宋承志　王兆相　熊光楷　等文
徐肖冰　苏　静　邹健东　等摄



军中老照片

——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郑鲁南　主编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军中老照片 ——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一直陪同在毛主席身边的江青拍摄了这张毛主席在 5 天视察南泥湾过程中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照片上毛主席右边上衣口袋里看上去装有鼓鼓囊囊的东西，正是我当年给毛主席装进去的半只烧鸡。

——宋承志

陈赓和周希汉站在一座攻克的碉堡前。陈赓笑容满面，周希汉穿着日本军大衣。透过这张照片，让我们看见了将军打了胜仗的自豪和喜悦。

——徐肖冰

部队在铁路一侧埋伏，待一批日军走近，部队一跃而起，齐声怒吼，“举起手来！”面对突然出现的八路军，日军个个惊慌失措，纷纷举起双手。此时，我和一一五师宣传科科长康矛召冲上前去，赶紧拍下了日军举手投降的镜头。

——龙实

战争期间，黄克诚因为眼睛高度近视，骑马行军指挥作战很不方便，于是就改乘自行车。而这个自行车的“驾驶员”就是时任新四军三师司令部通信参谋的我。

——王扶之

1958 年，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总政治部专门成立了国庆十周年筹委会，同时，筹建军事博物馆。在征集文物中，当时已任空军副司令的谭家述送来了这张珍贵的照片。一见照片，真是喜出望外。没想到，我又看到了 30 多年前长征中的自己。

——贾若瑜

上架建议：图文纪实

ISBN 978-7-5033-2244-0

9 787503 322440 >

定价：29.00元

宋承志　王兆相　熊光楷　等文
徐肖冰　苏　静　邹健东　等摄

军中老照片

——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军中老照片：老照片背后的故事／郑鲁南主编.—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033-2244-0
I. ①军… II. ①郑… III. ①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史料 IV. ①E29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23614号

军中老照片——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主　　编：郑鲁南
责任编辑：郭米克
责任校对：宛　玲
装帧设计：北京天青石企业形象策划中心
　　http://www.lazuli.com.cn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100035
电　　话：（010）66531659
E- mail: 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　　本：230x172 1/16
字　　数：225千字
印　　张：18
印　　数：1-8000册
版　　次：2010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33-2244-0
定　　价：29.00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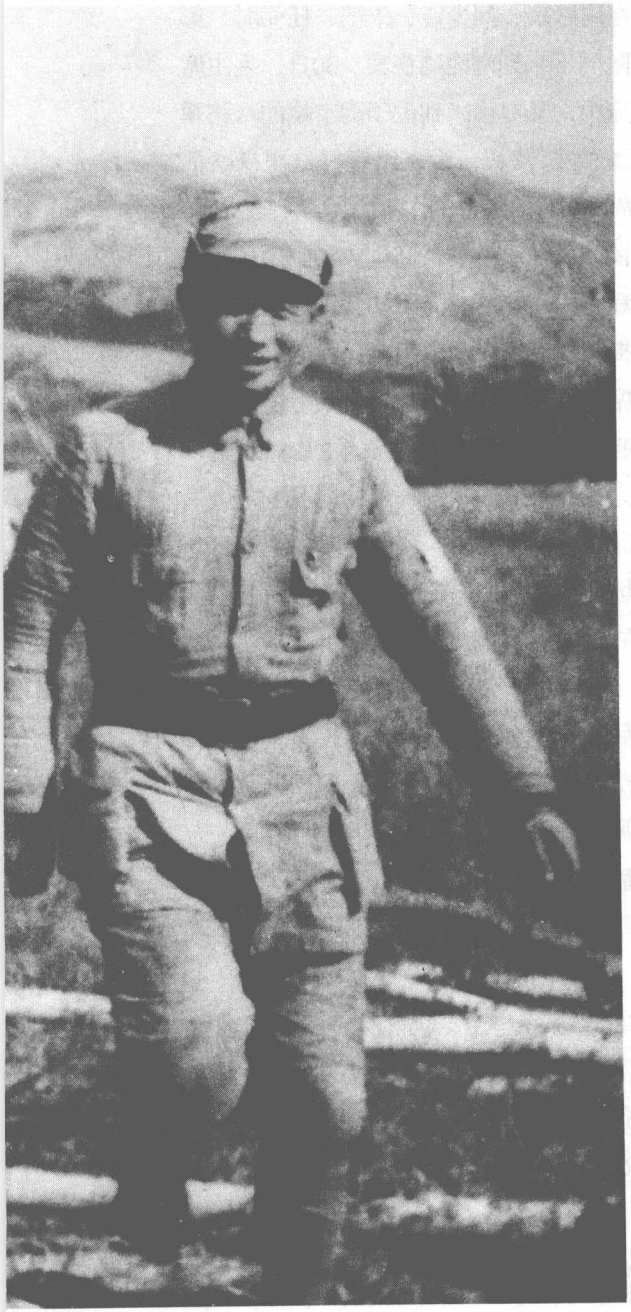
毛主席视察南泥湾炮兵团 004 宋承志/文 江青/摄
陈赓打榆社 007 徐肖冰 文/摄
等待白求恩做手术 013 罗光达 文/摄
陈庄战斗 016 王雁/文 沙飞/摄
王秉璋在平型关大战中 020 王润西/文
陈毅、粟裕视察炮阵地 026 康晓燕/文 杨玲/摄
陈毅司令员在坦克上 029 陈人康/文 陈士榘/摄
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伪总统府 032 邹健东 文/摄
第二军进军新疆的艰苦历程 036 王北来/文
宣传车为北平和平解放打前站 039 秦学惠/文
朱德总司令在机枪训练班上 042 苏晓林/文 苏静/摄
毛泽东与秋收起义部分同志合影 044 刘松柏/文
井冈山的同志们 047 熊光楷/文
陕甘边独立第一师唯一的一张合影 050 王兆相/文
长征中的一张合影 053 贾若瑜/文
首战平型关战斗中的“无名”参谋姜洪照 054 姜毅生/文
陈伯钧参加苏区党代表大会——在延安的生活片段 058 陈进元/文 海伦/摄
马宁与日本友人香河正男 061 黄晓意/文 史沫特莱/摄
陈庄奋力折“牛刀” 063 南溪/文
邓子恢率新四军民运队胜利归来 067 邓小燕/文 叶挺/摄
李天佑与“独腿”将军钟赤兵的三张照片 069 李亚宁/文
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倡导的爆破战术 074 罗小明 黎小弟/文
自行车上的指挥部 078 王扶之/文
周希汉，护送炮兵团回延安 081 韦晓咏/文 徐肖冰/摄
坚持在大青山 086 张秀英/文 王锦/摄
张震参谋长提议合影照相 088 胡文良/文 任泊生/摄
“皖南事变”中的王培臣 090 罗颖/文
谭希林在大桥战斗中 093 谭晓嘉/文

端炮楼 097 刘丁玲 刘兰丰/文 刘峰/摄
胡奇才打冶源 099 胡东平/文 胡奇才/摄
芝麻部歼敌 102 赵兴元/文 胡奇才/摄
我军将帅首次集体转移 104 滕飞/文
让敌人的飞机有来无回 107 康鲁平/文
日本鬼子举起手来 109 龙实/文 龙实 康矛召/摄
参谋长为英雄竞选唱大戏 112 罗小兵/文 罗义淮/摄
刘伯承司令员练打靶 114 裴植 文/摄
龙飞虎：跟随毛泽东离延安 117 龙剑辉 龙海岩/文
敌人在那里！ 120 邹健东 文/摄
山东即墨攻城记 123 姜京京/文 姜子宽/摄
李堡战斗前，周团长做动员 126 周锋 文/摄
攻克昌黎城的勇士们 129 伍时宝/文 吴群/摄
攻夺徐水，突击队冲上前 132 柳杞/文 蔡尚雄/摄
齐家埠之战——胜利者的欢笑 134 李恕 文/摄
保北战役中荣立特等功 138 宋双来/文 郝建国/摄
独四旅在运城战斗中 141 杨晓哲/文 王琦/摄
人人有本血泪账 146 李宣化/文 杨玲/摄
行千里 决一战——盂县歼灭战侧记 150 黎枫/文 黎枫 尤青/摄
邓小平政委观看华东野战军战绩图片展 156 康晓燕/文 杨玲 康矛召/摄
上蔡阻击战突围记 160 李云诚/文
送军粮 164 张韫磊 文/摄
骑兵追歼敌坦克 168 孟秀玲/文 杨玲/摄
杨罗耿兵团和“地面战场之神” 172 孔祥 /文 耿飚/摄
红旗直插太原城 178 韩红 王卉/文 韩荣志/摄
解放太原战役中的炮一师 181 张英/文
连战皆捷 184 张生文/文
进军大西北 187 李书良 文/摄

敌人在对岸 189 皮卫平/文 王纪荣/摄
第十兵团领导人进福州 191 陈鲁生/文 肖海/摄
千里行军进福建 194 张廷斌/文 肖海/摄
五十军进军鄂川 199 胡宝玉 文/摄
刘贤权将军在滇南战役中 202 安少杰 凌空/文 余林/摄
谭善和，巧用吉普车运粮 208 王晓建/文
练好本领打北平 211 郝建国 文/摄
1949，炮击东单临时机场 213 栾克超/文 齐观山/摄
朱总司令万岁 217 郑鲁南/文 孟昭瑞/摄
和平起义：包尔汉迎接解放军战车团入新疆 220 伊力夏提·包尔汉/文
金门战斗前，八十五师营以上干部合影 224 朱云谦/文
一个朝鲜军人和他的13张照片 228 朱伟民/文
三十九军军党委成员合影 234 潘荻 文/摄
一五六师“朝鲜团”入朝作战 238 邓鲁延/文
皮定均与神枪手张桃芳 242 王纪荣 文/摄
歼灭英军二十九旅皇家坦克营 244 胡宝玉 文/摄
战斗英雄赵积华 248 徐洁 文/摄
战前鼓动上阵地 251 张文苑/文
金城战役，炮击提前5分钟 254 杨东征/文
打扫战场，把敌人的武器搬回家 258 康海/文
美军不得不举起手来 262 胡春侠/文 张崇岫/摄
长津湖之战——东海胜利会师 264 郑鲁南/文 张崇岫 季一平/摄
美军的汽车插着白旗开到板门店 268 谷岩 王卉/文 蔡尚雄/摄
战俘回归祖国 270 袁汝逊 文/摄
火线释放美军战俘 272 黄继阳 程绍昆/文
亲历汉江阻击战 276 姜峰 文/摄
英雄阵地马良山 280 张炳新 文/摄
后记 286 郑鲁南



004 – 军中老照片



毛主席视察南泥湾炮兵团

宋承志/文　江青/摄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3年10月毛主席视察南泥湾。一直陪同在毛主席身边的江青拍下了这张毛主席在5天视察南泥湾过程中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照片上毛主席右边上衣口袋里看上去装有鼓鼓囊囊的东西，正是当年宋承志给毛主席装进去的半只烧鸡。照片右一为炮兵团团长兼政治委员邱创成，左一为作者宋承志，左四为政治处主任刘何（刘登瀛）。

1943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彭德怀、邓发、张闻天、彭真等陪同下来到南泥湾视察。30日，毛主席在视察第三五九旅返回延安的途中，又专程来到位于陶宝峪的八路军炮兵团视察。我当时任炮兵团教导营营长，为了组织好这次视察活动，团里分工我临时担任毛主席视察时的保卫工作。

上午，毛主席听取了炮兵团团长兼政治委员邱创成和副团长匡裕民的工作汇报后，兴致勃勃地和我们一起用餐。团、营领导能有机会陪同毛主席吃了一顿午饭，别提多高兴了。团里用自己种的菜、喂的鸡、养的猪，好好招待了毛主席一行，午饭后，我见餐桌上还剩有半只烧鸡，就拿了一张报纸包了起来，顺手装进毛主席的上衣口袋里，让毛主席带回去补补身子。因为在当时生活比较困难的情况下，烧鸡还是比较稀罕的东西。饭后，邱创成、我及团、营领导陪同毛主席到操场检阅部队。在毛主席去操场检阅部队的途中，一直陪同在毛主席身边的江青拍摄了这张毛主席在5天视察南泥湾过程中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

毛主席在操场检阅完部队后，还观看了连队的操炮表演和各种火炮器材。毛主席高兴地对邱创成说，炮兵团在南泥湾搞得很不错啊!看来困难这个怪物不是不可以克服的。你们做到战备、生产两不误，为将来成立炮兵学校打好了物质基础。毛主席的话，对炮兵团全体指战员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鞭策，部队士气大振。全团在完成生产和整风的同时，掀起了大练兵的热潮。

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时隔60多年，至今仍然挂在我家的客厅里。照片上毛主席右边上衣口袋里看上去装有鼓鼓囊囊的东西，正是我当年给毛主席装进去的半只烧鸡。照片右一为炮兵团团长兼政治委员邱创成，左一为我，左四为政治处主任刘何（刘登瀛）。

宋承志（1917.12~ ）安徽省金寨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参加了长征。原军委炮兵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陈赓和周希汉站在一座攻克的碉堡前合影。陈赓笑容满面，周希汉穿着日本军大衣。透过这张照片，让我们看见了将军打了胜仗的自豪和喜悦。

陈赓打榆社

徐肖冰 文/摄

陈赓不打无把握的仗，每次战斗前，他总是先把参战的团、营干部召集起来，在军用地图前把他的作战部署交代得非常清楚。另外，陈赓有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幽默，好开玩笑。除了彭德怀，他谁的玩笑都敢开。

八路军战士奋不顾身冲出战壕，冲向敌人的据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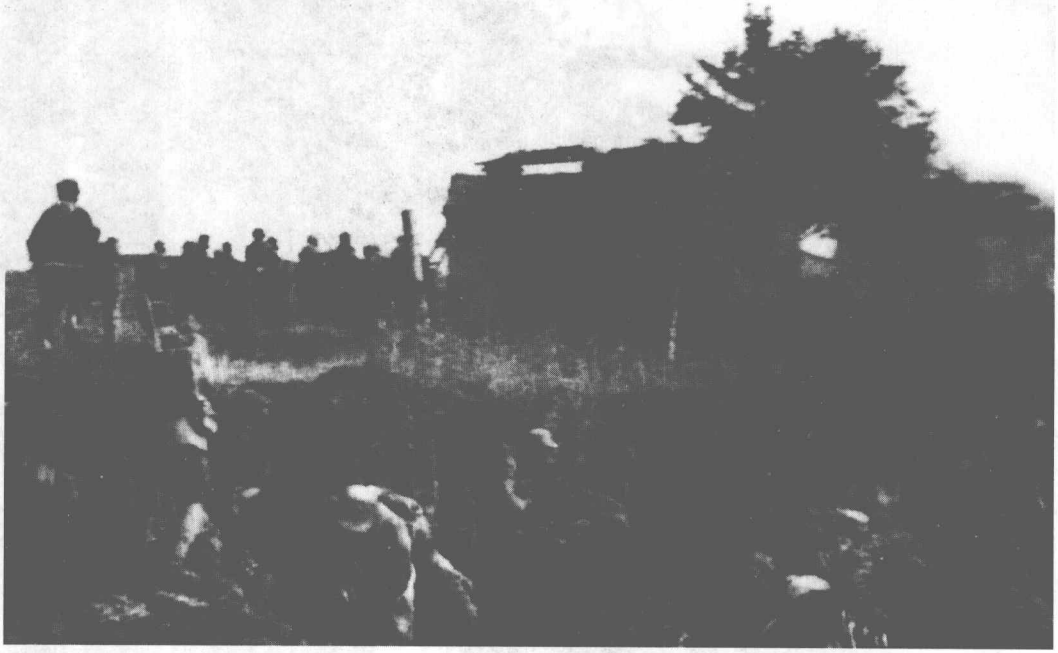
陈赓对于徐肖冰拍摄电影也非常关心，经常让战士帮忙拿东西、扛器材。对于徐肖冰的照片他也非常喜欢，还开玩笑说："徐肖冰，我看你打仗时拍照片挺利索的，干脆你留在我的部队打仗得了。拍照片固然有意思，可是哪有打仗过瘾。"这当然只是玩笑之词。

百团大战开始后，陈赓一直在前线指挥作战，屡立战功。攻打榆社城，陈赓又担负起主攻任务。

榆社是日军自正太路经平辽公路、辽榆大道向白晋公路各据点转运粮草弹药的主要枢纽之一。日军还企图将这条公路由榆社再向西南地区延伸，经过武乡与白晋铁路相连，达到分割太北根据地的目的。日军为了牢牢掌握这条公路的主动权，在榆社周围修筑了以东门外榆社中学为核心据点的堡垒群，并将周围修成绝壁，设置数道铁丝网，火力配置十分严密。这里地形险要，工事坚固，精兵守卫，日军视为固若金汤。根据事前侦察的情况，陈赓与参谋长周希汉决定乘夜近敌作战。夜里，攻击部队按部署朝榆社城方向行进，刚开始一切顺利，但就在部队主力接近西关城外的房屋时，忽然窜出来一条狗，朝隐蔽前进的队伍狂吠不止。狗的叫声惊动了城头上的日军，随之几颗曳光弹射向夜空，爆出耀眼的亮光，攻击部队来不及隐蔽，完全暴露在亮光之下。日军开枪了，盲目地狂扫乱射，在城四周布成了一个火力网。这一意外使攻击部队近敌作战计划流产。各路攻击部队只好冒着敌人的炮火攻击前进，但收效不大。天亮后，部队失去了黑夜的屏障，第一次攻击就这样因意外失利。

偷袭不成，只有强攻。陈赓和周希汉决定组织一批特等射手，专门压制敌人火力。晚上11点半，他们再次发起强攻，投弹组炸得敌人抬不起头。残敌再度收缩，躲进了榆社中学里，依托中学里的一个高大碉堡和四周的围墙，在四架飞机的掩护下，凭借优势火力做最后的殊死抵抗，并大量施放毒气。指挥所的陈





八路军攻克了大碉堡。

赓、周希汉和七七二团三营指战员正好处于下风，全部中毒，一个个头昏眼花，边流鼻涕边咳嗽。

为了陈赓的安全，参谋长周希汉坚持要他到后方指挥所去。陈赓想起师长刘伯承战前的电报，要三八六旅务必在两天之内歼灭榆社日军，并夺取榆社县城，就果断地说："我要看到你们打下榆社才走。"

在攻占过程中，有个碉堡的位置很重要，敌人的火力凶猛，如果不智取、单从正面进攻，会给部队造成很大伤亡。陈赓和周希汉召集大家开会，一起想办法。经冷静地分析形势，他们决定采取坑道作业，把坑道挖到敌人核心阵地内，用棺材装上炸药实行爆破，让敌人尝尝坐上"飞机"的滋味。

经过一昼夜的辛苦劳动，挖洞工作终告完成。装满炸药的黑皮棺材很快被推进去了，不久，"轰隆"一声巨响，那座阻碍部队许久的大碉堡被炸塌了。榆辽公路上的敌据点被全部拔除，榆社城解放了，全歼该城守敌，日军指挥官藤本剖腹自杀了。

新闻摄影的崇高使命就是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世界。为更好地拍摄八路军歼敌的实战镜头，徐肖冰背着摄影机和照相机奔赴

太行山抗日前线。在拍摄攻打敌人盘踞的榆社县城时，陈赓对他说，这仗易守难攻，一定会很残酷，很危险。但徐肖冰一心想拍到更生动、更精彩的场面，甚至还想过把枪瘾，几次差点儿撞上了日本鬼子的子弹。被安排躲在坑道里偷拍战斗场面的徐肖冰，受战士们英勇战斗精神的激励，也实在按捺不住想要拍摄宏大场景的激情，跳出去扛起摄影机就拍，像战士挥枪作战一般。

看着身边的战友瞬间扑倒在血泊中，徐肖冰只想用手中的相机留住他们年轻的身影，记录下这些战士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迸发出的无畏和悲壮。可是刚拍了几个镜头，敌人的机枪就扫过来了，子弹不断掠过眼前，硝烟滚滚。几个战士刚把他拽回坑道，又一梭子子弹更猛烈地打了过来。“真险，再晚一会儿，我就光荣了!”回忆起当年在激战中拍摄电影的情景，徐肖冰仍十分动情：“有些镜头是爬过战士的尸体拍的，现在想起来心里还发颤。”战争是无情的，人却是有情的。



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十六团的张义周排长在攻打榆社时英勇牺牲。

榆社城的外围被攻克了，徐肖冰跟在战士们后面接近了城里的一个院子。敌人躲在里面负隅顽抗。战士们就向里面扔手榴弹，炸得院里的敌人哀号不已。徐肖冰想拍下敌人被炸的真实场面，就一下子冲到了院子里边，刚想拍，就被一个战士一把拉了回来。他对着徐肖冰吼道：“你不要命了？敌人会把你的脑袋打碎的!”徐肖冰就只好从后面找缝隙拍敌人的惨相。

仗打了三天才把城攻下来，可是就在最后清点战利品的时候出了事故，徐肖冰也差一点儿把命搭上。战斗结束后，徐肖冰微

微闭上了紧张了三天三夜的眼睛，但战斗的惨烈，仍使他的内心一时无法平静。略显疲惫的他全然没有料到，就在此时，危险正在向他袭来。远处，战士们在清点缴获的一门大炮时，不小心拉动了炮栓，没想到炮筒里还有一发炮弹，滑膛而出的炮弹在距离徐肖冰不远处爆炸了。一声巨响，土石裹着弹片四溅，地面剧烈地颤动着，徐肖冰随之倒地失去知觉，被炸起来的泥土盖在了下面。

不知过了多久，徐肖冰被大家扒了出来，弄醒了。还好，他只是被震晕了，没有受伤，身体也没什么大碍。等他知道了是怎么回事，就赶紧端起相机拍了几张照片。可他刚受过剧烈震荡的脑袋还是晕的，眼也发花视物不清，等照片冲出来一看，焦点都是虚的。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但是徐肖冰觉得，那张模糊的照片是他经历战争最好的见证。

徐肖冰还亲眼看到身边的一个战士被敌人的机关枪扫中了脑袋的场面，即用特写定格了他的头部画面。泪水模糊了徐肖冰的视线，但他还是用镜头记录下了这场战斗的一个个瞬间，留下了一组真实的战争资料照片。

战事告捷，徐肖冰给陈赓和他的搭档周希汉照了一张特殊照片：两人站在一座攻克的碉堡前，周希汉微微一笑，陈赓笑容满面，滑稽的是他们还穿着日本兵的军装。透过这张照片，可以想见打了胜仗的将军心情何等愉悦。（徐肖冰 口述 童煜华 整理）

徐肖冰（1916.8~2009.10）浙江省桐乡县人。1937年冬赴延安，先后在八路军陕甘宁边区抗敌电影社、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等单位从事电影摄影和新闻摄影工作。曾任第三、四届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

等待白求恩做手术

罗光达　文/摄



不断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员，等待白求恩大夫给他们做手术。

1939年10月下旬，日寇突然集结了2.3万多兵力，对我晋察冀边区发动大规模的冬季大“扫荡”，我奉命随战斗部队到涞源摩天岭一带进行战地摄影。晚秋季节，白天可以穿单衣行军，而夜晚，摩天岭上已是雪花纷飞。拂晓时，我战斗部队开始向摩天岭的敌人据点猛烈攻击，不久即攻克了据点，烧毁了敌人的仓库。指挥部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部队立即向有利地点转移。当我随部队途经涞源孙家庄这个小山村时，看到村口小庙前停放了好几副躺着伤员的担架，小庙里搭了一个手术台。我走到庙前一看，原来是白求恩大夫率领的战地医疗队正在进行工作。穿着白布衣服的医务人员正紧张地给伤员们检查或包扎伤口，白求恩也正在手术台前给重伤员作手术。我看到这样生动的场面，立即不失时机地抢拍了医疗队活动的各种镜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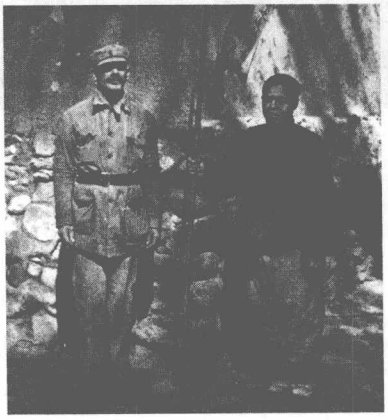
小庙前的担架，不时地把经过治疗包扎好的伤员运送到安全的后方去，同时又不断地接收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员。伤员们听说白求恩大夫给他们做手术，脸上都露出宽慰和信任的神情。前方胜利的消息传来，伤员们更为振奋。

我看到白求恩大夫认真地给每个重伤员作检查和作手术治疗。其中有个重伤员后背被炮弹片打伤，伤口很大，弹片深深地嵌在肌肉里，白求恩很快用手术工具取出了一块较大的弹片，但还有一块较小的弹片深嵌入后肋骨附近，紧挨着胸腔后壁。这是一次难度很大的手术。白求恩额头上流着汗珠，全神贯注地逐渐扩大伤口，经过数十分钟的努力，终于在不影响伤员内脏安全的情况下，顺利地取出了小小的弹片。他用带胶皮手套的手指，轻轻地从手术夹子上取下弹片，向周围的医务人员展示了一下，这时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难得的笑容。这微笑表现了白求恩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显露了他为伤员的得救感到的宽慰和喜悦。

白求恩虽已连续工作多个小时，但他毫不顾及自己的疲劳，

一个接一个地给重伤员做手术，我也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手术台，并随时准备抓拍生动的瞬间。他的工作态度是那样严肃、认真、他的动作是那么熟练、敏捷，注意力高度集中。他对自己要求极严，对周围协助他工作的同志，也不允许有任何疏漏马虎。我看到有一次护士把手术工具拿错了，还有一次护士配合动作稍微慢了些，他就严肃批评，甚至用有点儿上火的口气说："这是战场，时间就是生命，知道吗?"他这种以身作则、一丝不苟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当时医疗队工作的地点，离前线只有几里地，密集的枪炮声清晰可闻，白求恩和战地医疗队的同志都沉着而紧张地抢救伤员。尽管通信员多次来传达指挥部要医疗队迅速向安全方向转移的指示，但白求恩坚持要把已经抬来的伤员全部做完手术后再转移。他认为给伤员早一分钟手术，就可以早一分钟解除伤员的痛苦，早一分钟使伤员脱离危险。在他的坚持和模范行动影响下，医务人员更加鼓足干劲，同心协力，加快抢救伤员，直到侦察员报告对面山上发现敌情时，才收拾手术器具，迅速撤离孙家庄。不久，敌人的先头部队就冲入了这个村子，等待白求恩做手术的伤员已经全部安全转移。



1938年1月，白求恩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领一个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带着大量医疗器材，奔赴中国，支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图为白求恩大夫在五台时，和民兵合影。

罗光达（1919.1~1997）浙江省吴兴县人。1938年赴延安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



陈庄战斗

王雁/文　沙飞/摄

陈庄，位于河北省灵寿县城西北约50公里的太行山腹地。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曾经是晋察冀边区政府和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后方机关的所在地。1939年9月，第一二〇师主力部队一部在师长贺龙和政治委员关向应的率领下，由冀中地区北越平汉铁路，秘密转移至陈庄地区进行休整，准备参加秋季反“讨伐”作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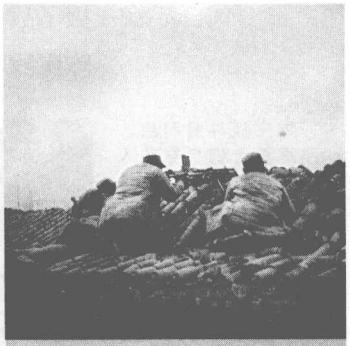
日军驻石家庄地区的独立混成第八旅团旅团长水源义重少将侦悉这一情况后，于9月23日，调集其第三十一大队的全部兵力共1500余人，由灵寿县城向陈庄进犯。日军首先占领灵寿至陈庄间的重镇慈峪，然后沿磁河两岸做声东击西的欺骗动作，企图迷惑和调动我军，乘虚奔袭陈庄。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及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根据日军企图和敌我态势，决定将计就计，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利用陈庄地区的有利地形歼敌。

从灵寿到陈庄，必须经过慈峪镇。贺龙亲率第一二〇师一部在慈峪到陈庄大路上布下口袋阵势，诱敌深入，歼灭来犯之敌。

沙飞主动要求参战，领导劝他到二梯队，可是沙飞不同意，他说，我是来参加战斗、拍战斗场面的，怕危险怎么能完成任务？战斗打响前，沙飞专门为八路军机枪阵地拍摄了照片。

陈庄战斗中八路军机枪阵地。





9月25日清晨，日军从灵寿出动。为了把敌人引入埋伏圈，晋察冀军区一部与敌交火，诱敌向慈峪而来。到达慈峪后，日军几乎投入全部兵力，发动猛烈进攻，很快占领慈峪镇。正当他们得意时，八路军又逼近过来，日军立即组织迎击，八路军佯装退却，引诱日军越来越接近设伏的地区。26日，日军继续发起进攻，一路打打停停，就要钻进“口袋”时，却突然回撤到慈峪，于傍晚从慈峪向灵寿方向撤退。27日，八路军获悉日军主力正在沿着小路向陈庄疾进，便重新进行了部署，由一个营的兵力绕道小路跟着敌人前进，一小部分兵力严密监视慈峪镇的敌人，主力则立即顺大路向陈庄方向追击。当日下午，各部队先后赶到陈庄外围，准备在敌人撤出陈庄时，将其一举歼灭。八路军“以变制变”，出敌不意，在陈庄大路两旁的高地上再次摆下“口袋阵”。28日，日军钻进“口袋”；在八路军猛烈射击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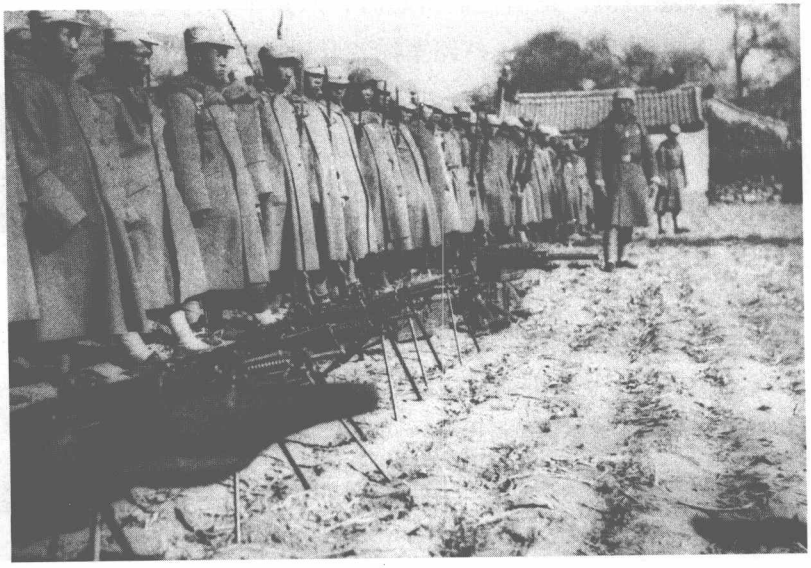
死伤惨重，爬上山逃走的日军不过二三百人，而且丢掉了全部辎重和重武器。从灵寿和慈峪赶来增援的800多名日军不断向八路军扼守的阵地攻击，但始终没能得逞。29日，八路军发起总攻，日军在飞机掩护下拼死顽抗。

9月30日，陈庄战斗胜利结束。八路军共毙伤俘日伪军1200余人，缴获山炮3门、轻机枪和重机枪23挺、长枪500余支、战马50余匹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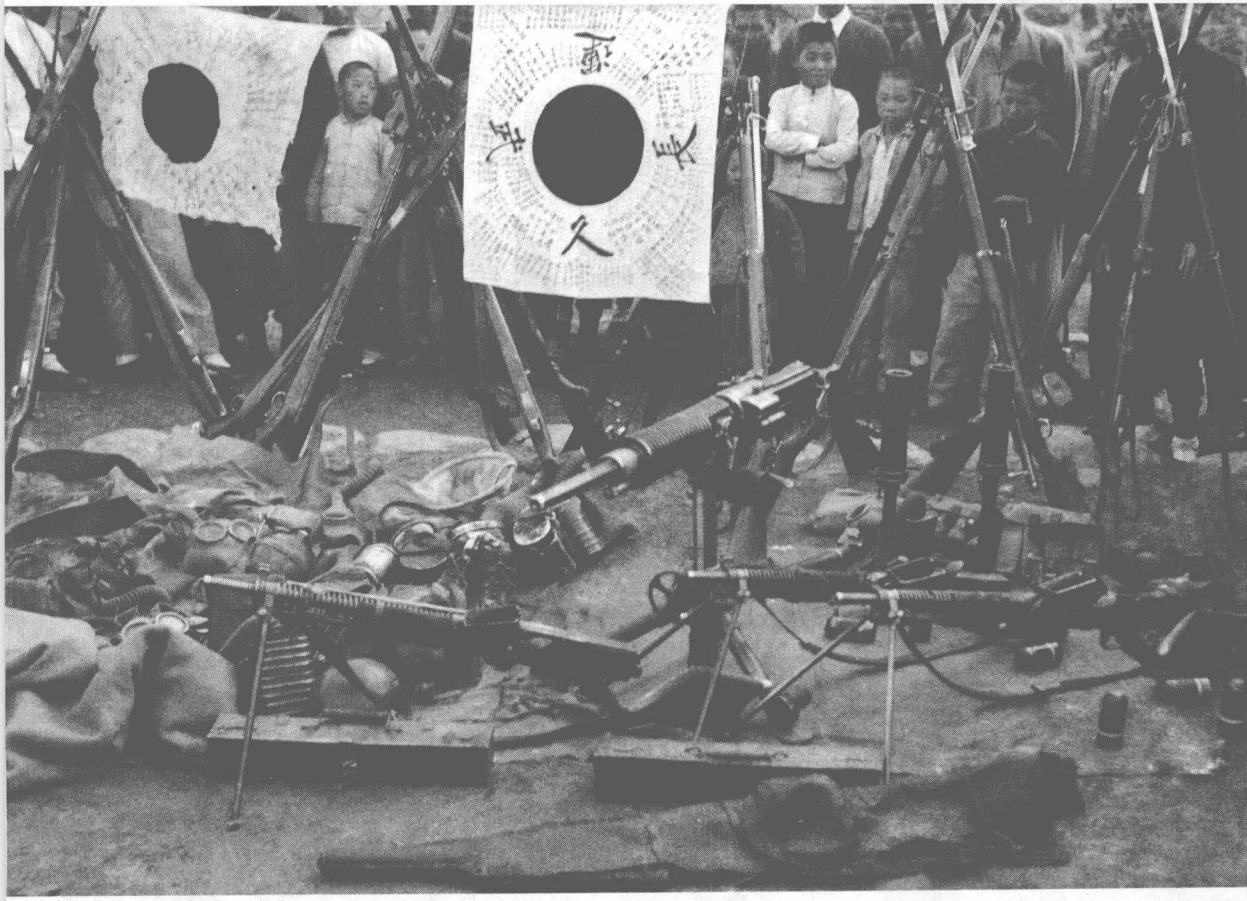
陈庄战斗，是抗战时期八路军集中优势兵力取得的第一个山地运动歼灭战的胜利。

蒋介石、程潜、卫立煌、阎锡山等均致电祝贺，并传令嘉奖。

此次战斗，晋察冀军区摄影记者沙飞随部队到前沿阵地，用手中的相机，拍摄了我军战士穿着缴获的日军大衣、用缴获的日军机枪打日军的珍贵镜头，拍摄了陈庄战斗缴获的战利品；还拍摄了战后的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这些照片，为后人了解陈庄战斗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



陈庄战斗胜利后，八路军勇士们身穿敌人送来的大衣。



在陈庄战斗中缴获的日军战利品。

沙飞（1912.5~1950.3）广东省开平县人。1926年7月参加北伐。1937年12月参加八路军，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报社副社长。



王秉璋在平型关大战中

王润西/文

这张平型关战斗的照片，王秉璋保留了半个多世纪。

1937年平型关大捷，国民党《扫荡报》记者前来拍摄采访。因《扫荡报》是国民党的复兴社办的报纸，林彪不愿接待，就将接待的任务交给了王秉璋。王秉璋多次与晋军打交道，且效果都挺好，师领导觉得这个任务对王秉璋来说一样会处理得得心应



平型关战斗。照片中，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左一）在看地图，副师长聂荣臻（左三）拿着望远镜、参谋长周昆（左二）在打电话、作战科长王秉璋（左四）在记录首长的指示、右一是位年轻的警卫员。

手。《扫荡报》记者拍摄了八路军清理战场的实况，包括清理缴获的武器弹药、服装、食品、日寇死亡状况和我方伤亡及民众拥军支前的盛况，还特意请一一五师领导到乔沟阵地补拍战前勘察及指挥战斗的情景。林彪、聂荣臻、周昆、王秉璋等人进入了摄影师的镜头。这张珍贵的老照片就这样诞生了。

几天后，《扫荡报》记者送来一沓照片，那时，拍张照片十分不易，王秉璋将照片分给了相关的同志，自己仅留下了这张一一五师领导在山西省平型关乔沟山头指挥所的照片，照片中，林彪（左一）在看地图，聂荣臻（左三）拿着望远镜、周昆（左二）在打电话、王秉璋（左四）在记录首长的指示、右一是位年轻的警卫员。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王秉璋转战晋、冀、鲁、豫、皖、苏、闽、黔、浙、赣等省，许多东西都丢失了，唯有这张珍贵的照片被幸运地保存下来。如今，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捷已过去了72年，但是这张照片的风采依旧。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王秉璋所在的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及红七十四师共同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

8月22日，一一五师在陕西三原改编后，奉命北上，开赴晋东北抗日前线。作为司令部作战科长的王秉璋随师部经韩城芝川镇进入山西省。为了保障部队的给养及加快行进速度，王秉璋奉师领导命令以一一五师“运输司令”的头衔与阎锡山交涉铁路公路运输、经费及部队冬装等事宜。当时日寇疯狂进犯我华北地区，国民党军节节败退。阎锡山希望八路军尽快到达抗日前线，抵御日寇，以减轻晋军的压力，派副官与王秉璋具体商议，双方交涉比较顺利。我军提出的车皮数量，阎锡山的铁路局长如数提供，还调拨了7个包厢车。那时，我八路军中的大部分官兵，不仅没有见过火车，更没有坐过火车。为保证乘车安全，王秉璋参考刘伯承元帅写的《关于部队行军注意事项》的条例写出了如何组织、指挥部队上车、上车后的注意事项等，还用一个连演练后下发执行。至此一一五师大部队在侯马登上了阎锡山调拨、山西省特有的小火车。以车替代步行，使一一五师的行进速度大大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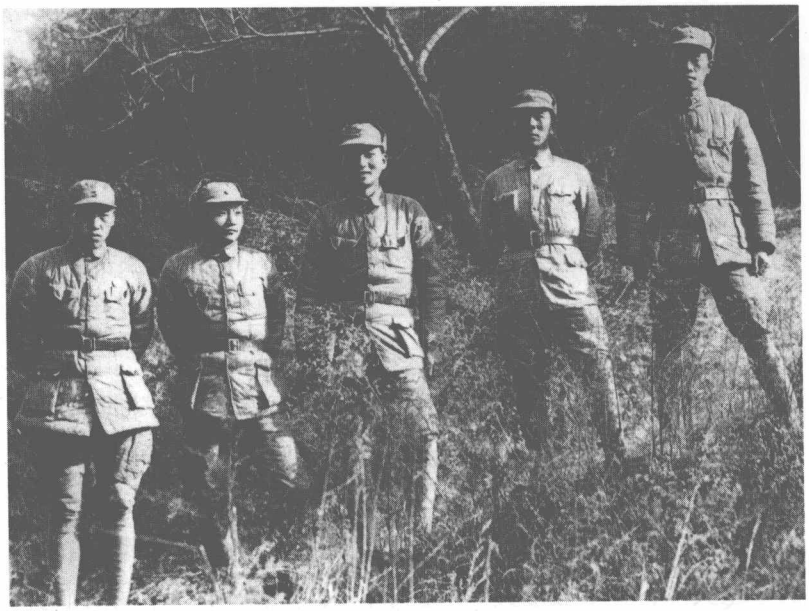
快，似神兵天降，及时赶到平型关阻击疯狂进犯的日寇。

那时还有一个小插曲：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曾找八路军要几节包厢，因为我部人多、任务紧急，王秉璋没有答应。后来得知何柱国是同情共产党抗日的。尽管事情已过去了五六十年，王秉璋仍有些后悔，多次表示：如果那时知道何柱国是同情共产党的，不管八路军多么困难，多么需要火车，也要设法挤出几节包厢给他，团结抗日是那时的宗旨嘛！

林彪、聂荣臻因参加洛川会议没有和部队同行。洛川会议后，林彪于9月上旬与一一五师先头部队三四三旅在太原会合。那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曾到太原与阎锡山商谈共同抗击日寇的部署。

20日前后，王秉璋随林彪等师领导勘察了地势。山西省境内的平型关（古称“瓶形关”）位于恒山与五台山之间、山西与河北交界处的古长城线上，地势险要，是灵丘与雁门关之间的交通要道，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其山口至灵丘东河南镇，是一条由西南向东北延伸的狭窄谷道，长约十余公里，沟深道窄，沟底窄得只能通过一辆汽车，两侧高地便于我军隐蔽设伏及居高临下打击敌军。林彪抓住敌军长驱直入华北，野蛮骄横、但疏于戒备的弱点，意在平型关阻击日寇。

23日，副师长聂荣臻到达上寨，师长林彪将自己勘察地形的情况及意图与之交流，并一同到前沿阵地，随即召开战前干部会议，传达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指示一一五师在平型关阻击日寇的命令，进行战前动员。林、聂决定在平型关东北的乔沟一带，利用两侧高地有利地形采取一翼伏击的战术，歼灭进犯之敌。会上，布置了各旅、团的伏击地点和任务。会后，各部队迅速进入阵地。25日清晨，正当日寇大摇大摆毫无戒备地来到乔沟，进入我军伏击圈时，林彪命令隐蔽在侧翼高地的六八五、六八六及六八七团向行进中的日军发起猛攻。骄横的日军遭突然打击，



1938年冬于山西省隰县苇沟村。自左至右：王秉璋、苏静、张雄、石新安、杨初振。

尚未清醒部队已被拦腰、斩头、断尾。王秉璋与徐海东率领的三四四旅一部被24日晚大雨引发山洪所滞，未能赶上9月25日清晨发起的对日寇的速决战。下午赶到时，战斗已进入尾声，王秉璋立即投入到清扫战场的战斗总结中。此役，经我军民浴血奋战，以劣势装备打败了号称“钢军”的日本板垣师团二十一旅团，歼灭日寇1700余人。毁敌汽车百余辆，大车二百余辆，缴获日军大炮、炮弹、机枪、步枪、战马等大量军用物资。此时，王秉璋受命接待了阎锡山的一个上校参谋，该参谋带着作战计划来到一一五师师部，要求一一五师配合晋军向日寇出击。次日，林、聂按作战计划派部队向日寇出击。战斗打响后，部队发现晋军没有按计划行动，上报师领导，林彪、聂荣臻命令撤出战斗。同时派王秉璋带一个营和两个迫击炮连负责掩护，王秉璋发现在两间大房子里堆满了晋军留下的迫击炮炮弹，即下令两个迫击炮连的12门迫击炮，分成两组，使用这些炮弹轮流向日寇射击。两小时后，胜利完成掩护任务。

平型关大捷是我军改编为八路军后首战日寇威名扬天下的一场艰苦的歼灭战。战斗胜利的第二天，毛泽东主席给一一五师发来贺电：“庆祝我军的第一个胜利”。八路军首战告捷的消息迅速传播，全国各地、各界纷纷发来贺电、贺信。平型关大捷不仅增强了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自信心，也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日的士气，为抗日战争揭开了胜利的篇章。

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画报社的工作人员征集革命文物，王秉璋从相册中找出这张发黄的小照片，告诉工作人员，这是他留下的唯一一张在1937年平型关大战时拍摄的照片。工作人员拿去翻拍了。1983年，聂荣臻元帅回忆录编写组成立后，编写组成员曾拿着一张照片来请王秉璋辨认，王秉璋一眼就看出了那张聂帅拿着望远镜站在树丛中的照片，也是在平型关战斗时拍摄的。

谈起平型关大捷，王秉璋总是那么兴奋和自豪，他说：战前不仅我们不知道、连师领导也不知道来犯的日军指挥官是谁，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电文也未告知。战斗胜利后，从敌方的广播和缴获的地图等战利品中才知道，被我一一五师挫败的竟是被称为“中国通” 的日军名将板垣征四郎。我们以劣势装备打败了装备精良的日军，整个战斗不仅是战斗速决，也打得十分艰苦、惨烈，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伤亡人员中有许多是从长征中走过来的同志。

作为幸存者，王秉璋保留的不仅仅是一张照片，而是那个年代永久的记忆。

王秉璋（1914.1~2005.9） 河南省安阳县人。1931年1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参加了长征。原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国防科委党委书记。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1947年3月，华东野战军缴获了国民党军大量的大炮和坦克，并迅速组建了特种兵纵队，任命陈锐霆为特种兵纵队司令员。这张照片就是陈毅、粟裕视察炮阵地时拍摄的。手执望远镜的是陈毅、看地图的是粟裕，他们在炮兵二团副团长李安邦、炮兵参谋杨善达的陪同下亲临特种兵纵队视察炮兵部队射击。



陈毅、粟裕视察炮阵地

康晓燕／文　杨玲／摄

上世纪60年代初，新建成的中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国革命展览，原华东野战军新华社前线总分社社长康矛召和摄影记者杨玲夫妇应邀前往参观，当他们进入“解放战争”厅时，迎面墙上悬挂的巨幅照片就是这张《陈毅、粟裕视察炮阵地》。似曾相识的照片立即引起了杨玲的注意，杨玲凝神细看，轻声问康矛召：“这张底片不是在咱们家里吗？”杨玲很纳闷，底片在家保存着，军博是怎么放大的呢？忽然她想了起来，1947年3月，华东野战军缴获了国民党军大量的大炮和坦克，并迅速组建了特种兵纵队，任命陈锐霆为特种兵纵队司令员。特种兵纵队副参谋长董菀卿为了欢迎陈毅、粟裕首长视察炮阵地，特地请她去照相，当杨玲赶到现场，正好碰上陈毅拿着望远镜、粟裕看地图视察炮阵地的情景，她不由得轻步靠近，不引人注意地摄取了这一既威武雄壮又自然生动的场面。

当时，这张底片冲出后印了小样，杨玲送给



陈毅、粟裕视察炮阵地 – 027

了一位炮兵干部。

70年代末，曾任特种兵纵队炮兵二团营长的杨廷槐同志来杨玲家做客，杨廷槐在杨玲和康矛召的相册中看到了这张照片，他说他也曾有杨玲当时送的一张小样，后来被征集到军事博物馆去了。原来杨玲拍摄的《陈毅、粟裕视察炮阵地》的照片就是这样被翻拍放大成巨幅照片挂在了中国军事博物馆里。

80年代初，杨玲和康矛召把他们在战争时期所拍的近千张底片，捐献给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这张原底片就在其中。

我在查寻中发现，“文化大革命”时期军事博物馆也分了派系，曾因两派对《陈毅、粟裕视察炮阵地》照片的真假看法不一将这张照片取下。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上将分管军事博物馆的工作，“文革”初期被揪去批斗，其秘书叶家林就是“小鬼”也要陪斗。叶家林曾是华野特种兵纵队的记者，当年就是他和杨玲一同去炮阵地采访的，他亲历过这个场面和这张照片产生的经过。看到派性使这张照片入库，他当时无能为力。1973年，因工作原因，叶家林几次去军博办事，都关心着这张照片的命运，为什么还没有挂出？于是，他给当时军事博物馆馆长张景华写了一封信，证明这张照片的真实性，得到军博的感谢。叶家林今年已经90岁了，说到这些事还记忆犹新，逻辑严谨，充满感情。

对历史负责，不仅是亲历者的责任，也是我们的责任。

杨玲和康矛召留下的大量老照片，丰富了中国革命史，丰富了老首长们的回忆录和老战友们的记忆，也丰富了我们这一辈对老一辈流血牺牲打江山的记忆。

杨玲（1922.7~2001.10）山东省临沂人。1939年参加八路军，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外交部一秘。

陈毅司令员在坦克上

陈人康/文　陈士榘/摄



这张照片拍摄于鲁南战役。照片中，陈毅司令员稳稳地坐在高高的炮塔顶上（后排中），脚踏在炮身上，泰然自若。张云逸（前排右）、张鼎丞（前排左）站在坦克前悠然自得，那个被俘的坦克手，居然像卫士一样站在陈毅司令员身边……这哪里看得出是硝烟弥漫的战场，这是胜利者的微笑。

在陈士榘眼里，鲁南战役是我军打得最过瘾的一次大仗，特别是歼灭了国民党具有全天候机动能力的第一快速纵队，令整个国民党军队及他们的美国顾问团都大为震惊。当然，让陈士榘最难忘的还有这张照片。

鲁南战役第一阶段刚刚结束，陈士榘陪着陈老总、张云逸、张鼎丞巡视战场，陈毅司令员看到缴获了这么多的坦克、大炮，高兴得合不拢嘴。一些被俘的坦克兵见到陈士榘他们围着坦克左拍拍右看看，很不服气地说："我们在印度、缅甸打了三年，一直是向前冲，美国人对我们也刮目相看，想不到今天会败得这样惨！"不料话一说完，陈毅哈哈大笑，随后，兴致勃勃地爬到坦克上，陈士榘一见，连忙举起刚刚从蒋介石快速纵队缴获的德国蔡司相机，拍下了这个精彩瞬间。

照片中，陈毅司令员稳稳地坐在高高的炮塔顶上（后排中），脚踏在炮身上，泰然自若。张云逸（前排右）、张鼎丞（前排左）站在坦克前悠然自得，那个被俘的坦克手，居然像卫士一样站在陈毅司令员身边……这哪里看得出是硝烟弥漫的战场，这是胜利者的微笑。

1947年1月，中央军委将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陈士榘为参谋长、唐亮为政治部主任。

为了打好鲁南战役，陈毅司令员要陈士榘参谋长制订作战方案。陈士榘根据敌我态势，提出了基本的作战方案，方案很快获得通过。

1947年1月2日，当敌人还沉浸在元旦的喜庆之中，我军突然向敌人发起了进攻。敌二十六师首先遭到了我军的分割包围，被切断了退路。而这时敌二十六师的师长马励武此时正在地方参加元旦联欢，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正在台下津津有味地欣赏京戏时，他的部队已经大祸临头了。

第一快速纵队的司令蒋纬国也正在徐州怡然自得过元旦，让他始料不及的是他的快速纵队——其父蒋介石赖以发动内战的主力之一，

正处在我军的炮火中。

3日晚上，我攻击部队缩小对国民党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的包围圈，左右两路纵队猛打猛冲，将敌人压制在方圆不过十几公里的陈家桥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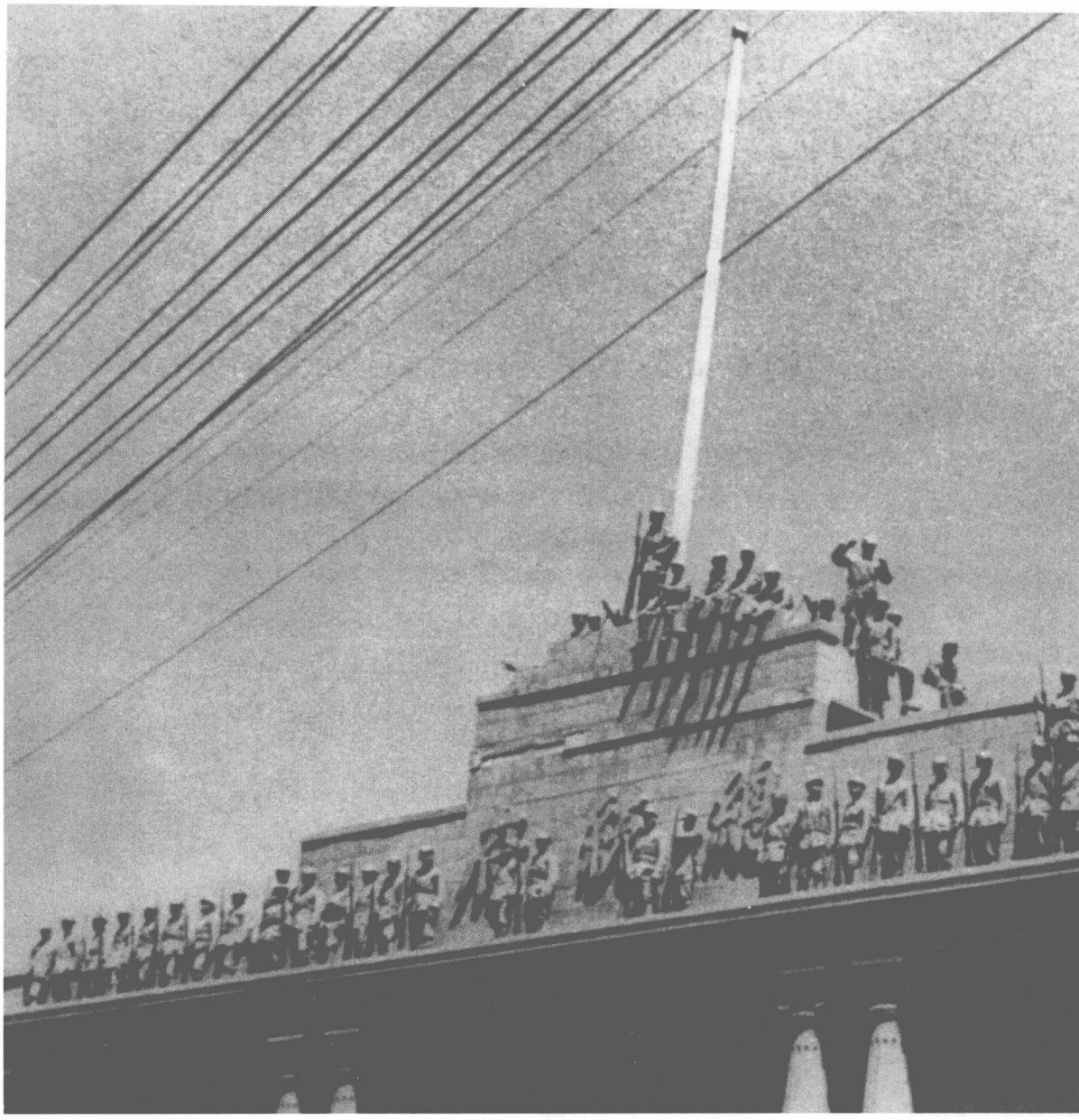
4日清晨，鲁南地区天气阴沉，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下雪，汽车、坦克时不时地就陷进泥里动弹不得。敌人的飞机由于天气原因也没有出动，机械化的设备都失去了应有的作用。本来我军可以用炮火将其全部摧毁，但为了缴获这些设备，陈士榘下令不再打炮，让步兵近距离杀伤敌人，将这些美式装备尽可能完整地保存下来，以便我军以后装备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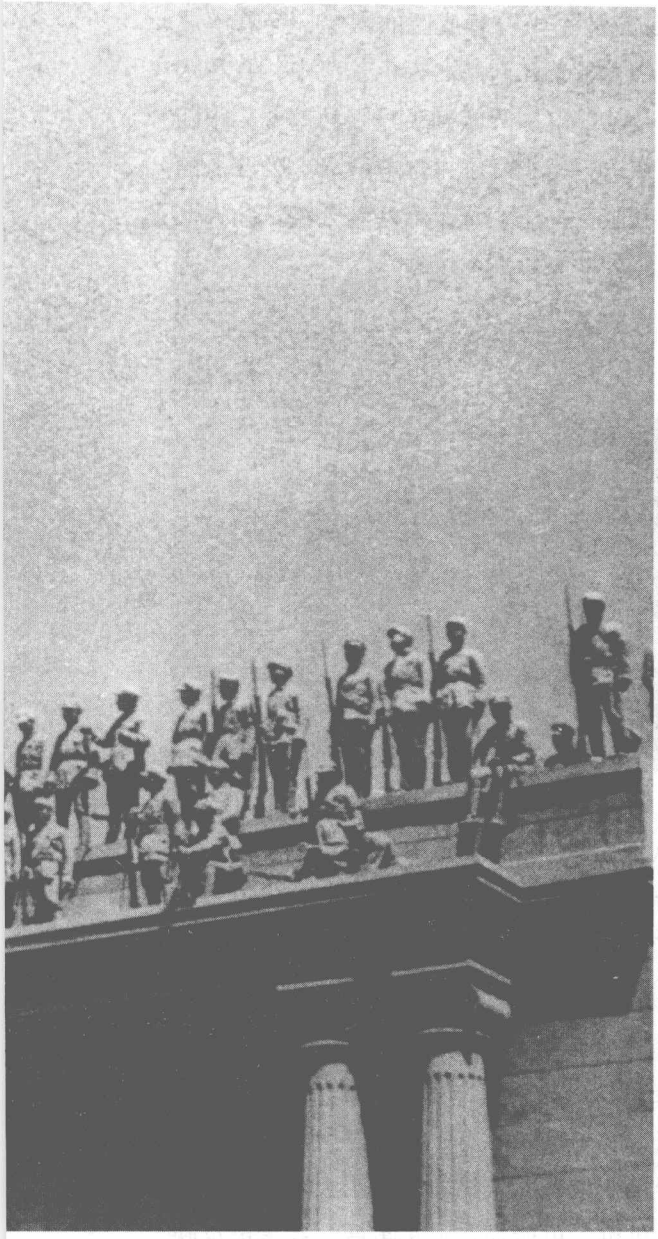
命令起了重要作用，战士们不再追杀慌乱的敌兵，对于第一快速纵队的装备，只要对我军没有威胁，一律给予看护起来。这样一来，不仅许多汽车、火炮、坦克都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大量的俘虏也都幸存下来。

日后，陈士榘受到了陈毅司令员的表扬。陈毅说："我们这回也可以搞快速纵队了！"鲁南战役之后，华野用缴获的装备成立了我军第一支特种兵纵队，炮兵出身的原新四军军部参谋处长陈锐霆出任特纵司令员。

历时18天的鲁南战役，不仅歼灭了敌军二十六师、五十一师两个整编师和一个快速纵队，歼敌5.3万余人，开创了解放战争以来华东战场一次歼敌的新纪录，还缴获了坦克24辆，榴弹炮、野炮、山炮104门，汽车474辆，轻重迫击炮113门，轻重机枪1025支，长短枪7000多只。同时，我华中、山东野战军也积累了对敌机械化部队作战的经验，并为尔后组建自己的特种兵纵队提供了最初的物质准备。

陈士榘（1909.4~1995.7）湖北省荆门人。192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参加了长征。原军委工程兵司令员兼特种工程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伪总统府

邹健东 文/摄

进入伪总统府的大门楼到各个办公室观察后，邹健东觉得选择拍摄最有代表性的典型画面，还是大门楼最合适，有“总统府”三个大字，再加上战士们站在门楼上高唱胜利的歌曲，这样的构图很理想。邹健东找到住在伪总统府的连指导员谈了他的要求，指导员说要请示上级。过了几天邹健东来到这里实现了他的构思——战士们登上伪总统府的门楼，庄严地把伪总统府踏在脚下。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坐着解放区的木船，穿着解放区妇女做的布鞋、布袜，登上了长江南岸。夜色苍茫中，我和八兵团军分社采编主任季音及总部电影分队到了丹阳县郊区，跟随二十军冒雨追击敌人，在京杭国道围歼了一部分敌人。公路上的大炮、枪支弹药、皮箱、衣服、马车、汽车堆塞着公路。敌人还有五个军被包围在广德、郎溪山区，只打了两天就全部被歼灭。我和电影分队郝玉生等从溧阳到了南京，那时已经是5月初了，进了城，看到在南京新街口的高楼上，挂了红布长幅，上有欢迎解放军的标语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标语，街上的群众看到解放军都满怀喜悦、笑脸相迎。



京杭路上，追击敌军的二十军战士，不顾敌人留下的大批大炮与辎重，继续前进，消灭敌有生力量。

蒋介石在南京建都22年了，作为新华社的摄影记者就会自觉地意识到首要任务是先到伪总统府采访。5月上旬的一天，季音、金雨困和我一同前往，到了伪总统府，向看守大门的卫兵打了招呼，说明我们是新华社的记者来采访的。进了大门就是不大的停车场，战士们围着看机枪，可能是在上军事课。我考虑反映蒋家王朝的灭亡、人民伟大的胜利，伪总统府的变化是最有代表性的。从停车场向里走要通过一个不大的厅，也就是长廊，里面

有个大会议室，蒋介石接见大使递国书、官员每周的周会就在这个会议室进行。对门就是蒋介石的办公室、休息室，这房子不大，办公桌也不大。再向里走是后楼，蒋介石和高级幕僚们开重要会议和重大决策在二楼的会议室进行。我看到墙上的日历仍是4月22日。

进入伪总统府的大门楼到各个办公室观察后，我觉得选择拍摄最有代表性的典型画面，还是大门楼最合适，有“总统府”三个大字，再加上战士们站在门楼上高唱胜利的歌曲，这样的构图很理想。我找到住在伪总统府的连指导员谈了我的要求，他说要请示上级。

过了几天，我来到这里实现了我的构思——战士们登上伪总统府的门楼，庄严地把伪总统府踏在脚下，向全国人民、向全世界正义的朋友们说：解放军胜利了，中国人民胜利了！

作为摄影记者，如何把伟大的历史巨变、人民的希望反映出来？在这具体情形下，拍一张大场面最理想。《人民解放军占领伪总统府》这张照片较好地表达了这样的意境。拍照时，我军战士精神抖擞，歌声嘹亮。我看到一个战士坐在旗杆下，突显出一条阴影，白色的墙上加了一束黑条，引起人们深一层的想象。伪总统府前的电线使天空在画面中有所变化，起到了一定的气氛渲染和画面均衡作用。我认为拍这张照片虽看似容易，然而要想到利用这典型环境、以这样的形式来反映人民的伟大胜利，只有亲身经历过国难的耻辱和受过封建反动政府压迫的痛苦和贫困，从战争中受过锻炼才会意识到。50年过去了，这幅南京解放的照片一直成了革命胜利的象征。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还将永远在历史的记忆中熠熠闪光。

邹健东（1915.11~2005.12）广东省大埔县长治人。1935年参加革命，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春参加新四军。原新华分社摄影组组长、高级记者。荣获文化部颁发的“造型艺术成就奖”。

第二军进军新疆的艰苦历程

王北来/文



这是一张1949年1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二军进军新疆，到达西部边陲重镇喀什时拍摄的照片。在队伍中向欢迎群众挥手致意的那个人就是时任第二军政委的王恩茂。其右为南疆警备副司令王僧根少将，其左依次为政治部主任左齐、四师师长兼政委杨秀山和副军长顿星云。他们身后的高个军人为起义高参吕公威少将。

1949年9月25日、26日，国民党新疆警备区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代表国民党军政当局向党中央、毛主席发表了和平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接受党中央的领导。从此，中国最大的省区、占国土面积达六分之一的新疆实现了和平解放。

10月4日，陶峙岳将军从迪化（乌鲁木齐）飞到哈密，5日晚乘车赶到酒泉，与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会面。陶峙岳向彭德怀报告了新疆的情况，初步商定由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二军进军南疆，第六军进军北疆。

10月9日，第二军进疆部队决定首先集中480~500辆军用卡车运送第四师全部、第五师师指及两个团和军指进疆。11日，四师在甘肃的玉门、安西集结准备出发。12日，五师师指及两个团由酒泉出发。部队在哈密会合后继续向南疆进军。

部队在到达南疆古城焉耆时，因车辆不足，油料缺乏，部分部队开始徒步前进。当时正值寒冬季节，部队装备、给养十分紧缺，但指战员们发扬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一步步地向西部挺进。从焉耆到阿克苏要行走20天，从阿克苏到喀什乘汽车也需要一天一夜的时间。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我进新疆的时候只有6岁，当时，在山西省河津县的第二军子弟学校也随部队一起进新疆，孩子们听到要去新疆和父母团聚的消息后，都异常兴奋，随后全校师生便开始了西行万里的大迁徙。从河津县出发时，年龄小的孩子乘坐牛车，大一点儿的孩子由教职员工带领徒步行走。途中不时地遇到国民党飞机的侦察、扫射和轰炸。每当这时，教职员工总是带领我们隐蔽躲藏，有时用身体掩护我们。三四天后，到达黄河边的风陵渡，乘坐木船或羊皮筏子渡过了黄河，在潼关乘坐火车到达西安，后乘汽车到达酒泉。在酒泉，第二军子弟学校的孩子们分别乘坐4架由苏军提供的里-2型运输机，飞往迪化。据说，在部队准备进军新疆时，

斯大林曾答应派大批飞机帮助解放军运送部队，部队也做好了空运进疆的准备。但实际上苏军派来的飞机又小又少，总共不过几架，根本不可能用来运送部队和装备。后来，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将军决定，用这几架飞机送我们这些孩子去新疆。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下着小雪，孩子们穿上特制的羊皮筒子，头戴苏式飞行帽，被苏联飞行员一个接一个像搬西瓜那样递上了飞机。苏联飞行员非常热情，每当他们抱起一个孩子的时候，都会用他们那长满浓密大胡子的嘴巴，在孩子们冻得通红的笑脸上亲吻一下。飞机从酒泉起飞，飞行了一天到达哈密，直到第二天下午，飞机才到达迪化机场。到达迪化后，我才知道，父亲王恩茂和郭鹏将军已率第二军进驻南疆喀什。随后我又乘坐汽车，经过六天行程，终于在1950年元旦前，与久别的父母重逢。

我永远忘不了这一段进疆的艰苦历程。我时常想，那些徒步跋涉，穿越戈壁沙漠，进军新疆的干部战士，一定经历了比我们多出好几倍的艰苦。正是因为这样，每当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脑海中浮现的不仅仅是各族群众欢迎部队进疆的场景，更多的是进疆部队的干部战士们在戈壁沙漠中艰难行军的身影。

王恩茂（1913.5~2001.4）江西永新赤石村人。1928年5月参加革命，参加了长征。原新疆军区政治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主席。政协第六届、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委员。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

宣传车为北平和平解放打前站

秦学惠/文



1949年1月31日清晨，东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队四辆彩车开出驻地，军乐队在前，戏剧队（即合唱队）在后。没料到，车开出没多远，一辆车就坏在了路上，我们只好乘三辆彩车前往北平西直门。

这张照片生动地记录了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宣传队宣传车首次进北平时的盛况。我当时就在宣传车上。

1949年1月中旬，东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队受命从驻地开往北平海淀镇待命，大家都期待着进北平城去宣传演出。1月30日，宣传队领导传达上级指示：我军与国民党军傅作义将军谈判达成协议，和平解放北平，命令军乐队与戏剧队乘四辆彩车进城，主要任务是宣传北平和平解放的方针政策，同时试探对方的诚意；会上，宣传队领导指定专人负责张贴告示，宣传我党的城市政策。而对我们要坐宣传车的宣传队员宣布的纪律是：不许带武器；不许下车；发生意外情况服从指挥。这样的要求和纪律，对每一位宣传队员来说，都充满了好奇和疑惑，不许带武器，发生意外怎么办？不许下车，如果意外情况真的发生了，难道在车上束手就擒？尽管会后大家有种种猜测，但是怀着对北平和平解放的向往，谁也没有怨言。

1月31日清晨，四辆彩车开出驻地，军乐队在前，戏剧队（即合唱队）在后。没料到，车开出没多远，一辆车就坏在了路上，我们只好乘三辆彩车直入北平西直门。我在第二辆车上，车经西直门时，大家不由得警惕了起来，原来城墙上及城门旁均有国民党军队荷枪实弹的岗哨，但我们宣传队员在车上个个雄赳赳的，毫无惧色，后来我们才明白，实际上我们是在为解放军入城打前站。进西直门后，宣传车应城内群众的要求，在瓮城内稍停，又应北京大学生的要求，车队经北京大学的正门穿入城内，城里道路两旁的群众自发地欢迎解放军入城，场面极其热烈。当车队到达北京前门老火车站时，恰好解放军第四十一军北平警备部队入城，我们车上的乐队立即为车下行进的部队演奏了“解放军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曲目，部队也很自然地跟着乐曲的节奏迈着整齐的步伐行进。来自各路的群众热烈鼓掌欢呼，高呼口号：“共产党万岁”“热烈欢迎解放军入城！”出现



出城的时候，大家兴奋不已，回头张望，只见城墙上和城门旁已换成了我军的岗哨，人民解放军与城内的国民党军队，交接了防务。

了一个迎接解放军入城的高潮。

当时担任张贴告示宣传党的城市政策的有战友文彪和另外一位同志，他的名字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车队绕城一周后转到西直门出城返回海淀镇。出城的时候，大家兴奋不已，回头张望，只见城墙上和城门旁已换成了我军的岗哨，解放军哨兵正向我们挥手致意——北平和平解放了。

按照双方达成的协议，1月31日这一天，人民解放军与城内的国民党军队交接了防务。国民党军队全部开出城外，接受解放军的整编。

至此，北平和平解放了。（郑鲁南 整理）

秦学惠（1930.2~ ）辽宁省大连人。1947年7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4年转业。原中央戏剧学院舞美系教授。



这张朱德总司令（站立者）在机枪训练班上讲话的照片，是井冈山时期红军初创时的真实写照，既珍贵又有价值，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

朱德总司令在机枪训练班上

苏晓林/文　苏静/摄

1933年2月，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消灭了敌人近两个师，缴获了大量的武器，但是缴获的轻机枪却成了摆设，因为装备简陋的红军战士没有人会使用它，为了充分发挥这些武器的最大效能，红军举办了机枪训练班。朱德总司令亲自为战士们传授使用机枪的要领。照片上，机枪训练班的大课堂就在一片树林的空地中，整齐排列的机枪清晰可见。朱总司令站在战士们面前，告诉战士们为什么机枪射手扣动扳机，枪就能自动而连续地发

射，为什么使用机枪能够提高战斗力……战士们围坐在四周，听得津津有味。时任红一军团司令部的侦察参谋苏静，用从敌人手中缴获的相机，及时抓拍了这一生动的瞬间。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红一军团在遂川缴获了敌人这架德国造的照相机，军团长林彪知道苏静学过照相，于是就将相机交给他保管。就是用这部相机，苏静拍下了红军摄影史上的第一张照片——这张1933年2月朱德、林彪、聂荣臻出席红一军团轻机枪集训队开学典礼时，朱德总司令讲话时的全场照片，现保存在军事博物馆。

当时，苏静照相非常不易，仅有一卷胶卷，这卷胶卷只能拍6张照片，拍照完，苏区还没地方能冲洗，所以苏静一直把胶卷带在身上，细心包好，胶卷既不能见光，也不能受潮。长征途中，苏静带着侦察部队在最前面开路，每天到前面探路回来，别人都休息了，他却赶着画出第二天的行军路线图，然后刻蜡版，油印出来，再分送给各部队的首长。无论是爬山，还是过河，他都把胶卷妥贴保管，直到长征途经遵义城，才有机会在当地照相馆把这卷胶卷冲出来，6张底片，有2张照坏了，4张完好。长征到达陕北后，苏静在陕西省咸阳市三原县洗出了这4张珍贵的照片。从拍摄到冲洗，直到最后洗印成照片，前后历时近4年，和苏静一起走过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路。难怪罗瑞卿大将说，苏静是红军中的第一部照相机。

苏静（1910.12~1997.11）福建省海澄（今龙海）县人。1932年参加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原总参谋部军务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代表，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毛泽东与秋收起义部分同志合影

刘松柏/文



《毛泽东与秋收起义部分同志合影》是1937年5月在延安的凤凰山，毛主席的住所照的。这是毛主席从长征后到达陕北的第一个住所。

1927年9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湖南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的领导下举行。十年后，参加秋收起义的部分同志在延安合影。

前排左起：赖传珠、张宗逊、孙开楚、赖毅、谭冠三、胡龙奎；

后排左起：杨立三、陈伯钧、毛泽东、龙开富、周昆、谭希林、罗荣桓、谭政、刘型、杨梅生、胡友才及参加井冈山斗争的贺子珍。



红军十周年纪念章。

照片上边有毛泽东的题词："一九二七秋收暴动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至今尚存之人约数十人 此为一部分 一九三七，五月 于延安城"。

1927年9月，毛泽东主持的中共湖南省委将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以及平江、浏阳等地的农民自卫军整编，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辖3个团约5000余人。同年9月9日，按中共"八七会议"决定举行秋收起义，秋收起义的部队久攻不下长沙，毛泽东毅然决定将这支部队向湘赣边区敌人力量薄弱的井冈山地区转移。经三湾改编，确定人民军队建军原则，部队缩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11月，部队抵达井冈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红色根据地。

当时，新成立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约5000余人，但是到了1937年4月参加秋收起义的部分同志在延安与毛泽东主席照相时，"尚存约数十人 此为一部分"，从这一革命历史照片中，反映出革命的坚苦卓绝，共产党的丰功伟绩。

第二张照片《毛泽东与井冈山的同志们》的合影（见47页）是1938年春在延安的凤凰山毛主席的住所照的，过了半年，你看那些人背后的小树都长高了。

这张照片，刘型站在第二排。

照片上边有毛泽东的题词："井冈山的同志们"。

据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介绍，在延安的这些重要的历史照片都是摄影家吴印咸摄制的。

2009年夏天，原延安第二保育院（现北京六一幼儿院）的阿

姨、叔叔和当年的孩子们在北京聚会。在会上，我遇见吴印咸的女儿吴筑清，她告诉我，他父亲是1938年8月初到延安的，1938年8月以前的历史照片不是他父亲摄影的。

这几张历史照片生动地记载了这一英雄年代中的领袖和红军战士们的风采和丰功伟绩。照片的摄影师是谁？还需要查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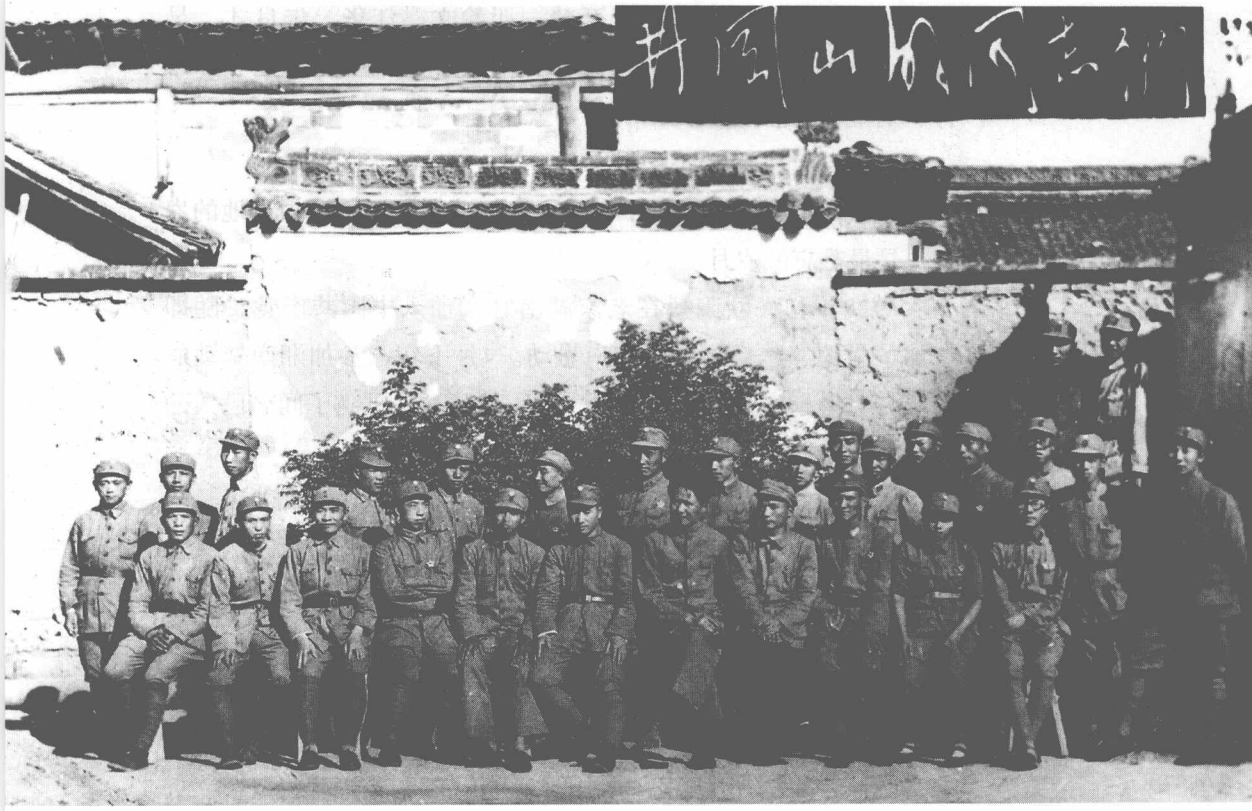
2006年，刘型同志诞辰100周年时，我们出版了《刘型画传》，书中用了《毛泽东与秋收起义部分同志合影》和《毛泽东与井冈山的同志们的合影》等几张历史照片，这几张照片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大辞典、军事百科全书、解放军画报等处都有登载，但其中的人物介绍都不同，也不全。比如：毛泽东与秋收起义的部分同志的合影这张照片，前排在地下坐的是6人，而各处展览和书上，只找到标记5个人的名字。我们想，无论照片中的人物是否健在，功过与否，我们都要把其中的人名找全，恢复历史的原始面貌。我们走访了中国革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查阅了大量的书籍、资料，并与老红军子女们一一核对。终于使这几张历史照片中的人名标注清楚。《毛泽东与秋收起义部分同志合影》照片中的第一排右起第一人是：胡龙奎，至此照片中的人名都找全了。

从1927年刘型带着萍醴游击营到井冈山找毛委员的那一天起，刘型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

刘型（1906.3~1981.8）湖南醴陵人。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秋收起义、黄洋界保卫战和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参加了长征。原北京地质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国家农垦部副部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

井冈山的同志们

熊光楷/文



在欧阳毅将军家里客厅的墙上，醒目地挂着这张黑白照片。照片拍摄于1938年8月，在延安参加井冈山革命斗争的部分同志来到毛主席凤凰山驻地和毛主席一起合影。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在照片上亲笔写下了“井冈山的同志们”七个大字。在参加合影的29人中，坐在前排最右边，戴着眼镜，相貌儒雅的人，就是欧阳毅。

照片中：

一排左起：宋玉和、谭冠三、谭政、滕代远、萧克、林彪、毛泽东、高自立、何长工、曾玉、欧阳毅；

二排左起：胡友才、孙开楚、谢翰文、江华、朱良才、吴溉之、李寿轩、张际春、谭政文、李克如、韩伟、龙开富、谭希林、刘型、陈伯钧、张令彬；

三排左起：徐日文、曹里怀。

在欧阳毅将军的一生中，毛泽东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岁月，是最难忘的岁月。

1928年初，欧阳毅在老家湖南宜章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参加了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暴动。4月下旬，参加湘南暴动的部队与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师，欧阳毅第一次见到了闻名已久的“毛师长”。

欧阳毅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第一次聆听毛泽东讲话时的情形。欧阳毅写道，毛泽东“身材高大，目光炯炯，长长的头发背向脑后，显得风度不凡”。讲话中，毛泽东引用了孙悟空和如来佛的故事。毛泽东说，敌人没有孙悟空的本领，即使有的话，也不是红军的对手，因为红军有如来佛的本领，敌人逃不出红军的手掌。毛泽东还讲了战术问题，说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敌人也有强弱之分，“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只要抓住弱的猛揍一顿，打胜了立即分散，等强的来了，就同它玩“捉迷藏”，这样，就能掌握主动权，就可以把敌人放在手心里玩。

几十年后，欧阳毅对毛泽东讲过的这些话仍然记忆犹新。当时，由于敌人封锁，井冈山物资匮乏。1928年冬天，为了储备充足的粮食，粉碎敌人的“会剿”，毛泽东、朱德、陈毅都亲自率领军民下山挑粮。那时候，挑一次粮食，要来回奔波几十里山路，每天天不亮就要出发，天黑尽了才能回来。欧阳毅曾经跟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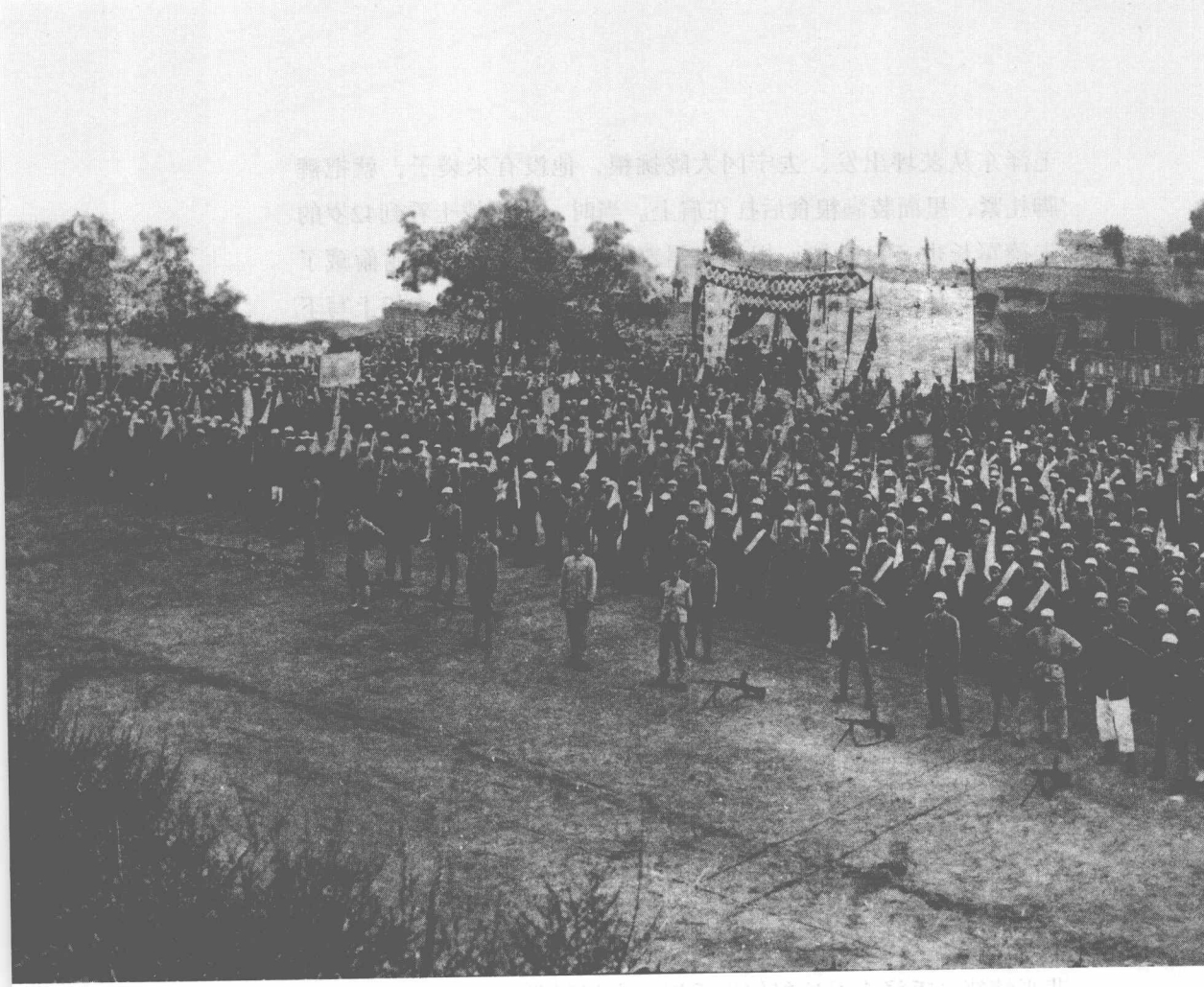
毛泽东从茨坪出发，去宁冈大陇挑粮，他没有米袋子，就把裤脚扎紧，里面装满粮食后扛在肩上。当时，红军战士看到42岁的朱德军长也亲自挑粮，担心他累着，就把朱德的扁担偷偷藏了起来。谁知朱德又亲手用竹子削制了一根扁担，还在扁担上写下“朱德记”几个大字。这就是著名的“朱德扁担”的故事。

在井冈山上，欧阳毅还和陈毅建立了深厚友谊。当时陈毅是士兵委员会主任、军委书记，欧阳毅担任秘书，两人共事的时间比较长。陈毅有一条毯子，但没有铺的东西。欧阳毅有一块布单子，但没有盖的东西。在井冈山打游击，经常露宿山野，陈毅就和欧阳毅搭伙同住，共毯而眠，被传为“两毅同眠”的佳话。寒冬腊月，山风阴冷，一条毯子一块布单，原本不足以御寒，但与陈毅相互慰藉而眠，让欧阳毅感到十分温暖。

欧阳毅在井冈山战斗、生活的时间共有9个月，随后就与毛泽东、朱德率领的部队下了井冈山，向赣南进军，直到后来打下瑞金，开辟中央苏区。1929年12月，欧阳毅列席参加了古田会议，作会议记录，并为整理后的记录刻写蜡版，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结束后，恰逢1930年元旦，林彪派人给毛泽东送去一封“新年贺信”，表达了对时局和革命前途的悲观情绪。毛泽东对这封信很重视，专门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欧阳毅当时担任纵队党委秘书，毛泽东的回信首先交给了他，他拆看后又转交纵队党代表彭祜，由彭祜交给了林彪。这封信后来经修改、油印后下发部队，这就是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井冈山——中国革命的摇篮。

欧阳毅（1910.4～2005.6）湖南省宜章县人。1926年参加革命，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原军委公安部队政治部主任、军委炮兵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陕甘边独立第一师唯一的一张合影

王兆相/文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6年8月1日。

部队长征到达陕北后，奉中央军委命令部队再次扩编，番号为中国抗日人民红军独立第一师，我担任了师长。这张照片，就是独立师成立时拍摄的。当时，我们从国民党军占领的神木城接来照相馆的两位师傅，请他俩给兵强马壮的独立师拍了一张全师合影。两位师傅受国民党宣传的影响，对红军心存疑虑。但真正来到苏区与我们接触后，亲眼看见红军对老百姓好，纪律严明，



官兵平等，不但打消了疑虑，对我们表示钦佩，回到神木城后，还悄悄地为红军做宣传。

新中国建立后，在一些博物馆和纪念馆征集旧照片时我才得知，由于种种原因，陕甘边红军和陕北红军都没有留下部队的合影，我们独立师这一张，是唯一的一张，显得弥足珍贵。

几十年来，戎马一生，这张照片我一直带在身边，不仅因为这张照片是独立第一师唯一的一张合影，也是特务连发展壮大到独立师的历史见证。

1933年7月，中共陕北特委在葭县（今佳县）召开了高起家洼会议，会上决定在陕北开展武装斗争。我就在这时被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习仲勋、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张秀山派回老家神木县，作为军事骨干参加陕北的武装斗争。

因为我曾经在红二十六军当过警卫队长，组织上希望我把神木、府谷地区的游击队建立起来。为组建神木、府谷地区的红色武装，中共神木南乡区委从物色成员到搜集武器，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那时候，搞到一支真枪很不容易。区委起初派了两名党员过黄河到山西太原买枪，结果枪未买到，两名同志却牺牲了。后来，区委又派一名党员到国民党驻军当兵，8天后，这名党员从敌营背回来一支步枪。正当我们为武器太少发愁时，同情革命的铁匠师徒打制了一批大刀、长矛送过来，为我们解决了大问题。

1933年10月18日，南乡区委在尚家岌召开了游击队成立大

会，共7人参加了会议。贾怀光代表南乡区委宣布：“根据陕北特委的决定和神木、府谷人民的迫切要求，神府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组织今天正式成立！经陕北特委批准，名字暂称中国工农红军神府特务队，队长李成兰，政委王兆相，队员就是今天到会的5位同志。大家一致表示，努力宣传发动群众，齐心合力反对国民党的统治，建立穷人自己的政权，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成立大会是在队员张景新的窑洞里召开的。会议结束后，主人为了庆贺神府红色武装的诞生，宰了自家一只羊，炖了一锅羊肉。大家一边吃着羊肉，一边热烈地议论特务队的当前任务和发展壮大的远景，个个充满信心。

特务队成立不久，李成兰、李成荣兄弟就在战斗中牺牲了，但特务队迅速壮大了起来，先后扩编为陕北红军的第三支队（红三支队）、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第三团（红三团）。尽管我们与陕北红军的兄弟部队被国民党军阻隔，一直单独战斗在神（木）府（谷）葭（县）榆（林）地区，但还是在短短3年时间里，由7个人、4支枪，发展到1200多人、1100多支步枪、20挺机枪。

这张照片就是历史的见证。

王兆相（1909.10~2009.6）陕西省神木县王家后堰村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学院院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长征中的一张合影

贾若瑜/文



这张照片拍摄于长征途中，可是我在1958年才见到。

1936年，红二、六军团长征路过贵州省毕节时，王震政委和谭家述参谋长到教导团视察，并和我们一起拍照留影。相片第一排正中坐着的是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同志，他当时只有29岁。后排右二是军团参谋长谭家述同志。前排右一是教导团政委李信同志；后排右一是总支书记杨尚高同志；后排右三是教导团团长陈外欧同志；后排左一是时任主任教员的我。前排左一束子弹带的是警卫员连生，还有一位未脱稚嫩的公务员小马。

拍完照片后，部队转战南北，我一次也没有见过这张照片。

1958年，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总政治部专门成立了国庆十周年筹委会，我是筹委会主任。同时，筹建军事博物馆。在征集文物中，当时已任空军副司令的谭家述送来了这张珍贵的照片。一见照片，我真是喜出望外。没想到，我又看到了30多年前的自己。照片中，我们这些正规的红军部队指战员穿戴各式各样，不像现在影视中的红军那样着装整齐统一。长征途中，我们没有自己的根据地，过着被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生活，根本顾不上着装的统一。然而，装束的参差不齐并不妨碍我军在长征途中突破敌人重重封锁线，胜利进军。

如今，这张照片已经70多年了，抚今追昔，我更加体会了长征的伟大意义。

贾若瑜（1915.6～ ）四川合江二里乡人。1935年参加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原总政治部副秘书长、代秘书长，军事学院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平型关战斗胜利后，战士们拿着缴获敌人的战利品。

首战平型关战斗中的“无名”参谋姜洪照

姜毅生/文

这张照片中没有姜洪照，但是在李天佑将军写的《首战平型关》一文中提到，在紧要关头，派身边的一位参谋去师部报告敌情并火速跑回传达下达攻击命令的情节，许多人都非常熟悉，这位“无名”参谋就是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的姜洪照。

1937年9月，震惊中外的平型关战斗中，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作为主攻团，第一个到达阵地，并对日寇进行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殊死战斗。

9月25日清晨，六八六团冒雨连夜进入阵地。团指挥所依山设在坡坎下，前面是公路，两旁是山峦。李天佑团长举起望远镜，观察到战士们隐蔽得很好，同时发现，在几块空地的尽头，一条公路由东而西，是灵丘通平型关的古道，公路以北是座三四百米的秃山，山腰有个不大的古庙，俗称“老爷庙”。这座山雄踞路北，是控制公路的制高点。李天佑团长略显遗憾地对杨勇副团长说：“来不及在它上面埋伏一支兵力了，占领那座庙，

那里居高临下！”杨勇副团长看了一眼说：“等会儿战斗打响了，我带人上去抢占！”

此时，六八七团埋伏在六八六团的东面，六八五团埋伏在六八六团的西面，距平型关仅十余里。单等敌人来到，攻击的命令一下，左右兄弟部队截头断尾，六八六团就拦腰打下去，分割歼灭敌人。

上午7时，山沟里传来了马达声，百余辆汽车载着日本兵和军用物资在前面开路，骡马炮队随后。大概是因为昨晚大雨，公路泥泞不好走，几十辆汽车在兴庄至老爷庙之间停了下来，西进的敌军行列还在往前拥，人马车炮挤成一团，李天佑一看，这正是个开火的好时机，命令姜洪照参谋立即跑步向师指挥所报告敌情，请求下达攻击指令。姜洪照转身向设在六八六团指挥所右后侧山坡上的师指挥所跑去，向林彪师长报告了敌情和李天佑团长请求攻击的请示，林彪当即下达了攻击命令。姜洪照气喘吁吁地跑回团指挥所传达林彪师长的攻击命令。李天佑兴奋地命令担任突击任务的一营：“攻击开始，打！”

战士们盼望的时刻到了，两侧的山冈顿时怒吼起来。机枪、步枪、手榴弹、迫击炮一齐发射，把拥塞在公路上的敌人打得人仰马翻。一辆从平型关开过来的汽车中弹起火，拦住了西进的道路。

左侧的六八五团也开始突击。

为加强指挥保证打好，杨勇副团长决定带领三营攻打老爷庙，姜洪照参谋跟随杨勇一起行动。

刹那间，巨大的冲杀声震撼山谷，三营长邓克明率领全营战士勇猛地向公路冲击，敌人东奔西窜，极端凶狠，利用汽车和沟坎顽抗，我们的火力压不住敌人的火力，冲上去的战士一个又一个地倒下来。然而“冲啊！”“杀!”的喊声不断，战士们前仆后继奋勇杀敌。日军也很顽强，一部分已经爬到对面山上，占领了



平型关战斗胜利后，李天佑和杨勇（右）合影。

老爷庙，情况对我们极为不利。

李天佑团长再一次命令三营长邓克明“一定要拿下老爷庙！”并告诉侧翼连队加强攻击，吸引敌人的火力，支援三营冲锋。三营战士钻进硝烟里，伤亡很大，冲过公路后，三营九连仅剩下十来个人，战斗仍然激烈地进行着。

三营长邓克明负伤了，但他坚持不下火线，继续指挥部队作战。在二营的积极援助下，终于占领了老爷庙制高点。

此时，在一片狼藉的阵地上，一名日本军官孤身一人站在那儿，身穿一件军大衣，两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显然没有了抵抗能力。杨勇见状，大声用日本话反复喊：“缴枪不杀，八路军优待俘虏。”当杨勇副团长等人离这名日本军官越走越近时，那个一声不吭的日本军官突然右手从口袋里掏出手枪，速向杨勇开枪，把杨勇打伤了。一直跟随杨勇副团长身边的姜洪照和几个战友立刻将这名日本军官击毙。

此刻，敌人又反攻上来了，杨勇副团长带伤继续指挥战斗。原来，我军占领了老爷庙后，敌指挥官猛然醒悟过来，挥刀喊叫，指挥敌兵争夺老爷庙制高点。八路军战士对敌人的冲锋进行反击，打退了一批敌人的进攻，又一批敌人冲上来，情况万分危急，六八五团团长杨得志观察到这一情况后，立刻命令该团二连连长匡斌不惜一切代价冲上去。在各部队的同心协力下，终于守住了老爷庙制高点。

下午1点，六八七团攻上来了。李天佑团长看到敌人的后尾一乱，便命令部队加强火力进行反击。敌人哪能挡得住两面夹击，纷纷开始逃窜，疯狂、残暴、凶恶的日本侵略军精锐板垣师

团二十一旅团，在八路军的铁拳下，遭到了彻底的毁灭！

平型关战斗后，姜洪照因在战斗中左腿负伤，离开了六八六团，伤愈后先后进入延安抗大总校和延安中央军委参谋训练班学习。自离开六八六团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姜洪照再也没有与李天佑见过面或联系过，直到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冤受难，才与李天佑联系上。

1969年5月，造反派审查姜洪照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党籍问题，怀疑他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员，谁证明他是共产党员？姜洪照深深陷入了苦恼和重压之中，姜洪照是193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他入党的连长、指导员早在战斗中牺牲，没有人能够直接证明姜洪照是共产党员，即使有领导或战友认识，处在“文革”人人都自身难保的环境下，谁敢站出来证明你是共产党员呢！？此时，姜洪照想到了时任副总参谋长的李天佑，特别是姜洪照看过上世纪50年代李天佑写的《首战平型关》，文中特别提到，在开战的紧急关头，派一位参谋跑去向林彪师长报告敌情又跑回来传达了攻击命令的细节。姜洪照想，既然李天佑几十年后回忆平型关战斗没有忘记这位参谋，也一定记得这位参谋就是姜洪照，他抱着一线希望，就证明姜洪照的中国共产党党籍问题给李天佑写了一封信，请李天佑证明自己是共产党员。没想到，信发出后仅十天，就收到了李天佑副总参谋长的回信，信中李天佑证明姜洪照是共产党员。这封信，还了姜洪照一个政治清白。

如今，平型关战斗已经过去了72年，无论岁月如何变化，只要一谈起平型关战斗，姜洪照一家人就会想起李天佑，想起这位军功卓著的高级将领在“文革”中，给姜洪照写的一封证明信，那不仅仅是一个证明，而是一个共产党人的胸怀。

姜洪照（1917.8~2000.5）福建省上杭县城关镇人。1935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福州军区空军副参谋长、正军职顾问。



陈伯钧作为参加苏区党代表大会六军团代表，第一次走进延安，陈伯钧胸前佩戴的是中革军委授予的二级红星奖章。

陈伯钧参加苏区党代表大会——在延安的生活片段



陈进元/文　海伦/摄

长征胜利结束后不久，时任红二方面军六军团长的陈伯钧，率部驻守在陕中流曲镇、庄里镇一带。1937年4月底，陈伯钧作为参加苏区党代表大会六军团代表，第一次走进延安，这也是陈伯钧参加革命十余年来，第一次到后方参加如此盛大的会议。4月30日，陈伯钧在日记中写道：“全国同志均集中于此，如此良辰美景，何可多得！”他抓紧机会四处和老友们聚会、畅谈，其兴奋之情，跃然纸上。

5月1日，出席苏区党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到五一运动大会会场（即延安飞机场）参加延安各界庆祝五一节大会。9时许进行了阅兵式，之后庆祝大会开始，朱德总司令、林伯渠代主席、马海德等发表了演说。会后进行了体育竞赛，在篮球比赛中，“红大和军委获胜”。

第二天上午，参加党代会军以上的干部到抗大参观。下午，党代会在中央大礼堂正式开幕，洛甫同志致开幕词，接着选举了大会主席团。

5月3日全天和4日下午，毛主席作了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及红军今后任务的报告。听了毛主席的报告，陈伯钧情不自禁地在日记中写道：毛主席 “用最通俗的语言，以古词绝句来说明政治事件，真是十分生动。”

9日休会。上午，陈伯钧与朱德总司令以及关向应、萧克、王震等二方面军领导游览清凉山，途中遇到徐特立老先生，遂同行。陈伯钧在日记中描述清凉山：“这是延安最好的名胜地之一。山顶有寺院，名小五台，传说宋之名将杨六郎及孟良、焦赞



陈伯钧站在毛主席的右侧，右腿因在江西打仗时被子弹贯穿短了一截，故只能以“稍息”的姿势站立着。



红二方面军的部分干部合影。左起陈伯钧、萧克、关向应、王震、甘泗淇（美国记者海伦拍摄）。

把守三关，大概此其一关也。”“至清凉山各石岩洞观看，更饶风趣。岩洞中有众多石佛及各种古迹，面临延水，背靠五台，夏凉冬暖，真修养胜地。”字里行间流露出陈伯钧游览此山时的愉悦心情。

当天下午4点多，陈伯钧又到凤凰山毛主席驻地，与参加1927年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尚存的部分同志合影，由此留下了被公认为经典之作的“秋收起义”照。在照片中，陈伯钧站在毛主席的右侧，右腿因在江西打仗时被子弹贯穿短了一截，故只能以“稍息”的姿势站立着。如今，在凤凰山毛主席住处，已将这张照片和另一张1938年8月在同一地点拍的《井冈山的同志们》，放大后放置在拍摄地供人们参观、缅怀。

5月14日大会结束。第二天，美国记者海伦给红二方面军部分参会代表拍了照，这张照片后被用于斯诺《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中。

大会结束后，由于交通不便，陈伯钧一行于22日始得以乘车经洛川、耀州、庄里镇回到流曲镇驻守。直到当年8月下旬，红六军团改编为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后，陈伯钧作为该旅首任旅长，才率七一八团移驻到延安和西安之间的咽喉要道洛川。

当年召开苏区党代表大会的“中央大礼堂”原是一座基督教堂，1938年11月被日本飞机炸毁后已荡然无存。2006年5月，有关部门在会议旧址处新刻了一块石碑，上面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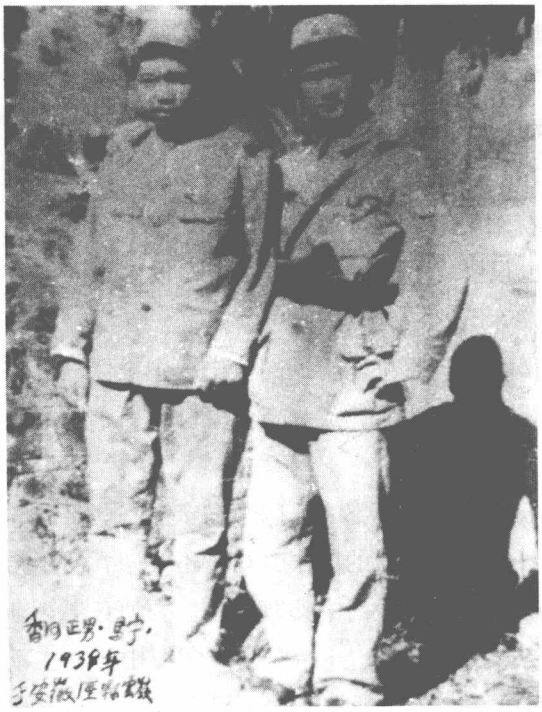
1936年4月9日晚至10日凌晨，周恩来和张学良在这里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进行了会谈……

1937年5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此召开，会议分为两期举行。5月2日至14日，召开了党的苏区代表会议……5月19日至6月10日，召开了党的白区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团结，为全国抗日战争在政治上、组织上做了重要的准备。

由此可知，70多年前召开的党的苏区代表大会，在中国革命史上已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这一张张照片更显得弥足珍贵。

（根据《陈伯钧日记 文选》整理）

陈伯钧（1910.11~1974.2）四川省达县人。1927年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参加了长征。原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院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马宁（右）与日本友人香河正男。

马宁与日本友人香河正男

黄晓意/文　史沫特莱/摄

1937年初，美国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到延安进行了采访。

1938年冬，史沫特莱又来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采访。新四军军长叶挺把她当做贵宾一样给予特殊照顾。史沫特莱却坚决要求深入到部队中去了解情况，叶挺军长只好让她到军部医院里去体验生活。

当时，在新四军军部的医院里住着一批被俘的日军伤员，他们同新四军的伤员住在一起。史沫特莱很好奇，她发现，医院对待日军战俘伤员同对待新四军伤员一样，甚至照顾得更周到、更体贴。虽然语言不通，但是史沫特莱亲身感受到了新四军对日军

战俘不杀、不辱、治病养伤的人道主义关怀。她放下大记者的架子，主动为被俘的日军伤员喂饭喂水，还为一名叫滨田的日军伤员倒便盆，将滨田感动得落下泪来。

在医院里，新四军《抗敌报》主编马宁亲眼看见史沫特莱做“义工”，便向史沫特莱了解情况，因为是同行，他们很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马宁也很快成为医院里日军战俘的朋友。

不过更让史沫特莱称道的是马宁和香河正男的友谊。

香河正男是在安徽宣城日军机场附近的伏击战中被俘的，在伏击战中，香河正男最先放下武器，成为新四军的第一个日军俘虏。

香河正男被送到云岭新四军军部时，因为马宁懂一些日语，被派去做接待、教育日俘香河正男的工作，马宁不仅向香河正男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还在生活中嘘寒问暖。香河正男渐渐感受到了共产党人的胸怀，开始向马宁学习中文，主动要求参加新四军。史沫特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将日军战俘转化为新四军战士，觉悟了的日本军人掉转枪口反戈一击，这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鲜有的奇迹。



1937年1月底，美国人史沫特莱在延安留影。

为了纪念马宁与日本友人香河正男的珍贵友谊，史沫特莱专门为他们拍了一张合影作为留念。

滨田伤愈出院后，和香河正男等人一起组织了“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积极活跃在抗日前线。

上世纪60年代，日本友人香河正男在日本共产党主编出版的《反战兵士物语》一书中，深情回忆了当年与新四军并肩战斗的苏中反战经历。

马宁（1909.9~2001.12） 福建省龙岩县龙门镇人。1930年3月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福建省文教厅文化处处长、福建省文联主任。

陈庄奋力折“牛刀”

南溪/文

陈庄，位于鲁柏山区西侧。抗战初期，晋察冀军区机关、学校、医院都设在陈庄附近。

1939年9月24日，华北重镇石家庄日军号称“牛刀子”的第八混成旅团长水源义重少将，率日军第三十一大队及伪军2000余人，分4个大队，突然由灵寿进占慈峪，企图袭击陈庄，捣毁晋察冀根据地。

晋察冀军区唐延杰参谋长接到敌情后电话急令四分区五团不惜一切代价拖住敌人。四分区五团政委萧锋和陈祖林团长当机立断，命令二营尾追敌人。追至营里，干净利索地将殿后的40多名日伪军全部歼灭，迫使日军主力不得不回过头来对付五团，为上级机关的安全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

28日晨，日军终于进占了一座空城——陈庄。水源义重以为用突然袭击的办法，会创造一个奇迹，抓住贺龙、聂荣臻和罗瑞卿，捣毁晋察冀军区机关和大后方。可是，水源扑空了，什么也没捞到，气急败坏地命令放火焚烧了陈庄。霎时，陈庄成了一片火海。随后，水源急不可待地命大队人马撤离陈庄，防止被八路军围歼。

但是“牛刀子”既然来了，就不能轻易放走。

根据敌情分析判断，贺龙、聂荣臻命令：第三五九旅四团担任向行唐、曲阳方向的警戒；第三五九旅七一九团、晋察冀军区四分区第五团在慈峪以北地区，诱敌深入；第三五八旅七一六团、独立一旅二团及独立第一支队等部队，隐蔽集结于口头镇、秦家台羊、牛下口地区至陈庄以东地区设伏，准备全歼日寇水源部队。



陈庄战斗。照片中，萧锋站着，手拿望远镜。站在萧锋左边双手握重机枪的是机枪教员钟奇同志。

28日10时许，日军果然浩浩荡荡进入八路军伏击地区。水源做梦也没有想到，晋察冀军区各部队和一二〇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迅速在慈河以北地区布下了天罗地网。

水源突然发现大势不好，即令部队突围，涉水过慈河，退回石家庄。但是水源的这条退路必须要过五团这一关。而五团坚守破门口、朱家背、李家沟、唐家沟、石拂峪一线打阻击，死死关住了水源南逃的大门。因此，五团的阵地受到日寇猛烈轮番攻击。

在七祖院二营阵地上，战士们静静地隐蔽在堑壕里。日军

黑田治大佐先是命令机炮大队用炮轰，然后观察未见有动静，于是便放心地命部队前进。当敌人距离阵地前沿还有50米时，就听二营长洪钟似的一声“打！”一颗颗手榴弹在敌群中开了花，机枪、步枪子弹雨点般射向鬼子，连续打退敌人4次冲锋。当日军再次发起攻击时，萧锋来到阵地上，冒着呼啸的弹片，纵身跳到二营长身旁。随后，与二营长交换了意见后，命七连从右侧绕到鬼子的后边，五连、六连从正面狠打，两面夹击。

战斗持续到20时左右，五团不仅全歼了这股敌人，还俘虏了黑田治大佐，结束了七祖院战斗。

在陈庄战斗中，五团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照片中，萧锋站着，手拿望远镜。那个望远镜还是萧锋1936年西征时，在与国民党马步芳骑兵团的一次战斗中缴获的。站在萧锋左边双手握重机枪的是机枪教员钟奇同志。照片已经泛黄，但是，陈庄战斗的生死经历，萧锋却无法忘怀。

在破门口至南庄、青扬山方向，五团一营、三营的指战员也在与日军血战。日军敌机不时地俯冲扫射投炸弹，树在燃烧，草在燃烧，石头也在燃烧。敌人一次次像蝗虫般拥向阵地，战士们用机枪、步枪、手榴弹向敌人回击。八班长刘兹沟带领全班与敌人拼杀，打死敌中队长津田上尉。战斗英雄程段林与鬼子拼杀4次，两处负伤，仍坚守在指挥位置上。阵地被突破了口子，一营长、三营长冲出堑壕，端着刺刀，带领两个营官兵，同日本鬼子拼起了刺刀。大片刀卷刃了，刺刀扎弯了，子弹打光了，战士们就用石头砸，抱住鬼子用牙齿咬。鬼子支持不住了，退了回去。到28日晚21时，日军只前进了两公里……

29日上午，晋察冀军区四分区刘道生政委来到五团阵地。他紧紧握着萧锋的手说：“贺师长表扬你们团真了不起！”接着，刘政委告诉我们各部队的情况，“这一次，关起门来打狗，坚决把水源这把“牛刀子”折断！我们必须在一两天内把鬼子压缩在

横山岭一带，全歼水源旅团！”说完，用拳头砸向地图上横山岭的红圈。

9点钟，日军残部在6架飞机的掩护下，水源亲自指挥日伪军四五百人，向我军阵地发起轮番冲击。爆炸声、拼杀声响成一片。从俘虏的水源的翻译官黄太郎口中，得知了水源的指挥位置和我团的指挥位置离得很近，又得知他的外貌特征，真是天赐给萧锋消灭水源的良机。29日下午15时许，水源声嘶力竭地挥舞着指挥刀，指挥部队突围。在一营阵地前，萧锋的眼睛死死盯住水源，令重机枪手钟奇瞄准水源猛射，“哒哒哒……”一梭子子弹钻进了水源的胸膛。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牛刀子”就这样折在了陈庄。

陈庄战斗，全歼日伪军2000余人，俘虏16人。这一仗，是继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打的又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有力地保卫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萧锋遗稿　南溪整理）

萧锋（1916.2~1991.2）江西省泰和县人。1927年参加赣南万安农民暴动。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39年1月，冰雪还未消融，邓子恢（前一）带着新四军的民运队早已深入千家万户。

邓子恢率新四军民运队胜利归来

邓小燕/文　叶挺/摄

这张照片快70年了,是叶挺军长照的，画面上的人几乎没有什么人认识，但是率队走在队伍最前面的邓子恢许多人却记忆犹新。

1938年3月，邓子恢建立了皖南的第一支民运工作队，他把来自上海、武汉等大城市的抗日青年和知识分子组建成服务团和宣传队，举办民运培训班。他亲自编写授课提纲，上课作报告，深入浅出，言之有据，深受学员欢迎。那些来自大城市的男女青年学生们，脱下西装旗袍，换上布军装；甩掉皮鞋，蹬上草鞋；在新四军民运部长邓子恢的带领下，用曾经弹奏钢琴、舞文弄墨的纤纤双手，为乡亲们耘田、插秧、割稻、打场。他们的行动使乡亲们深受感动。邓子恢教他们到群众家里要先掀开锅盖看看，伸手到米缸里摸摸，帮助乡亲们挑水、扫院子、劈柴、烧火，拉拉家常，得到了群众信任，再进行抗日的宣传，就会得到好的效

果。邓子恢还特别提醒年轻人，皖南山区比较闭塞，做妇女工作要特别注意，梳巴巴头和不梳巴巴头的、扎辫子和不扎辫子的，都不一样，大娘、大嫂、大姐，不能乱叫。这种细致周到的工作作风，给民运工作队的同志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尤其是一次抗日宣传后,中午在农家吃饭，稀饭、糠馍和一碗腌菜，菜里面夹着蛆，民运队员们望着白蛆不敢下筷，邓子恢先把有蛆的菜夹进自己碗里 ,带头吃了起来。这件事虽小，却在当地人中争相传颂，民运队受到了广泛的好评。而民运队的许多知识分子都从这位曾经留洋的老革命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希望。

照片上的邓子恢笑得很开心，嘴角向上翘起，眼神中带有几分自豪和少许的得意，虽然他身着棉服脚踏棉鞋，当时已经43岁了,但是从他矫健的步伐和有力摆动的双臂上可以看出，他丝毫不输给身后那些年轻的民运工作队队员，他身后的4名年轻人，都是一副喜笑颜开的样子，再后面有一个身材瘦削穿着单薄的男队员，他的姿势很特别,上身向左侧摆动，双手交叉握在胸前,像是在为大家今天的成绩鼓掌庆贺。远处的村口,还散站着一些身穿棉长袍送行的乡亲们，从他们的衣着不难猜出,应当是几位乡间的开明士绅。

当抗战烽火燃遍全中国，新四军毅然捐弃前嫌，慷慨赴国难。新四军军部位于云岭国统区，国民党三战区在此驻有重兵，几乎没有群众性的抗日团体，邓子恢知道，冰雪还未消融，要在皖南站住脚跟，坚持抗战，必须加强对群众的宣传与组织发动工作，尽快让群众了解新四军的抗日纲领，展开减租减息,给农民以实实在在的好处,才能启发群众的爱国热情，全力支持新四军抗日,从而补充部队的有生力量,向抗日前线输送兵源。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邓子恢带着新四军的民运队早已深入千家万户。

邓子恢 (1896.8~1972.12) 福建省龙岩人。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原国务院副总理，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届中央委员。



李天佑(左一)与钟赤兵1939年在莫斯科合影。

李天佑与“独腿”将军钟赤兵的三张照片

李亚宁/文

这张照片上的两个人是生死之交的老战友，左边是李天佑，原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另一个拄拐杖的是我军有名的“独腿”将军钟赤兵，原国防科委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们俩有三张合影照片。

第一张照片是1939年秋在莫斯科拍的。那时，李天佑和钟赤兵风华正茂，才25岁，可两个人已经是身经百战的老革命了。早在1934年江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后期，李天佑和钟赤兵就在一起共事。李天佑是三军团五师师长，钟赤兵是五师师

政委。两个人当时都只有20岁。五师是中央红军的主力师之一。在长征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的行军中担任三军团前卫。1934年11月底，中央红军过湘江时，李天佑和钟赤兵指挥五师两个团和临时配属的军委炮兵营担任中央纵队左翼掩护。军团电报命令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至四天！”最后五师3000多人的兵力，以损失2000多人的沉重代价，坚守防线三天两夜，终于完成了掩护任务。1935年1月红三军团整编，他们两个人就分开了。

李天佑在长期战争环境里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1938年5月，他奉命从抗战前线回延安，不久转到西安治病。同年底组织决定派他到苏联边治病边学习。经长途跋涉，1939年6月，他来到莫斯科，后转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钟赤兵的腿是在1935年2月攻打娄山关的战斗中负伤的。当时他是红三军团十二团政委。红军第二次占领遵义，他在城里做手术把负伤的右腿锯掉了。领导劝他留在当地养伤，他坚决表示要求跟部队走：“爬，我也要跟上部队，无论如何，我决不离开红军。”在行军途中，虽然他可以骑马或坐担架，但是很多情况下不允许，还是要靠自己的一条腿和一根棍子走。他硬是凭着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意志，克服比常人更多的困难，靠着一条腿走过了雪山、草地，走完了长征。但是，由于当时治疗条件有限，战斗生活又很紧张，他的腿伤愈发严重。这样，钟赤兵也被派往苏联治病和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同一批人中还有刘亚楼、卢冬生、杨至诚和谭家述。他们是我们党派到苏联学习军事的第一批高级军事指挥员。在莫斯科，钟赤兵化名杨松。李天佑化名李光。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的时候，李天佑和钟赤兵在莫斯科住在一个旅馆的6层楼上，没有电梯。当时政府规定，晚上空袭警报响起来，必须尽快到地下室，可是钟赤兵一条腿频繁下楼上楼很不方便，和很多人挤在潮湿的地下室里也很不舒服。于是等警报再响，他们两个人就下到一楼楼梯扶手处后面的墙根前坐下

来。第三次响警报，他们两个干脆就躺在床上。李天佑对钟赤兵说，他有一次在战场上给战士送水，敌人飞机来了扫射一通，把他端水的锅都打漏了也没有打着他。“你腿不行，咱们别下楼了，就在屋里躲着吧。”钟赤兵巴不得来个“就地隐蔽”。两个老战友，馊主意想到一块儿去了。屋外警报声刺耳、飞机轰鸣、高射炮声大作，探照灯灯光飞舞，他们两人卸下灯泡，舒适地躺在床上聊天。突然急促的敲门声把他们惊吓住了，莫斯科防空袭管制和惩处是很严厉的。原来，有人发现他们两个旅客不下到地下室，怀疑是日本特务，带着持枪的军警上楼查房来了。当时在苏联的日本特务比较多，苏联人分不清中国人和日本人。一番诚恳地解释和道歉后，他们虽然没有被惩处，但还是不得不退了房。



解放战争时期，两位老战友在东北聚首。

李天佑将这张在莫斯科的合影带回国很不容易。从苏联到蒙古，穿越中蒙边界的沙漠，再进入宁夏、陕西西安，多次躲开日本巡逻兵和国民党地方武装的盘查。可以说，这张小小的照片是豁着性命带回来的。

第二张珍贵合影疑是朱瑞将军所拍。

这张两个人穿军装的合影照片，在李天佑留下来的影集中没有，李天佑的家人以前也从来没有见过。还是2007年的春节，钟赤兵叔叔的大女儿钟安屏送来给我们兄弟看的。她告诉我们，这张照片的

原版是一张1寸的黑白小照片，是朱瑞叔叔的女儿朱淮北去年在整理她母亲的遗物时偶然发现的。朱瑞是我军著名军事将领，辽沈战役时是东北民主联军的炮兵司令，1948年10月1日在东北义县看地形时不幸触雷牺牲。他有照相的爱好，估计李天佑和钟赤兵的这张照片是他给照的。这张原版照片在时隔60年后被意外发现，对我们这些后代是一个惊喜。听说，同时发现的还有一些有关其他将领的照片。这些老照片不仅可以丰富家庭的影集内容，而且可以作为革命历史的见证，实在是珍贵。

没有记载这张照片是何时何地照的，分析可能是在哈尔滨，时间判断可能是在1946年的5月底。1945年12月，李天佑任东北民主联军北满军区参谋长，钟赤兵任北满军区政治部主任。他们两个人又一次共事。北满军区在离哈尔滨市100里远的宾县。1946年4月底，在北满分局领导下，李天佑任总指挥，带领部队解放了哈尔滨。而紧接着不到一个月时间，国民党军队就先后占领了四平、长春和吉林，而我东北局领导机关和东北我军大部主力匆忙撤往哈尔滨。从照片上看李天佑没刮胡子，钟赤兵手里拿根烟。虽然当时他们只是30岁出头，可看上去都像是40岁的人了，严肃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们的心情不轻松。这次共事时间也不长，1946年5月底李天佑调任松江省军区司令员兼哈尔滨市卫戍司令员，钟赤兵也另有任命了。所以这个合影有可能是在1946年5月底他们各自奔赴新工作岗位前照的。

第三张照片上两个人穿中山装的合影，这是1960年冬季在广州拍的。当时李天佑在广州军区任代司令员，钟赤兵在北京任国防科委副主任。那年冬季他到广州开会，李天佑请他到家里吃饭，饭后他们两个人留下这张合影。两个人轻松的表情，在楼房和花草的背景下折射出和平时期的安定生活状态。仔细观察，钟赤兵的拐杖，比起哈尔滨照片中那个简易的双拐和莫斯科那个独脚的，已经漂亮多了。照片上他们紧靠在一起，这是两个生死之



1960年，李天佑(右一)与钟赤兵相聚在广州。

交、患难与共的战友。从在江西反“围剿”的战场上，到红军的长征路上，到莫斯科的学习生活，再到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创建根据地，他们共同穿过枪林弹雨，共同走过风风雨雨。他们不仅参加了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进行的宏伟壮观的革命战争，而且正在经历保卫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

三张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方的合影照片，记录下李天佑和钟赤兵的战斗友情，也见证了两位老战士的战斗和工作历程，见证了他们信奉的革命事业。

李天佑（1914.1~1970.9）广西临桂县人。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钟赤兵（1914.2~1975.12）湖南省平江县城关镇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国防科委副主任。第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倡导的爆破战术

罗小明 黎小弟/文



黎玉和罗舜初（站立者）在侍郎宅的围墙上。

这张照片是1940年12月黎玉和罗舜初在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侍郎宅拍照的。山东纵队在侍郎宅战斗中，用自己制造的土炸药，打开了侍郎宅大门。黎玉和罗舜初兴致勃勃地站在侍郎宅的围墙上拍下了这张照片。黎玉坐在墙边，那时他34岁，罗舜初神气地站着一旁，而那时，他才26岁。

1939年春夏之际，日寇出动两万余人，在植田大将指挥下分十余路对鲁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他们实行堡垒政策，以大、小据点为依托，步步为营“蚕食”我根据地。为了有效地摧毁敌人的碉堡、炮楼，各部队尝试制造“土大炮”，把榆木中心掏空，做炮筒，结果一点火，炮弹没出去，先把“炮”给炸毁了；有的把辣椒收集起来，想制成“毒气”熏倒敌人再进攻；有的把浸过油的棉花团绑在公鸡腿上，点火后将公鸡抛向敌人的炮楼；还有的部队采取古老的擂鼓呐喊的方法爬城强攻，结果都差强人意。

当时，山东纵队一旅二团的副团长王凤麟曾在苏联学习过军事爆破，抗大一分校有个教员叫赵志坚，是专门教工兵的，山东纵队就请他们办了两期爆破集训班，培养骨干，传授爆破技术，

参加学习的同志们积极性很高。

在沂水县（现属沂南）侍郎宅，有个地方反动武装头子叫刘超峰（刘越松），此人一贯坚持反共立场，经常进攻我抗日根据地，抓捕我党政军工作人员和家属，民愤极大。1940年12月，为了打击这个无恶不作的家伙，山东纵队命令特务团攻下刘超峰的反动堡垒。侍郎宅虽说只是个土围子，却是用巨石构筑而成，易守难攻。八路军第一纵队参谋处长罗舜初来到现场观察，提出土法上马用自己制造的土炸药炸炮楼。特务团领受任务后，通过坑道，将炸药送进土围子东南炮楼下，对炮楼实施爆破攻击，一举擒获了刘超峰，消灭了这股土顽武装。第一次使用爆破攻坚获得成功，大家都非常高兴，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委的黎玉和罗舜初来到现场，看到爆破效果很好，就在侍郎宅的围墙上留下了这张照片。

1941年2月，山东纵队一旅二团奉命攻打伪军据点徐家楼。战斗打响后，爆破手因为迷失方向，一时找不到事先指定的爆破点，而炸药包的导火索已经点燃，眼看就要爆炸，只好将炸药包靠围墙放下。结果炮楼没有炸着，却把围墙炸塌了。敌人被意外的爆炸震蒙了，我军乘机突进围墙，全歼守敌。这一仗，虽然没有按预想炸掉炮楼，却意外地发现，工业用胶质炸药外爆也可以摧毁土石围墙，这样不仅可以减少挖坑道的土方作业量，还可以减少伤亡。真是歪打正着，我军又多了一种爆破方式——由爆破员直接下炸药爆破。

为了减少爆破员的伤亡，一团参谋长于淞江设计了一种用木头做骨架，上铺几层浸湿的棉被，下安木轮，由1~4个人推动前行的“土坦克”，以掩护爆破手送炸药。但是，“土坦克”目标大，行动慢，防护力不好，爆破手的伤亡仍旧难以避免。于是，一团副团长王凤麟尝试着用火力掩护爆破手进行爆破作业。这样做比挖坑道工程量小，比“土坦克”更灵活安全。



拆除敌碉堡。 吉文 / 摄影

1942年1月，山东纵队一旅二团在攻打茅茨据点时，以一个连用强大火力封锁守军，以一个连组织投弹组，向炮楼顶层密集投弹，掩护工兵班长实施爆破，终于将炮楼炸塌，全歼守军。在进攻蔡家庄据点时，二团先是用爆破手段，把据点围墙四周的碉堡炸掉，然后用小包炸药连续爆破中心据点周边的火力点和障碍物，利用爆炸烟雾，掩护一名爆破手抱起一个10斤重的炸药包跃到中心碉堡的面前，一举将守敌100余人一起埋葬在大碉堡里。

随着八路军的爆破攻坚技术越来越精。日伪军也绞尽脑汁，想出了一系列对付八路军爆破的办法。针对敌人的反爆破措施，新的爆破办法层出不穷。例如：敌人加固工事，修双层围墙，我们就用多梯队接力方式连续爆破；敌人将碉堡底层用土石夯实

来阻止地面爆破，我们就用支架把炸药竖到二层楼上进行“悬炸”，敌人在碉堡外挖很宽很深的堑壕，我们就用带腿的云梯越战壕去炸。总之，不管敌人想出什么样的办法，都阻止不了我们爆破进攻，消灭敌人。应该值得一提的是，淄博矿区的工人们为了支援八路军打日本鬼子，冒着生命危险从井下把炸药和雷管装进饭盒里偷偷带出交给我们，许多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随着爆破技术、战术的日趋成熟，山东八路军不仅可以运用爆破拔除一般的敌人据点，还可以对县城进行爆破攻坚。1944年，我军就是运用多种爆破技术，仅用了两天的时间，就解放了日伪联合设防的沂水县城，全歼日伪守敌1000多人。

1947年，王建安同志（曾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副指挥兼一旅旅长）向毛主席汇报了山东部队实施爆破的经验，毛泽东听后十分重视山东八路军在爆破战术上取得的重要经验，认为在我军转入城市攻坚战中应该重视和推广爆破战术。1948年7月16日，毛泽东主席代军委起草了一封给徐向前、周士第同志的电报，内容是:“太原空虚，有乘胜夺取可能，……攻城方法望采用山东部队所使用者，既迅速，伤亡又少，又节省炮弹炸药。即是在火力掩护下用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携小量炸药置于城根，炸成一洞；再用同样方法置炸药于已炸开之洞内，炸成更大之洞；第三次，用大量炸药置于该洞，即可能成功。”电报中所提的“山东部队”指的是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其前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山东部队广泛使用爆破技术攻坚，并取得经验，就是从山东纵队开始的。

黎玉（1906.7~1986.5）山西省崞县（今原平）人。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农机部副部长。全国政协第三、第五、第六届常务委员。

罗舜初（1914.12 ~1981.2 ）福建省上杭县人。 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战斗间隙，王扶之蹲在自行车前吃面条。战争期间，黄克诚因为眼睛高度近视，骑马行军指挥作战很不方便，于是就改乘自行车。而这个自行车的“驾驶员”就是时任新四军三师司令部通信参谋的王扶之。

自行车上的指挥部

王扶之/文

1941年至1943年，日军对盐城、阜宁一带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率部进行反“扫荡”。由于黄克诚眼睛高度近视，骑马行军指挥作战很不方便，于是就改乘自行车。而这个自行车的“驾驶员”就是时任新四军三师司令部通信参谋的王扶之。

说到自行车，那还是1939年在河北的红子店、温塘战斗中，部队缴获了一辆自行车。那时候自行车是个洋玩艺，没人会骑，王扶之也很好奇，就想试试学学看。功夫不负有心人，王扶之不但很快学会了骑自行车，还可以在自行车上拿大顶，双手撒把骑和倒背着骑。

从此，部队无论向哪里开进，黄克诚师长总是以自行车代步，并经常坐在自行车上听取汇报，了解敌情，制订作战计划，指挥作战行动。这辆自行车的特殊功能被大家形象地比喻为“自行车上的指挥部”，而王扶之作为一名熟练的“驾驶员”随时保障着这个“指挥部”转战南北。

涟水县境内的五港口，是苏北抗日根据地盐阜区与淮海区交界处的要道。伪军在这里建起一座炮楼，对我军行动妨碍颇大。一次，王扶之用自行车载着黄克诚师长到这里看地形，远远地望着炮楼。黄克诚师长说：“要是能把这个据点争取过来，为我所用就好了。王扶之，你敢去做这个工作吗？”王扶之笑了笑回答：“师长，我当然敢，可是，怎么争取呢？如何做这个工作？”黄克诚师长说：“走，咱们回去，边走边说。”说完，坐上王扶之的自行车。在路上，黄克诚师长对王扶之讲：你要想办法首先作好炮楼里伪军头头的工作，让那个头头明白抗日斗争的形势与前途，看看能不能从他的家里做做工作。你呢，胆子要大些，心要细一些，遇事要沉着冷静。

这样，王扶之就承担了伪军炮楼内的统战工作。炮楼内伪军队长的家就在五港口庄子里，王扶之通过他庄子里的人与那个伪军队长取得了联系，经过几次接触，把他争取了过来，这个炮楼也就成了我军的情报站。一天，王扶之化装成老百姓进炮楼去取情报，刚坐下，日军一个小队长就带着一汽车鬼子来了。王扶之正好在炮楼里，这可怎么办？出去已经来不及了。王扶之急中生智，拉住伪军队长等几个人坐在麻将桌旁装做打麻将。队长通过

翻译告诉鬼子小队长：说王扶之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今天是来看望他。鬼子们没有发现破绽，休息一会儿就坐车走了，王扶之和这个来之不易的情报站总算有惊无险。

1943年春，新四军三师师部只带一个特务营在转移途中，在阜宁境内的芦堡外旧黄河堤附近同日军遭遇。特务营随即依托河堤与敌展开十分激烈的战斗，并多次与日寇拼起刺刀。部队伤亡较大，河堤临时防线随时有被敌突破的危险。师指挥所就设在距河堤不足200米的芦堡村内。特务营营长陈金保、政委黄励华请求师指挥所立即转移，可是黄克诚师长就是不肯走，他说："师指一撤就会动摇军心，不能撤。"在坚持指挥了一段时间后，黄克诚师长才在同志们的强烈要求下，勉强坐上王扶之的自行车，同师指挥所的其他人员一同撤出战斗。转移途中，他坐在自行车上发布命令，调单家港附近的第八旅二十二团一个营增援特务营。就这样，在自行车上黄克诚将军指挥了6次大规模的反"扫荡"战斗。

198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张爱萍同志到新疆检查边防建设，见到时任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的王扶之时还深情地询问："王扶之呀，还记得你用自行车驮着黄老的事吗？那时你的自行车上可带着三师的指挥部啊。"（**王扶之口述 王宝国整理**）

王扶之（1923.10～ ）陕西省子洲人。1935年7月参加红军，193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第十一、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全国政协第七、第八届常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周希汉，护送炮兵团回延安

韦晓咏/文　徐肖冰/摄

在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唯一的一支炮兵团投入了战斗，并在战斗中打光了弹药。战役结束后，没有炮弹的炮兵团，就成了前线部队的“累赘”。八路军的炮，每一门都是用鲜血和生命从敌人手中缴的，珍贵无比，毁掉或丢给敌人都不行。于是八路军总部决定由前线各部队分段将其护送回延安根据地休整。第一二九师负责太谷至清源段。

师长刘伯承对周希汉在百团大战中的出色表现印象深刻，所以他把护送任务交给第三八六旅，并点名由周希汉指挥护送。

除炮兵团外，被护送的还有由鲁西军分区司令员杨勇率领的一批赴延安集训的中、高级干部和一批来自日本国内的“反战同盟”的日本朋友。加上负责护送的第十七团和旅属第四交通大队，这支队伍足有3000多人，而且单位多、非战斗人员多、牲口多，行军的组织非常困难。

1941年5月26日，周希汉在太谷县的铺子岭，召集了一个小型联席会议。会上，他详细地介绍了日伪军在晋中平原上设置的几道封锁线的情况和特点、太谷至清源的路程和他们所选择的路径。接着，他宣布了行军序列和纪律，最后强调，由于是夜间隐蔽行动，“保持肃静和灯火管制是成功的关键”。

实行灯火管制当然是不允许吸烟的，这对睁开眼就离不开香烟的周希汉来说是个不小的困难。他和警卫员商量了一个办法，把水壶里灌满醋，想吸烟时抿一口。

28日黄昏，队伍离开西山底村，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原野上。

深夜11点部队将要通过同蒲铁路时，尖兵报告铁路上自北向南有一辆装甲机车开来，他们马上隐蔽。装甲机车一路上走走停停，探照灯惨白的光柱成扇面形扫来扫去，机枪也不时盲目地向铁路两

侧扫射。对于部队来说，这其实是司空见惯的，只要灯光扫过时匍匐不动，车上一般发现不了什么，困难的是牲口容易在枪声中受到惊吓暴露目标，好在炮兵团的牲口没有暴露目标，当装甲机车威风凛凛地远去后，他们立刻越过铁路，又穿行在敌人的据点间。

29日凌晨3点，他们涉过汾河，按时抵达护送任务的交接点东、西清堆。但不知何故接应部队没有按时前来，时间一分一秒地掠过，眼看天就亮了，继续等，万一等到天亮，仍等不来接应部队，他们将无处隐蔽相当危险。向前再送一程，他们道路不熟通过徐沟至交城的公路时天就该亮了，行动仍无法隐蔽。如何是好？

焦急中，周希汉习惯地把手伸进衣袋，空的。警卫员及时递过装满老陈醋的军用水壶，一口老陈醋，酸透顶梁门，他禁不住打了一个冷战，真顶用！比香烟灵多了，口中酸涩尚未退尽，一条妙计已浮上心头。

他猛然想到无法隐蔽就不隐蔽，索性让部队成进攻队形，大模大样地走大路，给敌人造成一个我军要打清源、高白据点的错觉。“敌人怎会晓得我的炮没有炮弹?等他们明白过来，我们已经过去，动作快点儿就进了山了!进了吕梁八分区的游击区，我还怕他何来?”他招来第十七团和交通四大队的领导，谈了自己的想法，接着说“万一敌人不上当，那就不惜一切代价坚决阻击，掩护被护送部队夺路先走”。经过讨论他决心下定，再送一程走大路。

很快八路军大部队要打清源、高白的信息已通过当地群众“泄露”给了敌人的“耳目”。

清晨的薄雾散尽时，公路上出现了一支“装备精良”的八路军，大模大样甚至是气势汹汹地行进着。清源、高白的日伪军果然上当，纷纷龟缩进防御工事，准备抗击。

周希汉端坐马上，与杨勇将军谈笑风声，在部队的簇拥下并辔而行。

他们就这样，从容地越过了封锁线。

当天上午10点多钟，他们进入山区，抵旺村、落地渠一带。这里已经属于吕梁军区的游击区了。在这里，他们与吕梁八分区的部队接上了头。善于表达激情的反战同盟的日本朋友们一路上缄默不语。当他们听说找到了接应部队，并且后面的路程相对比较安全的时候，竟然齐声欢呼起来，有的还叽里呱啦地唱起了歌。受他们的感染，其他被护送的同志们脸上也浮现出了笑容。周希汉也长出了一口气。但他没有把悬着的心放下。游击区毕竟是游击区，离敌人还很近，还不能算大功告成。

办好了交接手续，他决定护送部队原地宿营，放出警戒，等第二天被护送的人员走远后，他们再撤离。第二天破晓时分，周希汉被密集的枪炮声惊醒，他宿营的村庄被敌人包围了。

宿营的部署没有漏洞。周希汉的指挥部同交通四大队的大队部宿在一个村子，不易直接受到敌人的攻击，而且离第十七团的主力也并不远。但是村里的一个“抗日积极分子”实际上是个汉奸，此人嗅出了周希汉的身份，仗着路径熟，找了个托词，溜出山到清源向敌人告了密。

清源和高白的敌人得知八路军进山后并没有走远，连夜调整部队，从清源和高白两处倾巢而出，分两路杀奔山里。

一支日军由汉奸引路，绕过守护在前面的设防村落，直扑周希汉的宿营地。

和衣而卧的周希汉掀掉毯子，抄起枪就跳下床来。他从枪声中听出敌人战斗力不弱，而且不远处分明还有炮声，便知情况不妙。严重的并不是他本人有什么危险，是炮兵团和所有被护送的部队还没有走远。经过一整夜又大半天的跋涉，他们昨天也在靠里面一点的附近宿营的。还不知其他方向情况如何，前面若被突破，后面被护送的部队就失去了屏障。

他一出门便同警卫员撞了个满怀。警卫员说：“首长，村口被封住了，敌人差不多有一个营!四大队长带人在那儿顶着呢。他

让我们保护您突围。”

“沉着点，我的脑壳那么容易就让小鬼子要去了?跟我到前面看看去再讲!”

话虽如此，到了前面他立刻就明白了，突围出去是根本不可能的。交通四大队战斗力不算弱，但队部和警勤分队的力量还是太单薄了。再加上前面村庄的部队好像也受到了攻击，枪声很紧，即便他们能分出兵来支援，兵力也一定很有限，根本无济于事。他的心一沉。

恰在此时，第十七团指挥员陈康带人斜刺里飞马杀到。一顿机枪和手榴弹，打得封门的敌人退出去老远。见到周希汉，陈康只说了一句：“快走!”就命人把周希汉架起来抢出了危险地带。

转眼间有如神助，前面村子里的部队此刻也分出兵来，人数不多但拼了全力，兜着敌人的屁股没命地开了火。敌人本来就被陈康打得站不住脚，再加上背后一挨打，愈加慌乱，丢兵弃甲夺路退去。

此时，扼守大旺村制高点警戒阵地的部队和疙瘩村1200高地上的第十七团第八连两处都受到了猛烈的炮火攻击，情况吃紧。300多日军在炮火支援下向第八连的阵地发起冲锋。为了保住1200高地，八连官兵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斗异常激烈，该团参谋长廖兆行率队前去增援不幸英勇牺牲。

周希汉仔细观察着敌人进攻的势头，分析着自己的处境，敌人的后劲很足，自己要么被压迫到东面的平原上遭敌人聚歼，要么支撑不住往山里退。可炮兵团等被护送的部队刚刚出发，退下去是很危险的，若要敌人退兵，唯一的办法是釜底抽薪。他对陈康说：“老陈，我看他来了这么多的部队，清源和高白的家里一定空虚。能不能这样，我马上同八分区第三团联系一下，你们团和他们团各派出一个营，分别迂回到高白和清源这两个点敲他一家伙，逼他们缩回去。”



1941年5月30日上午，扼守疙瘩村制高点1200高地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枪炮声响成一片。第三八六旅参谋长周希汉对增援部队作简短的战前动员："……炮兵团还没有脱离险境，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不能退，相反的，我们必须把鬼子打退。"

陈康领命而去。

5月30日上午，扼守疙瘩村制高点1200高地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枪炮声响成一片。第三八六旅参谋长周希汉重新调整了部署，并对增援部队作了简短的战前动员："……炮兵团还没有脱离险境，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不能退，相反的，我们必须把鬼子打退。"

随后的战斗仍很激烈，但周希汉逐渐掌握了主动，日军的老窝受到陈康等部的袭击，首尾难顾，下午果然退了兵。此时炮兵团及被护送的部队已经远去，护送任务圆满完成。

周希汉（1913.8~1988.11）湖北省麻城县人。1928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参谋长、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坚持在大青山

张秀英/文　王锦/摄



这张在大青山山洞口前拍的照片并不十分清楚，但是姚喆将军一直把它保留在身边。照片中，穿着大衣的蒙古族老乡听到日军企图偷袭部队的消息后，饿着肚子跑了几十里路，悄悄给部队送信，看信的正是时任大青山支队参谋长的姚喆。

1938年7月，为了贯彻毛泽东关于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的重要指示，八路军总部决定以一二〇师七一五团和师直骑兵营一个连组成大青山支队,李井泉任支队长,姚喆任支队参谋长,率部挺进绥远敌后的大青山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不久，大青山支队改为骑兵支队，下编3个营，大大增强

了部队的战斗力，指战员们充分发挥骑兵的长处，灵活运用游击战术，积极战斗，英勇杀敌，被日伪军视为眼中钉。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加紧了对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扫荡”。敌人依仗其兵力多、装备好，总想一口吃掉大青山骑兵支队，我们就采取灵活的战术，钳制、疲惫、消耗敌人。敌人上山，我们下川，敌人在山区乱转，我们在树林联欢，敌人想找我们打硬仗，我们偏和敌人捉迷藏，敌人集中兵力，我们化整为零。这些战术交替使用，使得敌“扫荡”往往乘兴而来，扫兴而归。一次，日军六七百人从武川、萨拉齐、固阳三个据点出发，企图对我驻石虎子一带的骑兵支队教导团和绥西专署进行合击。由于老乡及时给我们送来了情报，确保了部队安全转移，使日本侵略军的偷袭计划扑了个空。

大青山地区是蒙古族人的聚居地,我们主动和蒙民交朋友,尊重蒙古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尽可能帮助蒙民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当地群众为了给我们送信、送粮、送情报、掩护伤兵，常常遭受敌人的毒打，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没有人民群众，大青山根据地不可能开辟，更不可能坚持到最后胜利。

姚喆（1906~1979.5）湖南省邵阳人。1928年参加平江起义。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原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王锦（1931~ ）山西省阳高县人。1945年参加八路军，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光明日报社摄影美术部主任。

张震参谋长提议合影照相

胡文良/文　任泊生/摄

1942年冬，日伪军对豫、皖、苏根据地清乡“扫荡”，新四军四师进行了33天的反“扫荡”战斗。总结会后，张震参谋长提议师首长和与会同志合影，洗后每人发了一张。照片是新四军四师联络专员任泊生同志照的。战争年代虽然战斗频繁，随身带的东西精减了又精减，可是这张照片一直保存至今，已经有67年了。

照片中第一排右一是机要员王来同志。他两手胸前一抱，显得自然潇洒，他生性活泼，好开玩笑。有一次，他看见师首长的勤务员在井水里冰了一个西瓜，竟然把西瓜偷来给机要科的同志们吃了，后来张参谋长知道了，要王来同志赔西瓜，王来扮着鬼脸说，我哪有钱买西瓜呀。张参谋长笑笑作罢。彭雪枫师长结婚，王来鼓动几个同志去偷听他们夫妇的讲话，结果一无所获。抗日战争胜利了，他高兴地爬上老乡的房顶往下跳，惹得同志们直乐。解放后，王来转业到地方工作。

前排：右三是机要股长徐树森同志。因为是打游击战，为了隐蔽安全起见，同志们经常穿便衣，所以他穿便衣时腰里总是系一个米袋子，饿不着肚子。徐树森后来是总参三部二局的政委。

右四是机要员吴志勇同志。离休前是福州军区直属政治部主任。

第二排：右一是机要员王学春。原来是彭雪枫师长的勤务员，后来学习机要业务作机要工作，离休前是第三军医大学医务部副政委。

右二是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同志。他特别能打仗，红军时期他是彭德怀司令员手下的一位得力的师长，精明干练，文武双才。他还经常给司令部干部讲话，讲两三个小时不用稿子，思路条理非常清楚，大家都爱听他的讲话，他的工作作风严谨，对部队要求严格。有一次，我给他送电报，因电报前后顺序不整齐，他把文件夹子一下摔到了门口，我拾起来回机要科重新夹好后再送去，他才满

意。还有一天深夜，军委来了急电，我去送电报，此时师长夫妇已经就寝，师长夫人凌云同志赶紧拉起被子蒙上头，我一时不知所措。彭师长就像什么也没发生，接过电报，处理电文。

右三是新四军四师政委邓子恢，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他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儿架子。

右四是机要科长左金祥，离休前是总参机要局副局长、顾问。

第三排：右二是新四军四师参谋长张震。他为人和蔼可亲，特别关心部属。1941年因战争激烈频繁，机要科工作特别多，休息少，我和施怀清等4位同志身体都有些吃不消，张震参谋长就吩咐司务长每天做一个荤菜，为我们加餐，直到我们身体好转。

从这张普通的照片上，看不出谁是师长，谁是普通一兵，按个儿大小排好就是了。张震参谋长个儿高排在最后，半个脸还被机要员王来同志挡住了。战争年代官兵平等，没有那么多的礼节，首长不须一定排在前面，上下级关系和谐、无拘束。

我珍藏这张照片，更怀念那个年代。



胡文良（1923.11~ ）1938年入伍，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总参机要局副局长，正军职顾问。

“皖南事变”中的王培臣

罗颖／文



王培臣记不起这张照片是谁拍的，但是王培臣在“皖南事变”中扛着机枪杀出一条血路突围的形象，却留在了战友们的心中。

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共9000余人，奉命由皖南北渡抗日，于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顽固派8个师8万余人的围攻堵截，激战八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最后突围出去2000余人，其余3000人被俘，2000余人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王培臣是突围出来的幸存者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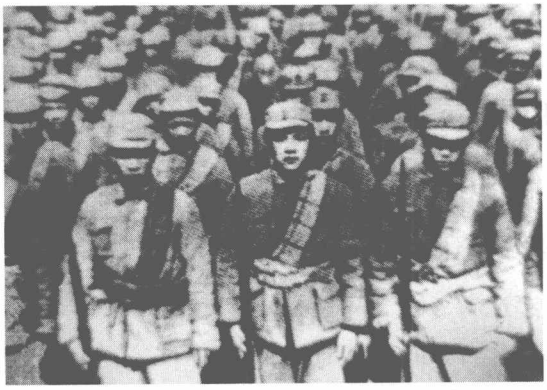
作为新四军新二支队作战科长，王培臣对当时之处境，早有一种难言的预感，常向支队领导建议准备方案。当时新二支队突围时为中路纵队（军部随中路纵队之后跟进），1月4日新二支队冒暴雨于午夜渡过章家渡的舒溪到达茂林东北的风村。6日战斗即打响，王培臣按支队首长指令，带一个侦察班分别到新、老三团传达作战命令，协助指挥榧岭、星谭和山口（百户坑口）战斗。8日、9日新二支队在高潭地域组织防御，掩护军部行动，战

斗极为激烈，伤亡较大，与敌打成胶着状态，晚上才得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人职务，部队由叶挺军长、饶漱石指挥的决定。10日到13日，新二支队占领石中坑阵地，抗敌围攻。当时部队英勇顽抗，王培臣在新、老三团阵地之间飞奔，同时又担负联系左路新一支队和右路三支队任务，协调战斗，收拢被打散人员，继续投入战斗。整个石井坑周围的战斗极为激烈，据突围出来的王东平、阙中一、王荣光、张日清等首长回忆，战斗中看到王培臣1.8米多高的身影带着侦察员，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在各团营之间飞跑，传达命令、协助指挥作战，其英勇与威猛，至今难忘。

13日下午4时左右，军部决定突围。新二支队分两路向西北方向突围，预定在铜（陵）、繁（昌）之间渡过长江到达无为县。二支队突围开始时只余近千人，陆续收拢其他部队达2000人。首次攻击受挫，退回狮形山与香炉东之间。再战，王培臣和新三团团长熊梦辉在前头带队，与敌激战，并会合了突围出来的支队副司令冯达飞等400余人，直奔章家渡。14日晨约5时，天刚破晓，冲到了章家渡对面的舒溪南岸，不知敌人新七师早已布防。于是决定百余人在南岸掩护，由王培臣和熊梦辉团长、参谋长张日清、主任阙中一率百余人先行强渡。冲到舒溪中间沙洲时，遭敌猛射所阻，大批战友倒在水里，王培臣大怒，端着机枪猛射，冲在最前面，大喊着激励冲锋。新三团参谋长张日清赶紧拉王培臣卧下，这时，一颗子弹射来，打断王培臣右手腕（后评二等甲级残废），又穿过新三团二营政委黄步忠的头部（当场牺牲），再穿过通讯班长叶石家的左腰部。部队因伤亡过大，回到南岸，王培臣等300多人被敌重兵三面追击围堵，又分成几股突围。王培臣与王荣光（解放后任江苏省军区副政委）、阙中一（解放后任东海舰队参谋长）等一部分人继续突围，中途殊死拼命，沿途两侧尽见牺牲的烈士和伤员，枪炮震耳，尸横遍野，血流

成河，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天地为悲。王培臣回忆说，下半夜冲到一处，见遍地都是新四军，以为大部队宿营，于是倒头便睡。凌晨，唤大家起来，才发现全部是新四军遇难的无头烈士（被敌人残忍地全部割下头颅）。在绝望中奋起。突围途中，王培臣带队冲在最前面，几次遇敌，均利用过去在赣南打游击时跟陈毅学的四川话搭腔，冒充敌人部队番号巧妙突围。一次被敌兵围住，关在一土屋中，晚上王培臣组织所有人员集中向土墙角撒尿，挖洞又突出。就这样，历经艰险，终于突出重围，北渡长江到达无为县集结。

“皖南事变”突围到无为的部队后来与江北游击队、挺进团等部队组成了新四军七师。“皖南事变”后，王培臣调到新四军军部工作一段后，又谢绝了二师师长罗炳辉邀请他调到该师的要求，再次选择到七师沿江支队兼沿江军分区任参谋长，是“皖南事变”不了的情结和死难烈士的英魂召唤着他，重新回到战斗过的地方，坚持皖中抗日战争直到最后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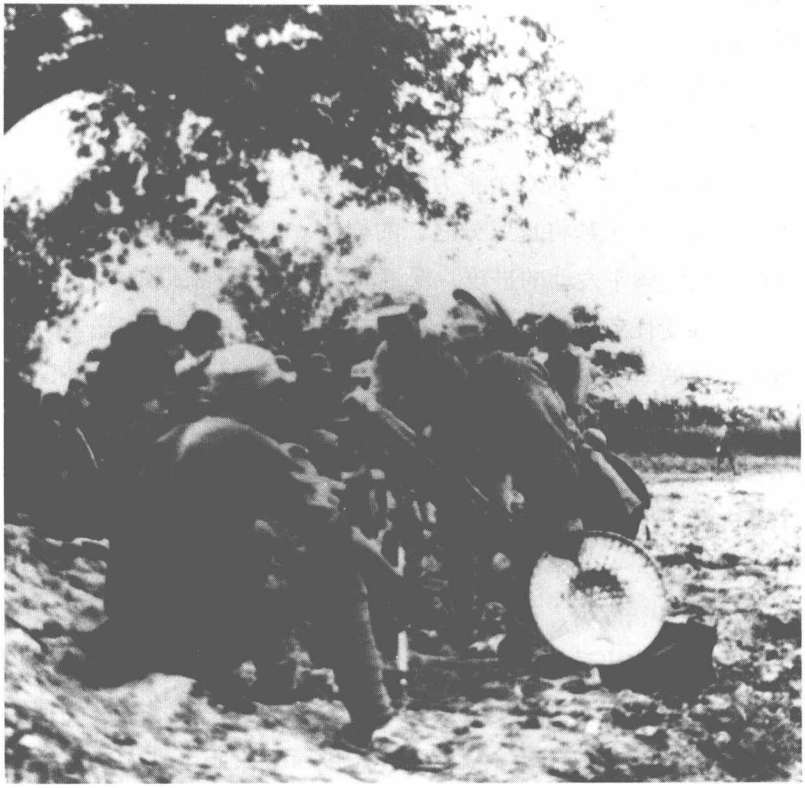


1941年5月，新四军第七师正式成立。图为成立大会上的指战员。

王培臣（1914.4~2007.8）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战斗。原国防工程指挥部参谋长。

谭希林在大桥战斗中

谭晓嘉/文



这张照片是1941年谭希林（右一）在大桥战斗前，下部队检查迫击炮的情景。谭希林对迫击炮一点儿也不陌生，在井冈山黄洋界上，谭希林就是出色的迫击炮炮手。如今，大桥战斗在即，迫击炮又该发挥威力了。

1941年10月，日军、伪军和桂系顽军部队四面围攻路西根据地，桂顽一七一师先行向路西根据地进攻，后面是一七二师集结在巢县附近，国民党四十八军的两个师隐伏于寿县以西，进犯蚕食我路西南部地区一百多个村镇，如果日伪军继续向我路西根据地腹地进逼，势必把新四军挤出路西根据地，华东根据地全境都将面临险境。

面对顽军的进攻，新四军组建津浦路西野战司令部，谭希林任司令员，王集成任政委，将六旅三个团，四旅十一团和十二团，五旅十三团，共六个主力团，都划归津浦路西野战司令部指挥，即集中了二师将近三分之二的部队，主要的任务，就是坚决打退国民党顽军发动的进攻，保卫淮南津浦路西根据地。

从领受任务的那一天起，谭希林便深藏在自己的作战室里，面对满墙的军事地图，思考、推敲、决策，经过深思熟虑，谭希林把注意力集中到大桥镇。

大桥镇是两军必争之地，守军是敌五一一团一营，外加一个县大队，总兵力1100多人。离大桥不出20里路远近，便是界牌集、王山头等一大串的顽军据点，都在半日行程之内，如果强攻大桥的战斗一打响，这些据点里的援兵说到便到。不但一七一师的兵力会倾巢出动，另外的敌3个师也会进行增援。那些站在滁县、蚌埠、合肥城头坐山观虎斗的日军、伪军，也很有可能乘机出动，牵一发而动全身。权衡利弊，谭希林决心下到大桥镇，将这股顽军包围歼灭，战斗打响后，引蛇出洞，再打一个伏击战，这样，打一个相当规模的歼灭战的目标便可实现。但是这个意图风险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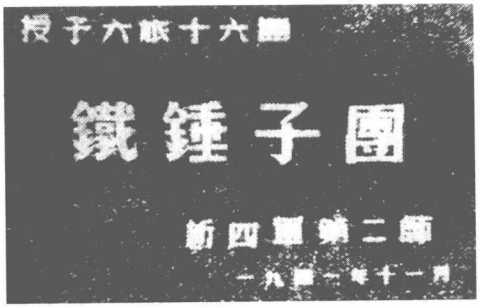
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津浦路西野战司令部命令，四旅十一团急行军200里，从路东的古城镇赶到路西的永宁集，十一团抵达路西的当晚，谭希林即刻召开作战会议，给参加大桥战役的六个团下达了作战命令。四旅十一团负责强攻大桥镇，要求全

部歼灭驻守顽军，战斗必须在第二天打响，只给一天的准备时间，并且严格限定在一昼夜时间之内解决战斗。六旅十六团负责打援，在新张家村外设伏，不许一个援兵进入大桥镇。五旅十三团位于赫朗庙一带防守，准备相机参战。六旅十七团于战场北翼监视定远城等地日伪军。六旅十八团为战场西南侧保障部队。四旅十二团为战役预备队。五个县总队作为战役保障部队分别监视各据点的敌军。在作战会议上谭希林指出，战役部署上一个团攻坚，五个团掩护，是战场形势的需要。而把艰巨的攻坚任务交给匆匆赶来的十一团，没有使用已在路西的其他几个主力团，是为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路西这几个主力团，敌人有暗探盯着，所以让各团离大桥远一些，十一团从路东赶来，隔一天就下手，中心区的群众给你们站岗放哨，封锁消息，就可以打个措手不及。谭希林在向十一团交代任务时指出，只给你们一天准备时间，行动要坚决，16日晚打响，争取17日白天解决战斗。各团领导当场表示，保证完成战斗任务。

16日晚，十一团在团长吴华夺率领下包围了大桥镇，11时30分，三面同时发起攻击，突击队用大刀和手榴弹开路，迅速消灭了县常备大队400余人。随即向大桥镇的北大街展开进攻，顽军凭借层层叠叠的工事顽强抵抗，十一团以火力和近战拼搏相抗衡，在反复较量中，逐渐攻入北大街。大桥镇的顽军一边拼死顽抗，一边告急求援，距离大桥镇最近的据点是界牌集，17日上午，界牌集顽军一个加强营500余人准备随时出动，但指挥官迟迟不敢下令出发，犹豫之间时间过了中午，当界牌集的顽军终于出动的时候，十六团团长张翼翔早已率领部队悄悄进入距大桥镇只有六七里的地方，在废弃了的砖瓦窑厂周围的荒野干河沟里张开了一只大口袋。让从界牌集出来的敌援军毫无戒备地进入了十六团的伏击圈。当敌援一到，张翼翔一挥手，埋伏在干河沟里的机枪、迫击炮摆成一线，突然齐射，在震耳欲聋的枪炮声里，

一排排手榴弹飞入敌军队伍中，这时震人心魄的冲锋号响起，十六团的战士们，奋勇冲进顽军队伍，干净利索地解决了战斗。顽军一个加强营，没来得及还手，便被包了饺子。在新张家伏击战打响之前，十一团调整了部署，重新组织进攻，将敌人阵地分割成许多块，残敌阵脚大乱，仅余200多人向北突围，被围歼在镇外的野地里。

大桥战役的胜利，稳定了淮南形势，巩固了路西根据地。战后，四旅十一团和六旅十六团被授予“铁锤子团”光荣称号。路西野战司令部撤销前夕，专门出版了一本大桥战役经验总结专集，扉页上有谭希林的题词，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战阵不依陈法，行动不循常轨，依敌情我情地形之变化而变化。”让许多战斗的亲历者记忆犹新。



大桥战役结束后，六旅十六团被授予“铁锤子团”光荣称号。

谭希林（1908.3~1970.2）湖南省长沙（现为望城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进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参加了北伐战争。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端炮楼

刘丁玲 刘兰丰/文　刘峰/摄



这张《端炮楼》的照片是刘峰于1944年6月在平汉铁路线上保定以北的徐水县隧镇拍摄的。

1941年12月，日本侵略军以五万兵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扫荡”。日本侵略者推行的“三光”政策，使日军在所到之处见人就杀，见屋就烧，见粮就抢。同时发动了所谓的“治安强化”运动，把修路、挖沟、筑碉堡结为一体，迫使当地

群众为他们建了3358个据点和炮楼，修了13452公里的封锁墙，企图用来围困八路军和阻止八路军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当时，打击敌人重要的任务是端掉日本侵略军的炮楼。因为炮楼上常驻有日伪军的小头目，他们一般不离开炮楼，一出来就无恶不作，时刻威胁着当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端掉一个炮楼就等于扩大了一块根据地。

1944年春季以后，敌人加强了易县、满城地区一线炮楼的兵力，其他地区的炮楼则比较空虚。晋察冀一分区针对敌人这一弱点，决心将徐水县沟外的几个中心炮楼全都端掉。

按着惯例，每年的端午节，各炮楼都会向周围村镇索要过节礼物，这时候，正是一次摸清敌情和化装袭敌的大好时机。端炮楼就定在端午节。听到这一消息，时任晋察冀第二纵队摄影股股长的刘峰非常高兴，他早就想拍一张端炮楼的照片，以展示敌后军民运用各种手段打击敌人的抗日精神。机会终于来了，刘峰立即身藏照相机，腰插手榴弹，跟随徐定支队和当地群众，抬着礼物，藏着武器，敲锣打鼓，浩浩荡荡地走进了敌炮楼，还没等敌人明白怎么回事，战士们突然把藏在箩筐里的武器拿出来，迅速解决了战斗。随后，徐定支队又见机行事，把设在北楼、户木、隧镇、高林营、崔庄等几座中心炮楼一一端掉。这个端午节成了徐定支队和当地群众的端炮楼节。这张照片就是打下隧镇炮楼时拍摄的。战士们从炮楼里搬取胜利品，群众庆祝胜利的欢呼声和鼓声如犹在耳……如今，我们已经看不见炮楼了，可是这张照片却清晰地告诉我们，当年，晋察冀边区军民就是在碉堡如林、沟墙成网的广大地区和敌人进行着出生入死的艰苦斗争。

刘峰（1923.12~1979.2）河北省新城人。1939年6月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解放军画报社摄影记者、编辑组组长。

胡奇才打冶源

胡东平/文　胡奇才/摄



这张黑白照片拍摄于1945年6月，照片中横七竖八整整十个日军年轻人躺在地上，赤裸的上身露出多个刺刀的扎痕，远处三个人是鲁中军区警卫班的战士，居中者是赵太富，现已90岁高龄，原杭州市重工业局局长，是此照片健在的唯一见证人。

1945年的初夏，盘踞在山东临朐的一个日本小队，经常结队出城，袭扰乡村，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尤其以奸淫妇女为乐，老少皆不放过，先奸后杀，并把裸露的尸体挂在路旁，当地百姓恨这帮小鬼子丧尽天良，禽兽不如。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时任鲁中军区政委的罗舜初把参谋长胡奇才叫来，商量如何替沂蒙父老出口恶气。

胡奇才知道，狡猾的鬼子在碉堡里不出来，强攻不是上策，如隔靴搔痒。想起跟随徐向前司令在鄂豫皖的战斗经历，为何不学习他的围城打援的战法，将敌引出临朐歼灭。

1945年6月，胡奇才率领鲁中军区二团一举包围了驻守在临朐县城南冶源的马大牙伪军中队。马大牙见势不妙，遂向驻扎在临朐城的日军告急。日寇心里明白，倘若冶源被我攻克，临朐城则难以保住。于是，日军的玉渊顾问当即率领30多人的小队前来增援。同时，还急令伪临朐县“清乡”大队、县警察队等伪军几百人，向冶源进发。这正是胡奇才事先所料到的，他早已以两个营的兵力悄悄在临朐城外的荒野埋伏了起来，指挥所就设在位居高坡的一座关帝庙里，凭窗外望，大道、小路看得清清楚楚。

时近中午，一队鬼子急匆匆地走了过来，看到日寇那副骄横野蛮的样子，战士们不由怒火万丈。当这伙敌人进入战士们的埋伏圈时，胡奇才当机立断命令二团一营：“出击！统统上刺刀，把敌人剁成肉泥！”

拼刺刀是一营战士的绝招，加之当时子弹缺乏，一营战士便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崇尚武士精神的日本鬼子，见八路军战士如此英勇，先是一惊，继而清醒了过来，像野兽般地嗷嗷叫着，端着刺刀跟一营战士展开拼杀。顿时，刺刀飞舞，喊声震天，战士英勇顽强，一个回合便把鬼子杀得一败涂地，33名日军除1名被俘外，全被打死，包括1名日军小队长。这次伏击战，有个叫冯相成的翻译官，见事不好，趴在苇草丛中藏了起来，一营打扫战场时，把他俘虏了。当时，闻讯赶来的乡亲们看到这一堆鬼子的尸体，高兴得把一营的战士抬起来欢呼。

战斗结束后，面对横躺竖卧的鬼子尸体，胡奇才叫战士把这些尸体拉到一起排队，顺手掏出在长征时缴获敌人的照相机，“咔嚓”一声，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1987年，迟浩田到沂蒙山区视察，有一七旬老翁特地向他

打听胡奇才同志，并当场唱出了当年歌颂临朐战斗胜利的歌谣："胡奇才，不简单，指挥八路打冶源；打死鬼子三十三，活捉一个翻译官。"迟浩田听后感慨万千，回京后即亲笔写下了这首歌谣，敬赠胡奇才老将军。

如今，胡奇才和与他一起战斗过的敢于和日本鬼子拼刺刀的二团战士们大都离我们而去，而这张照片已成为军事博物馆珍贵的历史资料。看着这张照片，我们越发真切地感觉到胡奇才当年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那就是：没有保家卫国胜利的民族是可悲的。从南京大屠杀的屈辱，经狼牙山五壮士的悲壮，到照片上亮剑击败武士道的骄傲，它是千千万万中国人胜利的见证。如果有一天，敌人胆敢侵犯，别忘记，鲁中军区二团战士的子孙，照样会亮剑战场，以胜利证明中华民族永远屹立的理由。

胡奇才(1914.10~1997.1) 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长征。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主编注： 在《军中老照片》约稿时，我无意中发现了两张同样的照片：两位作者围绕照片写的是同一件事：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同一次战斗。《胡奇才打冶源》是胡奇才的孩子写的，父辈的英雄主义精神在孩子们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芝麻部歼敌》是老英雄赵兴元写的。我把这两篇文章放在一起，不仅仅是因为照片里的故事，也是由于照片展示的是不可复制的历史见证，在叙述历史时，有时一张小小的照片，其真实性、可靠性，往往胜过千言万语。

在《胡奇才打冶源》的照片上，有几个大字，那是胡奇才当年拍摄照片后写下的；在《芝麻部歼敌》的照片中，除了几个大字，还有两行清晰的小字，那是胡奇才1982年将照片送给四十军时写下的，因为当年的鲁中军区二团后来改编为四十军三五三团。照片上胡奇才的字迹非常珍贵，胡奇才不仅是这场战斗的指挥者，也是这张照片的拍摄者。赵兴元是这张照片的见证者，也是这场战斗的亲历者。这张照片，就像中国革命历史画卷中的许许多多照片一样，已经成为我们了解历史、了解历史事件、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长壮大的一种解读方式。



芝麻部歼敌

赵兴元/文　胡奇才/摄

冶源战斗后，打扫战场时胡奇才拍下了这张照片。

我也保留了一张打冶源的照片，是四十军一位老领导送给我的，因为我亲身经历了这场战斗。

1945年夏，八路军总部发出命令，要求各部对日寇占领的各大城市展开更加积极的进攻。当时我在鲁中军区二团一营任一连副指导员，随部参加了军区组织的“东进攻势”。围攻冶源和芝麻部日寇就是这其中的一仗。

冶源是敌设在我解放区和敌占区之间的重要据点，距此向北直通胶济路上的重镇临朐。汉奸马大牙率他的汉奸大队300多人驻守这里，这个汉奸大队由原来的地主武装组成，他们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被乡亲们称做“大耳朵队”（意为像猪一样贪婪），在当地引起极大民愤。他们死心塌地投靠日寇，顽固地与八路军为敌。其据点在日寇的支持下修得非常坚固，砖砌的围墙高宽各二丈有余，墙外是深宽各二丈的外壕，壕外有三层铁丝网。

6月22日夜，我们在营长张少安的指挥下包围了冶源据点。由于当夜雨下个不停，壕沟湿滑，几次爆破均未成功，随即改夜袭为白天强攻。天亮后，按照计划，二连、四连担任主攻，我们连为助攻，向冶源发起了攻击。在我强大的攻击下，马大牙惊慌失措，连连向住临朐的日军求援，日军立即派出一小队鬼子和一

个连伪军驰援冶源。我指战员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英勇作战，经40分钟激战就攻进据点，全歼了守敌，活捉了马大牙。而后，我连在指导员张连盟的指挥下迅速撤离战场，奉命向北迎敌。

此时，临朐出动的援兵已进至距冶源六里的芝麻部，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其经营了8年之久的重要据点，会这么快被我军端掉，还在拼命地向冶源疾进。我连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向敌发起突然袭击，然后乘敌慌乱之际冲入敌阵，展开了白刃格斗，全歼了伪军，迫使鬼子小队慌忙退入河边的一块坟地里背水顽抗。这时二营四连从侧翼向坟地杀来，我们两个连协力夹击，把鬼子赶进了河边树林，而后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歼敌大部。残敌逃至河对岸，躲在芦苇丛中，企图继续顽抗。我带二排突过河去，全歼了残敌。这时，我们在河边发现一个鬼子兵躺在沙滩上一动不动，身边有一个信鸽笼，四只信鸽一只不少的还在里面，人像是死了，可身上没有伤口，有几个战士上去用脚踢他，他突然站了起来，成了我们的俘虏。这个俘虏还算听话，当我们站队时他还自觉地站在队后，当我们开饭时，他不客气地先吃起来,一看便知是饿了很长时间了。后来经审问才知道，他是刚从日本补充来的新兵，专门负责放信鸽，由于我军作战勇猛快速，他一只信鸽也没来得及放，小队就给打没了，他只好装死，结果还是没能逃过我们战士的眼睛，作了俘虏。

随后，我们把尸体和缴获的枪支等战利品都集中起来。正在这时，胡奇才从指挥部赶到了现场，他当时是鲁中军区参谋长，我们简单汇报了一下战斗情况，他看了一下现场，拿出相机，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赵兴元口述 杨延龙整理**）

赵兴元（1925.1~ ）山东省章丘人。1939年7月参加八路军，194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旅大警备区副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共第九届至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我军将帅首次集体转移

滕飞/文



前排蹲坐5人:左起依次为李伯钊、邓颖超、蔡树藩、聂荣臻、李富春。

后排站立7人（不算陈毅与邓小平之间露半个头部的人）：左起依次为杨尚昆（叼香烟者）、陈毅、邓小平、刘伯承、滕代远、萧劲光、陈赓（其右一人只露半身），同机还有杨得志等人未出现在这张照片上。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投降，延安军民沉浸在一片喜庆之中，可就在这时，国民党政府却电令八路军、新四军等所有部队“原地驻防待命”，不许解放军进行反攻，收复失地，同时下令敌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

华北和华东的大片敌占区面临着由谁受降、由谁接管刻不容缓的抉择。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决定迅速把出席党的七届一中全会的代表以及在延安参加整风的我军各路将领以最快的方式送回前线。可是，千里迢迢怎么跨越黄河和太行山呢？在延安，别说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即便有，又怎能快速便捷呢？

经常与美军观察组打交道的中央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受命向美军观察组致以抗战胜利的热烈祝贺，并顺便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想借一架飞机，送一批人员到太行山麓的八路军前方总

部，参加对日寇的最后一战。至于这批人员的姓名、职务，叶剑英笑而不谈。美军观察组也未细问。

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滕代远出席党的七届一中全会后，就在延安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八路军的工作情况。听到这一情况后，立即轻装上阵，做好了一切准备。

8月25日清晨，20位受命搭乘飞机赶赴前线的军人匆匆到达了延安东关机场。

原来早在1944年末，八路军太行军区就在晋东南的黎城县长凝镇修建了一个简易机场，用于接待前来的美军人员，同时转运被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救护的美国空军人员。太行军区特设情报联络处负责此项工作，美军飞机以前也曾多次往返于此地与延安之间，所以，美军观察组人员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叶剑英的要求，甚至认为没有请示上级的必要。

为防不测，中共中央对此事严格保密，要求20位军人谁也不许带随员和家属。

毛泽东非常关心这次飞行的安全，派叶剑英和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到机场进行安全检查并组织登机，要求每个乘机人员都要带上降落伞。因为这20位军人要搭乘的是一架破旧的美国军用运输机，舱门关不紧，两只螺旋桨在启动时还要靠人来推动。机舱矮小并呈弧形，人在两边的铁座上坐下后，根本直不起腰、抬不起头，好在飞机性能良好。不过滕代远一点儿也不担心，早在1934年滕代远在苏联就学习过驾驶汽车、飞机、坦克和爆破、跳伞等军事技能，紧急情况下安全跳伞应该不成问题。起飞前，他还教大家如何使用降落伞。当大家背着降落伞上机前，不知谁提议合个影留念，于是，大家背着降落伞在延安东关机场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9时许，飞机从跑道上腾空而起，把人们的心一起带上变幻莫测的万里长空。延安最高统帅部里同样充满着紧张和担忧的气

氛。谁都明白：万一这架飞机在飞越封锁线时被击落，或因其他什么原因而失事，那么，这将对我党我军造成至关重要的大损失！

经过一段惊心动魄的难熬等待，飞机终于平安降落山西第十八集团军总部。作战参谋第一时间向毛泽东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听后会心地笑了。就这样，美军飞行员一次漫不经心的飞行，仅用几个小时，便使我党我军完成了本来需要艰难跋涉两个月左右时间才能完成的战略性输送任务。

这是我党我军统帅部将帅第一次集体立体化行军转移。

乘坐这架飞机的20位军人是：晋冀鲁豫军区（二野前身）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第一副司令员滕代远、副政委薄一波、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军区所属二级军区（兵团）司令员陈赓、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山东军区（三野前身）司令员陈毅、军区所属二级军区（兵团）司令员江华、聂鹤亭、宋时轮、傅秋涛、邓克明；东北军区（四野前身）司令员林彪、军区所属二级军区（兵团）司令员萧劲光、邓华、李天佑、冀察晋军区（华野前身）所属二级军区（兵团）司令员杨得志。这些乘坐飞机的军人都是我党我军各大战略区的主帅和高级将领。

滕代远(1904.11~1974.12) 湖南省麻阳人。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任铁道部部长。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第八届至第十届中央委员，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

让敌人的飞机有来无回

康鲁平/文



听唱片。照片左起李兆培（警卫团副参谋长）、左第二人名字记不清（南通县县长）、康林（南通警卫团团长）、沈志仁（南通警卫团政治处主任）、顾尔钥（当时是南通警卫团政委），右一、右二不详。

1945年4月的一天，南通警卫团团长康林带部队在江苏省如东县北坎休整，为了对付日本鬼子的“清乡”，部队正准备转移。这时，天忽然阴了下来，下起了雨。在风雨交加中，隐隐约约听见了“嗡嗡”的响声，大家不由得警觉起来。只见一架画着“太阳旗”的日本运输机贴着房顶由北向南飞来，由于气候环境恶劣，敌机由南向西又折向东转了一圈，在草滩上迫降了。敌机为什么在这降落呢？想必出了什么事情，康林命令部队暂缓转移，展开部队，向敌机降落的地方围攻上去。

飞机停下后，从机舱里走出一帮穿着阔气的鬼子军官，看样子是航空兵，其中一个又黑又粗的大高个向我们走来，因为看我们有些人穿着日本军服，他还以为遇到自己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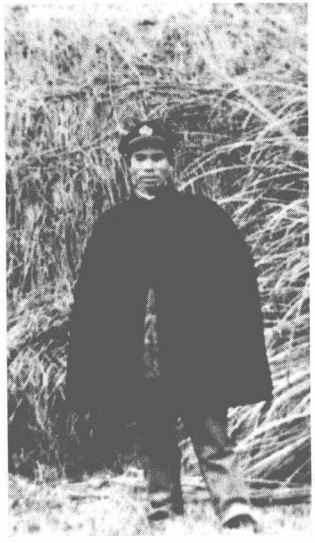
七连党支部书记沈志仁笑呵呵地迎了上去，大高个忙说他们是刚从日本航校毕业的军官，共24人，这次是分配到上海工作，飞机从东京起飞，由于气候条件太差，在这迫降了。说罢，他还用匕首在地上画了两个汉字“三余”，要我们把他们送到三余去。三余是日本鬼子在这一带的重要据点之一，离这里不到30里路。沈志仁略一思忖，假装答应下来，大高个十分高兴，停了一会儿，他突然发现不对，因为他看见我们许多人当中还有穿新四军服装的，他瞪着眼睛大声问：“这是什么地方？”沈志仁看

骗不了他，就说："这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又指着康林说："这是我们新四军的联队长，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投降吧！"大高个猛然吃了一惊，转身想跑，被沈志仁一把抓住，大高个一看难以逃脱，就朝飞机方向的鬼子大声喊，告诉远处的鬼子遇到新四军了，让他们赶紧驾机逃跑。

情况瞬间变化，康林当机立断，不能让送上门的鬼子跑掉，即令七连连长李明德立刻展开进攻。

随着"嗡嗡"的响声，飞机上的螺旋桨转动起来，飞机就要起飞了，部队已无法接近飞机。康林大声命令部队：打！朝机舱狠狠打。一阵枪响，飞机上的油箱着火了。那些刚爬上飞机的鬼子有的喊、有的叫、有的浑身是火栽下了飞机。飞机不能起飞了，敌人像热锅上的蚂蚁，乱成一团，不一会儿，就成了我们的俘虏。

打完这一仗，部队迅速转移如东县北坎镇。在整理战利品时，大家又高兴又新鲜，因为许多战利品从来没有见过。如转盘机关枪，射击时会发出红光、绿光；防水镜、日式的大披风、还有留声机，当时我们还不知道留声机叫什么，围在一起观看，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康林穿着"打飞机的战利品"日式的大披风留影。

部队抓获日军空军军官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四分区，老乡们在传颂过程中，为它增添了许多传奇的色彩。（根据康林回忆录整理）

康林（1916.11~1995.7）江西省于都新陂乡人。1932年3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二十八军军长。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



康矛召正在对日军宣传我党宽大俘虏的政策。
龙实／摄

日本鬼子举起手来

龙实/文　龙实 康矛召/摄

1945年日寇战败宣告投降，但蒋介石却规定日军只许向国民党军队缴械。为此，山东境内八路军一一五师决定派一支小部队到津浦铁路枣庄—济南段侦察日军动向，相机歼灭拒绝向我军投降的敌人。

这年冬天，我军前线部队在鲁南津浦铁路上的官桥车站发现，每天都有小股日军陆续由藤县往济南方向步行，他们身着军装并打着绑腿，没有携带武器。为了弄清这些日军的真实情况，一天清晨，部队在铁路一侧埋伏，待一批日军走近，部队一跃而起，齐声怒吼，“举起手来！”面对突然出现的八路军，日军个个惊慌失措，纷纷举起双手。此时，我和一一五师宣传科科长康矛召冲上前去，赶紧拍下了日军举手投降的镜头。尔后，由懂日语的敌工干部一一查问他们的身份及此行目的，战士们同时搜查他们身上是否携带武器。这批日军个个年轻力壮，一看就像当兵的，可是他们口口声声都自称是商人，说生意难做，准备到济南去并设法回国。当时济南是国民党占领区，有投降日军在那



日本鬼子举起手来。照片中，站在日军队伍前穿棉衣的人是龙实。

康矛召 / 摄

里等待遣返回国，此说法虽有可疑之处，但他们确实没有带任何武器，当时山东境内的日军敢于顽抗者也极少了，于是决定对其教育后放行。一一五师宣传科科长康矛召同志上前讲话，他痛斥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着重阐明日本军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日本士兵应该与中国人民一起反对侵略战争。同时，康矛召还对这些俘虏宣讲了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

我当时任一一五师《山东画报》的主编，到部队筹建摄影通讯网工作，见此场面是个好镜头，便拿起相机，把这个难得的场面拍了下来。可惜战争年代没有妥善保管，胶卷冲洗出来后模糊不清，非常遗憾。

左面这张照片是康矛召拍的。照片中，站在日军队伍前穿棉衣的人是我，那些戴着军帽、打着绑腿、扎着宽皮带的人就是口口声声自称是“商人”，恳求我们对他们放行的日本军人。

这两张照片，均是在同一场景拍摄的。

或许是康矛召的讲话教育了日本军人，或许是八路军对日本军人的友好态度感化了他们，不久，便出现了日本军人用马车拉着军用物质、打着白旗来送“货”的生动情景，康矛召用他的相机记录下了这个真实的镜头。

抗日战争是改变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一场战争，是反对日本侵略者，保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的神圣事业。

如今，抗日战争胜利已经60多年了，这些“日本鬼子举起手来”的照片，不仅真实记录了日本鬼子心悦诚服举手投降，也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宽大胸怀。（王卉 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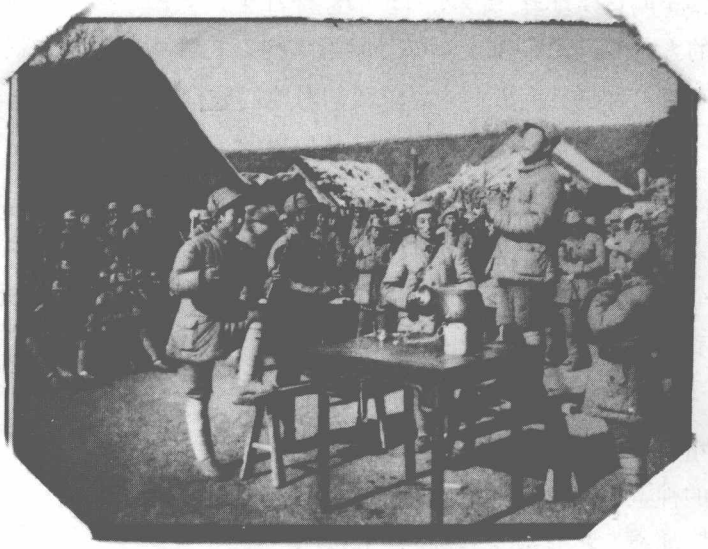


日本军人用马车拉着军用物质、打着白旗来送“货”。

康矛召 / 摄

龙实（1918.4~ ）广东省高州人。1938年由广东赴延安在“鲁艺”学习，同年参加八路军并于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原重庆市文联副主席，四川美术学院院长。

康矛召（1919.4~1994.11）湖北省武昌人。1937年12月赴延安抗大。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华东野战军新华社前线总分社社长。1950年4月调外交部工作，前驻欧洲经济共同体使团团长和驻卢森堡大使。



国防剧团的宋文、杭普、徐松等同志，正在为十五团戴荣昌竞选英模人物。

参谋长为英雄竞选唱大戏

罗小兵/文　罗义淮/摄

这两张老照片是1946年时任山东军区第五师宣传科科长的罗义淮拍摄的。照片背面均有罗义淮亲笔写的说明，第一张照片说明：师首长肖参谋长唱山西小调给孙延之竞选。第二张说明：国防剧团给十五团戴荣昌竞选。

看到这样的说明，许多人都感到疑惑：60年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就有“竞选”活动，有没有搞错啊？带着这一疑问，我走访了当年山东军区第五师的一些老同志，心中的谜团才豁然解开。据当年的文工团干部、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郝光及其爱人张云光回忆，在战争年代，每一场战斗下来，部队都会开展竞选，俗称“拉选票”，实际上是为推举英雄模范而进行的一种组织动员活动。各单位纷纷评选英雄模范代表，领导干部、政治机关也亲自出马，带领文工团为英雄模范“拉选票”，文工团通常采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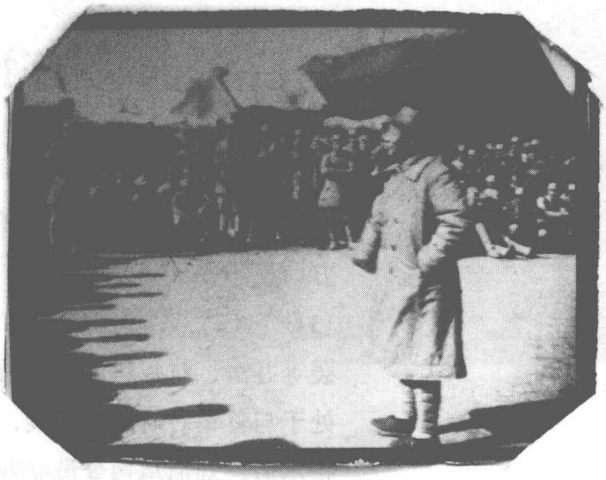
政治鼓动、文艺演出的形式，把英雄模范的事迹编成文艺节目，在部队广为传唱。这种表彰先进典型、弘扬英模人物的做法，深受广大指战员欢迎。

这两张照片虽然泛黄，但是画面依然清晰可辨：图中为孙延之竞选。站在战士们中间唱山西小调的是山东军区第五师参谋长肖镜海，肖镜海后改名刘静海，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孙延之，当时是第五师分所的一位班长，后来被评为乙等看护模范。

第二张照片，经郝光夫妇辨认，认出图中有当年胶东军区国防剧团的宋文、杭普、徐松等同志，他们用吹拉弹唱的文艺形式，为十五团戴荣昌竞选英模人物。戴荣昌，被评为特等战斗模范。

1946年11月，山东军区胜利结束了长达五个月的第一次胶东保卫战,部队全部集结于掖县东部地区进行整训，各部队开展了别具一格的竞选英雄模范的组织活动，罗义淮用手中的相机，真实记录了战争年代独具中国特色的解放军民主生活。

山东军区第五师参谋长肖镜海在战士们中间唱山西小调。



罗义淮（1918.1~1978.11） 四川（今重庆）荣昌人，1938年初徒步赴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昆明军区后勤部副政委。



刘伯承司令员练打靶

裴植　文/摄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一方面与我们进行和平谈判，一方面又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妄图在内战中消灭我们。1946年1月13日午夜停战协定生效后，蒋介石仍采取了筑堡进逼和骚扰、奔袭等办法，对我解放区不断进行挑衅和蚕食，我晋冀鲁豫解放区处于与蒋军对峙的第一线，更是首当其冲。党中央下发五一练兵指示后，刘伯承司令员立即部署了晋冀鲁豫区部队的整军练兵运动，并于6月2日写了题为《大家发奋整军练兵》的专文，发在军区的《人民军队》报上，接着召开了各纵队军政首长和个别旅、军分区首长参加的练兵会议。

我当时是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的摄影科长，听说刘伯承司令员要亲自率领军政首长练打靶，赶紧到司令部去了解情况。

打靶时间定在6月10日上午8时，我七时半就赶到了靶场。靶场位于邯郸市东南郊，占地数十亩，是侵华日军修建的，我们接管后还没有顾得上整修，显得有些荒芜。

刘伯承向警卫战士要了一支步枪，对大家说："我跟你们比武，我先打三枪，我一只眼，可能打不好，你们可都要打好啊!"然后他站在队列前面，开始带领大家射击。◀

不一会儿，参加射击演练的旅以上干部集体来到靶场，他们稍事休息后，就整队等待射击开始。

准8时，刘司令员到达了靶场，他在张际春副政委、李达参谋长、训练处长、军政处长等的陪同下，迈着稳健、有力的步子走向指挥员队列。

刘司令员先在训练处长陪同下检查了一下用于射击的枪支，然后走到队列前面，看了参加打靶的人员名单，又用亲切的目光扫视一下整齐而又精神抖擞的指挥员行列，脸上浮现出喜悦的神情。他向管理枪支的警卫战士要了一支步枪，对大家说："我跟你们比武，我先打三枪，我一只眼，可能打不好，你们可都要打好啊!"然后他站在队列前面，开始带领大家射击。

他拿起一支步枪，装上子弹向前跨了两步，扑下身去，用卧姿射了三发，这时我很快地抢拍了这个镜头。接着，张际春副政委、李达参谋长也各打三发，然后列队的指挥员也依次各打了三发。

刘司令员很注意观察每一个指挥员的射击动作，全体打完后，他看过训练处长拿来的射击成绩记录，要大家随便围拢到自己周围，拿着刚用过的步枪对大家说："有的旅长和纵队参谋长，同我打得差不多，三发不过十环，不如战士，但成绩不小。三发子弹把和平麻痹、斗志松懈、居功骄傲这三个思想敌人打掉了，打中了要害。接着，他表扬了一位在这次打靶中成绩优异的旅参谋长，并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我们练射击技术，就是要练得像用筷子吃饭一样'百发百中'，要吃哪一块就能夹到哪一

块，做到熟能生巧。眼看短暂的和平又将消失，说不定第二天早晨就响起全国内战的枪声，由和平转入战争。能否令行禁止，关系战争胜败。练兵会议是按党中央指示举行的，参加会议的一位高级干部今天没有按命令到场参加打靶，这不是一件小事，从这里窥见了令人担忧的苗头!”说到这里，他用极为严肃的口气作了严厉的批评，给全场人员以极大的震动。刘司令员要求全体指挥员必须亲自动手，具体部署，随时做好应对突发战争的准备。

之后，一个轰轰烈烈的练兵热潮就在全军展开了。果不其然，6月下旬，蒋军的大举进攻开始了，我们接连打了定陶、巨野、鄄城等战役，只4个月时间，就一举歼敌九个半旅。





张际春、李达练打靶。



裴植（1918.9~ ）山西省运城人。1938年7月参加八路军，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转业。原中国体育报社副社长，副总编辑。

龙飞虎：跟随毛泽东离延安

龙剑辉　龙海岩／文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7年3月，是龙飞虎跟随毛泽东主席撤离延安时在吉普车上的合影。毛主席坐在驾驶员旁边，龙飞虎挨着主席坐在车边上，左手拿着一副手套，右手紧扶着车前框。当时，龙飞虎是毛泽东主席的行政秘书兼中央纵队第一大队大队长，直接负责毛泽东主席的生活和保卫工作。他跟随毛泽东主席在转战陕北的一年零五天里，保护党中央机关和革命领袖们的安全。

起程那天，龙飞虎安排的行军编队是：骑兵排开路，紧随其后的是工作人员乘坐的中吉普车，第三辆车是毛主席乘坐的中吉普车，第四辆是拉着电台和警卫部队的大卡车。当时毛泽东主席的车上还有周恩来、王震、江青、警卫排长阎长林。车辆编队一路经过延安飞机场、柳树店、拐峁几个可能出现敌情的关口，没有发生险情，大家松了一口气。

王震司令员考虑接下来的路程没有国民党的军队驻守，就下车回部队了。

车队重新上路后，毛主席的车在后面走，因陕北高原雨水少，汽车跑起来，地上尘土飞扬，弄得车上的人老是吃土。龙飞虎认为此路段比较安全，可以让毛主席坐的车走在车队前面，让主席少吃点儿土，就让司机老周超车。

可是前面的车并不知道这个意思。老周的车开快了，前面的车也开始加速，老周按喇叭示意他们让路，前面的车还误以为他们跑慢了，又加足马力，跑得更快。周恩来摇摇头说：“算了，就让他们在前边吧，他们在前边我们吃土，我们在前边他们吃土，总有吃土的嘛。”

这时，毛主席侧过脸来开玩笑地对龙飞虎说：“老虎啊！你不是飞虎嘛，你有本事就飞过去叫他们停下，让他们走在后边，咱们就不吃土了。”

龙飞虎灵机一动，说：“好，我不用飞，走也能赶上他

们”。接着，他叫老周把车停下，前面车上的人一看，主席的车停了，马上也停车了。龙飞虎就下车，快步走到前面，交代他们改变车队队形，跟在主席的车后面走，然后让老周把车开到前面去。

当龙飞虎上车后，毛主席笑着说：“老虎，你还真有办法。”此时，不仅龙飞虎笑了，连周恩来和全车的人都笑了。

毛泽东吃“土”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一天，毛泽东正在用餐，碗里盛着面条，龙飞虎在附近安排警卫工作，来回走动，扬起了尘土。陕北高原雨量少，地上的土如同面粉似的，一脚踏上去就能发出“扑哧、扑哧”的响声。毛主席笑着说：“老虎啊!我正在吃面条，你可不要给我撒胡椒粉啊!”毛主席诙谐幽默，让龙飞虎记忆犹新。

在毛泽东叱咤风云的革命的一生中，曾有过多位秘书辅佐他工作。1947年3月，党中央撤离延安时，在决定中国命运大决战的前夕，领袖身边有了一位行伍出身的秘书，他就是毛泽东指名、中央社会部为毛泽东安排的行政秘书龙飞虎。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一方面军保卫局侦察科科长龙飞虎被选派为周恩来的随从副官，跟随周恩来参加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此，龙飞虎在周恩来领导下驻留国统区做统战工作。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龙飞虎被党中央指派为保卫毛泽东的保卫工作负责人，与陈龙、颜太龙等人一起担负了保卫毛泽东重庆谈判的历史使命。在重庆谈判期间的43个日日夜夜里，龙飞虎寸步不离毛泽东，并负责出面与国民党特务打交道。龙飞虎的忠诚、机警、胆识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称保卫他的人员为“二龙一虎”，即指陈龙、颜太龙、龙飞虎。

龙飞虎（1915.2~1999.7）江西省永新县人。1928年6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参加了长征。原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副政委、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敌人在那里！

邹健东　文/摄

1947年5月，在孟良崮战役中，华东野战军某部炮兵连长施夫俊接到上级命令，用炮火摧毁驻在刘家疃的敌八十三师的一个团指挥所。战士们迅速作好一切准备，只待连长下达命令，瞄准目标，炮弹就可以连续发出去打击敌人。但施夫俊这时却心急如焚——因为不清楚村里敌指挥所所在的具体位置。他们这支部队是刚从华中转战来的，对山东的地形、村庄情况不熟悉，而在激烈的战场上，时间就是胜利。就在这紧要关头，一位老大娘出现在炮兵阵地。她对前面的村落、家家户户的房子情况和敌指挥所的位置都了如指掌。只见她紧挨着连长，从容不迫地指点着炮击目标，就像吩咐自己家里的孩子去做什么事情似的，又怕他听不准，重复地说明着。炮击时，老大娘没有离开炮阵地，她要亲眼看看战士们打炮，看着敌人的指挥所被摧毁。



孟良崮根据地人民全力支援我军作战。这位老大娘满怀着对敌人的仇恨向炮兵战士指点目标："敌人就在那里！"



华东野战军翻山越岭向孟良崮疾进。

1938年，我在皖南铜陵做群众工作，当时我是一个参加新四军不久的青年。一天，由于人生地不熟，和一个同志在黄昏后误进了日本鬼子住的村子。村里老乡看到两位穿军装的新四军，吃惊地说："唉呀，鬼子下午进了这村子！"赶紧拿了便衣给我们换上，掩护我们离开。皖南事变后，我到句容、金坛、丹阳等地，待机渡长江寻找新四军的新军部，完全是依靠群众的掩护帮助，才能在犬牙交错的敌伪据点间往来，安然渡过敌伪封锁的长江。

解放战争期间，我在山东，国民党军队依仗着美式武器装备，气势汹汹地向山东解放区进攻，山东人民和解放军同甘苦共患难，同敌人浴血苦战。大爷大娘送儿子参军，姑娘大嫂送情郎丈夫上前线；乡亲们把细粮留给部队战士吃，自己吃粗粮、地瓜

藤和树叶；民兵们钻到敌人“心脏”里去埋地雷、打仗；担架队跟着大部队南征北战，伤兵从火线上抬下来，大娘大嫂成了义务护士……解放军每战必捷，都是靠人民群众——伟大母亲的力量。如何把人民群众在解放战争中的光辉形象留驻在镜头里，是我作为一名摄影战士经常考虑的问题。在孟良崮战役中，我拍下了这样的镜头：山东临沂解放区，父亲送子去当兵。这是解放区军民在血与火的岁月里并肩战斗的真实写照。它形象地说明着，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人民曾经作出了怎样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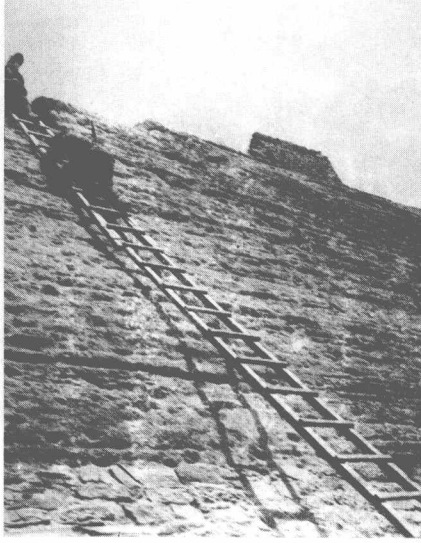


山东临沂解放区，父亲送子去当兵，前线立功好儿男。

邹健东（1915.11~2005.12）广东省大埔县长治乡人。1935年参加革命，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春参加新四军。原新华分社摄影组组长、高级记者。荣获文化部颁发的“造型艺术成就奖”。

山东即墨攻城记

姜京京/文　姜子宽/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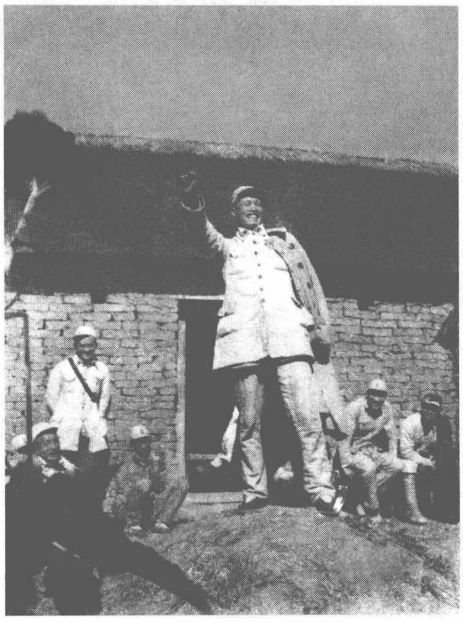


攻城云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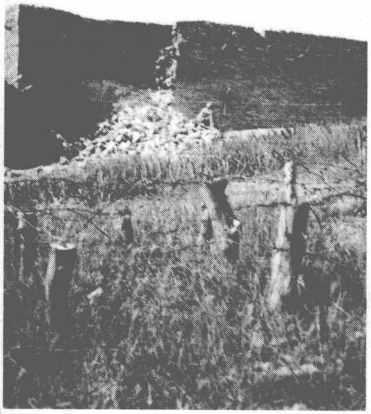
这一组照片是山东即墨攻城战斗的缩影。

1947年5月底，国民党第八军李弥乘美舰从青岛登陆，向山东解放区发动大举进攻。山东军区第五师在师长聂凤智、政委刘浩天的率领下英勇反击，在胶东军民的密切配合下，先后攻克胶县、高密。师长聂凤智下令乘胜追击攻打即墨。当时五师主力尚未撤离高密，时任五师十五团政委的姜子宽与副团长彭辉率十五团二营连夜赶往即墨。6月14日傍晚向即墨发起进攻，即墨守敌外围阵地相继被克，敌人龟缩进城内。聂凤智师长下令攻城，堵住胶县、高密溃逃之敌。

即墨城高墙厚，易守难攻。我军当时装备原始，仅有的几件重武器也因为星夜奔袭未及时到位，唯一的攻城武器就是炸药包。姜子宽下令组织三个爆破组，在轻武器的掩护下，第一组两位勇士跃出战壕向城墙蛇形奔去，在一阵密集的枪炮下，两人牺牲在开阔地上，“二组上”，又是两位勇士牺牲了，三组同样如此。政委姜子宽、副团长彭辉眼睛都红了。姜子宽给师长聂凤智打电话请示：“敌人火力太猛，是不是延后攻击？”“不行！今晚必



◀姜子宽政委在做即墨攻城战前动员。



突破口。

前线指挥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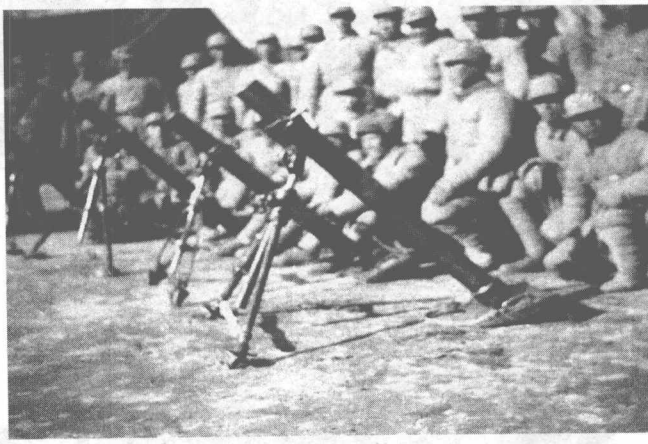
缴获的重机枪。

须拿下即墨！”姜子宽对二营长说再组织三个爆破组，副团长彭辉亲自抱着机枪带领战士进行火力准备，三个爆破组逐一冲了上去，六位勇士血洒即墨城下。姜子宽在电话里对聂师长说：“不能打了。”聂师长说：“不论多大牺牲也要把城拿下！”

军令如山！姜子宽把电话一扔，抓起一个炸药包，对彭辉说：“彭团长，咱俩上！”彭辉二话没说，拿上炸药包也往外冲。警卫员一看急了，4个警卫员赶紧拦住政委和副团长。姜子宽一边向前挣脱一边骂：“谁敢拦我我枪毙谁！”作战参谋忙打电话找师长：“政委和团长拿着炸药包要自己上了！”接着又如获救星般地大叫：“政委，师长找你说话。”姜子宽拿起电话，聂师长终于同意明天再攻。



庆祝会上。



攻城用的迫击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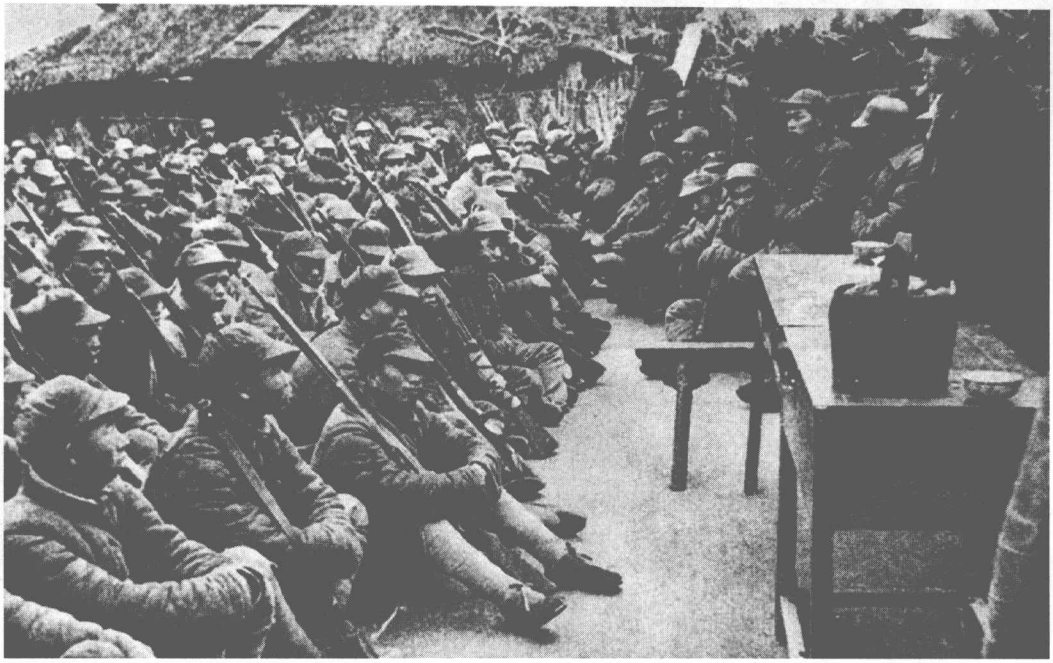
第二天晚上，后续的重武器和十三团一营都到了，随即展开进攻。半夜时分，即墨南门爆破成功，部分部队突入城中，战斗十分惨烈，无奈突破口太小，不利于部队展开，我入城部队伤亡很大，被迫退出城外。

这时天已大亮，十三团二营、三营连夜奔袭赶到，经过充分准备，我军发起了更加猛烈的进攻。守敌见大势已去，慌忙弃城向青岛逃跑，在城南地区被我军歼灭。姜子宽用缴获敌人的相机拍下了我军攻克即墨城的这组珍贵的照片。

姜子宽（1917.5~2004.4）山东省蓬莱县人。1938年9月入伍，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海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李堡战斗前，周团长做动员

周锋 文/摄



这张照片是1947年攻克李堡战斗前，九十一团团长周建平在做战前动员。

我当时是华中野战军第十一纵队政治部《战线报》的摄影记者，先后参加过两次攻克李堡的战斗。

1947年，国民党整编第四十九师集结重兵南调，沿范公堤抢修碉堡，构筑一条西起海安，经西场、丁家所、李堡、角斜，东迄黄海边栟茶的封锁线，企图切断我十一纵队与第一、第九军分区的直接联系，妄图将我十一纵队的七个团包围歼灭在东海边。

为了粉碎敌人的罪恶阴谋，我十一纵队兼苏中军区首长决心集中第十一纵队主力，用以攻为守的办法挥师南下，星夜潜行百里，插入敌后，打乱国民党重点进攻的战略部署，发起以攻击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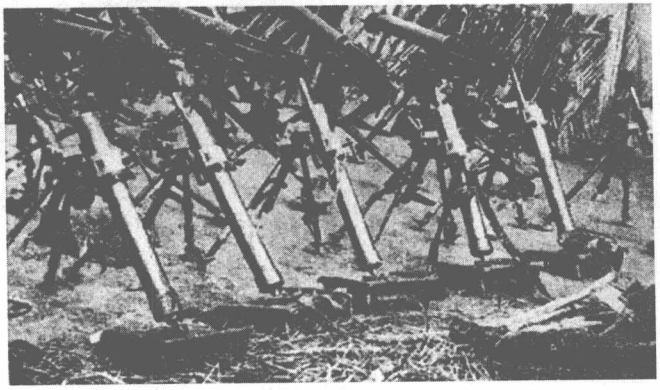
堡为中心的枘（茶）李（堡）战役。

九十一团担任攻击战略要点李堡，纵队首长要求九十一团在一天两夜的时间内，攻克李堡，全歼守敌。能不能出色、提前完成李堡攻坚战斗任务呢？周建平团长亲自给全团做动员。随后，全团上下开展了争创“李堡连”的竞赛活动，激发了全体指战员个个向前、不甘落后的英雄气概。结果，九十一团提前胜利完成了攻克李堡的任务，并和九十二团一起全歼整编第四十九师第七十九旅第二三七团所率的第二营及300余人的“还乡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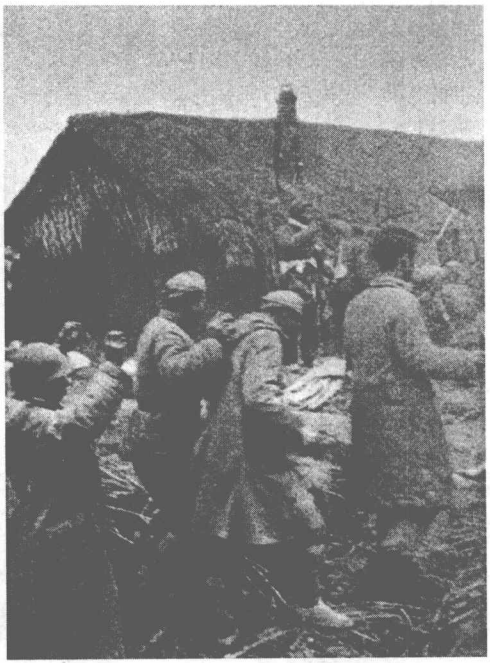
指战员向俘虏讲述我军宽大俘虏的政策。

记得拍摄这张周建平团长做战前动员的照片后，周团长告诉我：“这次攻坚战临时提前改为黎明时发起总攻。”闻讯后，我欣喜若狂，能在天明时拍摄战场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立即赶赴特务连突击队，途中偶遇七连指导员田计同志，因他在战场上熟练的跳跃动作，我们经常戏称他是田鸡（青蛙）。田计为了我的安全，特地安排了一名战士为我当警卫，该战士是1946年在海安保卫战中负伤、伤愈归队暂未编入班排的老战士，就是这位老战士在我拍摄碉堡前敌人投降的照片时将我扑倒在地，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敌人向我射来的一颗子弹，臀部负了伤。经我多次劝说，这位老战士才去医疗队。在频繁的战斗里，我时常会想起这位为掩护我而负伤的



战斗中缴获敌人的迫击炮和重机枪。

老战士，虽然我和他再也未曾见面，但一见到这张照片，我就会想起他。渡江战役前，一次行军途中，得知他在淮海战役中牺牲了。60多年前，他用自己的身体为我挡住了敌人射来的子弹，瞬间的动作，使我终生难以忘怀。回想起战争年代中牺牲的战友们，他们在民族生死危亡的关头，英勇捐躯，而青史却没有留下他们的名字，但是我深信，烈士的忠魂也一样会融入中华民族绵延的生命中而永垂不朽！



李堡战斗中，我军指战员押送敌军俘虏。

周锋（1930.3~ ）江苏省常州市人。1945年参加新四军，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国家图书馆研究员。

周建平（1919.8~ ）江苏省吴县人。1938年7月参加新四军，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攻克昌黎城的勇士们

伍时宝/文　吴群/摄

昌黎，地处河北省东北部，北靠碣石山，东临渤海湾。山非险要，地不富庶，因为它是北宁路上的咽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在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多次攻打昌黎。

1947年5月17日午夜，万籁俱寂。进攻昌黎的冀东军区独十旅突击队员们整装待发，高大而坚固的城墙成了拦路虎。独十旅六连三排长郝成龙担任突击排长，一排长李歧祥任突击副排长，架梯组也紧随其后摸上去。第一次强攻冲到敌人守着的东北角城墙前，梯子组才到城墙脚下，敌人发觉后就往下打枪，先后扔下20多颗手榴弹，城墙脚下一片火海。把三排压得抬不起头，有几个战士负了伤。当敌火力减弱时，在郝成龙指挥下，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又进行第二次攻城，眼看突击排接近墙顶，不想被敌人将梯子推倒，突击队员又摔了下来。一颗手榴弹扔在李歧祥肚子上，还没来得及爆炸，吱吱地冒着白烟，李歧祥手疾眼快，把手榴弹又反扔出去。第三次登城，李歧祥组织七班长李春林往上扔手榴弹，郝成龙奋不顾身地抱着机枪冲上城去掩护。紧接着又进行第四次立梯登城。这时我们的重机枪响了，终于把梯子靠上了。脑袋挂了花的郭长生一下翻上墙头，小个子刘长顺第二个上去，李歧祥大喊："跟我往前冲！"18岁的共产党员费德海上去了，解放战士刘子和、支书郑若和都冲上去了。这时，冲锋号吹响，勇士们奋勇争先。敌人见无路可逃，只好打出白旗，缴械投降。

正在冀东前线战地采访的晋察冀画报记者吴群，亲历攻克昌黎的险境，他拍摄了一组《切断北宁路 攻克昌黎城》的战斗纪实照片。"午夜从城东北角架梯登城的突击队""冲向城内大街，

消灭残余敌军”“放下武器的蒋军官兵，从昌黎县政府和自卫总部内被押解出城”等选刊在《晋察冀画报》第20期上，极大地鼓舞了部队指战员的战斗热情。

人们喜欢这组在第一线摄取的作战照片，对那张“架梯登城”的夜间战斗摄影更感兴趣，同事们都知道吴群使用的是从战场上缴获的伊康泰120折合式的照相机，没有连动闪光装置，也没有镁光灯泡，只有随身带的几小包镁光粉，怎么能拍出夜间爬梯攻城的照片？原来吴群把镁粉放在一个军用白搪瓷饭碗里，让通信员在身后斜举着，当调好相机光圈、焦距，按下B门后，就叫通信员用烟头点燃镁光粉，配合完成闪光拍摄任务。两人配合完成夜间摄影是在夜战进行中实施，除器材以外，还受诸多条件制约，其困难程度是今天的摄影爱好者难以想象的。

午夜从城东北角架梯登城的突击队。





放下武器的蒋军官兵，从昌黎县政府和自卫总部内被押解出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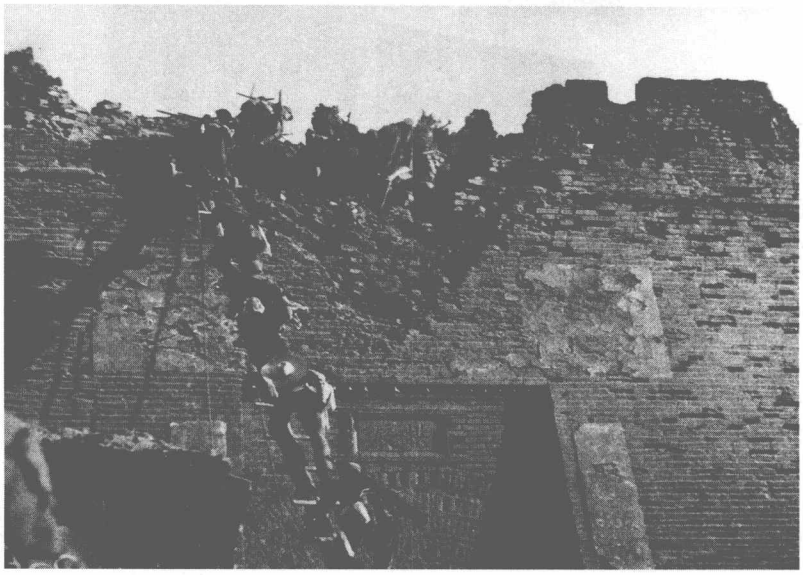


冀东军区独十旅进军昌黎城。

吴群（1923.3 ~1996.2）广东省顺德人。1938年赴延安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

攻夺徐水，突击队冲上前

柳杞/文　蔡尚雄/摄



这张照片是1947年7月在保北战役中，突击部队奋勇登上徐水县城的一瞬间。

徐水城，位于保定、北京之间，是保定的贴身城镇，是京汉铁路交通大动脉环链中的重要一环。敌人占有它，可以南援北调，机动用兵。为打掉敌人这一重要据点，华北野战军第二纵队曾经四次攻夺徐水。第一次是1947年6月12日。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察南战役之后的1948年7月14日，每次攻夺战，都歼灭了敌军一个团。当时，纵队政治委员是李志民，司令员是杨得志，后来是陈正湘。纵队的指挥领导机关，都驻在距城东北12里的沙口村。我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参加了攻夺徐水以及北许城村七天七夜的地道战。时间长了，房东都和我们相熟了，一有什么敌情，房东最先来通知我们。当时的这个沙口村，离北许城村只

有三五里路，每次攻夺徐水，我和《晋察冀画报》的摄影记者蔡尚雄都希望随部队攻城，及时报道我们最可爱的人。

蔡尚雄是摄影记者，摄影记者不同于文字记者，他不到现场，就难以记录现场。在炮火硝烟中，摄影又受到时间、地点、角度、光线等种种条件限制。摄影记者要捕捉战争场面的一瞬间，就不能不和战士们一起冲锋陷阵，尽管他是不持枪也不能还击的战斗员。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比战士更艰苦更危险。

这张照片，让我们看到了战士们勇敢攀城攻夺徐水的情景，显示了当年我军缺乏重炮攻城，只能靠人架木梯攀登的状态。这种梯子我们称为云梯，由六个人或更多的人抬着，在我军火力的掩护下，抬着云梯飞跑在突击队之前，为登城的勇士们架梯。守城敌军拼命抗击，双方交火，伤亡情况可想而知。沧州之战的大功臣——营长毕鸿恩，就是在攻夺徐水时牺牲的。冀察军区保卫部任职的营教导员蔡森冶也在这里牺牲了。另外，还有和平、雷香萱都是在教导员的岗位上在这里牺牲的。一位教导员牺牲了，又一位教导员带头冲了上去，这些冲锋在前的好干部都是隐伏在这张照片背后的烈士，让我们怀念他们，追思他们，他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烽火连天的解放战争，都远离我们几十年了。当年的颓垣断壁已变成了青堂瓦舍；当年残破的城池，已是高楼耸立；当年被鲜血染红的土地，已是稻谷青青麦浪滚滚；当年的瓦砾废墟，已成为新的小镇……艰险困苦的战争已经远去，一代又一代的新人已经长大。但能留下这段历史真迹的摄影记录，却永留人间，它向人们表明：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发生过惨烈的改天换地的伟大战争。

蔡尚雄（1919.9~ ）广东省中山人。1938年奔赴延安参加抗日，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人民画报社副总编辑、顾问。

柳杞（1920.11~ ）山东省临沂人。1938年8月奔赴延安参加抗日，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北京军区创作室副主任。

齐家埠之战——胜利者的欢笑

李恕　文/摄

1947年夏，我在胶东军区宣传部当干事兼任编辑记者，跟随新五师从平度向昌邑、潍坊之间的齐家埠出征，参加齐家埠战斗。齐家埠是昌邑与潍县之间的一个大村镇，北倚寒亭，座守烟潍路南侧，蒋军的王牌军之一李弥的第八军（即整编第八师）在此一带盘守，该部队全部是美式武器，战力极凶悍，我胶东军民称之为“顽八军”。由于“顽八军”遏制胶济路与烟潍公路咽喉枢纽，故对我山东各解放区有分隔阻遏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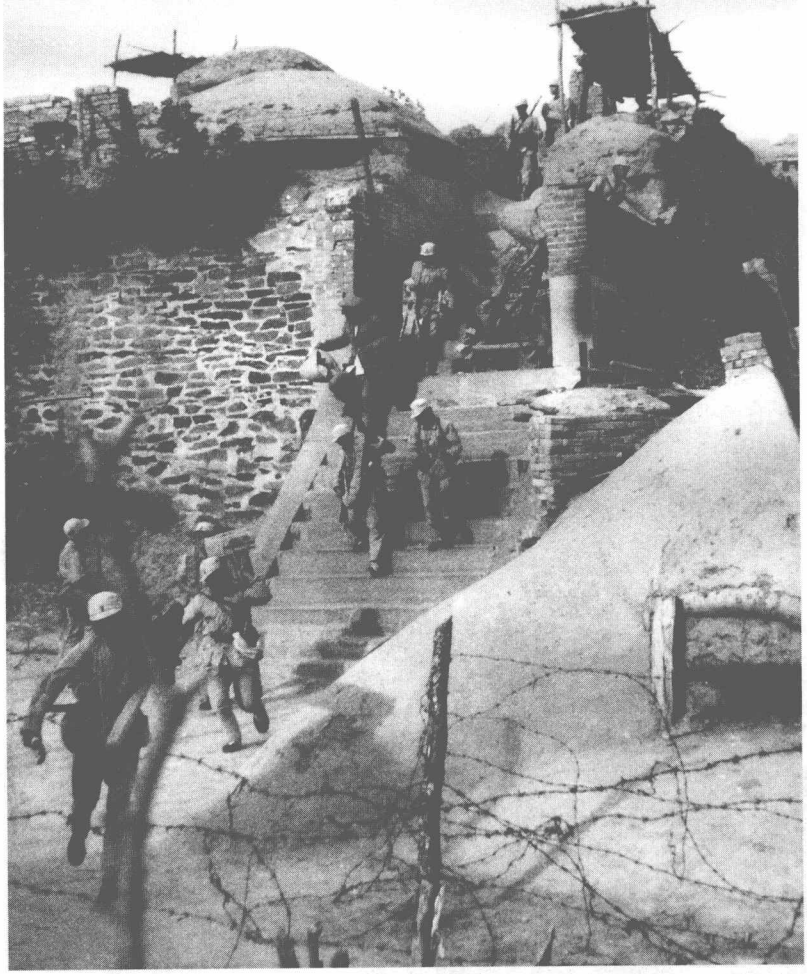
为配合我华东野战军主力纵队在鲁中准备南麻—临朐战役，同时策应鲁西、鲁南的外线作战，上级决定由留守胶东的主力新编第五师与新六师在滨海部队某团配合下，阻击并钳制昌潍之敌，对齐家埠守敌进行攻歼战。

主攻部队是新五师，新五师是胶东抗战胜利后组建的第三个五师番号主力，师首长由军区林浩政委、周志坚副司令兼任，师政委廖海光、参谋长高锐。新六师在外围先行作战，阻击潍县之敌李弥主力增援。

齐家埠守敌是“顽八军”登陆胶东后收编装备的一支顽伪土豪部队，番号是整编八师独立守备旅第三团，团长郝荣梓是当地的恶霸，全团1800多人，装备了大量的美式武器，火力很强，在齐家埠周围还构筑了高围墙与大碉堡群，布防多层火力网，外设深壕陷阱，铁刺网障，村镇内各要道口处还设有暗堡机关，易守难攻。

战斗前，新五师做了周密的侦察计划。以十三团（团长田世兴）为主攻团，对守敌工事爆破突击，十四团与十五团在侧翼，同时突击，对敌形成三面夹击之势。

战斗进行得十分艰难，师长周志坚身先士卒作战负伤，胶东



从敌人的工事里收缴武器。

子弟兵冲锋陷阵一往无前。在密集的炮火配合下，新五师对守敌坚固的防御工事同时发动了爆破攻坚战，我亲眼看见胶东子弟兵冲上去炸碉堡，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再冲上去，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让我非常感动，与其说我在给战士们做宣传，不如说战士们在教育我。

战斗从6月30日夜晚发起至7月3日胜利结束。全歼敌人第八师独立旅第三团，生俘团长郝荣梓等千余人，毙敌伤敌400人。

这张照片就是战斗结束时，新五师指战员从守敌大碉堡的工事里收缴武器，抢运作战物资。

随后，我在齐家埠敌人大碉堡群附近巡视，看到几个国民党军受伤官兵坐在地上，便停下来。这时正好我新五师一个炮兵班

匆匆路过，我请他们停住，站到一个受伤的国民党军官身后“合影留念”。这张“合影”当时在《胶东画报》刊登名为《胜败分明》。

刚刚照完相，忽然西南方向传来一片欢笑声，我闻声过去询问，原来是胶东新五师十三团与十四团的5名战士在战斗中互相配合，勇猛冲锋，从敌人手中夺下一门美式战防炮。在战士们的欢笑声中，我让他们重新坐在战利品前，留下这一精彩生动的瞬



胜败分明。



胜利者的欢笑。

间。看到这几名战士拍照，周围的战士都很开心，那是胜利者的欢笑，我当时发表在《胶东画报》上，名为《胜利者的欢笑》。

齐家埠之战，打掉了蒋军整编第八师插在胶东解放区西侧门户的隐患，我华野主力纵队向胶济路南的鲁中方向胜利挺进。

（李恕生前遗稿）

李恕（1926.5~2008.12）山东省黄县人。1939年1月到八路军胶东《大众报》从事抗战宣传工作。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解放军画报社副社长。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7年6月，前面第一个人是宋双来，宋双来当时在华北野战军七旅二十团三营七连任指导员。在保北战役中，全连血战十五汲，完成阻击任务后仅剩14人。

保北战役中荣立特等功

宋双来/文　郝建国/摄

1947年6月，我所在的七旅二十团刚打完正太、青沧战役，在连长负伤住院的情况下，一排长提升副连长，我作为指导员带领115名官兵投入了保北战役。我们七连连续拔掉了铁路两旁的102号、103号两座炮楼，又为被包围的兄弟连队解了围，打得英勇顽强。当七连赶到十五汲村的时候，营部通信员跑过来传达营长的命令，要我连“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敌人，一定要坚持到下午4点”。

十五汲村靠近铁路，是敌人增援部队的必经之地。头一天我们修了一晚上的工事，天一亮，敌人就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黑压压地扑过来了。大家都明白，全连要阻击几十倍于我的敌人，这是一场恶仗，战士们都做好了慷慨赴死的准备。战斗打响仅仅40分钟的时间，敌人就疯狂地向我们阵地打了三百多发炮

弹。在大部分工事被摧毁的情况下，我连伤亡不断增加，有的战士胳膊打断了，腿炸没了，仍然坚持战斗。成群的敌人向我们阵地打来，我连战士死守阵地，英勇反击，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由于敌我双方力量过于悬殊，打到下午三点多，全连仅剩下34名战士，我立即把34名战士撤到村里，临时编了三个班准备打巷战，令一班阻击从北面小街突入之敌；二班守住大街；三班阻击村西北方向突入之敌。刚刚布置完毕，就发现从北面小街突入了大量的敌人。等敌人冲到20米左右的样子，我大喊一声“打”，战士们的机枪、冲锋枪、步枪和手榴弹一起开火，猛烈射击，一个叫张二牛的战士，边打边喊“串糖葫芦啊!”……敌人一排一排地、一堆一堆地倒在巷子里，暂时退了回去。我转身去看二班，他们正与从北面大街突进来的敌人扭打在一起，有一个战士，拿着一个小铁钎和敌人拼打，我迅速叫机枪支援他们，二班战士打得英勇顽强，充分发扬了不怕死的英雄气概。这时，又有十几名战士壮烈牺牲，我们已经陷入了敌人三面夹击之中。情况万分危急。我回头发现不远处有一户农家院子，我们迅速转移到这户农家院，进到三间北屋，还没有站稳脚，三四十个敌人尾追到大门口，我们反击，敌人退了回去。进屋后，我组织战士们把南北窗户都堵起来，留个枪眼。正在我们分派任务时，敌人在我们院子外边从四面扔手榴弹、打枪。院子里、屋里都是灰尘，看不见人了，轰、轰……突突突，我喊了一声“注意观察敌人动静，做好战斗准备”。在一阵枪声过后，发现东墙外传来了挖墙洞的声音，我随即抓起两颗手榴弹隔墙扔了过去，挖墙的声音没有了。这时，又发现不少的敌人上了南房顶正在架机枪，我抄起冲锋枪一阵猛扫，敌人一个个滚下了南房顶。又有战士报告，北房顶也有人挖房，战士又把敌人打了下去，接着北窗口的战士看见有人扛着炸药向窗户这边靠近，我过去一枪把敌人消灭了。经过激烈的拉锯战，我们同敌人激战了近7个小时，离规定的时间

还有20多分钟。在你死我活的拼杀中，我们连打退了敌人7次围攻，全连只剩下14个人了，弹药也快打完了，我对大家说，同志们，外边敌人这么多，突围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坚持下去，要下定决心和敌人拼到底。战士们说，指导员请放心，我们宁死不投降，要与这个房子共存亡。我说：好，咱们把炕席、棉被、秸秆、木板堆起来，准备到最后一刻点燃，宁死也不能叫敌人活捉。副连长双耳被炮震聋了，什么也听不到，他一看这阵势，估计情况危急，随手把火点着了，我们一看大喊，并用手比画着，说时机还不到，赶紧把火扑灭了。等了一会儿，外边的枪声、喊叫声渐渐小了，我一看表，4点多了。我叫机枪掩护，爬到东墙头向铁路那边观察，发现很多敌人正在向北撤退。就这样，我们在身陷绝境的情况下，把敌人拖了7个多小时，用100多名勇士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钢铁防线，圆满完成了阻击任务。

保北战役胜利后，我们七连荣立大功，并被纵队授予“攻守钢铁英雄连”的锦旗，晋察冀军区也给我个人记了特等功。文工团还专门创作了一首歌颂七连的歌曲，在全旅传唱。

宋双来（1926.4～ ）河北省武强人。1940年4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解放军陆军指挥学院政委。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主编注： 在摄影师郝建国家采访时，我无意中看到了这张照片，郝建国老师告诉我：保北战役胜利后，他给战斗英雄拍照。当时，宋双来站在最前面，英俊、帅气，印象深刻。听罢，我翻拍了这张照片，向战斗英雄宋双来约稿。宋双来将军给我这篇稿件的时候，已经83岁了。虽然将军风采依旧，但是看了这篇稿件，我还是情不自禁地问道：全连115名战士，还记得谁的名字？宋双来思忖了很久，告诉我，全连115名战士，只记得两位健在者的名字：一位叫魏金池，在河北；一位叫李永谭，在南京。我不知道华北野战军的战史中是否记载了115名战士的姓名，也不知道血战十五汲的地方是否有烈士的碑文，但是我相信，每一个看过这篇稿的人，都会在心里树起一座无名战士的丰碑。新中国，正是有了这些在战争中前赴后继坚定信仰的共产党人，才使我们看到了他们高贵的秉性和不朽的历史。

独四旅在运城战斗中

杨晓哲/文　王琦/摄

1947年底，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在陕北连续作战9个月后，东渡黄河到晋南休整。此前，晋冀鲁豫部队曾两次攻打晋南重镇运城均未得手，徐向前元帅听说第二纵队路过此地，一高兴，要王震跟他们一起再打运城，王震二话没说答应了。为此，军委下达命令，由晋冀鲁豫八纵、西北野战军二纵和晋绥独立第三旅临时组成野战独立兵团，王新亭为司令员，王震为政委。

12月17日凌晨3时，独四旅从驻地闻喜上丁村向运城进发，途中到杨家庄与三五九旅和独六旅会合。在临时搭建的会场上，王震司令员站在木桌上，做了简短的战前动员，把一面“宜川战斗第一功”的锦旗奖给独四旅十三团，表彰他们在10月份宜川战斗中的英勇表现。王震还说，要奖励几万元（旧币）让他们去买酒喝，全场大笑。



王震司令员作战前动员。

会后，部队继续急行军，一天一夜走了130里，18日凌晨2时到达距运城5里的姚家庄。刚到驻地，战斗部署就下来了：八纵负责攻击老北门，二纵负责西门，独四旅担任西门主攻。独四旅受领任务后，当天就在集结地域做战前动员，杨秀山代表全旅宣读了决心书，干部战士纷纷在杀敌立功请战书、完成任务保证书、互相鼓励挑战书“三书”上签名，十三团一连几乎全体咬破手指用“血手印” 来表决心。十三团六连干部战士联名给王震同志写信，恳求司令员把攻城突击队的任务交给他们。

王震亲自回信：接到你们要求担任云梯登城的任务，兴奋极了。我衷心学习你们，学习你们的战斗精神……祝同志们胜利，西城立功。

独四旅将王震同志的信在全旅进行宣传，对部队教育很大。



在运城战役动员大会上，第二纵队独立第四旅政治委员杨秀山宣读决心书。

山西运城是一座中等城市，国民党军以日军的工事为基础

修建了坚固防御体系。城外的阵地上碉堡群、堑壕、雷场、鹿砦、铁丝网纵横交错，纵深约5公里。每一主要阵地均筑有高、低碉、伏地堡和暗碉等堡垒群，各碉堡之间有堑壕、交通壕相互连接。城墙上边有堡垒，墙体上有上中下三层枪眼，城墙突出部有侧射火力点，距城墙十来米远有外壕，与城墙之间有多道铁丝网。

运城战斗中的突击队。



攻打运城时杨秀山在战场测试风向。



为了攻下运城这个坚固的堡垒，突击队员在冲锋前宣誓，杨秀山亲自在战场上测试风向，部队以小组为单位组织爆破。20日17时，清扫运城外围碉堡的战斗开始了，爆炸声像炸雷一般此起彼伏震耳欲聋，敌人的碉堡被我逐一突破。12号大碉堡是块难啃的骨头，碉堡壁厚两米多，一般炸药不起作用，火箭弹打上去毫无反应，留下的痕迹就像久旱土地上泼下的一瓢水。最后十二团用了700多斤炸药才把它炸垮，守敌全部被震死在碉堡内。23日，十四团也成功打掉了13号大碉堡。24日，10号和11号大碉堡也被相继消灭，扫清了运城外围敌人的全部阵地。

12月25日早上7时整，第一次总攻开始。十三团一连担任突



战斗打响，部队向城内冲击。

击任务，战士们如下山猛虎跃出工事，一边射击一边抬着云梯向前冲锋。由于缺少炮弹，炮兵同步兵的协同也不好，当炮火压制敌人时，步兵未能乘机登城，待步兵冲锋时，掩护冲锋的炮弹已打完。结果反复四次冲锋，都未能攻上城墙，其他部队也均受挫。

黄昏后，我军向运城发起第二次总攻。突击队抬着云梯准备继续登城，十四团三连一度在西门攀登上城，在敌人猛烈反击下，连长负伤、排长牺牲，后续部队没跟上，被敌人反扑了下来。我军攻击再次全线受阻，兵团首长审时度势下令停止进攻，命令各部队抓紧一切时机继续做攻城准备。

经过两天充分准备，27日黄昏第三次总攻开始。敌人凭借坚固工事负隅顽抗，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战士们英勇冲锋，前边的倒下去，后边的跟上来，冒着敌人密集炮火和飞机扫射轰炸，在西门强行登城四次，又都被反扑下来。杜鹏程在日记中写道："下午4时到独四旅指挥所，王胡子、王恩茂副政委均在此……5点发出信号，顷刻之间炮声四起，打得烟雾遮天，但在烟雾炮火30分钟后部队还没有攻上去。顿旅长、杨政委均到了前沿。王胡子在电话中骂着娘，我看他焦急到了极点，像发狂一般……王胡子不顾阻拦，一直跑到前沿，这真是空前激烈。"



在运城战斗中，机枪射手掩护步兵冲锋。



我军向敌阵地发起冲击。

正当敌我在西门激烈争夺时，有过两次打运城经验的八纵二十三旅在老北门坑道爆破成功，二十四旅也随之进城加入战斗。入城部队遭到敌人顽强抵抗和反扑，兵团首长命令独四旅速去支援。就在杨秀山和旅长带着十二团、十三团向老北门运动途中，我十四团在团长吴子杰指挥下终于攻入了西门，三五九旅七团随十四团突破口进城，向纵深发展。

入城后，战士们与敌人逐街逐巷争夺，激烈的巷战持续到28日天明。部分残敌见运城失守向永济方向逃窜，十二团在政委漆承德率领下穷追不舍，在万全县中村地区将准备西渡黄河逃往陕西的700余人全部俘获。

经过11个昼夜的激烈战斗，我们最终解放了运城，歼敌1.3万人，拔掉了晋南三角地带最后一颗钉子，有力配合了中原地区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对平汉、陇海两路的突击战，战略意义十分重大。

这组照片，就是独四旅摄影员王琦在战斗中拍下的解放运城的真实记录。



攻入城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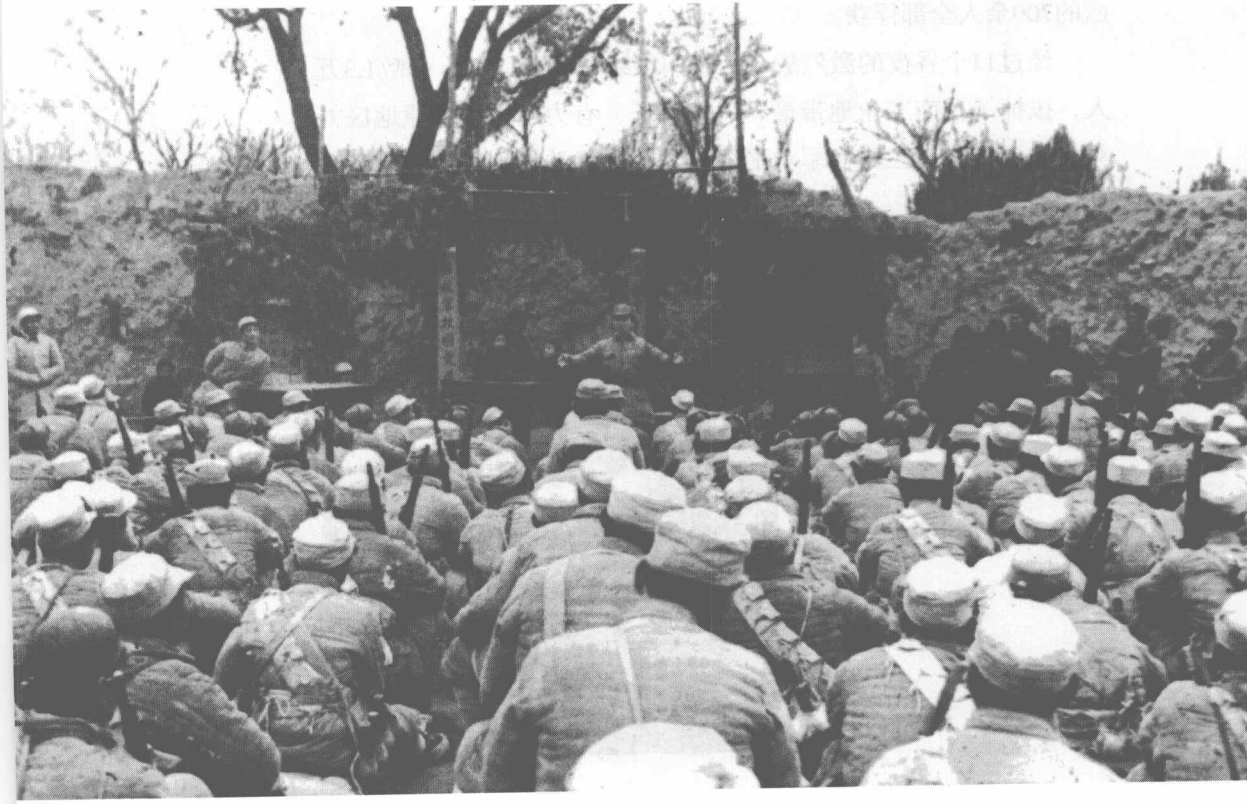
杨秀山（1914.9~2002.11）湖北省洪湖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曾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人人有本血泪账

李宣化/文　杨玲/摄

这组《新式整军运动》的照片是新华社华东总分社战地记者杨玲同志1948年在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骑兵团拍摄的。

我当时是骑兵团政治处副主任，在骑兵团召开的诉苦大会上，人人都有一本血泪账。



骑兵团召开诉苦大会。



官兵们纷纷在决心书上按上自己的手印，决心为解放被压迫剥削的劳苦大众英勇杀敌，消灭反动派，将革命进行到底。左二为政治处副主任李宣化。

1948年2月6日，骑兵团协助完成清剿土匪任务后，越过陇海路到达特种兵纵队驻地山东省临清市东南高阳林地区，开始休整。休整期间，骑兵团用40天时间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①]，骑兵团副政委张先舟和我负责组织领导，前后进行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诉苦方式启发阶级觉悟。先在班开展，尔后到团里集中诉苦，进行生动实际的阶级教育。骑兵团的干部战士大多来自贫苦农民家庭，很多同志以亲身经历的生动事实，控诉旧社会的罪恶，对比两种社会的不同，从而激发指战员战斗的自觉性。在团里召开的诉苦宣誓大会上，官兵们纷纷在决心书上按上自己的手印，决心为解放被压迫剥削的劳苦大众英勇杀敌，消灭反动派，将革命进行到底。

人人有本血泪账。



第二阶段是以检查存在问题为主的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三查”阶段。从检查每个人的阶级成分入手，检查自己的入伍动机和战斗、工作表现，检查对土地改革的立场和态度，揭露部队思想作风和组织上不纯的问题。

第三阶段是以提高认识为主的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的“三整”阶段。骑兵团组成区队、大队以上干部学习队，进行专门的“三查”、“三整”，部队也结合“三查”活动进行整顿。针对存在问题，以党员、干部为重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群众性的自我教育。在此基础上，各级党组织作出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的决议、措施，清理和纯洁党的组织。

经过新式整军运动，骑兵团指战员提高了政治觉悟，增强了内外团结，纯洁了组织，增强了纪律性，发扬了民主作风，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表决心。





在誓师会上振臂高呼。

李宣化（1922.4~ ）河南省杞县人。1938年参加新四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兰州军区政委。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杨玲（1922.7~2001.10）山东省临沂人。1939年参加八路军，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外交部一秘。

注①：新式整军运动是采取诉苦和“三查”“三整”的方法进行的。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通过这一运动，改善领导作风，增强内外团结，提高部队政治觉悟和我军战斗力。



战后，指战员在看《渤海日报》的胜利捷报。

行千里 决一战——盂县歼灭战侧记

黎枫/文　黎枫 尤青/摄

1948年10月27日，毛主席为新华社写的《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的新闻稿中提到：“今年5月，阎锡山、傅作义曾有扰石家庄的计划，保石线及正太线各县曾经一度动员对敌，后来阎军一师在盂县被歼，傅军惧歼未动……”

61年后的今天，重读毛主席亲笔写的这篇新闻稿，要比当年读报时的理解有了很大不同。随着时间推移，当时的军事机密有许多已公开，使我们对历史事件的认识更加全面、准确。毛主席说：“阎锡山、傅作义曾有扰石家庄的计划”，其计划纯属“项庄舞剑”，威胁党中央的安全才是“意在沛公”。这是因为当时华北军区的主力部队一部在开展“察绥战役”，一部在开展“晋中战役”，属于“重兵远置、大营虚空”的布局。恰似诸葛亮的“空城计”。同时，随着西北战局形势的好转，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和中直机关，于当年4月也来到这“空虚的大营”——华北军区驻地阜平县城南庄。此刻形势之严峻可想而之。更为严峻的是“大营”的现况被潜入的特务报给了阎锡山和傅作义，于是他们便南北呼应，开始了合谋袭扰我中央

跨越五台山的桃花岭，南下大军整整走了9天。▶



机关的“行动计划”。其计划严密而凶猛，诸如作战方针、兵力部署、行动时间、路线等相当具体。就是这样“严密而凶猛”的计划，其运作的全过程都为我北平、太原的地下工作者如实获取了。正是“知己知彼”何而不胜?于是便有了“后发制敌”的决策：急调在北线作战的第六纵队南下御敌。

当时我在六纵队第十六旅任摄影干事，参加了盂县歼灭战的采访。在察绥战役的第一阶段，第六纵队攻克了聚乐堡、凉城、和林格尔等城镇后，在凉城东部休整待命。4月30日下午，部队接到紧急行动的命令，晚饭没有吃就出发了。从进军的方向看，多数人认为是去攻打大同，解放雁北地区，使其同新解放的察南、绥东地区连成一片。但两天后不仅未靠近大同，反而一路向南跨越五台山，战斗任务何在?大家都感到渺茫。每天5点起床，吃过早饭就出发，中午休息时喝碗稀饭吃两个土豆又接着走，晚9点左右才到达宿营地，每天爬了几座山，走了多少路谁也说不清，只知道自己的大腿越走越粗（浮肿），许多人走起路来不是靠大腿撑着身体动，而是全身用力晃动拖着大腿动。脚上打起的水泡变成了血泡，有些新战士磨出了“连珠泡”，步兵连变成了“泡兵连”。由于睡眠不足，体力消耗过大，掉队的人一天比一



迎头痛击来犯之敌。



机枪手端着机枪向敌群扫射。

天多，收容队一天比一天庞大。好在沿途都是老解放区，所经村庄的翻身农民为自己的子弟兵设置了开水站，还准备了红枣、鸡蛋、干粮等给战士们吃，他们敲锣打鼓，进村欢迎出庄送，汇成一路拥军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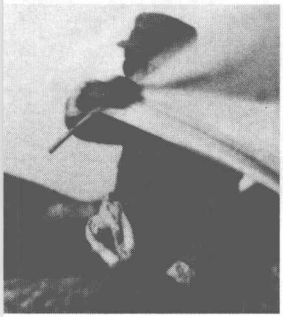
穿插分割，不让敌人跑掉。

5月8日，部队连续行军了9天，晚10点部队在盂县上社地区宿营。大家抓紧时间烫脚、吃饭，争取早点休息，准备翌日继续登程。然而黎明隆隆的炮声比起床号响得早，催促我们立即起床准备战斗，这时警卫员小郭跑来对我说："张宗胜（后任六十六军政委）主任要您和他去前线指挥所"。于是我马上带好相机、手枪就出发了。张主任骑马在前面走，我和小郭紧跟在后面跑。一口气跑了十来里路，此时已是枪声身边响，流弹头顶飞了。我迎着枪声跑过去，原来是第六纵队的主力十六旅四十六团在战斗。我曾多次随该团战斗采访，人都很熟。大家一见到我来，未等我站稳脚就听到有人喊："谁是英雄，谁是好汉，快到镜头前面站!"我也跟着喊："同志们冲呀!我要拍抓俘虏的镜头!"战士们争先恐后地往前



"同志们冲呀!我要拍抓俘虏的镜头!"战士们争先恐后往前冲，把敌人赶下了山。

冲，一阵猛打把敌人赶下了山。为了拍张大场面，我爬上左侧山坡，当拍完照片转身下山时，发现百米处有个军官模样的人伏在地上，我顺手掏出手枪，未等我举枪射击，他便猛然站起，举着双手高喊："不要开枪!不要开枪!我是医生!"我命令他走过来，见他佩戴少校军衔的肩章，便问：你明明是少校军官怎么说是医生!（当时不知道军官和军医的肩章不同），他战战兢兢地说：记者老总，我们军医和军官的肩章是不一样的，我若真是军官早就把它摘掉了。听来有理，看他戴着近视眼镜，文质彬彬，确似医生模样，便带他一同下山。没走多远，看到卫生员在给两位伤员包扎伤口，便将这位医生交给他们看管，我就追赶部队去了。



四十七团韩晋中团长振臂高呼："机枪掩护!大家跟我来!"

迎着枪声我独自一人往前跑，出了山沟便是一片干涸的河滩，这时周围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响作一团，但看不到人的踪影。突然河滩下游冲出一支队伍，其中举指挥旗者最引人注目，他就是四十七团韩晋中团长。我高兴地跳起来，大喊：韩团长您们辛苦啦!他亲切地问我：为何一人在此?前面敌情如何?我说：随四十六团采访掉队了，前面的敌情嘛……请团长大人给介绍一下吧!他不高兴地说："这是什么时候你还开玩笑?"话音刚落，从右面山上下来一股逃敌，居高临下向河滩里的部队疯狂扫射，妄图杀条血路逃命。正是狭路相逢勇者胜，韩团长振臂高呼："机枪掩护!大家跟我来!"射手们勇敢地站立起来，端着机枪向山坡上



盂县歼灭战的战俘群。（摄影尤青——菏泽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孟县军民欢迎解放军凯旋。

的逃敌扫射，战士们紧跟韩团长向敌人冲去。逃敌如惊弓之鸟，哪能顶得住战士们勇猛冲击，掉头就往山上跑，我军穷追不舍，很快就把这股逃敌消灭了。

太阳落山时，枪炮声渐渐停息下来，一日奋战，指战员们滴水未进，仍斗志昂扬。他们手握发烫的枪管，站在硝烟未尽的田野中，尽情回味“行千里决一战”的喜悦，品味毛主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伟大军事思想。一致认定这9天的艰苦跋涉值得!实在值得!否则我们迟到一天会是什么结果呢!

孟县之战，全歼阎军暂编四十九师共2000多人，其中生俘三十四军中将副军长兼四十九师师长张翼，少将副师长赵俊义以下官兵1200余名，并收复了寿阳城。

孟县之战，是地下斗争和武装斗争密切配合的范例，更是保卫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场圣战。我们不要仅从战斗时间长短和歼敌数字来评价此役的意义，更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全面认识此役的历史地位及其深远意义。

黎枫（1929.2~ ），河北省博野人。1945年参加八路军，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瞭望》周刊副总编辑。



邓小平政委观看华东野战军战绩图片展

康晓燕/文　杨玲 康矛召/摄

1948年5月，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率领中原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挥戈中原到达河南省宝丰县，奏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反攻的军号。陈毅、粟裕与刘伯承、邓小平两大野战军会师中原，为淮海大决战创造了条件。华东野战军派出以原新华社前线分社社长康矛召为团长，由华东野战军文工团、三纵和八纵文工团及新华社前线分社组成的慰问团，去慰问欢迎胜利归来的刘邓大军。

慰问团临出发前，康矛召请示华野首长还有什么指示，政治部主任唐亮指出，一定要把中原野战军首长的照片拍好，要向他

们学习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和作风，也要把我们的战役战绩向他们汇报，演好节目，让战友们互相鼓舞，休息好。

康矛召以团长身份与刘邓首长有更多接触，康矛召委婉提到华野陈毅、粟裕首长的要求，邓小平政委一贯低调不拍个人照，刘伯承见康矛召面带难色就拉着邓小平说，我们保证让康团长完成华野首长交给的任务吧。康矛召举起相机拍下了刘邓首长出大别山的风采。

在热烈的氛围里，刘伯承、邓小平首长亲切会见了慰问团，观看了华东野战军的摄影展览、文艺演出，并邀请全体慰问团成



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康矛召 / 摄

员一起大会餐。站在前桌进餐的有刘伯承司令、邓小平政委、张际春副政委、李达参谋长，康矛召团长幸运地和首长们同在一桌。看！这里融洽的氛围，亲切的会见、简朴实惠的招待、家人平和的相聚气氛……这些优良传统令人永远无法忘怀。

开饭前，当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华东野战军慰问团摄影



中原野战军首长和华东野战军慰问团一起用餐。杨玲 / 摄

组的郝世保和杨玲，早早地就将华东野战军战绩图片展的大横幅往四周墙上挂，其中有鲁南战役消灭国民党第一快速纵队，活捉第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的照片；莱芜战役活捉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的照片；孟良崮战役歼灭国民党王牌军七十四师、击毙师长张灵甫的照片；还有在各战场上缴获的敌坦克、大炮、汽车、轻重武器等战利品的图片。每个战役有评介，每张照片有说明。前来观看的人越来越多，不知什么时候，邓小平政委也来到这里，他认真地观看照片和文字，聚精会神地欣赏，在邓政委毫不察觉时，杨玲举起了相机，为小平同志拍下了这张照片。就在慰问快结束时，中原野战军的一位同志找到杨玲恳切地说："我们拍的首长像不满意，能否把你拍的照片留给我们？"不知是否话中暗含的赞扬起了作用，杨玲二话没说就把底片留给了他们，没等拿到照片，慰问团就回山东了。

1982年，北京举办"老战士摄影展"时，杨玲遇到当年在宝丰县合过影的战地记者裴植、袁克忠，她迫不及待地问起这张底片的事，得到的却是"底片在成都失火时烧了，出过一个小册子，但现在没有。"杨玲非常惋惜。

1988年的一天，在翻阅《邓小平画册》时，杨玲突然在第145页发现了这张珍贵的照片，虽然复制得不很清楚，但总算见

到了，喜出望外！杨玲赶紧托人去找底片，但又是杳无音讯。

1989年，原中原野战军（二野）在美术馆展出《太行山、大别山、喜马拉雅山》的军史展。邀请康矛召、杨玲出席开幕式。当杨玲在签到簿上写完“杨玲”二字时，一位一直站在签到处的同志上前一步，紧紧握住她的手不住地致歉。和历史相比，和无数长眠的战友比，杨玲已经很坦然了。

1996年，杨玲和子女出版《康矛召·杨玲摄影集》时，从《邓小平画册》里复制了这张照片。看到这张照片，杨玲总记起康矛召说过的一句话：对摄影工作的价值，不只看眼前，还要看到它的历史意义。



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李达参谋长接见华东野战军慰问团。杨玲 / 摄

杨玲（1922.7~2001.10）山东省临沂人。1939年参加八路军，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外交部一秘。

康矛召（1919.4~1994.11）湖北省武昌人。1937年12月赴延安抗大。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华东野战军新华社前线总分社社长。1950年4月调外交部工作，前驻欧洲经济共同体使团团长和驻卢森堡大使。



这张照片是上蔡阻击战突围后，原十纵二十九师八十七团政委宫愚公（中）、参谋长雷英夫（右）和副政委李云诚的合影。每当看到这张照片，李云诚就会想起在上蔡阻击战时英勇牺牲的八十七团团长杨德隆。

上蔡阻击战突围记

李云诚/文

1948年6月，中央军委鉴于鲁西南地区敌人集中了9～11个整编师的兵力，不易割歼的情况，指示华东野战军要多方调动敌人，创造打运动战的机会，“于运动中歼灭敌人。”6月15日，陈唐兵团主力进至通许、睢县、杞县之间，距开封只有一日行程。此时，华东野战军首长抓住战机，命令陈唐兵团就近攻取开封，调动敌人增援，在运动中歼敌。为确保开封战役的胜利，上级要求我十纵迅速向东开进，务必于17日上午赶至平汉路东、上蔡以北布防，把胡琏部阻于洪河以南，不得有误。八十七团接到纵队命令已经是中午14时，驻地距上蔡180里，按次日上午9时到达阻击位置计算，所剩时间不足20小时。任务来得如此急迫，我只做了简短的紧急战前动员，部队就迅速开拔，所需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部都是在行军途中进行。部队一路小跑，急行军半天一夜，于18日拂晓到达上蔡城西北、正南地区。立足未稳，就与正在前进中的敌军胡琏兵团主力十八军遭遇，当即展开战斗。我第二十九师八十六团在上蔡城西北对敌发起进攻。八十五团和

八十七团一部至上蔡城附近及正北等地对敌发起进攻。八十七团进至上蔡城南部公路时与正在前进中的敌摩托化部队遭遇并发起进攻。这一来，敌十八军已被我军拦腰斩成几截。战斗之际，八十七团接师前指命令，要我团派一个加强营，到上蔡城的徐楼（又称萍楼）、满人店（一里铺）接替八十五团防务。

团党委分工，由我负责带一营加上三营八连和特务连的一部，并抽调机关参谋干事数人以及通讯班前往。不料，我们刚到驻地构筑完防守工事，就遭到敌人伏击，随即展开战斗，后在一营的火力策应下脱险。但我的警卫员小赵及两个参谋负伤被敌人虏去，干事小崔及通讯员3人光荣牺牲。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特务连伤亡很大，阵地反复经争夺，战斗异常激烈。

下午1时左右，敌人先是用猛烈密集的炮火把徐楼房屋摧毁，接着是数辆坦克掩护步兵向我突击。我们处在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形势十分严峻。战士们一面与敌顽强拼杀，一面加紧修筑工事。一天的紧张战斗，大家都没有吃一口饭、喝一口水，随身所带的弹药也消耗无几。许多伤员都忍住剧痛，没有一个呻吟的。每个人都紧盯着阵地前的敌人。

到了下午4时左右，敌人又向我发起第三次进攻，我们严阵以待，一面在战壕里尽量避开炮弹片以减少伤亡，一面上刺刀，拉开手榴弹盖，把导火索环在食指上，预备敌人冲进来时和他们拼命。由于我们是孤军在敌人营垒里作战，大家都明白上级的意图和自己的处境。面对恶劣情况，战士们勇敢异常，视死如归。由于电话早已中断，通讯无法联络。

到了下午5时左右，突然听见南面嘶杀声震天，是不是被敌人突破了？我用望远镜一望，见八十五团的阵地全被敌人占领了，敌人几个团的兵力，在坦克大炮的掩护下，像潮水一般向西猛进。我不知道八十五团是不是接到前指命令撤退的，可是，如果给他们下了命令，怎会不同时给我们下命令？此时，我们既不

能请示，也不能等命令，因为八十五团突围后，我们就更加暴露，形势也更加严峻。事不宜迟，我立即叫王参谋通知田营长准备突围。田营长迅速将命令传达到了各连。利用天色昏暗，部队迅速向西南角隐蔽撤出，伤员尽量带走，争取摆脱包围我们的敌人，营长田德昌同志亲自在前组织指挥，我带八连等其他人员断后掩护。因为有青纱帐，外面的敌人没有发觉，一营很快便突围出去了。但当我带的八连准备突围时，敌人发现了，像潮水一样涌进村来，八连用猛烈的火力阻击敌人。眼看一营已向西全部撤出，而我们在后面掩护的人却不能随一营突围，因为敌人在我们正面加强了火力，我们不足200人，为摆脱困境，我们迅速回头往东南青纱地带方向撤，在敌人侧翼寻路突围。上蔡这个地方是青纱地带，经敌我双方一天的炮击，黄沙滚滚，遮天蔽日，才下午5点钟光景就似黄昏一般。敌我士兵身上都沾上了一层厚厚的黄沙，衣服几乎成了同一颜色，以至于双方相距仅几十米，敌人都没有认出我们。借着青纱帐的掩护，我们混迹于敌人的部队中间，大胆穿插到敌人的队列之中，双方混在一起向西走去，就这样，我们突围出来了。

此时已是黄昏7时左右，当政委宫愚公、副团长雷英夫同志一见到我们归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泪如雨下，好半天才说："联络不上，真担心你们出不来了。部队情况怎么样？"我回答说："还好，除了一些伤员和烈士无法带出来外，其余都突围出来了。"政委问我："杨团长呢？他带二营去接应你们了。"我说："没见到啊。"

后来我听宫政委讲，当时团长杨德隆听到徐楼方向枪炮声激烈，很着急，打电话请示师前指，说一营还在敌人围困中孤军作战，无法通知他们突围。肖锋师长决定抽调二营一部分兵力前去救援。团长杨德隆亲自带队从东南方向绕道增援，结果路上遇敌展开激战，团长杨德隆壮烈牺牲。我和杨德隆同志是在1942年新

四军新埔党校学习时相识的。1947年他调到十纵八十七团，我们又是一个团里的战友。杨德隆同志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作战英勇，和官兵打成一片，在干部战士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对党的事业忠诚，是个好领导。他的牺牲，激发了全团指战员对敌人的无比仇恨。



突破。陆文骏/摄

在上蔡阻击战中，我们十纵紧紧拖住了敌胡琏兵团，粉碎了其增援开封的企图。就在当天晚上（6月18日），我陈唐兵团以风卷残云之势，攻克了开封，守城敌军全部被歼。

在上蔡城，我们派民运股长李俊伦同志带工作队找到了团长杨德隆同志的遗体，将他和其他烈士一起葬入上蔡城北部坟场，并举行了安葬仪式。如今，杨德隆同志离别我们已经60多年了，他的英雄形象，令我永生难忘。

李云诚（1917.4～ ）湖南省双峰人。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湘赣游击队，193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福州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顾问。



1948年冬，淮海战役时，山东渤海区的民工赶赴前线。

送军粮

张韫磊 文/摄

1948年11月，我在华东军区（三野）政治部画报社任摄影记者。当时画报社驻扎在山东的益都(青州)城南的一个叫贾家庙的小村。淮海战役打响后，报社派我去采访民工支援前线的任务。我带上一架由战场上缴获的135小相机和4个135黑白胶卷就出发了。

路经临朐，一路还较平静，进入沂水县境，情形就大不同了。由山东各地前来支援前线的民工、民兵在大大小小的道路上处处都是。有的扛着自制的担架；有的推着独轮小车，上面堆着粮袋、军鞋；还有的用马车拉着棉衣等物。有来自胶东地区的，有来自渤海地区的，也有鲁南和鲁西北的。尽管天寒地冻，山路



崎岖，国民党飞机来回扫射、轰炸，但民工们一刻也不停，一齐向徐州方向前进。我跟随担架队一面走，一面打听情况。在一队长长的送军粮的民工队伍中，我和一位带队的干部谈了起来。他告诉我：这一大队都是胶东莱阳县的，全县来了几千人，单他们这个区就200多人。第一批参加了济南战役，不少人立了功。他们是第二批，这次出来的人比过去多，都想立个功再回去。我问上前线不怕吗?那干部说："这是打老蒋，为俺穷人打天下，不光解放军有份，俺们也有份，去端蒋介石的老窝，谁也不怕。"从民工的谈话中看出民工们只有一个信念：支援解放军尽快消灭国民党军队，好过上太平日子。



雪地送军粮。

忽然，我看见路边民工们和一群妇女正在把集中上来的军鞋往独轮车上装，这些军鞋都是妇女们赶制出来的。我停住脚步，上去把鞋翻过来一看，只见鞋垫上一只绣着“打倒蒋介石”，一只绣着“解放全中国”。我赶紧举起相机，把这个感人的镜头拍了下来。

第二天一大早，下起了小雪，听说有一队送军粮的小车队刚刚过去，我急忙沿路追赶。这个车队全是独轮小车，一人推一辆，约有二三十辆，专门向前线运送米粮。在一处大沙河的北岸，我追上了他们。沙河很宽，没有水，河两岸皆有高坡，车队过河，要二人互助，前边一人扶着，后边一人推着，把车滑下北坡，穿过河心，再一人拉着，一人推着上南坡，然后再回来推第二辆。我赶到时，正好他们已把全部独轮小车推到河心，一片白雪映衬着一排小车，很是壮观，我站在河岸上，居高临下，正要拍照，突然国民党飞机来了，民工们迅速散到河边干沟里躲起

来。“哒哒哒哒”，一阵机枪扫射，飞机飞走了。民工们起来一看，人未打着，有一车的粮袋被打了一个洞，黄澄澄的小米正向外流淌，民工赶快用手捂住，正要找东西堵洞，飞机又回来了，别人又都躲起来。这位堵洞的民工没有跑开，他一手捂着口袋洞，顺势趴到小车底下。一阵枪声扫射过去，幸好没有打中。飞机走了，他这才找了点儿干草和破布把洞堵上，然后与别人合作攀上南坡，继续赶路。

雪地中，送军粮的小车队向前线驱车猛进，巍峨起舞，就像是万里长城。我兴奋地拍下了雪地中送军粮的车队。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来回走了沂水、临沂、蒙阳、莒县、郯城等地，行程300多公里，拍了民兵支前活动的许多照片。对于淮海战役的胜利，陈毅司令员说过这样一句话：“淮海战役的胜利是父老乡亲们用小车推出来的。”如今，看到这张照片，看到民兵小车队正在通过大沙河向前线送军粮，更加体会到民工支前的重要意义，淮海战役的胜利，不仅是解放军英勇善战、奋勇杀敌的历史，也是山东250万民工用小车推出来的历史。

张韫磊（1926.10~ ）山东省莱州人。1947年于山东大学艺术科参军。原人民画报社记者组长、采编室主任。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老摄影家协会理事。

骑兵追歼敌坦克

孟秀玲/文　杨玲/摄



骑兵追击敌坦克。

这组《骑兵追歼敌坦克》的照片，是新华社华东前线分社女记者杨玲在鲁南战役中拍摄的。

1949年1月6日，我华东野战军向被包围在陈官庄地区的国民党军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敌阵地一片混乱。

准备接杜聿明突围的敌战车独立团一营的15辆M3A3坦克，在混乱之中找不到杜聿明，就在副营长吴秀章的带领下，沿薛湖、张集、会亭集一线向驻马店方向逃跑，沿途被我军打掉9辆，其余6辆继续逃跑。敌坦克的逃窜引起了华野司令部的高度警惕，他们判断杜聿明有可能躲在坦克内，分别用电报和电话的方式，将敌坦克逃窜情况通报特种兵纵队司令部及其所属骑兵团，命令加强侦察，迅速拦截。此时骑兵团驻河南省夏邑县会亭集附近，担任战役警戒任务。

1月9日早8时，敌坦克逃至张集附近被骑兵团三大队(营级单位)发现尾追，到火神庙附近，一辆敌坦克陷进沟里，里面的敌人爬出来钻进前面坦克继续西逃，第一辆坦克被三大队缴获。

其余5辆坦克逃至会亭集东门外刘大庄附近时，被一大队发现。大队长孟昭贤和副大队长张遵三、支部书记张德才立即集合部队迅速追了上去。开始，他们以两、三个区队形成夹击之势，向敌坦克射击、投弹，尽管火力很猛烈，子弹打在坦克上火星四

溅，但却不起作用。敌坦克一面还击一面继续向西逃窜，一些骑兵还受了伤。

二区队长王永丰和副区队长王广华率队边打机枪边向前冲，王广华先向坦克投了两颗手榴弹，利用靠近敌坦克的一瞬间，大叫一声“爬上去！”一跃第一个跳上了敌坦克，随后蒋步宽和郭长青也跳上了坦克。他们折弯了天线，砸坏了潜望镜，迫使敌坦克只能缓缓行进。忽然，敌坦克炮塔转了起来，王广华等人站立不住，急忙跳下趴到附近的坟地里。没走多远敌坦克便陷入泥坑内不能前进，一名敌人钻出来慌慌张张地往前面的坦克跑去，被王广华一枪击中。稍停，敌坦克举出了白旗，一大队俘获了第二辆坦克。

剩余四辆敌坦克则继续向西南逃跑。一大队仍然紧紧追击，不断地向坦克射击、投弹。王广华、袁化先、杜津民等同志企图用“跳下马、再跳上坦克”或“直接从马上跃上坦克”的办法，逼敌投降，均没有成功。副大队长张遵三指挥机枪组，绕过去迎头阻击，效果也不佳，敌开路坦克用“37”炮和重机枪还击，张遵三头部负伤，一区队长袁化先身负重伤（后牺牲）。孟昭贤急令部队与敌坦克保持一定距离，继续追击。行至会亭集东南方向的一片野地时，1辆坦克陷在泥坑内，一大队迅速包围上去，第三辆敌坦克投降。

敌坦克继续西逃，行至谢寨、步桥一带，遇到一条小河沟，敌坦克突然调回头来一面集中平射炮和机枪猛烈开火，一面隆隆地向一大队冲击。骑兵们急忙下马，在一片坟地散开，集中火力向敌坦克还击。战斗中，机枪手蒋步宽和弹药手李振香、班长汤传厚和郭长青先后被敌炮击中牺牲；王广华被枪弹打中，7处负伤，肠子流到肚子外面，他抓住王永丰的手喃喃地说：“老乡，我不行了，给我家捎个信……”没等说完就牺牲了。望着牺牲的战友，骑兵们愤怒到了极点，纷纷要求和敌人拼命。大队长孟昭



敌坦克被擒的现场。

贤明确表示“不能硬拼！”他考虑到坦克虽然装甲厚，火力猛，但坦克里的人也是人，他们也要呼吸、吃饭、喝水，只要紧追不舍，就会有机会。于是他指挥剩余人员采取穷追、紧缠、硬憋的“狼群”战术，与敌坦克保持着一定距离，成扇形尾随追击，遇到有利地形立即冲上去，朝天线、驾驶孔等处投弹。

这时，三大队部分人员赶了上来。

到白庙北附近的小常庄时，由于长时间的打炮和快速行进，再加上严重超员，坦克内热不可忍，吴秀章的太太几乎憋晕过去；天线被炸坏，潜望镜被炸坏，被迫无奈，这辆坦克打出了白旗。一、三大队迅速包围上去，敌人一个个从坦克里爬了出来。

最后两辆敌坦克仍然向西逃跑。一大队和三大队部分人员继续追击。追到亳县东北杨庄，又一辆坦克陷入沟里，骑兵们纵马飞驰上去，连人带坦克一齐活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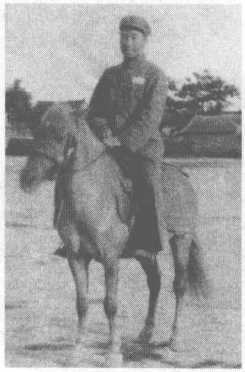
最后一辆坦克仍然顽强地向西逃跑。这时，骑兵和马匹已十分疲劳，许多马已跑不动，不断有人掉队。孟昭贤挑选了20余匹体格较好的马，带领王永丰、万福才、张友田、王复林等20多名骑兵继续追击。到亳县芦家庙附近时，敌坦克终于停了下来。大家立即包围上去，经搜索，很快将丢弃坦克逃跑的敌人全部擒获。

至此战斗全部结束。从早上8时到黄昏20时，追击12个小时，行程100余里，缴获坦克6辆，坦克内的43人无一漏网，创造了“骑兵打坦克”的突出战例。但一大队牺牲了王广华等9名同志。战后，华东野战军首长来电嘉奖，一大队荣立集体一等功，王广华荣立一等功，孟昭贤因指挥有力荣立了二等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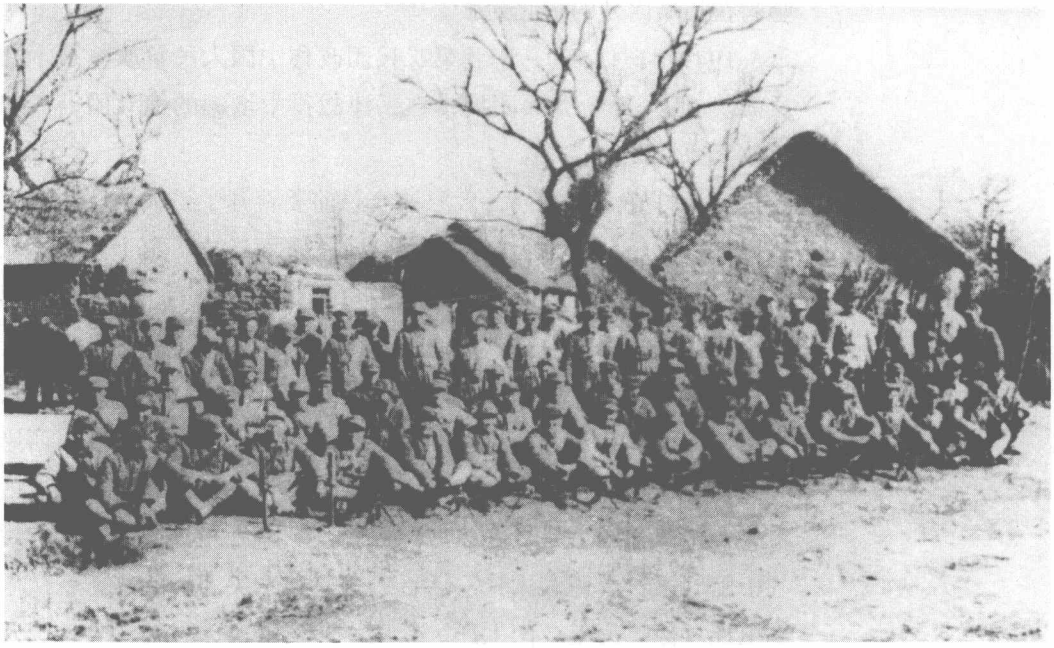
当敌坦克从陈官庄突围时，特纵坦克大队也奉命追歼敌人，新华社华东前线分社女记者杨玲冒着刺骨寒风跳上战车，跟随现场采访，一路上拍摄了不少照片。当他们追到会亭集时，骑兵团已基本把敌坦克擒获。杨玲又拍摄了敌坦克被擒的现场照片，并于战斗结束后在会亭集李楼为参战的一大队英雄群体合了影。

“骑兵打坦克”被传为佳话，是我军战史上颇为传奇的一个战例，已经永远载入了人民解放军的战史之中。

（根据孟昭贤回忆录《骑兵追歼敌坦克》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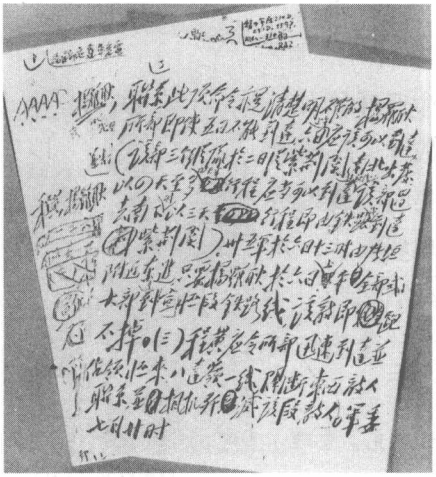
骑兵大队长孟昭贤。



追歼敌坦克的一大队英雄群体在会亭集李楼合影。

孟昭贤（1920.1~1994.12）河南省睢县人。1938年5月参加新四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北京军区装甲兵技术部部长。

杨玲（1922.7~2001.10）山东临沂人。1939年参加八路军，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外交部一秘。



“4A”级电报。

杨罗耿兵团和“地面战场之神”

孔祥　/文　耿飚/摄

从平津战役开始，一个叫做“杨罗耿”的词组密集出现在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发往前线的“4A”级电报里。在西柏坡的军委作战室里，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说：“我们这个司令部，一不发枪，二不发人，三不发粮，就是天天发电报，叫部队打胜仗！”

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兵团即华北第二兵团，一支驰骋在长城内外的华北劲旅。

1949年1月15日，华北第二兵团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4月，第十九兵团携带在平津战役中增编的炮兵团，参加解放太原战役。

为了打好太原战役，太原前线总前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攻城部队的任务区分为：第十八兵团从东面进攻；第十九兵团从南面、西面进攻，并负责攻下东南角的双塔寺；第二十兵团及第七军从北面进攻。

耿飚将第六十四军和晋中军区部队部署在太原西面。进攻开始后，他们和从西面进攻的第七军第十九师一起，沿汾河西岸分路向守军猛攻，第六十四军军长曾思玉指挥他的炮兵群抵近射击，一个急速射就是1000多发穿甲弹，耿飚在指挥所用电话连说“干脆利索！干脆利索！”话音未落，各个尖刀连的红旗就从硝烟里连续掠过南屯、南上庄、新庄、沙沟等点，11时50分，十几面红旗在煤山会齐，挥舞出“胜利”的旗语。

在南面，第十九兵团在扫清了外围据点后，于下午5时，组织第六十三军会同第十八兵团第六十二军的第一八六师包围了东南角上的双塔寺。



太原前线总前委扩大会议后留影。照片第二排左起杨成武（第十八兵团司令员）、杨得志（第十九兵团司令员）、耿飚（第十九兵团司令员兼参谋长）、彭德怀（左起第五人），前排左起第三人罗瑞卿（第十九兵团政治委员、总前委副政治委员）。其他不详。

双塔寺要塞是敌东南防区总指挥部所在地，为太原东南面的屏障。国民党军在该处阵地上筑有三层工事和数十个碉堡，周围还有天然沟和人工壕围绕，易守难攻。守军为第四十三军军部、一个暂编师，之外还有几个团。

22日晨，第六十三军的第一八七师和第一八九师对双塔寺守军发起总攻。炮兵团的尊尊大炮，瞄准了敌人。耿飚命令炮兵：狠狠打！但是只准打塔周围的工事、碉堡，把敌人的通讯设备、交通壕、火力点统统打烂，不准打那两个塔。

从北平“溶编”而来的兵团副司令员葛宴春是科班出身，它有一套“上目标，下一千，距离密位在两边……”的公式，还具体画出了150榴弹炮的膛外弹道，给耿飚过目。

解放军的大炮“发言”了。那么多炮，打得那么准，摧毁了守军的地面工事、高堡、夹墙堡，而双塔寺内未落一颗炮弹。这样，这座有着许多碑刻的明朝古刹双塔寺，就在密集的炮火中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兵团指挥部已移到双塔寺，就在寺下第一层的地上展开战役全图，兵团首长们靠墙蹲了一圈，杨得志握着“热线”电话，坐在地上指挥。耿飚拿着一具指挥尺，在地图前趴着作业。



杨得志（右四）和耿飚（右二）与兵团首长们一起蹲在地上看地图，分析敌我态势，研究作战部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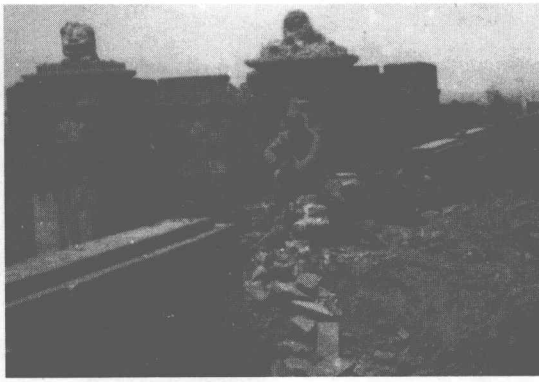
双塔寺距首义门不远。首义门上的守军是阎锡山的所谓决死队。他们仗着有自己的兵工厂，把枪弹、炮弹像水泻般地往下打，第六十三军几次攻击，均未得手。耿飚计算了城墙高度，确定火焰喷射器可以喷射到城楼上，就下令把1945年在张家口缴获日军的4具火焰喷射器抬来。

4具火焰喷射器很快前进到

攻击位置，各尖刀队一个齐射，压住了城墙上的守军火力，操作手奋勇向前，4条火龙飞上首义门。顷刻间，国民党军的守城部队呼爷喊娘，死的死，逃的逃。接着，第一八八师指战员迅速登上城墙，攻占了首义门。

这时，西面的攻城部队也发起了进攻。第六十四军的五七四团在水西门和旱西门之间奋勇登上城墙，然后打开水西门，使主力部队如怒潮般冲入城内。

在大南门，第十九兵团的大炮正在“啃烧饼”，数十门榴弹炮抵近射击，炮口摇平，直接瞄准，对着城墙打集火射击。那可真是一炮一个洞，一炮一层砖。一排排炮弹从上到下，一层一层地把城墙炸开、穿透、掀塌，不到10分钟，城墙上硬是开出一个可进四路纵队的大口子。硝烟未散，第六十五军的战士们已经呐喊着冲上去了。





上图：被我炮击后的城墙。下图：城墙上硬是开出一个可进四路纵队的大口子。耿飚/摄

在进攻部队的呐喊声中，耿飚冲出兵团指挥所，随部队向突破口跑去。司令部的军务科长、作战参谋大喊危险，杨得志急叫“拖回来！”兵团首长的几个警卫员一齐扑上来，怎奈耿飚腿长，他踩着山一样的瓦砾，冲得比六十五军的部队还快。

在高高的城墙突破口上，耿飚举起那架经历了长征的照相机，“咔嚓”：城墙上的大窟窿——一颗150榴弹的威力；“咔嚓”：上百个定格的呐喊面孔——蜂拥而入的攻城洪流；“咔嚓”：硝烟里潇洒的褴褛布条——红旗飘扬在太原城头……

通信队干脆把前进指挥所的电台送到城头上来。各路指挥



城墙上的大窟窿。耿飚/摄

员纷纷报告得手，请示攻击方向，耿飚目视着大战中的街景，回答：第六十四军沿街向东，接应第十八兵团和第七军，其余部队可以不受战斗分界线限制，自行冲向市中心“绥靖公署”——阎锡山的老巢。

进攻“绥靖公署”的主力很快就到达了位置。这时第六十五军电话报告，在“绥靖公署”大门口发现9辆坦克，由于打开了巷战，这些坦克还没来得及用上，解放军就冲到了跟前。坦克手弃车而逃，连发动机都没关闭。

耿飚一听缴获了坦克，高兴得几乎跳起来，就对着话筒高喊：“好极了，派一个排看住，我随后就到。”

耿飚立刻去找第六十五军缴获的那9辆坦克。只见一个连队的指战员正围着那些“游动堡垒”争论不休。见耿飚到来，他们就报告说：

“副司令员，这些坦克不知为什么不响了。”

耿飚登上一辆坦克仔细观察，发现油料都烧完了。

根据随车文件，耿飚知道这是9辆日本“豆”式轻型坦克。耿飚说：“没事，快从俘虏里找驾驶员，加上油就能开走。”

耿飚派人在缴获的9辆坦克上用喷漆喷上红五星，组成了第十九兵团第一个坦克大队，下辖3个连，每连3辆坦克。

接着，他们按照中央军委的毛泽东来电中“十八及十九兵团改隶第一野战军建制，尔后行动整训及补给等统听彭德怀同志指挥区处”的指示，离开了太原，踏上了解放大西北的征程。

缴获的坦克。耿飚/摄



耿飚（1909.8~2000.6）湖南省醴陵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参加了长征。原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兼）、国防部长（兼）。



向太原进军途中小憩时，战士们一边休息一边还不忘记练习瞄准，为日后的战斗做好充分的准备。

红旗直插太原城

韩红　王卉/文　　韩荣志/摄

在韩荣志的印象中，太原战役是最惨烈的一次战斗，这场战斗从1948年10月至1949年4月持续了六个多月，是国共内战期间，历时最长、参战人员最多、战斗最激烈、伤亡最惨重的城市攻坚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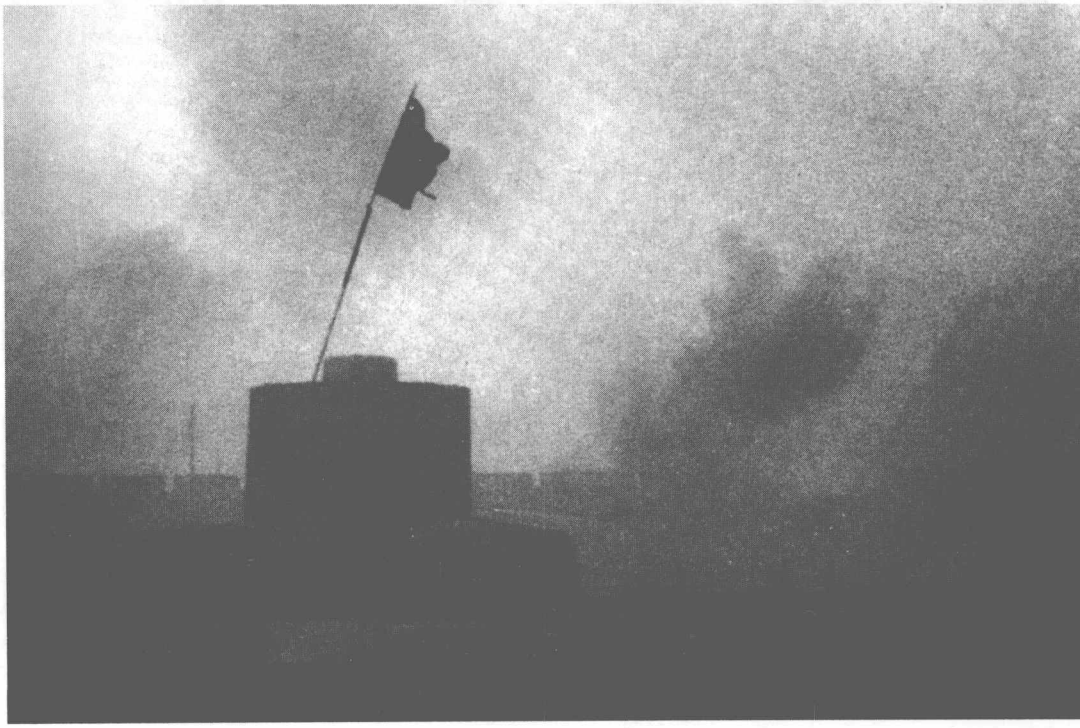
1949年初，韩荣志随六十八军进军太原，战士们途中小憩的时候，一边休息一边还不忘为日后的战斗做好准备，抓紧时间练习射击。韩荣志看见一位战士蹲在路边用一块小石子压在另一位战士的枪膛上练瞄准，赶紧拿出相机，拍下了这张在大战前，战士们行军途中精彩的瞬间。

部队士气高昂，大步前进，一路行军，没有遇到任何战斗，可是到了太原才发现，战斗的残酷性远远超出战士们的想象。

太原是山西省省会，是华北战略要地，地势复杂，易守难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所部10万余人据守该城。守军在城内外筑有各式堡垒、壕沟、暗道，形成了方圆数百里相互配合、互为犄角，多层次、大纵深的防御体系。六十八军突击队在进攻太原城时，大北门附近的突破口几次未能炸开，在阎军上、中、下三层火力网的阻击下突击队冲锋到城下，架设云

梯强行登城，由于步炮协同不当，云梯被自己的炮火炸断，已经爬到梯子中部的战士们被打落城下，突击队组织剩余兵力搭起人梯登城，也因为城墙太高而没有成功。韩荣志在掩体里心急如焚。突击队个个都是好样的，没有一个人在战斗中退缩。到了上午8点晨雾消散之后，炮兵再次集中火力轰击，终于炸开十几米宽的一个缺口，用不着人梯就可以越过，在嘹亮的冲锋号声中，突击队举起红旗往前冲，在8点30分将红旗插上城头。这张照片是韩荣志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在炮火硝烟中，韩荣志看到战士们在枪林弹雨中突击冲锋英勇无畏，深深地被战士们的精神感动，他感到自己作为一名摄影记者有责任一定要把战士们高举红旗插上太原城的情景拍摄下来，因为这是历史的见证，也是对英勇奋战的突击队员最好的纪念。

红旗直插太原城。



4月24日晨，攻城部队在1300门火炮的支援配合下，对城垣发起总攻。第二十兵团首先由小北门东侧突破城垣，第十九兵团和第十八兵团也相继攻入城内。各部队在强大炮火支援下，采取勇猛穿插、分割包围、各个歼敌的战法，迅速突破守军防线，韩荣志紧紧跟随六十八军突击队攻进城，与守军展开巷战。突击队一面与负隅顽抗的敌人进行巷战，一面对藏入地下室的敌人进行搜捕，躲藏在地下室的敌人听到越来越近的枪炮声，在极度绝望之中又听到解放军向地下室里喊话:“缴枪不杀！”、“负隅顽抗，死路一条”，于是纷纷走出地下室高举双手缴械投降。韩荣志不顾从地下室出来的敌人有可能拿枪顽抗的危险，找到一个最合适的角度迅速拍了这张《瓮中捉鳖》的照片。

瓮中捉鳖。



韩荣志（1926~2003.9）河北省清苑县人。1940年参加八路军，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解放军报社摄影美术处处长。

解放太原战役中的炮一师

张英/文



1949年4月，炮一师副政委张英（站立者）在太原战役前夕，向全师连以上干部宣布作战动员令。

1949年2月底，我在第四野战军炮兵第一师任副政委，奉命率部向太原开进，参加解放太原的战斗。

3月5日，我与师长彭景文带炮兵二十六团、二十七团以及临时配属的炮兵二十九团、高射炮兵团（当时，我师的二十五团由王珩副师长率领南下参加渡江作战）乘专列出发，在寿阳车站下车。时任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同志在火车站迎接我们，他高兴地与我们一一握手，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说：“我们兵团的炮兵太少，弹药也不足，太原国民党阎匪军仗着炮兵的优势，使我们吃了不少的苦头。你们有充足的弹药、丰富的作战经验，你们的到来一定会加快太原作战的进程。”

太原战役是个规模较大的攻坚战，我炮一师抵达太原前线后，立即投入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

太原城内，国民党阎匪军的指挥官是孙楚、王靖国和特务头子梁化之等，部队10余万人，装甲车六辆，各种火炮百余门，15

厘米大口径的榴弹炮两门。城外围碉堡工事密集坚固，城内粮食弹药充足，还有一些作战经验丰富的日本军人帮助他们做垂死挣扎。

我军太原前线的总指挥是彭德怀和徐向前同志。参战的我军部队有：十八兵团、十九兵团、二十兵团，西北野战军第七军，华北野战军炮兵旅、野战炮团和我们炮兵一师等。

最重要的是，我军有人民这个后盾，广大人民群众的拥军热情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是最大的力量。我炮兵二十七团所需炮弹，是当地群众上千人赶着1000多头小毛驴，从20余公里外，冒着危险，日夜兼程，历时20余天，运上阵地的。

在太原战役中，我们炮兵第一次充当了一次政治动员的主角。在战前的一次作战会议上，当有人向彭总请示政治动员的指示时，彭总大声说："大炮就是最好的动员，让各部队派代表去参观炮一师的大炮嘛！我们的战士一看大炮肯定会斗志倍增……"

我马上回到师里，组织部队做好了兄弟部队来参观的准备。大家看了我师二十九团的摩托化装备和二十七团的15厘米大口径榴弹炮非常高兴，都说：我们步兵有这么多、这样好的大炮支援好比老虎长了翅膀，什么样的明碉、暗堡和火力网也挡不住我们了！

4月20日，外围战斗打响。我炮兵一师在这次作战中也划分了若干炮兵群，由统帅部直接指挥，重点轰击敌炮兵阵地和观察所，对敌人进行炮火压制，彻底取消了敌人大炮的发言权。

在拔掉太原城外围的敌人据点后，我军又加紧了对太原城的总攻准备。指挥部对太原城总攻战斗的兵力部署是：太原城东、大东门、小东门由十八兵团担负攻击任务，我炮兵二十七团的两个榴炮营配属这一方向；太原城南和西南由十九兵团担负攻击任务，重点攻打义首门，我炮兵二十七团的两个炮连配属这一方向；太原城北由二十兵团担负攻击任务，负责攻打大北门，由炮

兵二十七团第九炮兵连协同作战；城西由七军负责，也配属了相应的炮兵分队。其他各炮兵团组成若干炮兵群随时支援步兵打突破口，掩护步兵逐步向城内纵深发展。

24日清晨五点半钟，总攻开始。我炮兵一师担负开辟突破口的营、连立刻开炮射击，太原城的四周像火山爆发一样，火光熊熊，巨响隆隆。一排排的重型炮弹在城门洞和城墙上开了花，霎时城上烟雾滚滚，弹片和碎砖乱石四处飞溅，守城的敌军乱作一团。炮击不到半小时，城东、南、北三个方向的突破口便都打开了，共计有数百米宽。突破口打开后，随着炮火向纵深延伸，我军步兵发起了冲锋……

四个半小时后，战斗结束。太原解放了。

在此战役中，我炮兵二十七团炮兵五连为摧毁太原城东南双塔寺敌军观察所立下了战功，得锦旗一面；炮兵九连为支援步兵打开突破口和支援步兵作战，受到了华北野战军二十兵团的表彰，获“神手炮兵”锦旗一面；炮兵二十六团四连、七连、八连，炮兵二十七团一连、五连、八连、九连，以及炮兵二十九团的部分连队都荣立了集体战功。

彭德怀总指挥感慨地说：“炮兵一师是我军一支英雄的炮兵部队。”（张英口述 杨延龙整理）

张英（1916.12~ ）辽宁省盖平（今盖州市）人。1936年11月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沈阳军区吉林省军区政治委员。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连战皆捷

张生文/文

我珍藏的这些泛黄的老照片，是江汉军区战地记者于1949年4月初在平汉（京汉）铁路花园火车站西面的朱家湾附近拍摄的。画面中前排左侧是两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双手举着竹竿撑起一面锦旗，旗上由右至左排列着“连战皆捷”四个大字。前排右侧第一人就是我，我当时是江汉军区独立旅第三团政委。老照片反映的是独立旅第三团在王家店、花园战斗中两战皆胜，在战后祝捷大会上，江汉军区独立旅第二团向第三团赠送“连战皆捷”锦旗的场景。我代表第三团接受了这面锦旗。虽然照片上“连战皆捷”的字迹已经模糊，但是独立旅第三团的全体官兵都知道，这面锦旗不是一面普通的锦旗，而是全团的骄傲，它是对革命理想信念的一种坚持和共勉，它激励我们在战斗中互相支持、配合，占胜任何困难和敌人，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而奋斗！

看着这幅老照片，当年的情景一幕幕在我脑海中浮现……



江汉军区独立旅第二团向第三团赠送“连战皆捷”锦旗。

1949年3月，中原野战军电令江汉军区部队和桐柏军区组成的五十八军积极行动，抓住企图南撤之敌白崇禧第三兵团，力求歼其一部，切断信阳之敌南退道路。为此，江汉军区主力在3月中旬东渡汉水、转战于敌第三兵团驻防外沿之应城、云梦地区，逐步向信阳南段铁路靠近。3月下旬，白崇禧令第三兵团加强孝感、花园方向防守，掩护第五绥靖区部队南撤。敌七军一七一师五一三团由云梦收缩到花（园）、广（水）铁路线，据守花园，掩护信阳之敌南撤。

为了阻断敌人后撤，引诱敌一七一师两个团北上增援，江汉军区根据敌情判断决定：独一旅一部奔袭王家店，切断汉口、信阳铁路。三团担任主攻王家店战斗任务。当三团奔袭王家店时，友邻五十八军一个团袭扰花园守敌。江汉军区主力在安陆东北地区隐蔽，待机歼敌。

王家店车站的守敌为应山县保安团，约八九百人，住在王家店旁一条河边的寨子里，寨子由很厚的寨墙环抱，四周有碉堡。另有国民党一个正规营。

3月29日，第三团奔袭王家店，工兵迅速将铁路桥炸断，切断敌军增援道路。然后，攻打村寨，由于夜晚作战视线不清，战斗持续至第二天清晨。天亮后，三团用迫击炮打掉敌村寨四周的碉堡，又在火力掩护下派工兵炸开寨墙，攻入寨中，俘敌500多人，且无一伤亡。三团佯攻磨山守敌，敌人果然上当，一七一师北上增援。至此，三团任务圆满完成，押着俘敌返回花园西。

30日下午，我和团长陈德志兴致勃勃地向军区首长汇报了任务完成的战斗经过，同时了解到汉江军区、五十八军主力在花园西十里的周家大湾地区与敌一七一师五一二团的战斗持续进行了一夜大半天，仗打得异常激烈，敌我双方相持不下，难解难分。我悄悄将团长拉到一边商量：我们请求参加战斗。陈德志团长和我不谋而合，立即向军区首长请战。经研究，首长同意了三团的

请战要求。

我和团长立刻进行了简短的战前动员，全团指战员英勇顽强，向敌右后侧进攻，迅即占领祠堂湾，接着又向汤家湾攻击。

敌一七一师五一二团属李宗仁、白崇禧的七军，官兵多系广西壮族，素以善于山地迂回包围作战见长。我三团官兵，善打硬仗，以刺刀见红著称。两强相遇勇者胜，三团官兵猛打猛冲，英勇无畏，将汤家湾之敌压缩至周家大湾。

关键时刻，独一旅集中各种炮50余门，对敌阵地猛烈轰炸，独一旅二团、三团、四团和五十八军一部协调配合，一举攻入村内，与敌人短兵相接，逐巷逐房争夺。很快消灭了周家大湾残敌，俘敌800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和弹药。攻占了花园，切断了信阳敌人的退路，打开了通往武汉的北大门。

这些照片，就是战斗胜利后拍摄的。



应城胜利颁奖大会。张生文（前排右一）为战士颁发锦旗。

张生文 (1915.9~)山西省柳林县人。1935年1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进军大西北

李书良 文/摄



这张照片是第一野战军六十五军一九四师进军大西北的历史瞬间。

渡江战役结束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全军将士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中央军委命令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第十九兵团归属第一野战军建制，参加解放大西北战斗行列。我当时在十九兵团六十五军一九四师任摄影干事。部队奉命开到平遥、榆次地区进行整训，为进军大西北做积极准备。

1949年5月底，部队进军大西北，战士们士气高涨，轻装上阵，每日行军百里以上。战士们的全部家当，就是枪支弹药和背包，而我作为一名摄影干部，除了军人应有的背包、手枪外，照相机就是我最重要的武器。一路上，到处都是支前的民工队和后勤部队，来来往往，络绎不绝。

路过山西运城稷山县时，还没进城，喧天的锣鼓和唢呐声迎面而来，“向进军西北的解放军致敬！”的巨幅标语高高地挂在城墙上，十分醒目。我赶紧用手中的老式德国蔡司伊康折叠式120型相机，目测距离、调好光圈，拨动快门，拍下了这个精彩的瞬间。走到城墙边才发现，城墙的右侧清晰地画了一幅城区东南西北的方位图，部队行军的路线，一目了然。部队所到之处，欢迎的人群、搭起的彩棚、欢快的锣鼓、飘扬的彩旗随处可见，战士们高呼口号：“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走在队伍中，

你会不自觉地加快脚步，挺起胸膛向前进。这两张照片，就是在行军中抓拍的，只可惜，当时只配发一个胶卷，很多精彩生动的画面错过了。这两张照片是我到西安之后才冲洗出来的，记得最初看到下面这张照片时，觉得拍的不好，部队在向前进，有个战士却在回头张望，所以一直没有发表。没想到60年过去了，现在看，反而觉得这张照片非常自然生动，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北的真实记录。



李书良（1932~ ）河北省束鹿人。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原解放军报社摄影记者、高级记者。



皮定均亲临江边察看地形。

敌人在对岸

皮卫平/文　王纪荣/摄

照片中双手举着望远镜注视对岸的是时任华东野战军二十四军副军长的皮定均。

渡江战役前，皮定均亲临部队突击地段的江边察看地形，向船工仔细了解对岸登陆点的敌情选择登陆点。他神情专注，嘴角露出坚毅、果敢的神情。照片上的船工形象非常清晰，虽然船工衣衫褴褛，但从他举手的动作中，从他那乐观的神情中，不难看出江北的穷苦百姓对解放军渡江战役发自内心的支持。

哪里有人民的军队，哪里就有人民的支持。这个历史镜头，只是战争年代军民团结打天下的一个缩影，它无疑在我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中留下了精彩的瞬间。

1949年4月，我军冒着敌人炮火强渡长江。在渡江战役中，担任第一梯队的部队是：第二十军、第二十一军、第二十三军、第二十四军、第二十五军等。为了渡江战役的胜利，在渡江战役之前，皮定均跟师团领导一起研究实施方案，深入到师团指导渡江战役的准备工作。他除了要求部队派出便衣潜入江南进行实地侦察外，还在我阵地沿江一线设置了8处秘密观察所，昼夜不停地通过炮镜观察江中敌舰的活动规律和对岸敌军活动情况、详细记录、逐日上报。同时，命令各部队拔除蒋军前沿据点，扫清渡江战役攻击前的障碍。4月1日黄昏，二十四军用两个团的兵力向土桥守敌发起攻击，一举突破敌人外围防御，2日拂晓全歼守

敌。二十四军顺利推至江边，使敌军江防完全暴露在我军阵前，为我军胜利渡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了摸索渡江作战经验，皮定均亲自指导某师组织了横渡巢湖演习。皮定均说："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现在我们要渡江作战，就是要练好渡江登陆作战的本领。"皮定均专门组织某师各级指挥员到江边熟悉地形、明确任务、研究渡江作战方案的具体实施，就部队的编组、兵力的使用、火力的配备、部队的隐蔽、水中的自救互救、登陆后的展开以及船老大的保护等问题，都一一考虑周全，充分发扬军事民主，共同研究制订作战方案。经过刻苦训练，每条木帆船都成了"士兵舰"，能攻善守，机动灵活，大大提高了全师指战员渡江作战的信心和战术技术水平。

4月20日夜，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500多公里战线上强渡长江，二十四军实施宽大正面的渡江突击。当晚，月明星稀、风平浪静，二十四军借助天时地利，扬帆疾进，船如箭发，出敌不意地过了江心，迅速突破了国民党苦心经营的"千里江防"，当敌人发现我军渡江时，他们的远程炮火已经失去了效力。而二十四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神速地登陆成功，夺取沿江堤坝。由于二十四军组织严密、准备工作充分，部队迅速向敌纵深猛插、勇追穷寇、扩大渡江战果，先后占领了宣城、郎德、广德，直指杭州钱塘铁桥，完成了战略迂回，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这张照片，就是二十四军随军记者王纪荣在渡江战役前夕拍的，皮定均在老船工的指引下观察南岸敌军阵地。没有人记得老船工的名字，但是王纪荣清楚地记得：熟悉地形的老船工手指的方向，就是对岸的敌军阵地。

皮定均（1914.1~1976.7）安徽省金寨戴家岭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原福州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第十兵团领导人进福州

陈鲁生/文 肖海/摄



第十兵团领导人进福州。照片从左到右依次为：刘培善（十兵团副政委、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十兵团政委），叶飞（十兵团司令员），陈铁君（十兵团副参谋长），陈超凡（十兵团直属政治部主任）。照片中，年轻的开国者们流露出自信的微笑，当年他们的平均年龄还不到35岁。

许多人都非常熟悉这张照片，但是，却少有人能说清照片上的人名。

2005年，福建一家杂志社在编辑开国将军《叶飞画传》时发现，这张照片虽然屡屡被各类史料期刊杂志引用，但人名说法各有不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开国上将叶飞》一书中，照片说明标注第五人是“陈超寰”；《岁月聚焦》刊登这张照片时，陈超寰的名字被印成陈超衰；《福州军区简史》中，陈超寰的名字变成了陈铁君；再查看一些其他史料书籍，照片说明中，索性把此人的姓名忽略不记，留下空白。

那么，照片中左起的第五人到底是谁呢？

事隔50多年，照片中的人都已先后离去，到哪去查询这个人的真名实姓呢？

说来也巧，2007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编辑部意外收到了一篇1944年曾在新四军《苏中报》上发表的《忆日本战友——松野觉》的手稿，文章首页作者署名“陈超寰”，编辑部的同志眼前一亮，这似曾相识的名字，会不会就是他们要找的人呢？当几位编辑带着疑虑和期盼登门去采访寄稿人谢莫京老人时，看到她家中桌上赫然摆放着这张老照片，编辑部的同志一下子豁然开朗，他们不仅找到了“陈超寰”，找到了陈超凡的夫人谢莫京老人，还找到了这张照片的拍摄者。

原来，陈超凡的原名叫“陈宜悦”，受革命影响改名“陈超寰”，以表达青年心中远大志向。1937年，陈超凡从日本回国参加新四军，后调任十八旅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是彭冲。十八旅的同志觉得陈超寰的名字“寰”字很难写，建议把“寰”字改成“凡”字，后经上级批准，从1946年起，“陈超寰”的名字正式改为“陈超凡”并一直沿用了下来。从参加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进作战、“挺进纵队”建立江北抗日根据地到渡江战役解放苏州等城市，陈超凡与叶飞、韦国清、刘培善、陈铁君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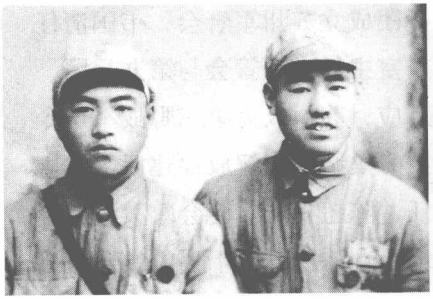
了深厚的战斗友谊。1948年，十兵团成立苏州军管会，韦国清任军管会主任，陈超凡任军管会调查室主任。军管会与第九兵团、第十兵团在解放上海战役中前呼后应，苏州成为第三野战军司令部解放上海的作战指挥地和兵团主力集结地；解放福建后，成立福州军管会，韦国清任军管会主任，陈超凡任军管会政策研究室主任，军管会再次配合叶飞、刘培善、陈铁君等十兵团领导指挥漳、厦战斗……

这张《第十兵团领导人进福州》的照片就是十兵团随军女记者肖海于1949年秋在解放福州后拍摄的。照片中5位人物从左到右依次为：刘培善（十兵团副政委、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十兵团政委），叶飞（十兵团司令员），陈铁君（十兵团副参谋长），陈超凡（十兵团直属政治部主任）。照片中，年轻的开国者们迈着豪迈的步伐，带着自信的微笑，迎接全国的胜利。当时，他们5位领导人的平均年龄不到35岁。

半个世纪，弹指一挥间。2007年，当摄影师肖海再次将这张1949年拍摄的老照片翻印放大后赠送给陈超凡的夫人谢莫京时，两位老人均已白发苍苍。谢莫京老人92岁高龄，听话耳背；肖海老人因病，说话困难，两位挚友自称她们是“聋子和哑吧的对话”，但是无论岁月如何变化，她们的话题围绕的内容还是这张老照片，照片中的5位人物都已化作闪耀天空的星辰……

陈超凡（陈超寰）（1913.8~1968.5） 广东省梅县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参加新四军。原福建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

肖海（1929.2~2008.3）江苏省南通市人。1945年参加新四军，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福建省文化局社会文化处处长。福建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进军福建前张廷斌（左二）和崔希明军医（左一）两人合影，经过千里行军到达福州后，张廷斌又照了一张三人照，两张照片对比，胖子变成了瘦子。

千里行军进福建

张廷斌/文 肖海/摄

1949年5月，解放上海战役后，经一个多月休整，华东军区命令十兵团（二十八军、二十九军、三十一军）向福建进军。我二十八军二四八团奉命从常熟出发，经急行军至嘉兴，乘闷罐车到达上饶，稍事整顿后发放给养物资，每人携带的物品都在25公斤以上（每人发3公斤大米、1公斤水、按标准每个战士带100发子弹、4枚手榴弹、1支步枪带刺刀或冲锋枪、饮食洗涤用具、防雨布、1条USN军用毛毯、军人鞋袜各1双、钢盔1顶），开始了千里行军。此时，正值7月末8月初，是江南最炎热的酷暑季节，我们沿着江西上饶的简易公路前进。第一天过了江西铅山县。第二天行军，沿武夷山的盘山路到分水岭，在分水岭上，团部命令休息十分钟，此时顿觉凉爽甚至有点儿寒意，之后下山到崇安茶厂附近休息。第三天我们从崇安到达建阳时，发现我们要经过的桥梁已被敌机炸断，桥上余烟中还冒着燃烧的火苗。但是我们英勇勤劳的工兵已在老桥的上游修好了一座新的简易桥梁。我们顺利地从简易桥梁上通过。走在桥上，我们对工兵同志充满了感激之情，他们不愧是我们的先行官。



部队继续穿山越岭，几乎都是盘山路，不是上山就是下山，部队只能成三路纵队前进。在太阳强烈照射下，有些战士发生中暑，只能简单治疗休息后，继续行军，病重者则由担架连抬着走，稍好转后，返回连队。

为了减轻战士的过度劳累，作为卫生队长，我向团首长提出如下建议：

1. 给战士水壶中加少量盐，以防中暑。

2. 行军中准许战士打开风纪扣、上衣扣，扎的皮带也适当放松。

3. 行军时战士的前后左右距离放长放宽，以利热量散发。

4. 行军速度适度放慢。

团首长采纳了这些建议，孙成才政委在连续第四天的集合行军前讲话，要求部队采取措施，预防中暑，做好行军的保障工作。此后中暑的发病率明显下降。在由建阳向建瓯的行军中，又发生了一例大叶肺炎，病员送到卫生队时，已处于深度昏迷状态，虽经大力抢救，患者仍在深夜去世，这是在我们这次行军全程中唯一病逝的一名战士。

在这次行军过程中，发病率最高的是痢疾、肠炎和疟疾。但我们团卫生队对这类药的储备是充足的。只要发生了这种病，就可以送卫生队治疗。卫生队常常是白天行军，夜间抢救病人，治愈后送回连队。这样每治疗一个病人，就等于给连队增加一个战士。但卫生队的崔希明军医却因夜间得不到休息，只能在白天打着瞌睡行军，有时竟站着睡起来了。

随着行程的向前延伸，战士们身上的负荷也在下降，米袋子越走越瘪了。好在兵团部汽车还补充些粮食，但炊事班早就没有油给战士炒菜了，而且也买不到菜，只能用点盐水给战士下饭。战士们为了减轻身上的负荷，便把那心爱的USN的毛毯减掉一半，再减掉一半……直到剩下1/8，仅做一块背包的垫布。这时战

士们的体重和体力都在下降。

在从建瓯向古田的行军中，路两侧不时有敌人向我们打冷枪，我们派小分队去追，他们很快就在丛林里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就影响我们行军，以后索性就不管了。好在未引起我们的伤亡。据说这是蒋军的散兵游勇。到达古田城后，我们宿营在郊外小村里，大部分战士仍宿营在树下草地上。

部队休息一夜后，继续前进到闽侯一带的山路旁，这时已到了8月14日，师、团分别召开了作战会议，部署和研究攻打福州的作战计划。我们团的任务是沿公路线消灭一切阻碍我们前进的敌人，进而进攻福州市区，二四五团的任务是由北大岭南下直接攻打福州。我们团在福州西郊一座山上遇到敌人一个加强营的阻击，敌人用重机枪的火力扫射路面，我团则在炮兵和重机枪的掩护下用两个营从两个侧面向山上的敌人发起攻击。从早上7点开始，到上午9点钟结束战斗，敌人被全部歼灭。我团也伤亡70多人。战斗结束后，我团急速向福州进发，12点钟到达福州古楼即福州北门。此后又向南门兜进发，到南门兜后我们部队就地休息，这时有许多老百姓出来欢迎和观看。二四五团由北大岭下山后，一直顺利前进，但在解放大桥（原名万寿桥）上遇到了在中洲岛上的敌人的密集火力的杀伤，我方伤亡20多人，我抗战时期的老战友魏景利同志就牺牲在这里。

魏景利是1939年参加革命的，参加革命时年仅14岁。我和他在一个部队，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在战斗中，他总是冲锋陷阵，非常勇敢。1945年在山东夜袭羊口的战斗中，战斗快结束时，一颗无情的子弹击中他的左眼。我给他包扎时，心中十分难过，心想，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失去一只眼睛，是多么的不幸呀！而他却乐观地说："不要紧，我还有一只眼睛，还能打仗"。在解放侯镇的战斗中他被敌人的弹片击中了左手中指、无明指，小指也切掉了一大半。我将他伤口包扎后送后方医院治疗，从此我们

失去联系。1949年5月，在上海营以上干部参加庆祝上海战役胜利的大会上，我俩又见面了。我问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还活着呀！"他说："在渡江战役中腹部中弹，又救活了，大仗打过去了，革命胜利了，过去没有死以后大概死不了啦！我们能看到全国解放啦！"

在解放福州时，他是二四五团三营的副营长。在福州解放大桥（原名万寿桥）上遇到敌人火力阻击，魏景利同志带领突击部队向桥上冲去，就在这一瞬间，他和几位同志倒在了血泊里，他那时才24岁。

写这篇文章、看这些照片，我如果不把魏景利同志的英雄战绩写上去，我心中不安，愧对英雄。我虽年近九旬，每逢想起我的那些老战友，都无法抑制住老泪纵横，一个个鲜活的面容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解放福州后，我团从1949年8月17日到1950年2月初，在福州担任警备工作，主要是保护新建的省、市政府和军事管制委员会。

《千里行军进福建》这张照片是随军女记者肖海拍摄的，她的照片，真实生动地记录了那个年代。而我战争年代的日记，记下了千里行军进福建的点滴生活。

张廷斌（1923.12~ ）山东省邹平人。1940年9月参加革命，194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福州军区后勤部直供部副部长。

肖海（1929.2~2008.3）江苏省南通人。1945年参加新四军，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福建省文化局社会文化处处长。福建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1949年10月，五十军在湖北宜昌渡长江，向鄂西进军，参加解放大西南战役。

五十军进军鄂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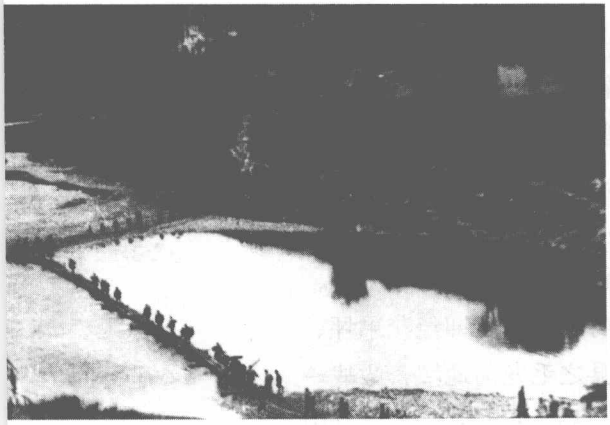
胡宝玉　文/摄

1949年冬，人民解放军响应毛主席、朱总司令“解放全中国”的号召，继续奋勇向华南、西南地区和沿海岛屿进军。当时，我跟随五十军由东北战场转入西南战场、挺进鄂川，参加鄂西北战役，并入川参加成都战役。

10月下旬，我部由湖北宜昌渡过长江，很快进入鄂西山区，部队翻越数座高山，先头部队占领要隘野三关，迅即经花果坪、鸦雀水向西跟踪追击逃敌，截敌于建始县之毛龙河地域，激战一夜，歼敌一个团，俘敌400余人，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11月中旬，我部一四八师、一四九师追击逃敌越过恩施县境，进到宣恩与咸丰之间小关南北地区，切断盘踞五峰、长阳、鹤峰山区残敌

逃路。在宣恩渣口洞堵击横越公路之敌，歼敌一部，迅速展开宣恩、咸丰战役，我两师并肩向东攻击，于龙坪里地区堵击向西突围之敌，并在卧犀坪、大小高罗地区，及沙道沟、鹤峰城郊激战，将敌军大部歼灭，俘敌6000多人。全歼盘踞在湘鄂川边区的敌军，攻克了建始、利川等县城，解放了恩施地区，鄂西战役胜利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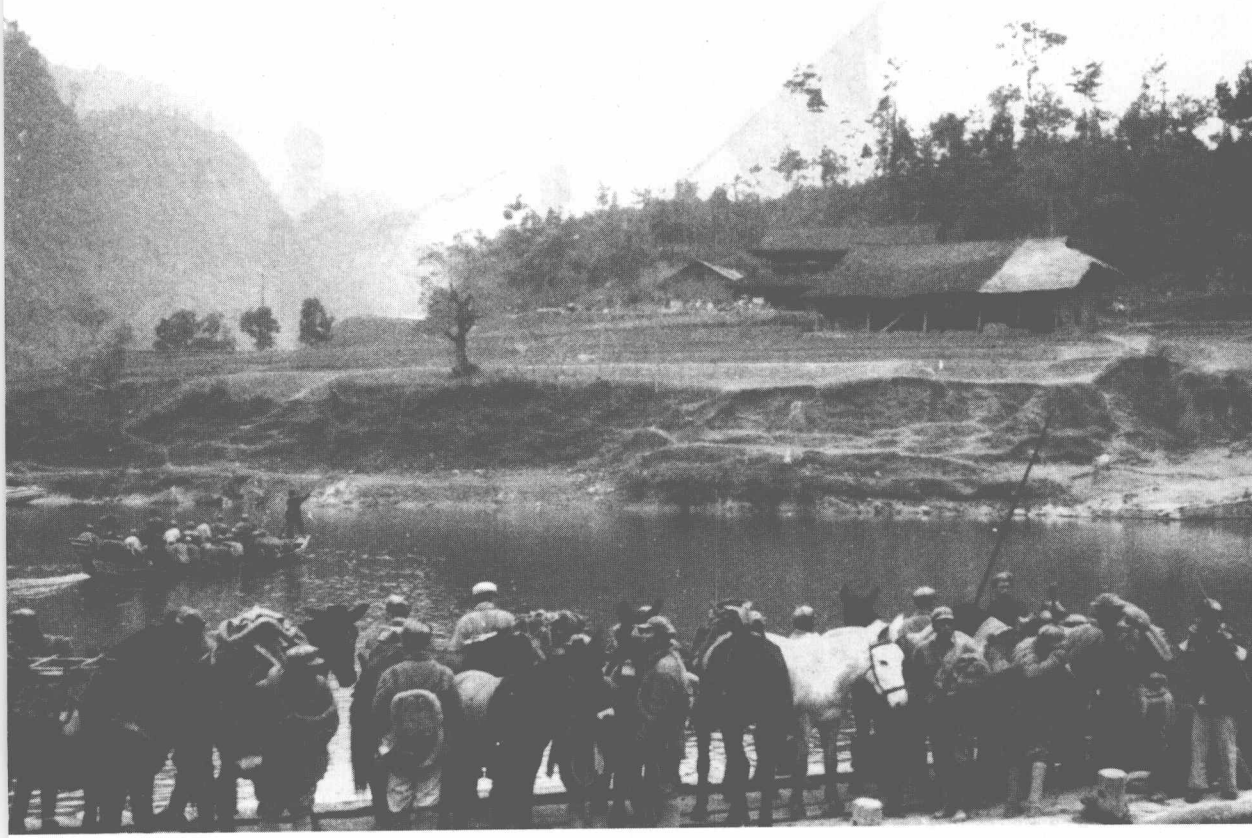
一仗接着一仗，部队再奉命继续乘胜进军四川，配合第一、二野战军围歼窜聚成都之敌。我军从咸丰出发，踏着泥泞难行的山路翻越高耸入云的白马山，经黔江、彭水、武隆，于涪陵北渡长江，边行边战，经长寿、邻水、广安、岳池进至南充地区，以连续三个昼夜急行军220公里赶至距成都40多公里的简阳地区布防，拒敌东逃，参加战役合围。溃逃窜聚在成都的蒋介石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和其他部队共40余万人，在我解放军强大兵团的严密包围下，已成瓮中之鳖，除起义者外，全部放下武器投降，成都宣告解放，西南历史名城获得了新生。



在鄂西进军中，部队通过当地人民群众用门板搭成的便桥，追歼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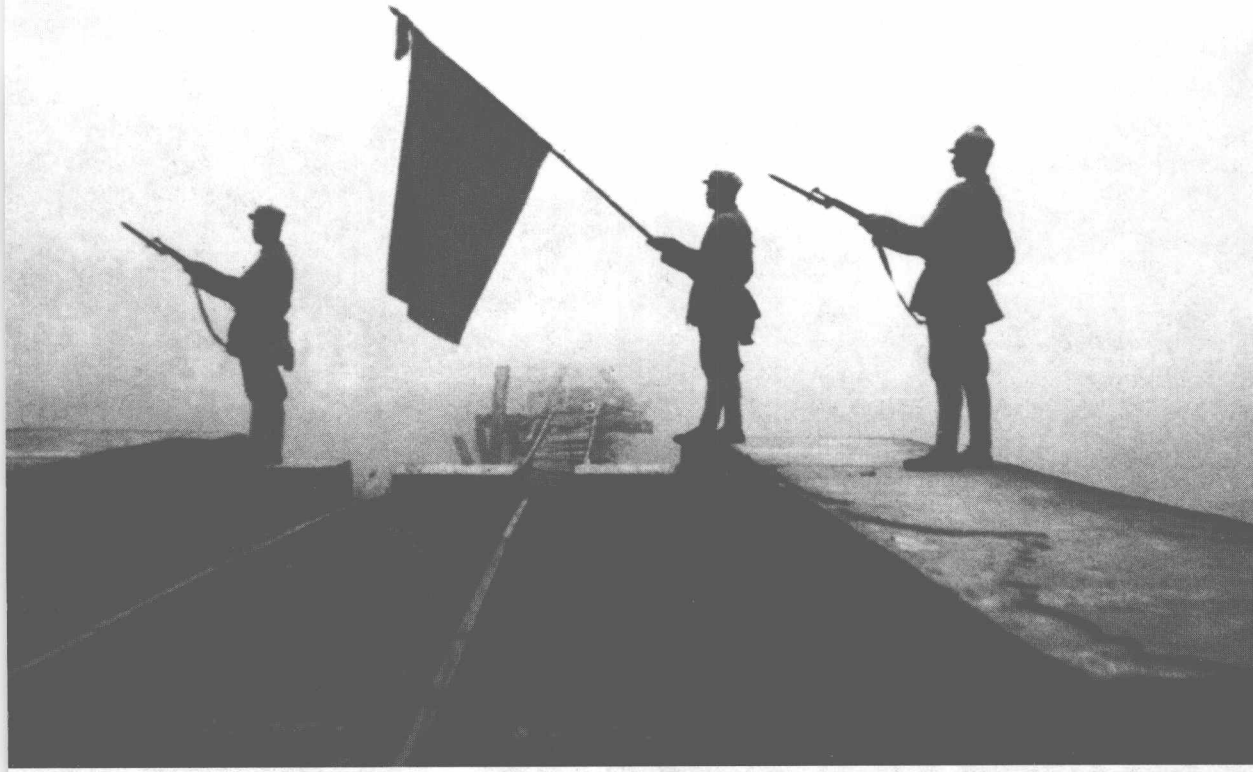
先头部队追敌至恩施县郊小关桥，急速修复被敌破坏的桥梁。



部队渡过嘉陵江后，再渡饮马河向成都挺进。

1983年，我再次进川采访，重走30多年前战斗时所经过的地方。重返故地，山清水秀的大地充满生机，30多年前的一幕幕回忆，油然浮现眼前……

胡宝玉（1929.7~ ）河北省盐山人。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解放军画报社记者、编辑组长、研究员。



我军与企图南逃的敌人赛跑。1950年1月11日清晨，三十八军一一四师三四一团抢先占领了河口。堵住了逃敌的第一个路口。图为我军战士高举鲜艳的红旗，守卫在南疆口岸。

刘贤权将军在滇南战役中

安少杰 凌空/文　余林/摄

1949年12月，时任三十八军一一四师师长的刘贤权，奉命率部挺进到广西的田东。正当他和战士们说说笑笑打算怎样欢度新中国第一个元旦时，机要科长匆匆递过一份急电。刘贤权看罢电文扭头就赶回师部。敏感的老兵们猜测又要打仗了。

不错，不愧是老兵。急电是中央军委发来的。命令三十八军驻百色地区的两个师由刘贤权统一负责，暂归二野四兵团陈赓司令员指挥，以一一四师为前卫，一五一师为二梯队，务必于1月12日前迂回到云南的河口、蒙自方向，封锁边境，切断国民党军汤尧集团的逃路，与二野入滇部队和滇桂黔边游击总部配合，歼灭该敌于滇南地区。

由广西的田东迂回到云南的边境，是崎岖复杂的千里之遥，而限期只有17天，作战任务是如此紧迫，而且刘贤权还要统一负责两个师，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刘贤权在作战地图前经过一番沉思后，立即与政委方国南研究并召开了党委会，部署行动方案。会后，他专程去一五一师协调作战预案。一五一师师长曹灿章原是一一四师的副师长，老战友相见，分外亲切。两人商定，由一一四师封锁国境线，由一五一师指向开远，防止敌人从开远机场空运溜走。

12月27日凌晨，刘贤权率部从广西田东出发，以日行百里的速度飞奔河口。旗开得胜，于1950年1月8日进驻文山县城，收编了国民党地方部队420人。当天，刘贤权收到二野四兵团转来的一份电报，说是毛主席从莫斯科打来的，指示参加滇南战役的部队正面追击不要太急，以麻痹和拖住敌人，担任迂回包围的三十八军一一四师和一五一师的动作要快，以阻住敌人南逃的退路。刘贤权想，毛主席正在苏联访问啊，他还惦记着这场作战，心情格外激动。立即向全部队传达说，这一仗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咱们可要给党和毛主席争光，一定要把敌人堵住，把红旗插到河口！干部战士的求战热情立即沸腾起来。

与此同时，四兵团通报敌人正向蒙自方向移动，电令一一四师加速向河口前进。据此情况，刘贤权立即兵分两路，令一一四师一部继续往西南直插河口，令师主力向蛮耗疾进，同时发电给曹灿章师长，要一五一师往西北直奔蒙自，寻机作战。



三十八军一一四师三四一团一营奉命飞越千山万岭，于1950年1月15日抢先占领敌人在红河上架设的汽油桶浮桥。后在蛮耗歼灭敌军一个营。

山路崎岖，有的地方根本无路，战士们只能艰难跋涉。刘贤权和方国南政委以及师的领导全都丢掉马匹下到连队同战士们一起步行。1月11日晨，一一四师前卫三四一团胜利地占领了军委指定的位置河口，把八一红旗插在红河桥头，封锁了敌人南逃的第一个通路。时任一一四师政治部主任的余林，为战士们拍下了这个珍贵的镜头。

此时，敌二十六军得悉我军已抢占河口，逃路已被切断，慌忙派出一个营去蛮耗的红河渡口架设浮桥渡河掉头西窜。

刘贤权立即率部向蛮耗疾进，先敌抢占浮桥，断敌退路，消灭蛮耗守敌。我军前卫部队在炮火掩护下冲上了浮桥。此地守敌的哨兵还昏头昏脑地以为是“自己人”，又问口令，又问番号。当守敌成了俘虏后，还疑惑不解地问道：解放军怎么会是从南面过来的啊！

再说蛮耗的另一股守敌，开始以为是游击队来了，准备固守在一个大院里抵抗。在我军猛烈的炮火声中，听到我军的喊

话:“我们是从东北来的第四野战军，你们快投降吧！”敌人无比惊异，问道:“怎么证明你们是四野的？”一位班长灵机一动，脱下脚上穿的东北“大傻鞋”，使劲扔进了守敌的院内。不一会儿，敌人就打出了白旗。事后做了俘虏的敌营长说，“一看见鞋就知道真是东北四野的，当地没有这玩意儿。唉，老蒋的新一军、新六军都叫你们消灭了，我们怎么敢和你们打呀！”至此，敌军的第二条逃跑通路又被我军牢牢卡住。

这时，师侦察队从对抓来的“舌头”审问中得知，狡猾的敌人又转向西南的蛮板逃窜，企图从红河上游渡口渡河南逃。刘贤权一听，把手一挥，决不能让敌军漏网！立即下令三四〇团一定要抢在敌人前占领蛮板。三四〇团奉命连夜急行军，阻击敌军，途中歼敌二十六军一部600多人。18日，二十六军军部300余人也成了师侦察队的俘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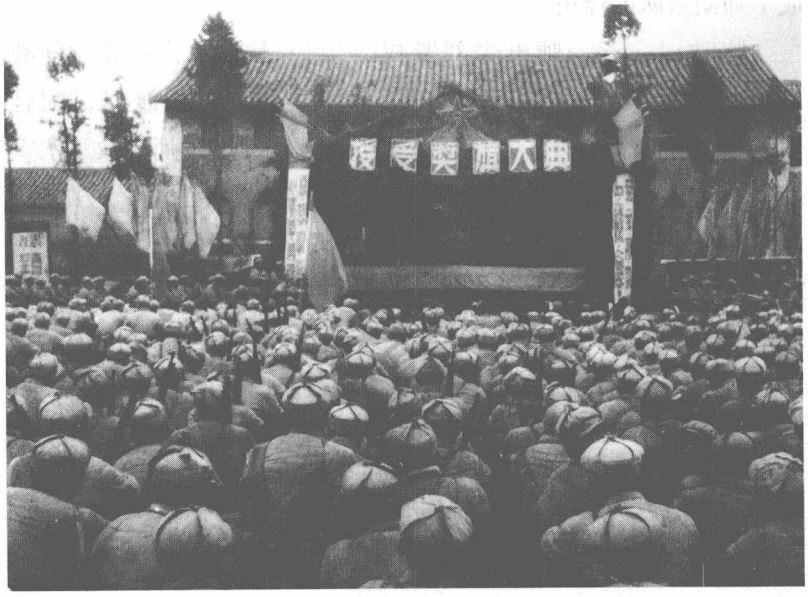
此时，一五一师电告刘贤权，他们已攻占了蛮板。歼敌二十六军大部。刘贤权即令三四〇团立即从蛮板渡河，配合一五一师追歼二十六军，命师主力折向元江前进，消灭敌第八军残余。此后至1月24日，各团每天都有俘敌的战果。

在滇南战役28天的连续行军作战中，刘贤权率一一四师征程2475华里，进行大小战斗9次，共歼敌4000余人。上级首长对参战的一一四师、一五一师予以通令嘉奖。

滇南战役结束时，刘贤权再也经不住疲劳的袭击，倒下去就睡，一睡就是几十个小时。酣睡中他被副师长叫醒：陈赓司令员来电，要你到昆明接受任务。刘贤权一听，睡意全消。什么任务，电报没有说明。刘贤权立即坐火车辗转到达昆明。陈赓司令热情接待，拉住他的手说，刘副军长，你们太辛苦了。刘贤权不好意思地解释说，我是一一四师师长刘贤权。随即表达了对四兵团老大哥部队和边总游击部队的敬意。原来，上级已经下令刘贤权为三十八军副军长兼一一四师师长。因为部队一路奔驰，作战



云南人民热烈庆祝滇南战役的胜利，耍龙灯，扭秧歌，欢迎凯旋的亲人解放军。



滇南战役胜利后，一一四师论功行赏，在云南曲靖及时召开庆功授旗授奖大会。激励指战员继续发扬革命英雄主义。

紧迫，刘贤权和他的部队对此都不知晓。直到战役结束归建途中才看到命令。

陈赓此次电召刘贤权来到昆明，传达总部令三十八军两个师归建的指示，充分肯定友军参战的贡献，并设便宴欢送。

滇南战役是我军在云南省南部地区进行的以追歼逃敌为主要特点的一次战役，是敌我双方在大陆上最后一次大的武力角逐。这次战役歼灭蒋介石嫡系第八兵团2.5万余人，生俘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兵团司令汤尧等高级将领多人。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云南境内残敌企图垂死挣扎和逃往国外或台湾的阴谋，解放了云南各族人民，对保卫祖国西南边疆，巩固国防，具有重大意义。



滇南战役胜利后，兄弟部队二野四十四师师长向守志（右一）代表十五军军长秦基伟、政委谷景生，来到曲靖县北市慰问参战的一一四师，看望三十八军副军长兼一一四师师长刘贤权（前排左二）、政委方国南（前排右二）。

刘贤权（1915.9~1992.6）江西省吉安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济南军区副司令、顾问。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委员，第九届中央军委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谭善和，巧用吉普车运粮

王晓建/文



谭善和（中）在刚刚修通的雅安至甘孜段的康藏公路上，迎接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张国华乘坐的这辆吉普车，也被谭善和临时借用，参加了在金沙江东岸的接力运粮行动。

1950年2月，大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西康四省已经遍插五星红旗，待解放的地区只剩下西藏了。中共中央把进军西藏的任务交给了西南军区，西南军区随即决定：由十八军为主进军西藏；为支援十八军进藏，以西南军区工兵纵队所属的6个工兵团为骨干力量，另与十八军的3个步兵团及西南公路局两个总队相配合，尽快修筑康藏公路，以便运送部队和军需物资。

谭善和时任西南军区工兵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接到西南军区“不惜一切代价修路”的命令后，他立即带领几位工兵团长和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出发勘察路址。他们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勘定了康藏公路雅安至甘孜段的路线。4月中旬，谭善和率6个工兵团万余人开始了艰苦的施工。

康藏公路沿线的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地质、地形条件复杂，横亘着雪山、冰川、流沙、沼泽地，加之气候恶劣、风雪晴雨变化无常，空气稀薄，使人徒手行走都感到呼吸困难。谭善和指挥工兵部队发扬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英雄气概，使用简陋的器材筑路基、架桥梁、打隧道，征服了每秒流速超过7米的大渡河、雅砻江，打通了海拔3400米的二郎山、4700米的折多山、4600米的罗锅山，将公路修到了金沙江以东100多公里的甘孜。1950年8月25日，康藏公路雅安至甘孜段通车。

遥望金沙江以西的西藏，谭善和要求各工兵团不能松劲，要继续奋力向西筑路，使公路尽可能靠近金沙江边。经过工兵部队1个多月的苦战，康藏公路甘孜至海子山段于10月2日竣工。十八军利用这条刚刚通车的公路迅速集结部队，10月6日渡过金沙江发起了昌都战役。

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进军西藏的方针是“不吃地方”。因此，昌都战役打响后，所需一切粮食、物资都要靠后方补给。但是，康藏公路的临时重点海子山距金沙江边还有60公里，经十八军部队抢修，有30余公里能通行吉普车和马车，其余路段只有牦牛才

能行走。谭善和奉西南军区首长命令来到海子山，亲自组织向金沙江边转运粮食和物资。

谭善和临时决定，将自己和十八军军、师首长乘用的吉普车集中起来，与200多辆马车一起向金沙江边抢运粮食和物资；在吉普车、马车过不去的地段，换用雇来的1万多头牦牛驮运。

在刚刚修通的康藏公路（雅安至甘孜段）上，谭善和迎接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张国华乘坐的吉普车，也被谭善和临时借用，参加了在金沙江东岸的接力运粮行动。

于是，在金沙江东岸出现了一个奇观——解放军首长乘坐的吉普车与成群的牦牛进行“接力运输”。粮食和物资运到金沙江东岸后，再船运过江，供给十八军作战部队。

1950年10月24日，昌都战役结束，获得歼灭藏军5700余人、攻克入藏门户昌都的重大胜利。此战使西藏地方政府的态度发生了转化，很快便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和谈代表团赴北京，于1951年5月23日与中央人民政府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西藏终获和平解放。在昌都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共伤亡114人；但在康藏公路雅安至海子山段的修筑过程中，却伤亡650余人。昌都战役的胜利以至西藏的和平解放，是与工兵战士付出的生命、血汗分不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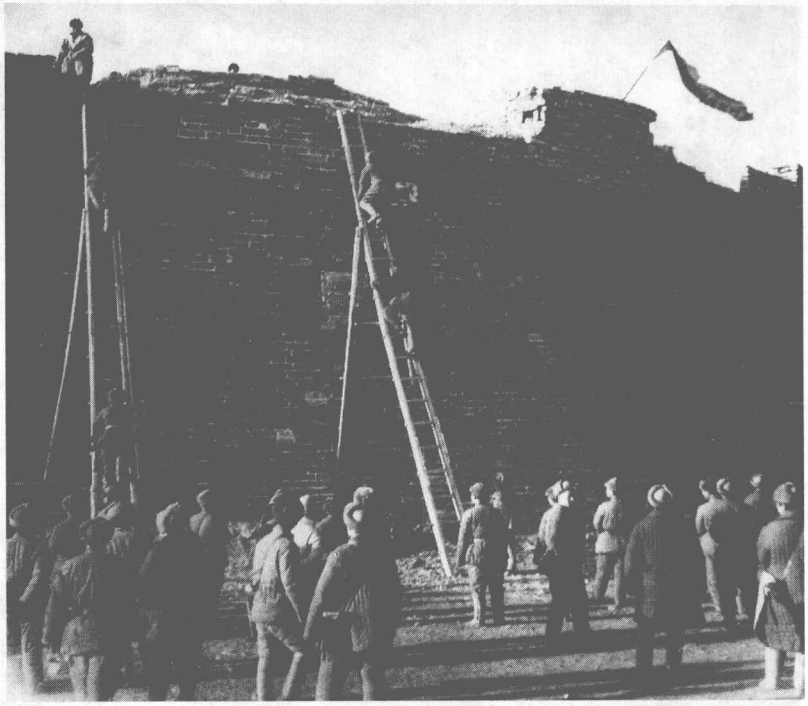
谭善和（1915~1991.6）湖南省茶陵洮水乡中洲村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原乌鲁木齐军区政治委员。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练好本领打北平

郝建国　文/摄

1949年1月，我随六十三军一八七师冒着飞雪赶赴北平城外。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六十三军在中央军委的部署下，和兄弟部队一起完成了对北平守敌的包围。东线国民党重兵把守的天津市已被我军解放，断绝了北平守敌海上逃跑的退路；西线平绥线上，在新保安我军又歼灭了傅作义嫡系部队一个军，打消了北平守敌西窜的梦想，完全切断了平、津守敌的联系。当时的北平城，已经成为一座孤城，而我军气势高涨，斗志旺盛，厉兵秣马，只待攻城。



攻城训练。

一天雪后，我看见战士们在村头的打麦场上和村后的山坡上，开展练兵竞赛，两人一组练刺杀，战士把“练好本领打北平”的口号扎在了稻草人的身上，每天看，每天练，“练好本领打北平”的决心，已经成了全团上下的一致行动，战士们只等命令一到，立即攻上城，解放北平。

我当时在六十三军一八七师政治部任摄影干事，拍下了这个难忘的瞬间。

如今，我已经80多岁了，看着这张照片，更加体会到当年毛主席、党中央对北平围而不攻、和平解放的伟大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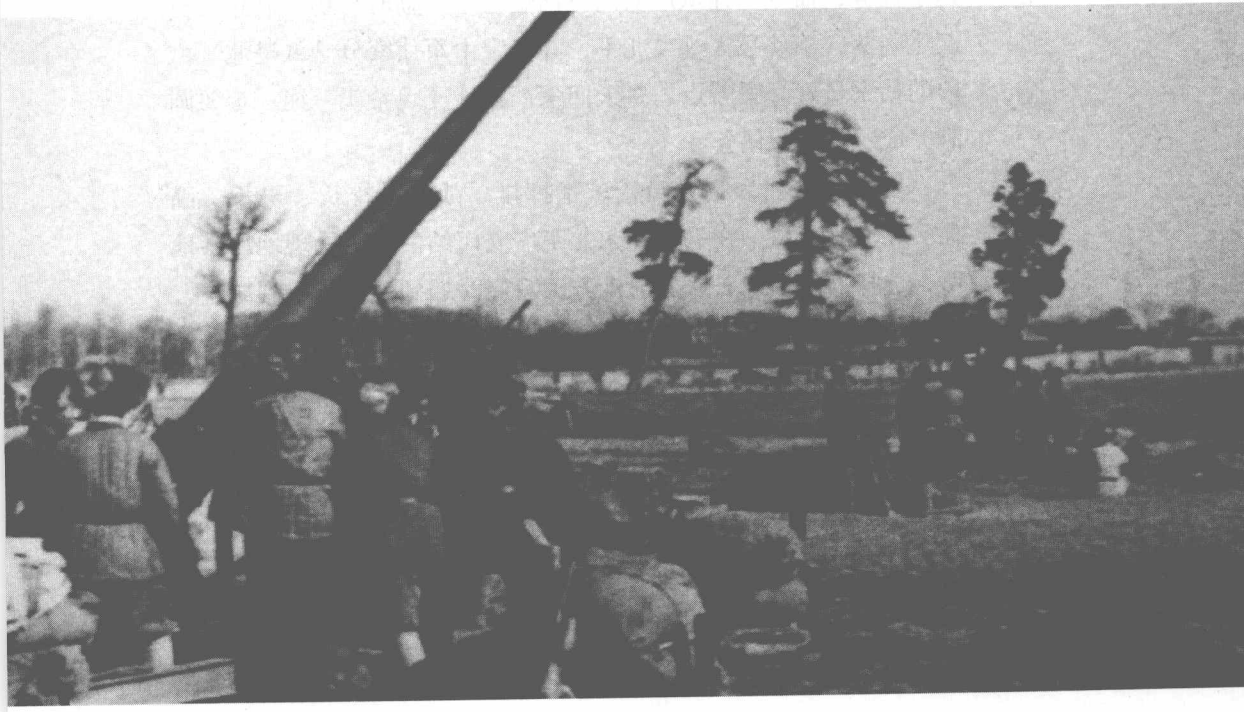
郝建国（1926.2～ ）河北省饶阳人。1945年1月参加八路军，194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解放军报社摄影组组长。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中国老年摄影家协会理事。

1949，炮击东单临时机场

栾克超/文　齐观山/摄

为了争取和平解放北平，中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决定以炮火控制国民党东单临时机场，阻止北平城内的蒋介石嫡系第十三军校以上军官乘飞机南逃。东北野战军第四十一军炮兵团一营一连奉命执行炮击东单临时机场，控制其飞机起飞降落的任务。我当时任一连副连长。

1月14日中午，风雪交加，我和指导员胡景举（缺连长）到营部开会。营长赵梗传达上级指示说：“你们一连今天下午出发，到丰台镇以东马家堡宿营，明天上午你们两人到长辛店四十二军司令部去受领任务，炮击东单临时机场，如何打法，按四十二军首长的指示执行。为快速到达，团里给你们连配属3台



汽车。”教导员于湘云强调说：“此次任务重大，一定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与兄弟部队搞好团结关系，注意安全，胜利完成任务。”

一连干部回到连队，立即召集班、排长研究，确定由司务长带领炊事班、马车马上出发前去设营；因为火炮是木铁轮，不能长距离汽车牵引，即将火炮推上汽车载运，由指导员和副连长带领指挥排、3个炮兵排乘汽车前进；文化干事于厚诚带领3个驭手班、全连马匹，拉上挂炮装炮弹的前车跟进，如果遇到汽车故障，仍以马拉。连队午夜到达马家堡。

1月15日，大雪基本停了，仍寒风瑟瑟，上午连队擦洗火炮、弹药、器材，检修车辆，进行战斗准备，做群众工作。指导员和我一早乘马赶到长辛店四十二军司令部受领任务。四十二军作战处参谋席文献热情接待，罗文参谋长指着地图讲了情况，下达了任务，命令一连从广安门方向炮击东单临时机场，制止飞机起飞降落，不使敌人逃离北平，并确定由军侦察分队派进北平城内的侦察员观察弹着点，每天回来汇报情况，希望一连一定要圆满完成这个光荣任务。

当天下午我和指导员带领指挥排、战炮排排长、班长、瞄准手和汽车司机，在马家堡东北距广安门约两公里处现地勘察地形，选择发射阵地，研究射击方法。当时遇到了只能看到城墙，看不到东单临时机场射击目标的难题。

一连虽是支老部队，炮兵技术较好、作战经验较多、打过不少胜仗、消灭过众多敌人，但过去多是近战、直瞄射击，即使远战、间接射击，也是能看到目标的观察所指挥射击。现在则是炮阵地和观察所均看不到目标，加之当时又没有精确的军用地图，无法利用地图射击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既要打中目标，又不能毁坏文物古迹，误伤群众，确是一个难题。我们当即在现地召开了“诸葛亮会”，进行认真研究，确定用土办法射击：

1.请教人民群众。于干事通过村长请来几位熟悉东单机场附近情况的群众，请他们给指点东单的方向和距离。其中一位小学老师马先生，他姥姥家住在台基厂，还知道修机场的一些情况，介绍得比较准确。他们说：从炮阵地（炮对镜、方向盘观测器材位置）向东北看过去，通过城墙上那个垛口的方向，就是东单的方向；从这里到东单直线距离有20多里。

2.赋予火炮射击方向。在各炮阵地上架上方向盘，对准城墙上那个垛口，在方向盘前方瞄准线上插上两根标杆，方向盘对准的方向，即为火炮的射向，选定标定点，并根据当时的西北风，向左修正500米的方向修正量。

3.确定炮目距离。20多里即10000多米，加上气温低的气象修正量约500米按11000米，即为炮目距离。

1月15日下午，我和指导员胡景举带领战士们用8匹马拉1门炮和九〇野炮3门，在广安门外两公里处占领阵地，构筑工事，装定11000米距离表尺，精确瞄准方向标定点，做好射击准备。下午3时，我一声“全连2发齐射，放！”的口令，6发射弹飞向东单方向。为了免遭敌炮还击，立即撤出阵地。就在刚撤出时，敌炮立即还击，因我连动作快，未受损失。晚上四十二军侦察员回来报告，炮弹打在天坛公园西南角，约近1公里，偏左500米。

1月16日炮击第二天，增加1200米距离，向右修正500米的方向，全连2发齐射。刚开始射击，敌人的炮弹立即打过来了，干部战士奋不顾身，仍沉着射击。共产党员、塔山阻击战大功臣、三班一炮手曲中聚同志不顾负伤流血，继续装填炮弹；共产党员、三班长迟继增同志在瞄准手负伤时，立即充当瞄准手，继续瞄准射击。

傍晚侦察员来报告，炮弹落在崇文门大街西端和美国兵营附近。

就在这天晚上上级传来捷报：天津解放了！极大地鼓舞了全

连的斗志。

1月17日炮击第三天，一连早晨6点进入阵地，适当修正方向和距离，全连3发齐射。侦察员报告：射击准确，机场、跑道均有落弹。

不知何故，这天敌炮像接到禁止还击命令似的，在我射击时，敌炮一发也未射击。以后听说是傅作义下令不准还击。

这天早晨，一连接到上级指示："以后除了每天例行炮击一至两次外，凡是发现北平上空有飞机，就立即向东单临时机场炮击，制止敌机降落。"

原来是蒋介石逼傅作义南撤未果，害怕在北平城内其嫡系第十三军的命运如同天津，便于16日晚给傅作仪发电报："于17日派飞机到北平运走第十三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武器，约要一周，望予以协助。"果然，17日上午10时许，敌从青岛起飞的2架运输机来到北平上空，我们一连立即向东单临时机场炮击，全连3发齐射，接着又3发齐射，猛烈的炮火使敌机未敢着陆即飞走了，以后再未敢飞来。

如此炮击，又连续进行了5天，一连共发射炮弹89发，粉碎了蒋介石用飞机运走第十三军校以上军官及必要武器的企图。

一连由于炮击准确，既控制了机场，又没有毁坏文物古迹，也未波及居民。据说有一发炮弹落在中南海距华北"剿总"司令部和傅作义官邸很近的湖中，把冰面炸了一个大窟窿，对其震动很大。一连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为北平和平解放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栾克超（1927.8~ ）山东省莱西人。1945年1月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军事学院高级系学员队队长。

齐观山（1925~1969.8） 河北省平山人。1939年参加八路军，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新华通讯社摄影部采访科科长，中国摄影家协会第二届理事。



朱总司令万岁

郑鲁南/文　孟昭瑞/摄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进入北平。

照片上，海洋般欢呼的人群中，北京前门箭楼上“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式的标语格外显眼，但是最吸引《华北画报》摄影记者孟昭瑞的却是人群中高举的这一条幅——朱总司令万岁。

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曾经这样形容朱德：围绕他的名字，人们编织着上千种传说。他能刀枪不入，百步穿杨；他能料事如神，起死回生。对孟昭瑞来说，人民群众对朱总司令的热爱一样富有传奇色彩，孟昭瑞激动地高高举起了相机，按下了快门。

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胜利后，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决定，在北平举行解放军入城式，孟昭瑞敏锐地意识到，一个载入史册的时刻来到了。

为了给入城式的拍摄做好准备，孟昭瑞和几位记者一起兴奋地坐上了一辆吉普车，进城察看地形。这是孟昭瑞第一次进北平城。前门的宽敞热闹，让孟昭瑞既新鲜又好奇，尤其是坐在缴获的美式吉普车上，一路畅通无阻，那种巨变的感受，只能用一句话表达——北平和平解放了！

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部队3万余人在北平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

为了拍好这激动人心的时刻，那天上午，孟昭瑞按规定提前了1个小时赶到现场。上午10时，4颗红色信号弹飞上一碧如洗的蓝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以威武之师的雄姿亮相在北平人民面前，孟昭瑞用他的镜头紧紧追随记录着这历史性的一幕——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式。

入城式从上午10时到下午4时，整整走了6个小时。在北平200多万群众的夹道欢呼中，解放军行进路线由永定门经前门大街入城，经东交民巷，到东单、东四、北新桥，在鼓楼进入西城区，然后经地安门到太平仓，与西直门入城部队会合。

入城式的队伍走到哪里，夹道欢迎的人群都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当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学生看到入城式部队的装甲车、坦克开过来的时候，兴奋得争先恐后地把“热烈欢迎解放军”“毛主席万岁”“打到广州去”等标语贴到装甲车、坦克上，有的学生贴完标语干脆坐在坦克上，随着解放军一起进城。

孟昭瑞迅速抓拍了清华大学的学生坐在坦克上和解放军一起入城的珍贵历史镜头。

如今，当60年前的照片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心灵的震撼。这两张拍摄于1949年2月3日的照片，让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画面，而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日子—— 北平和平解放。

清华大学的学生坐在入城式部队的坦克上。



孟昭瑞（1930.8~ ）河北省唐山市开平镇南人。1946年参军。原解放军画报社高级摄影记者。



和平起义：包尔汉迎接解放军战车团入新疆

伊力夏提·包尔汉/文

这是1949年10月20日，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在迪化市（现乌鲁木齐）南郊，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入新疆的先遣支队战车团团长胡鉴的历史照片。虽然照片模糊不清，但是包尔汉和胡鉴热情握手的珍贵镜头却让每一位见证者记忆犹新，因为从这一天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进驻和接管新疆。

1948年伊始，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西北战场第一野战军解放了兰州、西宁后，第一兵团一军、二军直插河西走廊的张掖，挺进酒泉，准备解放新疆。一直为和平努力的张治中将军为了在新疆实现和平转变，向蒋介石建议撤换了一再制造混乱的顽固分子宋希濂，任命陶峙岳担任警备司令，随后以稳定新疆为名介绍和推荐包尔汉担任省主席，替代了臭名昭著的泛突厥主义分子麦斯武德，为和平解决新疆打下了基础。

1949年1月，包尔汉正式就任国民政府新疆省主席。为了稳定新疆局势，包尔汉上任后立即着手实施新政举措：1.实行币制改革，发行新疆货币“银元券”取代“金圆券”，在金融上切

断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依赖，抑制通货膨胀使物价渐趋稳定。2.支持、指导革命青年的地下组织，为和平起义做好思想和组织准备。3.同在伊犁的“三区”领袖阿合买提江保持联系，以协调民族军部队谈判维持和平局面。4.争取一些有影响力的上层人物走和平起义道路，撤换政府系统中坚持反动立场的死硬分子，通缉策动叛乱的美国驻迪化市副领事马克南，以威慑反动势力。5.尽量与新疆省警备司令陶峙岳沟通联络，争取国民党驻军共同实现和平起义。同时以省保安司令身份（省主席兼任省保安司令）安排得力人员担任保安副司令，组织保安武装部队，做好万一军方不同意起义或发生叛乱时的应急准备。

9月15日，包尔汉亲自到机场迎接从伊犁飞抵迪化的中共中央联络员邓力群，并安排邓力群和电台报务员住到自己的家里，采取了严密的保卫措施。邓力群向包尔汉转达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慰问和鼓励，并转交了毛主席让张治中将军发给包尔汉和陶峙岳督促起义的电报。包尔汉向邓力群汇报了和平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两人在关于新疆和平起义的问题上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作为中共中央联络员的邓力群同志在后来回忆这一段历史时曾动情地写道：“当我到达迪化时，有三件事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第一是作为当时新疆省政府主席的包尔汉会亲自到机场来接我；第二是他让我与他同乘一辆汽车，并亲切地以‘同志’称呼我；第三是他会安排我住在他家里，把他的家作为我和报务员居住、工作的场所。后来从他家院内外的严密保卫状况看，我明白他主要是从我们的安全考虑作出这一安排的。他家的住房并不宽裕，我们到达后，我和报务员住在房子的一端，包尔汉同他的家人住在房子的另一端，中间仅隔一间客厅。当时的环境相当险恶，国民党新疆驻军的态度不完全明朗，尤其是军中还有一批坚持反动立场的军官在企图进行最后的挣扎，甚至企图暗杀包尔汉及其他一些进步人士。在这种情况下，包尔汉敢于让我这样一个共产党的联

络员住在他的家中，那是需要巨大的勇气和胆略的……以后我同新疆许多军政要人的接触、谈话便都是在他的家中进行的。”9月19日，包尔汉通过邓力群向毛主席发去电报：表示已做好一切准备，态度鲜明地表达了对和平解放新疆的期待之心。四天后，毛主席回电：申皓电悉，极感盛意。新疆局面的转变及各族人民的团结，有赖于贵主席鼎力促成，尚望联络各方爱国民主分子，配合人民解放军入疆之行动，为解放全新疆而奋斗。

当时，新疆驻军中骑兵第五军军长马呈祥（青海军阀马步芳的外甥）、七十八师师长叶成（蒋介石的同乡和学生）、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军统特务）都是握有军权的实力人物，他们不但反对起义，甚至还策划在9月21日（中国人民第一届政治协商会开幕之日）发动叛乱，准备逮捕杀害以包尔汉为首的政府进步人士后挟持陶峙岳撤往南疆继续顽抗。这一阴谋被陶峙岳和包尔汉及省政府秘书长刘梦纯发觉。为了不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包尔汉和大家商议，决定由秘书长刘梦纯抢先一天于9月20日举行家宴，邀请马呈祥、叶成、罗恕人三人赴宴，同时邀请了主张和平起义的省保安副司令张凤仪、迪化警备司令陈德法、迪化市长屈武、财政厅副厅长白文昱等官员作陪。宴会有意拖延时间，随后又举行舞会、打牌等活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由于马呈祥他们三人失去与部队的联络，使得叛乱的阴谋没有得逞。

与此同时，身为警备司令的陶峙岳将军以长官身份与他们谈话，恳切陈词晓以利害，加上军阀马步芳和胡宗南在关内的军队全部被挺进大西北的人民解放军彻底消灭，终于使马、叶、罗三人认识到反叛无望，同意交出兵权“和平撤退”，离开新疆。但他们提出条件：所有带不走的公私财物全部折成黄金付给本人。省政府马上同意了他们的要求，所有物品一律作价由省库付给黄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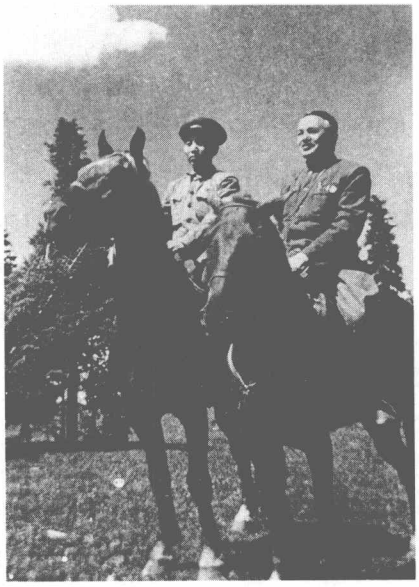
9月23日，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人携带家眷财物分乘数

辆大汽车离开迪化，经南疆由塔什库尔干出境流亡国外。这一决策，为和平解放新疆扫除了重大障碍，也有利于人民解放军顺利进疆。

9月25日，陶峙岳将军率10万官兵通电起义。9月26日，包尔汉领导的省政府发出起义通电：竭诚接受毛主席的八项和平声明和国内和平协定，并将省政府改组为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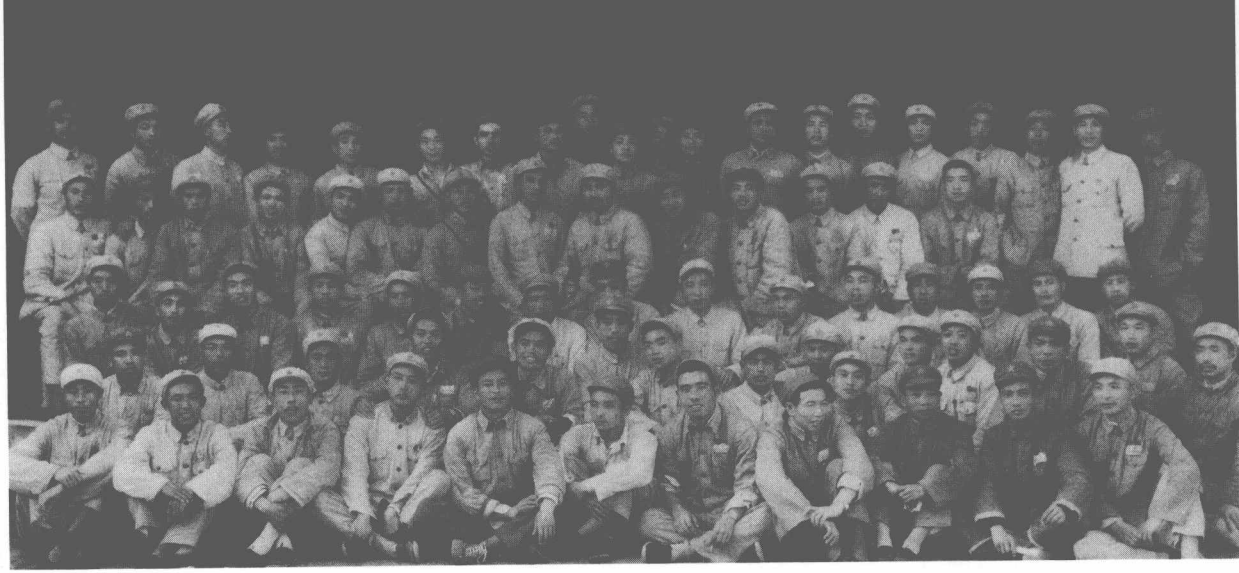
虽然新疆军政和平起义成功了，但由于人民解放军尚未入疆，局势依然十分严峻：起义部队中少数顽固分子坚持破坏活动，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和特务分子大量炮制谣言，煽动滋事，多处发生兵变和抢劫银行事件。包尔汉一方面急电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彭德怀副司令，希望解放军及早进新疆，并派迪化市市长屈武和省府委员率代表团赴酒泉向彭德怀副总司令当面汇报和平起义后新疆的情况，吁请解放军尽快进疆。另一方面，以省临时政府名义宣布戒严，加强巡逻。同时责成起草和大量印发《告起义将士书》，赞扬陶峙岳将军起义行为并组织各界慰劳起义将士，稳定军心，同时还通过苏联领事馆向苏方请求派空军协助紧急运送解放军入疆，使混乱局面得到控制。

10月20日，期盼已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先遣支队战车团终于开进了乌鲁木齐。



包尔汉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既被国民政府委任又被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委任的省主席。在解放和建设新疆的共同事业中，包尔汉（右）与王震司令员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

包尔汉（1894.10~1989.8）新疆温宿人。1933年在莫斯科参加革命工作。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这张照片是1950年金门战斗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九军八十五师营以上干部合影。

金门战斗前，八十五师营以上干部合影

朱云谦/文

厦门解放后，兵团命令我带二十九军八十五师的二五三团和八十七师的二五九团，配属二十八军首长统一指挥，参加解放金门战斗。当时金门守敌兵力较多，敌胡琏兵团又从广东汕头乘船转到金门增援。而我军渡海船只不足，一船只能运送三个团。

当时，第二十八军军长、政委都在后方治病，由副军长萧锋同志和政治部主任李曼村同志主持前指军政工作，萧锋同志负最高指挥责任。我向萧锋同志提出，请他建议兵团推迟攻击金门的时间。萧锋同志面呈难色回答我："三十一军和你们二十九军解放了漳州、厦门，如果我们二十八军不按兵团要求及早拿下金门，不好说话呀！我不便向兵团提意见啦！"我说："金门敌人兵力较大，按我军现在的装备情况，难以取胜。"萧锋同志说："敌人是残兵败将，军无斗志；我们是胜利之师，可以以质胜量……"当时我不知道，萧锋同志曾一再向兵团建议推迟攻击金门，都没有

得到兵团的同意，他感到不便再提意见。

我在同二十八军的同志接触后，听到一些议论，许多人认为应该推迟攻击金门的时间，筹集足够的船只，做好充分的准备。

我决定自己找兵团首长提意见。我到厦门市，找到兵团司令员叶飞同志。他当时正主持厦门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作千头万绪，办公室内人来人往，都是来向他报告情况和请示问题的，简直没有时间同我谈话。他简单地问了我几句话，就忙着去处理别的事情。我感到自己插不上嘴，就向他告辞了。

预定攻击金门的前一天，即10月23日，敌胡琏兵团增援金门的情报已经证实，敌我力量对比更加对我不利。是不是还按预定计划于24日夜发起攻金战斗呢?我派作战参谋彭允太同志骑马到莲河二十八军军部去询问，得到的回答是:“兵团决心已定，明天发起战斗!”

24日18时，二五三团团长徐博、政委陈利华率领全团整装登船。不少同志满怀胜利信心对送行的同志说:“一定给你们带回胜利品!”因船只不够用，还剩下一个连不能登船只得留下，但有的人还想挤上去。这时司令部有个同志笑着说:“师长，我看算了吧，留下一些人也好嘛。”事后回想，他似乎已有某种预感。

第二十八军赋予二五三团的任务是在金门岛西北角上的古宁头登陆，突破后，向岛西端的金门县城攻击前进，协同在金门岛北部登陆的第八十四师二五一团攻歼县城守敌，尔后会攻北太武山。25日1时40分，二五三团在古宁头登陆成功，并俘获一批敌人。我们在指挥所听到报话机中传来我军胜利的消息和金门守敌气急败坏地向台湾求援的呼叫声，内心的欢悦自不待言。同时，我们听到对岸枪炮声十分激烈，都渴望我军船只赶快返回，运送第二梯队继续登陆。这一夜，大家谁也不曾合眼，都密切注视着对岸金门岛上战况的发展，不料直到天亮，也不见一艘船只返回，却看到敌机在金门岛北部上空对我船队狂轰滥炸，不少船只

起火焚烧。原来我军船只一到达对岸就遇上退潮，因搁浅而无法返回。我们眼看着船只被烧，第二梯队无船过海，内心的着急和痛苦实非言语所能形容。古语说“隔岸观火”，是事不关己袖手旁观的意思，而我们却是看在眼里，痛在心头，异常着急而又无计可施！这样的心情，是我参加革命以来，从未经受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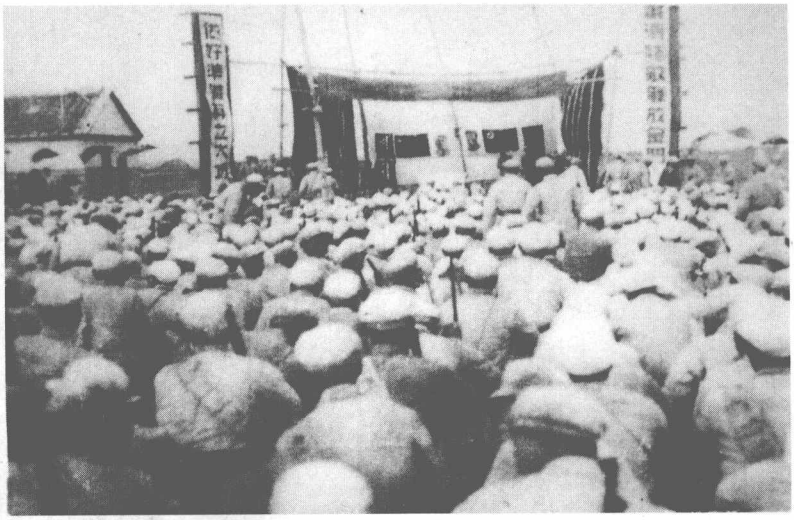
在古宁头登陆的二五三团同志，不管第二梯队是否到达，仍按预定方案奋勇作战。他们除留一部分人控制古宁头滩头阵地外，主力向金门县城发展，到25日晨占领古宁头以南的林厝、埔头一线阵地，并与二五一团取得联系。两个团同有海空军和坦克配合的敌军展开激战，杀伤大量敌人，自己也伤亡甚众。

25日晚，兵团由厦门调来一批船抵达澳头，这些船只能装运两个连，原定为第二梯队的二五九团遂派两个连登船起航。因夜间风急浪高，有两个排的船只失散，仅四个排于26日晨3时在古宁头登陆，同二五三团会合。这样“杯水车薪”式的增援，实在无济于事。

二五三团与二五一团并肩作战近两昼夜，遭到敌人连续反击，不得不于25日傍晚同二五一团一部退守古宁头。26日，他们与进攻的敌人展开巷战，同敌人逐屋争夺，白刃格斗。我们隔海看到，古宁头炮火连天，敌机敌坦克反复冲杀，对二五三团的处境万分焦虑，恨不得插翅飞过海去参加战斗，对自己的无能为力极感痛苦。

26日，各登陆部队被敌包围，二五三团也退到古宁头坚守。我守在海滩上，眼看对面金门岛上炮火连天，报话机里传来登陆战友血战到底的誓言，心急如焚，痛苦万分。兵团政治部主任刘培善打来电话说：“金门岛上没有师级指挥员统一指挥，你快过海到金门去指挥。从厦门给你派一条机动船。”军情危急，军令如山，我二话不说，就接受了这个艰巨任务。眼看兵团从厦门调来的民用机动船乘风破浪而来，我十分高兴。谁知船主人贪生

怕死，不愿送部队去金门。船快靠岸时，他加大马力猛冲，一下子把船开到岸上搁浅了，必须等到海潮大涨时才能开动。我当时气得火冒三丈，恨不能掏出手枪向船主开火，狠狠地骂了几句，赶紧转身设法找船。这时，上级又来指示，鉴于金门之战已近尾声，取消我过海指挥的任务。



金门战斗前，二十九军誓师动员大会，会场两侧对联为：肃清残敌解放金门，做好准备再立大功。周锋 / 摄

27日，激战60小时的金门战斗宣告结束，我登陆部队半数壮烈捐躯。消息传来，我不禁泪如泉涌。这个团在金门受挫，是我军的一大损失。这个团的战友们，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这就是我知道的金门战斗，这就是我为什么把这张照片珍藏至今。

朱云谦（1919.3～1989.1）江西省莲花县文路村人。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原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主编注： 《金门战斗前，八十五师营以上干部合影》这篇文稿是朱云谦晚年在住院期间断断续续写的。照片中，许多人参战后就没有回来，金门战斗结束后，二五三团许多战友的身影，不时出现在朱云谦的记忆中，朱云谦内心的沉痛长期无法消失。听胡阿姨说，朱云谦经常拿着这张照片暗自伤心，只要是从金门战斗回来的战友找到朱云谦，他都尽其所能帮助他们安排工作、解决待遇。二五三团是1942年在抗日战争最困难、最艰苦的时期建立的老部队。最初的基础是由新四军一师伤愈的战斗骨干组成的特务连，后发展为特务营，再扩建为特务团，1945年编入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尔后编入华东第十一纵队三十一旅，坚持苏中敌后，在多次战斗中挑大梁，作出了突出贡献。1947年春，朱云谦调任三十一旅副旅长，即同这个团的同志共同经历了苏中、苏北作战，淮海战役，上海战役，直到进军福建。二五三团不愧为一支英勇顽强、能攻善守、屡立战功的精锐部队。



清澈的河面上，竹筏上站立着英姿勃勃的莒南独立营的官兵，朱仲祥手持望远镜站在中间（右三），竹筏上的重机枪是在莒南战斗中缴获日军的战利品。

一个朝鲜军人和他的13张照片

朱伟民/文

初听13张照片的故事，仿佛在听一个传说。

这13张照片中，12张出自一人之手。

1944年11月，山东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滨海军区发动了莒城战役，获得重大胜利，不仅缴获武器弹药，还抓获了日军俘虏，其中一名17岁的日本小军官，特别引人注目。被俘时，这名日本小军官用手紧紧护着一架照相机不放，而且，冲洗照片的设备一应俱全，大家都非常好奇，纳闷这个日本小军官枪都丢了不要，还拿着照相机干什么？



在审讯中才知道，原来这名小军官不是日本人，是朝鲜人，很小就被送到日本去学习，在日本被征召入伍，从事文化工作。这名小军官虽然是俘虏，中文说得不好，但却写得一手好汉字，光唐诗就能默写不下一百首，他一笔一画的专注神态，引起了八路军滨海军区莒南独立营副营长朱仲祥的注意。朱仲祥入伍前有文化，在家乡自家开办的中学当过校长，顿起惜才爱兵之心，觉得这个人可以教育过来为我们所用，不仅可以教战士们学文化，还可以在同日军战斗时做反战宣传。于是，这个日本小军官连同他手中的照相机，一起走进了八路军滨海军区莒南独立营。

朱仲祥的这一决定，大大出乎日本小军官的意料。小军官发现，朱仲祥对他非常友善，一点没有官架子，八路军的干部和战士之间也像兄弟一样亲密和谐，不像日本军队中军官等级分明，虽然自己是一个战俘，但谁也没有对他另眼相看，更没有人对他粗暴，他开始笑了，要求大家不要叫他日本小军官，他是朝鲜人，他很快融入了八路军中这支非常普通的部队，成为了莒南独立营的一名八路军战士。

战争年代，照相机非常金贵，朱仲祥规定，小军官的那架照相机，除了拍照片的人，谁都不准动，再说，也没人能玩得转。小军官揣着他心爱的相机，心想，八路军打了胜仗，理应拍照留念，他要让八路军的人知道，照相机的用途和它的价值，也要让朱仲祥放心，自己的一技之长可以在八路军中发挥作用。他兴致勃勃地在反“扫荡”战场——莒城城东沭河边，为莒南独立营的干部照相，照片中，清澈的河面上，竹筏上站立着英姿勃勃的莒南独立营的官兵，朱仲祥手持望远镜站在中间，竹筏上的重机枪是在莒南战斗中缴获日军的战利品。莒南战斗中还缴获了日军的军马和自行车，由于缴获的自行车都要上缴，小军官又让莒南独立营的干部骑着缴获日军的6匹军马、1辆自行车照相留念。

朱仲祥和战友们骑在军马上，威风凛凛，那是一种打了大胜仗后从心底里洋溢出的自豪感。

照片洗出来后，大家争相传阅，从此，莒南独立营的官兵对







莒南独立营的干部骑着缴获的日军军马和自行车留影。

小军官刮目相看。

朱仲祥负责保管相片，谁要看，都到朱仲祥这里来饱眼福。无论行军还是打仗，朱仲祥都用油皮纸妥帖保管，在朱仲祥看来，照相这种奢侈的事情根本轮不上他们这样一支基层的普通队伍，幸好有了这么一个人，让朱仲祥遇上了，才有可能留下这些照片。当时战争条件艰苦，相纸非常有限，照片洗出来，不可能一人洗一张，因此，这些记录莒南独立营官兵战斗生活的照片，朱仲祥始终用生命呵护着，有战友来，就拿出来看看，聊聊照片









送朝鲜同志。

中的故事，看完后就收好。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朱仲祥去世前。

这是生命中怎样的一种珍藏啊！这一张张首次披露的莒南独立营基层指战员的勃勃英姿，鲜活而真实，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心灵的震撼。

小军官走上了革命道路，参加了八路军，抗日战争胜利后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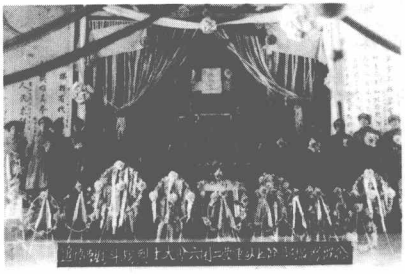
参加了解放战争，并用他手中的照相机，记录着莒南独立营的光荣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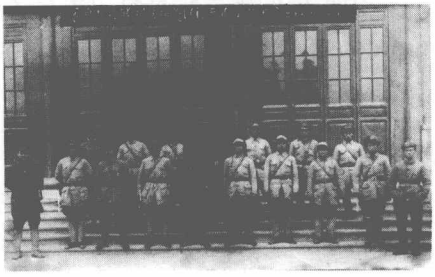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为了支援金日成同志，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籍干部送回朝鲜。那时，小军官已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一一三师直工科下辖直属营的一名干部，朱仲祥时任三十八军一一三师直工科科长。临行前，朱仲祥翻开这些照片，看了又看，依依不舍，担心以后恐再无机会与小军官见面，于是，朱仲祥主动要求给小军官和大家一起拍张合影，在朱仲祥拍的这张《送朝鲜同志》的照片中(左图)，前排左一穿马靴的年轻军人就是那12张照片的拍摄者——小军官。

此后，大家谁也没有小军官的音讯。

上个世纪70年代，听说小军官来中国访问过，位阶不低，已经是将军了。但那时，朱仲祥早已去世多年，相见无缘，留此遗憾。但是更让朱仲祥家人深深遗憾的是，在朱仲祥生前，没有问问父亲，那位会照相的小军官姓啥叫啥，没有问问照片中莒南独立营的干部是谁在哪。唯独这13张照片，依旧像过去一样，在家中珍藏，谁要来看，就拿出来，看完后收好。这种习惯，朱仲祥的家人沿用至今。（朱伟民口述　郑鲁南整理）

朱仲祥（1917.7~1971.12）山东省沂南县土山村人。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军政大学筹建组校务组长、军政大学校务部长。







三十九军军党委成员合影。照片左起：沈启贤（军参谋长）、李雪三（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信泉（军长兼政委）、贺大增（政治部副主任）、谭友林（副军长）。

三十九军军党委成员合影

潘荻　文/摄

这张照片是1950年9月三十九军抗美援朝出国前，在辽阳市召开全军英模代表大会时，军长、政委、参谋长、副军长、政治部副主任五位军党委成员在会场外的合影。这是我军事记者生涯中拍摄的第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

1950年5月，我放弃了广西平乐县女中学校校长的工作，到三十九军政治部《立功报》当记者。

三十九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主力部队之一。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打响后，该军在关系整个战局胜败的攻城战斗中屡建战功，为解放东北、华北谱写了不朽的历史篇章。接着又

奉命南下追穷寇、解放中南诸省，直到将五星红旗插上中越边境的“睦南关”（今友谊关）上，才班师北返中原休整。当时军部驻在河南漯河。不久，军部便接到中央军委密令：“三十九军限期开赴东北辽宁省备战”。原来，与我东北地区接壤的朝鲜半岛发生了战事，美国政府先令其驻远东的海、空军支援韩国军队（简称“韩军”），继而又令其驻日本的地面部队入侵朝鲜；同时还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非法决议，为美国及其纠集的16个国家的侵朝军队披上“联合国军”的外衣，并任命美驻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支持韩军向北朝鲜领土进犯。唇亡齿寒，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一方面为必要时派遣部队赴朝参战作准备。这一绝密的最高决策，当时只有少数被选派赴朝的部队首长知道。

7月的夜晚，热浪逐渐降温，宁静的祖国大地忽然出现了躁动。19列载着三十九军全体指战员及辎重装备、武器的火车，先后从漯河地区出发，连夜风驰电掣般由陇海路向东北方向驶去。沿途除济南站稍停加水外，其他各站一律不停，呼啸而过。当时我也是这批军列的乘员之一，坐靠车窗，看到站台上的铁路员工和旅客们投向我们军列的目光中流露着惊奇和敬意。当时全国人民开始享受和平的日子，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如日中天，全民景仰而信赖。解放军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是“胜利之师”“人民子弟兵”，可亲可敬。因此，即使有老百姓看到了军列的夜间行动，也不会去猜疑和议论。于是，三十九军的移防任务在7月中悄悄完成。军部驻在离沈阳一小时路程的辽阳；一一五师、一一六师、一一七师分别驻扎在距边境丹东市不远的海城、盖县、凤凰三个小县。全军开始积极备战。

这时，我也走进了三十九军政治部立功报社编辑部。我的第一课就是接受紧张的军事生活，同时开始学习军报的采编业务。备战期间，我参加了政治部召开的全军英模表彰大会，采写了解

放战争期间立功的战斗英雄和模范人物；参加了全军集训、检阅等备战活动。司令部派出参谋处长赴朝了解敌情和地形，回来制作朝鲜地形沙盘，召集全军营以上干部介绍朝鲜情况和敌情；认真检查武器装备、通讯设备，及时补充或更换；军后勤部积极调集军需物资、更换赴朝军服等。经过紧张的备战、思想动员和精神准备，指战员们斗志昂扬地待命入朝参战。

1950年10月20日夜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各部奉命按军委作战部署，从不同地点先后秘密渡过鸭绿江，入朝参战。一场声震寰宇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国际战争从此拉开序幕。几乎就在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踏上北朝鲜国土的同时，美国侵略军已占领了朝鲜首都平壤，敌人迅速向中朝边境推进，甚至出动战机频繁骚扰中朝边境的我国城镇和乡村。第一批出国参战的三十九军指战员当日夜晚，从丹东市跨过鸭绿江边境铁桥进入北朝鲜新义州。

当时，上级规定女同志一律不上前线，留守国内。三十九军辽阳留守处的女干部和家属们，每天都在等待：等待战斗的捷报，等待丈夫的平安信息。但是战争是无情的，何况抗美援朝志愿军是用步枪加小炮与武器装备精良、技术一流的美国侵略军交锋。三十九军部队踏上朝鲜国进军不到半小时，突然指挥车遭到空袭，敌机地毯般地扫射并投下了几十枚炸弹，军首长分坐的七辆指挥车中，与我丈夫沈启贤同坐一辆车的参谋处长何凌登同志不幸中弹身亡，他可能是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位牺牲者，遗体当即被运回国内殓葬。战争尚未打响，便有干部牺牲，这是我第一次面对战争，第一次领会“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憾和悲痛。

一天，报社传达室突然通知：三十九军来人找我。我的心跳加速，不知道是喜是悲，当看到参谋长的警卫员在对我微笑时，我悬着的心才落下来。警卫员告诉我说“首长平安，要我给你送点战利品（一桶奶粉、一桶咖啡）。这些东西战场上多的是。我

们战士不知道咖啡是干什么的，将它洒在雪上作路标。”警卫员讲道：首长去查看俘虏时，有美国军官俘虏埋怨中国军队不懂战规，说：“我们还在吃饭，你们就打过来了。”我听后哈哈大笑起来。随后，我将洋咖啡和洋奶粉分成许多包，让编辑部的记者、编辑们都能与我分享中国志愿军战胜美军缴获的战利品。

如今，洋咖啡、洋奶粉早已不是什么稀罕物，但是一喝到咖啡、奶粉，我就会想起自己第一次当记者时拍摄的这张老照片，就会想起当年在三十九军亲身经历的一段惊心动魄的军事生活。时间虽短，却终生难忘。

潘荻（1926.8~ ）湖南省长沙人。1948年参加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新华社资深记者。

一五六师“朝鲜团”入朝作战

邓鲁延/文



1950年2月，一五六师中的朝鲜族官兵奉命入朝鲜作战。师长邓克明（前排左三）、副师长全宇（前排左二）及师司令部机关干部在南昌市警备司令部大院合影留念。由于整编后的朝鲜族官兵划归朝鲜人民军战斗序列，因此，照片中的8位朝鲜族干部，都没有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

这张不经意拍的照片，谁也没有想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编制序列中占有一席之地，它真实记录了我军一个建制团整装后，从江西南昌入朝参战并划归朝鲜人民军的瞬间。你看，照片中两位干部随意穿着拖鞋，还有两个孩子跑来凑热闹，仔细观察还会发现，照片中一共10名军人，只有一五六师师长邓克明（前排左三）和他身后的一位半蹲的干部佩戴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因为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整编后的朝鲜族干部划归朝鲜人民军战斗序列，朝鲜族官兵一律不再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也就是说，这张照片中有8个人是朝鲜族干部。

1950年元旦刚过，一五六师师长邓克明突然接到江西军区陈奇涵司令员的电话，急令一五六师中的朝鲜族官兵，保持原建制，补充和更新装备后，待命入朝作战。

放下电话，邓克明思绪万千。他与好搭档副师长全宇早在延安中央党校时就相识了，那时，邓克明在学员队任区队长，全宇是学员。之后，全宇参加了太行山朝鲜革命军政学校组建朝鲜义勇军第五支队的工作，后任支队参谋长，参加了东北的解放战争。1948年1月，第五支队一部编入了邓克明所在的东北野战军独六师，全宇任副师长。在频繁的战斗中，两人互相尊重，团结合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一五六师，朝鲜族官兵主要集中在四六七团，初建时，全团几乎都是朝鲜族官兵，被称为“朝鲜团”。1945年9月，该团曾以中国人民军队的身份，举行了对日军一个连的受降式，收缴了侵略者的武器。1946年2月，在长春争夺战中俘敌1400人，活捉敌中将指挥官陈家桢和代理省长王斌华。受到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嘉奖，并授予马树民等5人为“五虎英雄”光荣称号。1948年3月,在杨大桥、太平村战斗中，该团在风雪交加的长吉公路上，连续两昼夜在雪地中追击敌人，受到东北军区通令嘉奖，该团三营集体记大功，并授予七连“英勇顽强第七连”光荣

称号，授予朝鲜族班长韩哲赫“猛虎英雄”光荣称号。在1948年5月辽沈战役围困长春小南沟战斗中，“英勇顽强第七连”在战场上又创新功，以一个连的兵力，击溃敌四个团，并灵活在防御中歼敌主力一个营，创造了防御战斗中的光荣范例，受到了总部通令嘉奖，同时授予独自一人俘敌30余人、缴枪30余支的战士严永道“独胆英雄”光荣称号。

多好的部队，多好的战士啊！这四六七团可是一五六师的主力团，也是邓克明最为难舍的部队，一想到这，邓克明心里就非常难过。可是邓克明深知，军令如山，无论感情上多么难分难舍，都必须坚决执行。

邓克明与师党委决定，从师财务结存款中拿出旧人民币5000万元（等于现在5000元）给朝鲜部队作机动费用。同时，给朝鲜战友每人赠送一个搪瓷碗；给每个连队赠送一个篮球和一部收音机；给连以上干部每人赠送一支金星钢笔。

2月8日，一五六师政治部召开军人大会，正式宣布了中央军委的命令。会后，师食堂把节余的伙食费通通拿出来买了鸡鸭鱼肉，以丰盛的晚餐宴别朝鲜战友。

1950年2月22日上午，一五六师举行了欢送朝鲜战友归国大会。在雄壮的军乐声中，师宣传队演唱了《金日成之歌》《阿妈妮之歌》，宣传队汉族女战士给全宇副师长披红戴花，朝鲜族女战士给邓克明师长献了花环。欢送会后，中朝战友难分难舍，迟迟不愿散去。

邓克明提议，拍一张相片留念，于是，师长邓克明，副师长全宇及师司令部机关朝、汉两族战友在南昌市警备司令部大院[①]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邓克明怀里的小女孩是他的大女儿，当时3岁半，另一个抱小男孩儿的干部，可能是朝鲜族干部迟炳学，这使得照片好像少了几分庄严，但恰恰是这张照片，真实生动地记录了那个年代……

当天晚上9时，一五六师的5000名朝鲜族官兵编为两个团，在火车站的站台上列队向中国敬礼告别。这5000名朝鲜族官兵当中，立过大功者有2000多人，被授予个人“英雄”称号的有100多人，80%的朝鲜族官兵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邓克明望着即将离去、曾经生死与共的朝鲜族战友，难过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个被人誉为“铁汉”的人，此刻与全宇紧紧拥抱在一起，任泪水在脸上流淌。

一五六师中的朝鲜族部队入朝作战后，在东北丹东换穿朝鲜人民军军装，编为朝鲜人民军第十二师，因部队英勇善战，被金日成授予一级独立自由勋章部队。师长全宇先后被任命为朝鲜人民军第五军团军团长、人民军总参谋部作战局局长、人民军副总参谋长等职，上将军衔。



1938年9月，时任一一五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参谋长的邓克明。

邓克明（1906.7~1983.10）湖南省安化县人。1930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原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七大、八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主编注①： 1949年6月8日，一五六师与二野四兵团的部队联合举行南昌市入城式，6月9日，在南昌市百花洲国民党“南昌市警备司令部”原址所在地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昌市警备司令部。这个大院，后来被改建为南昌市青少年宫。



雪地里，寒气袭人，张桃芳聚精会神地守候在阻击阵地上。

皮定均与神枪手张桃芳

王纪荣　文/摄

抗美援朝五次战役胜利后，我志愿军开展了著名的冷枪冷炮运动。一天，作战参谋向二十四军副军长皮定均同志报告，七十二师二一四团三营八连战士张桃芳，22天时间用274发子弹，打死71个敌人。皮定均听后，将信将疑。时值严冬，条件异常艰苦，皮定均从床底下找出一双自己一直未舍得穿的皮棉靴，交到参谋手上并对他说："你把这双棉靴带上，去看看那个张桃芳，亲眼看他消灭3个敌人，就把这双皮棉靴送给他，否则你给我拿回来。"

于是，九兵团摄影记者王纪荣便随着作战参谋一起带上皮棉靴到了上甘岭八连阵地。

为了了解张桃芳"打活靶"[1]的真实情况，第二天天还没亮，王纪荣就带上相机随张桃芳来到了前沿阻击阵地。张桃芳把王纪荣安置在一处既隐蔽又便于观察的地方，嘱咐他千万不要动，以防敌人狙击手的射击。然后，张桃芳迅速进入了狙击位置。

雪地里，寒气袭人，王纪荣不停地搓着双手，他抬头看了看远处的张桃芳，他正聚精会神地守候在阻击阵地上，王纪荣拿起相机，赶紧抓拍了一张。正低头，就听见一声枪响——张桃芳扣动了扳机，一个敌人应声倒下。紧接着，敌人的一个哨兵又被张桃芳击中，随即敌人的狙击手也开了火。王纪荣不敢抬头，怕暴露目标，又担心张桃芳的安全，正思忖着，远处响起了一声清脆的枪响，原来张桃芳早已安全转移到另一处阻击位置，机智勇敢地又消灭了一个敌人。

王纪荣和作战参谋离开八连前，向张桃芳说明了皮棉靴的来历，然后把它挂在张桃芳的脖子上。张桃芳不好意思地红着脸，低着头，在场的人都注意到了张桃芳脚上那双用军毛毯缝制的已经开了花的“旧棉鞋”。在那个艰苦的年代，一个军里皮棉靴也只配发两三双，即使在最冷的冬天里，张桃芳也没舍得穿，而是把这双皮棉靴当做勇敢杀敌的动力。

随后，二十四军副军长皮定均亲自深入连队，对张桃芳的射击技术进行“考核”，张桃芳用六发子弹打下五只小鸟，观看的干部战士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张桃芳被大家公认为是一名真正的名不虚传的神枪手。



二十四军副军长皮定均（握望远镜者）亲自深入连队，对张桃芳的射击技术进行“考核”，张桃芳用六发子弹打下五只小鸟。

王纪荣（1924~ ）江苏省扬中人。1944年秋参加新四军，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北京市文史馆研究员。

张桃芳（1931~2007.10）江苏省兴化人。1951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潍坊空军某师政治教导员。

主编注①： 从1952年5月开始，志愿军开展了冷枪冷炮杀敌立功运动，各军选择优秀射手组成阻击组，以单枪、单炮、单辆坦克为单位隐蔽在前沿阵地上，通过研究敌人的活动规律，采取灵活的方式经常变换阵地，准确地射击敌人。战士们把这种战法叫做“打活靶”。



志愿军一个步兵营以劣势装备全歼英军一个坦克营，这是一个很辉煌的胜利。可是志愿军总部在收到五十军上报的战报后，觉得有必要再核实准确。五十军指派参加这次战斗的一个排护送胡宝玉回到战场，把全部实况拍照下来，于是有了这一组照片，也有了胡宝玉在英军坦克前的留影。

歼灭英军二十九旅皇家坦克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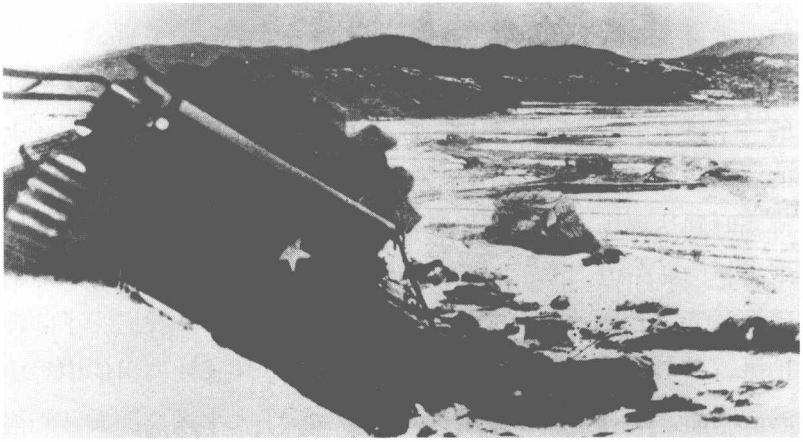
胡宝玉 文/摄

这组照片拍摄于1951年1月抗美援朝战场，我当时任五十军摄影记者。

1950年10月，五十军奉命入朝作战，我随五十军奔赴前线。1950年12月31日，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打响。中朝部队全线发起攻击。我跟随部队从高浪浦里以东至九野里强渡临津江，先头部队与敌江防部队交战不到一刻钟，突破了敌江防，占领敌阵地后迅速向纵深发展。1951年1月2日，美军和南朝鲜军第一线阵地被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全面突破，开始总撤退。我全线部队奉命实施战役追击。

1月3日，我军沿高阳至汉城方向追歼逃敌。先头部队的一营与侦察连先于高阳以北的碧蹄里击溃了美军二十五师三十五团掩护部队的一个营，又于仙游里堵击了从议政府取道高阳向汉城逃窜的英第二十九旅皇家来复枪五十七团掩护分队，经过短时间激战攻击了195.3高地，打死十多个敌人，还抓了37名俘虏。拂晓后，有300多敌人在飞机、火炮、坦克火力支援下，向高地反冲击，激战一天，我军打退敌人七次反扑，死死守住阵地，扼住了高阳，切断了议政府地带的敌机械化部队撤退的道路。

当夜，我步兵四四五团一营前进到汉城北40里的佛弥地、三下里一带，迅速分路展开，将敌坦克分队切成几段。同时，另一支部队的一个营也插到佛弥地，占领了有利地形，截断敌人的退路。溃退的敌人终于进入伏击区，两个营猛烈开火，在近两平方公里的一片山坳谷地上，对敌坦克行军纵队前堵、后截、拦腰攻击。敌纵队最先头的坦克首先被打坏，堵住了退路，乱成一团。各连迅即组织反坦克战斗组，采取多路突击，用集束手榴弹、炸药包、爆破筒展开了近距离的爆破敌坦克的殊死战斗。战斗整整打了一夜，将英军第二十九旅皇家来复枪第五十七团一部和英军第八骑兵（坦克）团直属中队（皇家重坦克营）全歼。炸毁敌



敌坦克被志愿军勇士以火箭炮、爆破筒、炸药包、集束手榴弹击毁在山谷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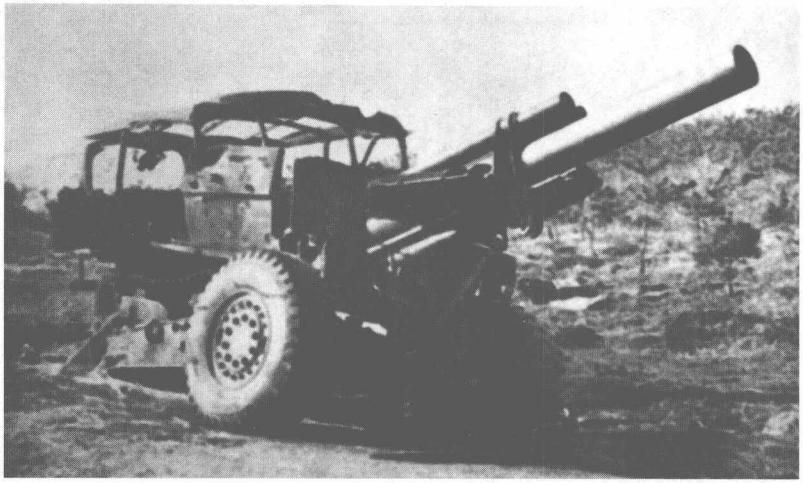
被我军俘虏的英二十九旅皇家来复枪五十七团坦克营官兵之一部。

坦克、装甲车27辆，汽车3辆，缴获敌坦克4辆、装甲车3辆、汽车18辆，还有两门榴弹炮，伤敌200多人，俘敌少校营长以下227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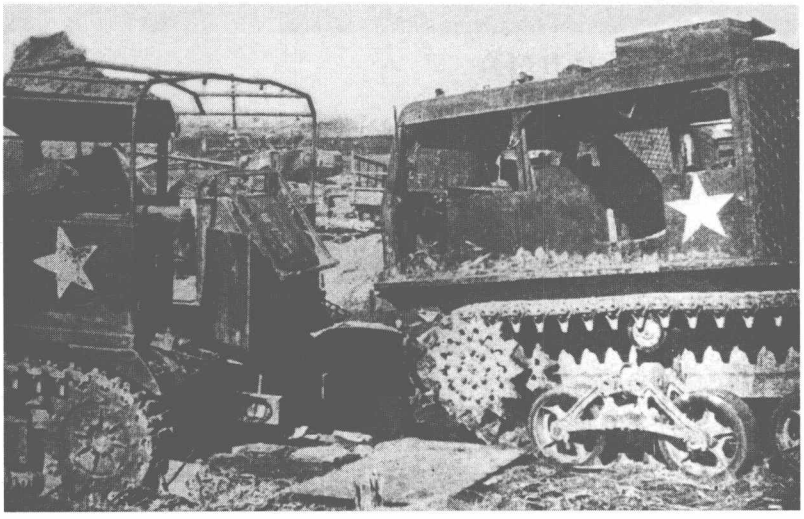
我志愿军一个步兵营以劣势装备全歼英军一个坦克营，这是一个很辉煌的胜利。可是志愿军总部在收到五十军上报的战报后，觉得有必要再核实准确，再报一次战绩。为了慎重，军首长打电话把我叫到指挥部，说明任务和情况，并指派参加这次战斗的一个排，由战斗英雄李光禄带领护送我再回到高阳，把战场上的全部实况拍照下来。任务紧迫，我们立即在寒夜中急速赶路，拂晓时到达现场。战地一片狼藉，被炸毁的坦克仰翻在山坳中，炮车斜倒在路边，敌军的尸体横卧在炮车旁，到处散发着浓烈的硝烟气味。天亮后，敌机时时掠空飞过进行侦察。我们为了隐蔽拍摄，个个身披白布做掩护，拍摄散布在这块长约两里的山谷中的战利品。边观察边拍摄记录，整整活动了大半天，随后转到离

战场七八里的一个小村庄，拍摄关押在村里的全部战俘。拍完后已到黄昏时分。大家稍作休息，就顺着原路星夜急行军返回军部，迅速将在战场上搜集的资料整理出上报总部。

看到这些照片，仿佛又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上……



被我军炸毁的敌105口径的榴弹炮。



被炸毁的牵引车之一部。

胡宝玉（1929.7~ ）河北省盐山人。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解放军画报社记者、编辑组长、研究员。



赵积华（左）与朝鲜云谷煤矿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劳动英雄朴永倍同志告别时，互赠纪念品后热烈拥抱的激情瞬间。

战斗英雄赵积华

徐洁　文/摄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已是指日可待。但是敌我双方在阵地前仍是剑拔弩张对峙着，时不时有小的摩擦与战斗，比如一个山头、一条通道的争夺。在临津江西岸的高阳岱东北山我军新占领的一个阵地上，阵地前沿有两个小山包与敌人隔江相望，这里可以密切监视敌人的行动，同时也是敌人越江向我们进攻的跳板，战略位置十分重要。7月18日拂晓，带领全班坚守在阵地上的志愿军某部五连五班班长赵积华，发现敌人阵地上有异常，他立即带领两个战士登上高地观察。上午9点，敌人开始用密集的炮火对我高地进行火力急袭，这是敌人进攻的

一贯手法。赵积华率领战士们隐蔽在掩体内，随时准备反击进攻的敌人。炮击过程中，敌火力不断假意延伸，企图诱使我军脱离坑道，杀伤我军。经过两次炮火延伸后，敌人的步兵约60余人，分五路向我高地冲来，妄图夺取高地。这时赵积华沉着指挥，等敌人距我主阵地只有30多米的时候，他一声令下，冲锋枪、手榴弹、手雷一通猛打，毙伤敌30余人，粉碎了敌人第一次进攻。不甘失败的敌人重新调整力量，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再次向我主峰冲来。这时我阵地上已有一名战士负伤，一名战士不幸牺牲。赵积华面对优势于我的敌人毫不畏惧，孤身对敌。他迅速跳进主峰右侧的一个掩体内，用手雷和手榴弹向敌猛打，打退了敌人的第二次进攻，毙伤敌20余人。赵积华想：只要我人在，阵地就不能丢。不一会儿，敌人又冲了上来，他根据敌人多路进攻的特点，把仅有的弹药放在弹药箱里，用绳子拉着，敌人从哪边上他就拖到哪里打，让敌人摸不清山上有多少人。很快他又打退了敌人一个排的两次进攻。战斗一直进行到下午3点，还没来得及休息，敌人又以一个加强排的兵力冲了上来。赵积华沉着冷静，越战越勇，他迂回到阵地左前方连续向敌人投弹十余颗，硝烟散处，敌死伤数十人，只有少数几个残敌逃向二号阵地。赵积华一人孤胆作战6小时，先后打退敌人6次进攻，战后清查共歼敌113人。赵积华同志在我军炮火支援下孤身奋战，保卫了高阳岱东北山的主峰阵地，战后被评为一等功臣。是年冬，被志愿军第十九兵团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并接受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的二级国旗勋章。在庆功会上和授勋仪式上我为赵积华同志拍摄了照片，但因为年代久远，部队几经转战，所有资料已遗损殆尽，无从查找。高阳岱东北山战斗胜利后第9天即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就在板门店签字了。停战后，赵积华同志积极投身到战备训练和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的战斗中，他处处带头，事事模范，为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5年后的1958年冬，赵积华所在的部队要离开朝鲜回国了，我又拍到了他向驻地朝鲜人民告别和胜利凯旋的照片。赵积华与朝鲜云谷煤矿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劳动英雄朴永倍同志告别时，互赠纪念品后热烈拥抱的激情瞬间。1958年11月回国部队途经丰台火车站时，赵积华与欢迎志愿军光荣凯旋的小朋友在一起交谈。时隔50年，现在赵积华同志也应是70岁以上的老人了，不知他现在身在何处，是否安康？赵积华同志的英雄事迹永远会在我心中长记。



1958年11月回国部队途经丰台火车站时，赵积华与欢迎志愿军光荣凯旋的小朋友在一起交谈。

徐洁（1932.9～ ）河北省安新人。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武警部队政治部创作员。

战前鼓动上阵地

张文苑/文



这张照片拍摄于1951年3月28日的朝鲜战场。十九兵团文工团创作组长张文苑（指挥唱歌者）和十九兵团文工团的话剧演员谢万和、杨振邦（坐着拉胡琴者）为战士们演出。

1951年3月28日朝鲜战场，三个文艺兵，冒着美军飞机的炮火封锁，在黄海道沙里院大东南的军长山阵地上，给五八六团挖堑壕的战士们唱歌、演讲，进行打阻击和防空降的战前鼓动。拿歌篇、指挥唱歌的是我——十九兵团文工团的创作组长张文苑，站在后边的是十九兵团文工团的话剧演员谢万和，坐着拉胡琴的是搞音乐的杨振邦。我们和战士们的共同意志是：打破美国军队向朝鲜蜂腰部进攻的野心。

我们演出的一个主要节目，是根据第三次战役中英军坦克营覆灭的前后经过改编的说唱曲目《痛歼英国皇家坦克营》，描述一位矿工出身的副排长领着三位战士用爆破筒、手榴弹率先打了两辆坦克，又带动全连齐奋战，使敌人的31辆坦克报销了的事迹。当我们刚演完这个节目，美军4架飞机几乎是擦着我们的头顶，从我们所在山的山腰部呼啸而过，人们随声喊起："机枪，手榴弹，打它的伏击！"但是只能叹惜，我们没有对空家什呀！

当时，十九兵团要求文工团下到师做战前宣传，每一个师至少要有一名文工团员。由于部队分散在山沟里或住在山洞，大多是以班为单位，所以下部队只准男同志去，女文工团员去学习或去征粮。接连几天，我们3个文艺兵，翻山跑路，走遍了全团隐蔽在山林里的大多数阵地，活跃了待命出击的部队士气。到4月中旬第五次战役前夕，师里宣传科的同志、名记者何日红等和我们一块到前沿排、连的阵地上做临战鼓动。第五次战役以来，人们很少听到歌声，对于唱歌，仿佛有隔世之感。十九兵团李志民政委提出，越是条件艰苦，越是要有歌声，战壕里就是只有一个战士，也要有歌声。于是我们抓紧时间创作，又添了《打好出国第一仗》等新节目，亦唱亦讲，鼓舞部队打进临津江、穿插议政府的斗志和信心。后来在临津江南岸，一位由战士架着的腰部负伤的副连长大老远见到我就说，我认得你，你的演讲能和人们的心气揉成一团！我不忍他费劲说话，赶紧把我撕掉了袖子里的棉

絮的大衣铺在他的身子底下，还把半小瓶人参膏留给了他。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各部队都评出了反坦克英模人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立三十周年的会上，兵团直属机关仅有200多人参加，我按李志民政委指示，在会上演唱刚写好的《歌唱王永章特功排》的叙事歌，宣扬他们在战役中打了美军4辆坦克，后来陷入美军包围，眼看要被敌围困时，他们骤然跳起，高唱《我是革命的好战士》歌猛冲，在美军不知所措的瞬间，他们甩掉了敌人，创造了一个奇妙制胜的战例。这首叙事歌被收进了兵团出版的歌集里。

1952年，我收到六十四军政治部通知，我和杨振邦创作的歌曲《打好出国第一仗》获奖，奖金三万（人民币旧制），词曲作者各一半。这是我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获得的最丰厚最有意义的奖赏。

创作来自生活，这张《战前鼓动上阵地》的照片，就像一首歌，一幅画，正如摄影家石少华说的：每一张照片都蕴含着一个娓娓动听的故事，表达着一种内在的语言。那就是我们的生活。

张文苑（1926.1~ ）河北省深州市人。1943年3月参加八路军，194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总政治部解放军文艺社副社长、顾问。



这张照片是在金城战役前拍摄的，照片中，志愿军二〇三师师长杨栋梁拿着望远镜在前沿阵地上观察敌情。

在金城战役中，担任歼灭“白虎团”的志愿军二〇三师师长杨栋梁，“擅自”更改了由兵团司令员杨勇亲自确定的炮火准备开始时间，提前了5分钟炮击。事后，杨栋梁不仅没有受到处分，反而由师长升任副军长兼参谋长。

这是怎么回事呢？

金城战役，炮击提前5分钟

杨东征/文

1953年夏季，朝鲜战争进入交战双方即将签订停战协定、结束这场长达两年多的战争阶段，为了打击美军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的嚣张气焰，配合停战谈判，促使战争早日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决心以第二十兵团在金城以南地区的有利战场态势实施进攻战役。

当时，担任二十兵团的杨勇司令员十分重视在作战中发挥炮兵的作用，为确保战役的胜利，调集了880多门大炮，并亲自确定全部炮火准备的总攻时间定为7月13日21时0分。这次战役，二十兵团六十八军的二〇三师则担负了战役的主攻并担任攻打南朝鲜军王牌精锐之师“白虎团”的重任。“白虎团”（南朝鲜军首都师第一团）全部美式装备，编制有1000多人。我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〇三师是一支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屡建奇功的英雄部队，这次两军相遇，可谓狭路相逢，棋逢对手。

志愿军二〇三师师长杨栋梁，在侦察敌情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讨论和认真思考，决心采取连续突破、穿插分割与化装奇袭相结合的战术手段，突破“固若金汤”的“密苏里防线”，全歼敌“白虎团”。同时，他还打破常规，在战前大胆将两个团数千人的兵力潜伏到“白虎团”的眼皮底下的进攻出发地域。经过14天紧张有序、艰苦的努力，二〇三师按照预期完成了进攻作战前的全部准备工作。

7月13日傍晚，志愿军第二〇三师指挥所里，灯火通明，通往各炮兵群的电话已全部接通，几百门大炮已处于临战待发状态，一触即发。作战科不时地和总部核对着时间，整个指挥所里笼罩着紧张的气氛，人们都焦急地等待着，离总攻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20时50分，南朝鲜军“首都师”炮兵，突然向我二〇三师部队发起猛烈炮击。

“敌炮向我进行拦阻射击!”观察所报告；

“我进攻出发阵地遭到敌人炮击!”二〇九团指挥所报告；

“敌人向我炮兵阵地进行压制炮击!”师炮兵群报告。

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一个情况连一个情况。

从情况判断，敌人似乎发觉了我军的进攻意图和进攻发起时间。杨栋梁师长看了一眼手表，时间是20时55分，距总攻时间还



杨栋梁在坑道前和干部交流。



志愿军捣毁“白虎团”指挥所。



志愿军坦克出击向“白虎团”阵地进攻。

有5分钟。这5分钟在平常不过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在现在，却关系着数千战士的生命，决定着战争的成败。杨栋梁师长深知炮火准备的开始时间、持续时间和结束时间都是由进攻作战的最高指挥官统一确定的，通常情况下，任何人都无权擅自更改。提前或推迟产生的严重后果，都将受到严厉的处罚。但是他更清楚，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如果继续等待，将面临被动挨打的局面。大家都焦急地看着杨栋梁，突然，他大声吼道："开炮！"并嘱咐参谋长立即将这一决定报告兵团指挥所。当时担任二〇三师司令部作战科长的康海至今记得：杨栋梁的这一声"开炮！"，震惊了指挥所在场的每一个人。随着杨师长的这声"开炮！"命令，顿时隆隆的炮声像汹涌澎湃的巨浪发出的怒吼，滚过大地，响彻云霄。在炮火的支持下，我二〇三师前沿部队，乘势像猛虎般向敌人发起攻击，仅仅用了12分钟就攻破了敌人防线，最后全歼南朝鲜军一个完整建制团，这就是人们所传说的"奇袭白虎团"战斗。

正是由于提前5分钟开始了炮火准备，减少了我军进攻中的伤亡，为全歼敌"白虎团"铺平了前进道路，并取得了战役的最后胜利。

在人们庆祝胜利的欢呼声中，杨栋梁反而忐忑不安了起来，军令如山，在战场上"擅自"更改命令，提前5分钟发起了总攻炮击，会是什么后果？杨栋梁做好了接受处分的准备。出乎意料的是，上级不仅没有批评他，反而肯定了他在危急关头果断、灵活指挥"奇袭白虎团"，全歼南朝鲜军一个完整建制团，杨栋梁师长被提升为副军长兼参谋长。

杨栋梁（1916.6~1989.1）河北省定州市人。1938年6月参加八路军，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军区装甲兵顾问。



康海（左）乘坐缴获“白虎团”的老爷车。

打扫战场，把敌人的武器搬回家

康海/文

这是在金城战役后，我站在缴获敌人的武器前拍的照片。

1953年，中国人民志愿军二〇三师一夜之间突破敌人“密苏里防线”，歼灭敌人一个团又两个营，能不能把敌人丢弃在战场上的大炮、坦克、汽车之类的重装备拉出来武装我们？我把我的想法向师长杨栋梁汇报，建议说：“是不是统一组织一下，把战利品抢出来，不然天明以后，敌人会轰炸战场，炸坏这些重装备的。”

杨栋梁一听，就说“好！”让我立即通知高炮营、炮兵团、炮兵群，让他们选派一批司机，到二青洞一带，把汽车、坦克都抢出来！

“是!”我正转身要走，又被师长叫住了。

“等等，”杨栋梁一摆手，告诉我：“缴获的敌人武器装备，是我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这些装备虽然是我师缴获的，但抢不出来太可惜了，你通知我各部队之后，立即向军部报告，让他们也组织力量来搬，不论谁抢出来，反正都是志愿军的。”

打扫战场，对兄弟部队开放，这在战场上是一个非凡的创举。

过去，很多部队打了胜仗之后，一般都要封锁战场，胜利品绝不能被外单位夺走，也就是说肥水不能外流。因为胜利品不但会改善自己部队的装备，而且也是打了胜仗的重要标志。所以，各个部队对打扫战场特别重视。

第二天拂晓，师高炮营教导员牛英田带领12名司机，徒步来到了二青洞战场。

一到二青洞沟口，牛英田就看到了数不清的大小汽车，高兴极了。牛英田数了数，光完好的吉普车就有30多辆，有的才跑了几千公里，有的只跑完初驶，比师首长现在坐的吉普车要好得多。他高兴地对大家挥挥手：“快，先开吉普车，一人一辆!”

司机们挑选起来，有的跳上车发动马达，有的检查仪表、油压等等。牛英田转了一圈，他发现了一个秘密，有的车头挡风玻璃下面喷着一个张着血口的白虎头，不用问，凡喷着这种白虎头像的吉普车，肯定是白虎团的。他心里说：既然我们歼灭了白虎团，必须先把白虎团的车开走，因为这是歼灭白虎团的凭证呀!他又下命令说：“先开喷着白虎头的吉普!”

司机们又忙活起来，都去找喷着白虎头的吉普去了。其中一辆，很新，白虎头特别鲜艳。司机小张如获至宝地跳上车，大声喊道：“你们看，这一辆肯定是白虎团团长的车，多新，多棒!”可是，他一踩打火踏板，怎么踩也发动不着。原来没有机油了。他扫兴地跳下车，提着机油桶到沟口被打坏的车上去找机油。



康海坐在缴获的武器上留影。

这时，敌人的一排炮弹扑头盖脑地打来。小张卧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

牛英田和通信员喊着跑过去，见小张头部中弹，已经停止了呼吸。牛英田很懊悔：如果早一点把车开走，不至于付出这个不必要的代价，他和通信员把小张抬上汽车……

在返回的路上，牛英田心情很沉重，本来可以开回13辆，只开回来12辆。他琢磨着，为了小张还得再来，多开回辆大卡车，夜间干。

当天晚上，牛英田多找了两个司机，开着车来了。到了战场上一看，嗬，好多人！由于战场对兄弟部队开放，大部分人都不认识。

很快，凡能开得动的汽车便被一抢而空，甚至损坏很轻的，换一两个零件，也被开了出来。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但是作为重装备的各种大口径火炮，如自行火炮、155毫米榴弹炮、105毫米榴弹炮、多管火箭炮等，仍然停在它们原有的发射阵地里。其实，这些东西比汽车更贵重，但它不是人们所必需的，所以无人问津。

我向参谋长王光霞建议说："对外开放战场，各种汽车已被抢出。由于道路条件差，各种火炮，一般汽车拖不动，人们也不感兴趣。现在看，要拖出这些火炮，只有坦克可以完成这项任务。因为坦克不受道路条件限制，好路坦克可以压坏，坏路坦克可以压好。拖炮正适合后者的要求。"

王光霞只是低着头沉思，我唯恐他不同意，又进一步解释说："不信，可以把坦克连连长叫来问问。"王光霞终于抬起头，耸耸他那浓重的眉毛，说："我看这么办，为准确起见，你先对道

路和各种火炮位置侦察一下，如果可行，咱们再向坦克兵下达任务。”

7月17日上午，我带着警卫战士小韩，沿着穿插营和化袭班所走过的路线，向二青洞方向进发。在三南里北面向东的山谷里，两架探照灯已被击毁。回想起进攻前敌人的探照灯光柱在夜空中晃来晃去，何等威风，现在已经瘫痪在它曾经逞过威风的地方，又是多么可怜可悲。

过了三南里，公路陡然向东。只见路上摆满了被击毁的汽车、坦克、自行火炮，有几十辆。

摸清了情况，我和小韩回到前指，我把这一切向王光霞参谋长作了汇报。他分析说，看来敌人的头面人物和下面的士兵想的并不一致，也说明装备越现代化，没有严密的协同动作，漏洞越大。他看了我画的缴获的敌炮分布和拖炮路线图，高兴地说：“把坦克连连长叫来，你直接向他交代任务！”

工夫不大，坦克连连长来到了前指，这位连长个子不高，但结实健壮。记得他姓李，名字想不起来了。我向他介绍了打扫战场的情况和执行拖炮任务的有利条件。他接受任务很干脆，没有强调任何困难。当我把所拖火炮的位置、路线图交给他时，他看了一会儿，高兴地向我敬了个军礼：“保证完成任务!”



康海和警卫战士小韩站在缴获的武器前留影。

18日拂晓，我们便接到了坦克连完成拖炮任务的报告，18门榴弹炮和多管火箭炮已经摆在了渔川里附近的山沟里。坦克连不仅圆满完成了进攻战斗的炮火准备支援步兵作战的任务，而且完成了一项绝无仅有的拖炮任务，为抢出战利品立了大功。

康海（1928.10～ ）河北省深县人。1943年2月入伍，194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山东省军区副司令员。



美军不得不举起手来

胡春侠/文　张崇岫/摄

这张照片拍摄于抗美援朝战场。

1951年5月下旬的一天，志愿军九兵团随军摄影记者张崇岫主动要求参加反坦克组上前线，随第二十军五十九师的一个团爬山越岭向议政府方向穿插，下午五点多钟，经过华川的时候，在云鹤山下迎面碰到正在撤退的美军第二十四师一个团的部分人员。

美军迅速开火，靠着坦克优势装备和强大火力横冲直撞，但是我军反坦克班班长潘泽明带领一个班的战士冲在最前面，在距离汉城只有百余里地的一条土公路上，与敌人狭路相逢，死拼硬打。反坦克班先用火箭炮打了8发炮弹，打伤击毁美军3辆重型坦克，被击毁的敌坦克熊熊燃烧，极大鼓舞了我军士气，挫败了敌人的锐气。

战士们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打下去。反坦克勇士们在“争取做反坦克英雄”的响亮口号下，奋勇向前。当时的场面很激烈，也很混乱，到处是炮弹。其他连队的官兵乘胜追击去抓敌人，美国大兵被追得满山跑。张崇岫看见一名班长勇敢地跳上被击毁的坦克，用英语大喊：“出来，投降！”他赶紧拍摄，只见美国大兵慢腾腾地从坦克里爬出来，在我军强大的攻势前，他们不得不举起手来。

这场战斗前后不过一个小时，结束时天还没有黑。虽然交战时间短，但敌人损失十分惨重，死伤三四十人，而我军大获全胜，几乎未有伤亡。潘泽明班在这次战斗中的英勇表现，被命名为潘泽明反坦克英雄班。战士们还从敌人的坦克里缴获了不少战利品，有巧克力、饼干、口香糖，还有罐装啤酒。当时很多战士还是第一次见到罐装啤酒，犹豫不决，不知如何处理这些战利品才好。张崇岫以前在国内曾见过罐装啤酒，就告诉大家，这是罐装啤酒，拉开盖子可以放心去喝。

关于这张照片，张崇岫在“文革”前后还受过一些委屈。有人说这张照片是摆出来的，不是现场拍摄的。张崇岫当时不想辩解，觉得这事自己心里最清楚。老人留有当年因这张照片被九兵团直属政治部荣记三等功的证书。立功的地点是黎木洞，立功的时间是1951年7月22日。立功事迹记录这样写着：

工作大胆、积极、勇敢，主动要求下连队，下部队、班、排，主动参加反坦克组，不怕流血牺牲，因而拍摄了敌人的真相。

在张崇岫老人的眼里，这张三等功立功证书，足以证明这张老照片确实是自己在朝鲜战场抓拍到的。如今，这张照片底片保留在总政解放军画报社，照片已被军事博物馆收藏。

张崇岫（1929.10～ ）安徽省巢县人。1942年参加新四军。原安徽日报社摄影组副组长、一级摄影师。

长津湖之战——东海胜利会师

郑鲁南/文　张崇岫 季一平/摄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长津湖之战举世闻名，但史料的记载却十分简单。

长津湖之战，是指第二次战役东线战场的清（川江）、长（津湖）之战。我们称长津湖战斗，美国人则喻为“赴战湖——地狱之旅”。

1950年寒冬，中国人民志愿军九兵团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长津湖地区展开了一场改变历史进程的殊死战斗。在长津湖战斗中，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伤亡和非战斗减员近万人。战后多年，陆战一师的作战处长鲍泽上校还心有余悸地说：“幸亏中国人没有足够的后勤支援和通信设备，否则陆战一师决不会逃离长津湖……长津湖的冰天雪地和中国军队不顾伤亡的狠命攻击是每一个陆战队员心中永远也挥之不去的噩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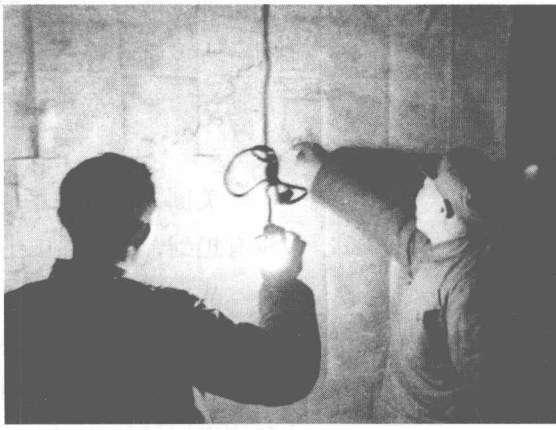
1950年11月底，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兵分两路，沿长津湖两岸冒进。志愿军九兵团穿着单衣，冒着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在恶劣的生存条件下，出其不意地机动到预定区域，突然于11月27日夜里将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两万余人，分割包围在长津湖柳潭里、下碣隅里、乾磁开、古土水一带。

在嘹亮的冲锋号中，志愿军官兵从冰天雪地里一跃而起，向陆战一师发起了勇猛的冲击。

第一夜战斗打成了胶着状。第二夜阵地反复争夺，宋时轮两次派部队围歼，终因战线太长，兵力分散，被围之敌在坦克、航空兵的支援下收效甚微。战斗异常残酷，美军的燃烧弹将志愿军阵地炸成一片火海，双方在被烧得滚烫的焦土阵地上反复较量，几度易手。九兵团政治部摄影组的同志几次要求随部队到前线采

访都被婉拒，一是因为夜间战斗中，闪光灯会暴露目标，照相机发挥不了作用；二是战斗激烈，难以保证摄影人员的安全。张崇岫想：摄影记者不上前线怎么反映前线战斗？按捺不住，拉上季一平就赶往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的指挥所。刚推门，警卫员就示意不要说话，警卫员告诉记者，宋时轮已经几天不知道吃东西了。张崇岫看着宋时轮站在地图前，眼睛微闭着、条理十分清晰地对作战处长金冶下达作战命令。命令口授一完，金冶就记录好了，字写得快又漂亮，作战命令几乎一字不改，准确无误。

张崇岫忽然感到来的不是时候，于是，拿出相机，想拍张照片就走。



宋时轮（右）看地图。
季一平／摄

九兵团指挥所设在山洞里，发电照明靠的是国内带去的发电机。为了拍好这张照片，张崇岫突然对金冶说："抓起灯泡。"金冶二话没说，一把抓起100瓦烫手的灯泡，宋时轮正好手指着地图。此时，宋时轮本能地眨了眨眼，回头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这张照片是1949年9月从上海参军的九兵团摄影记者季一平拍摄的，虽然照得不太好，但是在张崇岫的眼里，长津湖战役最紧张的时候，也是宋时轮最辉煌的时刻。

夜幕降临后，志愿军九兵团展开了英勇的攻势。二十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不顾饥饿和重大伤亡，英勇顽强地向美军步兵陆战一师、第二十四师第三十二团一个营和炮兵、坦克各一部发动猛攻。

长津湖围歼战整整打了九天九夜，志愿军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一座英雄的丰碑。

对这场战斗，九兵团随军摄影组组长张崇岫记忆犹新，美军在长津湖大范围撤退时，美军的飞机在冰天雪地的长津湖地区

四处投放传单。传单上的大意是：美军在长津湖碰上了强硬的对手：一个是黄埔军校的宋时轮，一个是不怕死的陶勇。

美国人想不明白，美军的王牌师——海军陆战一师、步兵第七师，怎么会输在朝鲜战场？会输在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人之手？美国人查东线战场的对手是谁？中国的军队指挥是谁？终于，美国人为自己的失败找到了自圆其说的理由，原来东线战场的对手是红军时期的指挥员、战斗经验丰富的宋时轮。

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天气里，传单像雪花一样飘散，美军的阵地上能捡到，志愿军的阵地上也能看到。当张崇岫捡到传单时，大家都相视一笑，谁也没有在意。张崇岫老人现在想起来非常遗憾，为什么当时没有留下一张传单做纪念呢，那是历史的见证。

美国人以为撒了传单就能让美国兵知道自己的对手是谁，却没有想到，一些美国士兵捡了传单后就不愿打仗了。

战场瞬息万变。

当“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向全世界宣布“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时，在冰天雪地中，缺乏装备、弹药、食品和防寒用具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面对优势的美军，粉碎了“联合国军”的总攻势。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强大的攻势之下，美军不得不撤出长津湖地区。当张崇岫冒着生命危险，赶到咸兴港时，美国兵在大量坦克、飞机的掩护下早已亡命撤退。遗憾的时候，张崇岫正巧看见一群素不相识的朝鲜人民军海防部队和志愿军二十军五十九师侦察连迎面而来，他顾不上疲劳，赶紧拿起相机，兴奋地给大家拍照。照片中，穿着黑棉衣、戴着棉帽、侧面微笑的，就是五十九师便衣侦察员王日德（照片中的幸存者，退休前在杭州邮政局工作）。

照片洗出来后，效果很好，照片的背景是在长津湖，虽然看





东海胜利会师。
张崇岫/摄

不见美国军队，但是咸兴港码头清晰可见，曾经在这里耀武扬威停泊的美国军舰已经了无踪迹，中国人民志愿军用小米加步枪，把美国最强悍的部队赶下了海。

1952年，为了纪念抗美援朝胜利两周年，中国人民邮政特地出了一套4枚的纪念邮票，《东海胜利会师》就是其中的一张。这张底片和照片，已被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收藏。

张崇岫（1929.10~）安徽省巢县人。1942年参加新四军。原安徽日报社摄影组副组长、一级摄影师。



美军的汽车插着白旗开到板门店

谷岩　王卉/文　蔡尚雄/摄

1951年6月底，蔡尚雄和解放军画报的林扬受总政治部委派作为特派记者去朝鲜板门店采访停战谈判。

经过战争的洗礼，小镇板门店被夷为平地，不知是哪位将军圈定板门店为双方停战点，于是，这个不出名的小镇，便成了世界瞩目的焦点。

板门店，是距汉城以北56公里处的一个人烟稀少的小山村。

1951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同美国和南朝鲜进行停战谈判的地点，由开城移到板门店。当时，板门店什么建筑也没有，只好以一些临时搭起的军用帐篷作为谈判会场。停战协定签字的前一天晚上，朝中方面的工程技术人员奇迹般地建起了一座有朝鲜民族特色的木结构大厅。为了中国军队辨认方

便，特意在谈判会议场所临时用木板搭建了一个小酒店，并悬挂了一块用汉字书写的“板门店”招牌，板门店因此得名。

这张美军汽车插着白旗开到板门店的照片，就是蔡尚雄1951年7月拍摄的。

照片中，车上的美军士兵抽着香烟，悠然自得。虽然在板门店“非军事区”里要求任何人不得携带武器，但是渐渐散去的硝烟，往来途中的车辆，仍然有个安全问题。于是，中美双方商定：来往车辆都挂旗，双方自愿选择醒目的颜色为标志，美方选择了白色，中方选择了红色。

一天清早，美军的汽车从汉城出发，每辆车上都插着白旗，蔡尚雄赶紧拿出相机拍下了这个精彩镜头。

在板门店，蔡尚雄和林扬抓紧时间拍了不少好照片，可是没曾想，8月下旬，美方夜间突然派飞机轰炸我方驻地，破坏停战谈判。蔡尚雄又去拍摄了美军的罪证事实，想赶回国揭露发表。不料返回途中，发生了翻车事故，车突然遇到弹坑倾斜翻入稻田水沟，四轮朝天。蔡尚雄的头部已经栽入泥水中，鼻孔和嘴里都塞满了泥水，眼睛见不到一点儿光线。直到来人，才把奄奄一息的他拉出水稻田。

途中遇险，蔡尚雄后悔不已，他和林扬拍摄的胶卷大部分都被水稻田浸泡报废了。有人劝他，人活着就好，可是对他来说，那些真实的、无可更改的历史镜头，永远无法再现。

这张照片，真实记录了朝鲜板门店谈判前后的一个侧影。

蔡尚雄（1919.9~ ）广东省中山市张家边村人。1938年奔赴延安参加抗日，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人民画报》副总编辑、顾问。



战俘回归祖国。

战俘回归祖国

袁汝逊　文/摄

无论任何人看到这张照片，都会受到强烈的震撼。

骨瘦如柴的战俘，为了回归祖国，同“联合国军”做了不懈的斗争。

1953年7月21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争夺战俘成了“联合国军”的一项特殊任务，为了强迫志愿军战俘去台湾，“联合国军”采用了强迫、逼供、威胁、利诱等各种手段。

当时交换战俘设了两个交换点，人民军和志愿军交换战俘的地点设在板门店；“联合国军”战俘交换地点设在汶山。

1953年8月5日，朝中方面与“联合国军”在板门店开始交换坚持遣返的战俘。交换战俘前，板门店云集了上百名的记者。

我当时是十九团政治部的记者，一直在开城前线采访。开城距板门店20里，我每天都到板门店，从交换战俘开始到交换战俘结束，始终在交换战俘的现场，亲身感受到了被俘人员回到祖国怀抱的激动心情。战俘们见到了人民军和志愿军的接收人员后，激动得热泪盈眶，一下车他们就把身上穿的破烂发臭的衣服脱下，扔到联合国官员的脚下，以示抗议和不满。

交换战俘从8月5日开始至9月6日结束，前后整整进行了一个多月，先是交换人民军的战俘，随后是志愿军的战俘，有时交叉进行；先是交换男战俘，之后是女战俘，最后交换高级干部。

记得刚开始，见到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人民军战俘和志愿军战俘，我就告诉自己：要用镜头说话，用图片作证——有的战俘被挖掉双眼，有的遍体鳞伤，有的步履艰难……当我看到这位骨瘦如柴的战俘从车上下来，迅速按下了快门。美国把自己称为民主国家，可是在朝鲜，美方战俘营虐待战俘等丑恶行为暴露了他们的本性。为了揭露美军的暴行和民主的假象，我拍下了一组组照片选寄到了《解放军画报》。这张照片当时由新华社转发国内外各大报刊，影响极大。

在交换战俘期间，我去过“联合国军”战俘交换地点汶山，“联合国军”被俘人员，穿着新的制服，吃得饱，穿得暖，还有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和板门店交换的战俘形成鲜明的对照。

9月6日，朝中方面将所有坚持遣返的“联合国军”战俘全部遣返完毕。

袁汝逊（1928.5~ ）河北省安平县人。1945年参加八路军，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转业。原北京新华分社摄影组长，先后当选内蒙古、北京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影协第三届理事，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中国老摄影记者联谊会常务副会长。



志愿军“释放美俘返国大会”现场。（志愿军前线部队敌军工作干部／摄）

火线释放美军战俘

黄继阳　程绍昆／文

在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面对美国空军飞机昼夜不停的狂轰滥炸，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在火线释放美军战俘的大会正在举行。

我们当时在志愿军战俘营担任翻译和管理工作，亲身感受到了中朝军队优待俘虏的人道主义精神。

志愿军部队于1950年10月25日开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最初的7个半月，即至1951年6月10日，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向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接连发动5次大的战役，歼灭了大量敌军，抓获了大批俘虏。这些俘虏除分批在火线释放了一些之外，大部分都转运到了志愿军战俘营。

早在1950年11月17日志愿军入朝参战不到一个月时，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副司令员邓华、政治部副主任杜平就联名写报告，就火线释放战俘问题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请示，得到毛主席的赞许和批准。第二天，即1950年11月18日，志愿军部队将第一批103名美、英军战俘在火线释放。此后在汉江前线又释放了第二批132人。再后来的各次战役战斗胜利结束之后，志愿军都陆续在火线释放过一些俘虏。

宽待俘虏，这是我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火线释放战俘这件事情本身就足以说明，我志愿军对放下武器的敌军被俘人员执行的是一条人道主义的宽待政策。志愿军在火线释放俘虏时，除发还其私人财物外，还给他们发食物、纪念品、安全通行证；有条件的还举行会餐。战俘临别时，无不感激涕零。

1951年4月7日，美军陆战一师一团二营四连上等兵冈查里兹被志愿军俘获。他是美军溃逃时被遗弃在战场上的许多美军伤员之一。志愿军部队的医护人员当即给他敷药治疗，并把他的手表、戒指等私人财物发还给他，又给了他一些食物、一张安全通行证，然后送他返回美军阵地。志愿军干部、战士都告诉他，如果美军方面不接纳他，他可以回来。冈查里兹泪流满面动情地说："我根本不愿离开自己的国家到外国打仗，都是因为受了蒙骗。"1951年10月23日晚上，志愿军前线部队释放4名俘虏，他们是：美军第二十五师三十五团九连二等兵斯莫塞尔和荷特，一等兵无线电员派克，下士副班长波义尔斯。这4名美军人员是1951年9月6日在中线西方山战斗中被俘的。他们在战斗中都不同程度地受了伤。他们被俘后，志愿军战士将他们送到战地医院治疗。志愿军释放他们时，为免遭美军炮火杀伤，给了他们一面白旗，指点他们走比较安全的路线通过火线。斯莫塞尔说："我回国后，一定要告诉美国人民，中国人民是美国人民的朋友，他们是爱好和平的人民，他们不要战争。"他还说："我一定要将志愿军

如何宽待战俘的情形告诉亲友们。”波义尔斯说：“你们救了我的命，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志愿军宽待俘虏、在火线释放俘虏的事受到媒体的高度关注，在国际上、在美国国内、在美军官兵及其家属当中，都产生了巨大的正面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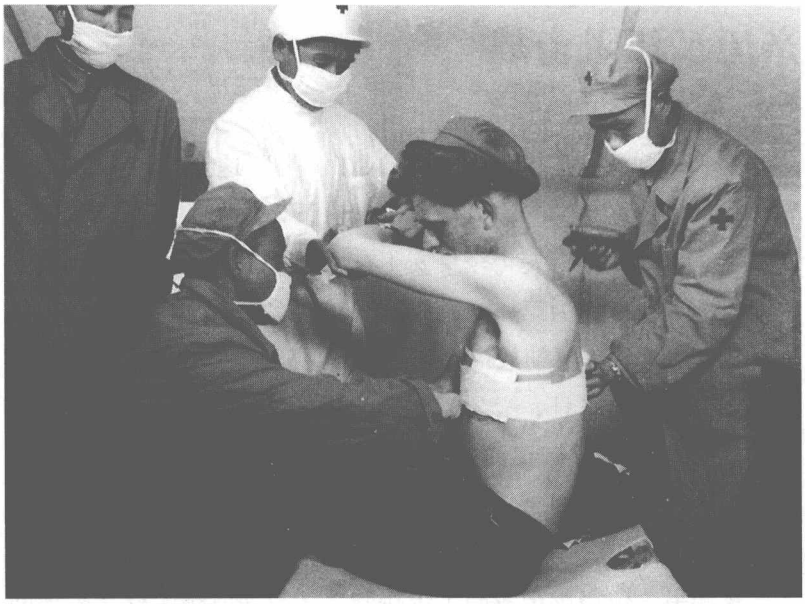
1950年11月23日，美国《纽约时报》根据路透社的消息报道：“被俘的27名美军伤员昨天被（中国人民志愿军）释放。伤员们说，他们被俘后，有吃的东西，待遇也好。”

1951年3月19日，美国陆军《星条报》援引美联社的报道说：“受伤的16名美军士兵返回了‘联合国军’的防线。他们都是2月12日遭受中国人伏击时被俘的美军第二师的士兵。中国军队撤走时，给这些（美军）伤员留下了吃的东西。他们（志愿军）本来打算用卡车将伤员送回美军防线，但一架美军飞机追上去把卡车打坏了。”

1951年10月27日，加拿大《温哥华日报》报道：“中国人曾无数次将受伤的美军战俘放回美军的阵地。伤员不能走路时，中国人就将伤员放在一个地方，美国军队去接运伤员时，中国人就停止射击。”

英国战史专家麦克斯·黑斯廷斯在他的《朝鲜战争》一书中谈到志愿军宽待和释放俘虏时写道：“说来奇怪，中国人在前沿地区对战俘执行宽待政策，很有诚意。在整个朝鲜战争中，中国人不仅不杀害‘联合国军’战俘，还把他们送回联军阵地加以释放。这类事例是很多的。”

法国巴黎《今晚报》记者报道说：“‘联合国军’方面的记者们在板门店告诉我说，他们曾在前线发现他们自己的伤兵，伤口已经被朝、中方面的医生包扎好，并且被放置在安全的壕沟里，然后被送回‘联合国军’的阵地。志愿军对俘虏的人道待遇是人间少有的。”



志愿军医护人员给予美军被俘人员及时的医药治疗。

（志愿军俘虏管理处新闻科／摄）

接替美国陆军上将麦克阿瑟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李奇微上将，在朝鲜停战14年后写的回忆录《朝鲜战争》一书中，也不得不承认志愿军在火线释放和宽待俘虏的事实。但是，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美、英军妄图用战俘问题大做文章。为揭露谎言，我们说服战俘中的原美联社随军记者诺尔背起了照相机，拍摄战俘生活照片，在美、英的报纸杂志上刊登，让谎言不攻自破，也驳得谈判桌上的美方代表哑口无言。这从另一方面说明战俘工作不但是瓦解敌军、削弱敌军战斗意志的有力武器，也是国际斗争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它是特殊的战斗。

程绍昆（1930.12~）安徽省巢县人。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在总政治部联络部工作。

黄继阳（1926.11~）湖南省澧县人。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中国航空服务公司副总经理。

亲历汉江阻击战

姜峰 文/摄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充满英雄气概的战歌，似乎还在耳旁回响。1950年10月下旬，我所在的五十军从安东（今丹东）和辑安（今集安）东西两线，跨过鸭绿江开赴抗美援朝战场。我作为第一批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摄影记者，有幸参加抗美援朝战地摄影报道，那年才是20岁的小伙子。

1951年1月25日，美军第八集团军，纠集南朝鲜军倾巢北犯，向我五十军防御正面宽约40公里的战线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我军依托简单的野战工事，对敌展开了艰苦卓绝的阻击战，一场震惊中外的汉江南北50昼夜的阻击战便打响了。

我和另一位摄影记者胡宝玉接受军《战斗队报》社长高巢的指示，担负报道这场阻击战的任务。我下到一四八师坚守帽落山一线阵地的四四三团。帽落山控制着水原通往汉城（现为首尔）的公路和铁路，西与四四四团坚守的修理山相毗连，与四四七团坚守的白云山遥遥相望，是拱卫汉城的一扇大门，是敌人进攻的重点。

1月27日，在战斗打响的前一天，我赶到坚守帽落山前沿主阵地的三营指挥所，并深入到最前沿的七连阵地。在这里我再次接受生与死的严峻考验。我虽然参加过解放战争时期解放中南的鄂西战役和解放大西南战役的战地摄影，但打的都是追歼战。那时蒋家王朝已摇摇欲坠，我军渡江南下之后，所向披靡，蒋军已不堪一击。所以当时我所经历的战地摄影，远远比不上这次在朝鲜战场这样震撼心灵。七连阵地离敌人只有500米左右，肉眼都能看到对方阵地上敌人窜动的影子。翌日拂晓，冷雾蒙蒙，阵前的能见度不到百米，敌坦克和火炮开始向我前沿阵地进行猛烈的排射，有几辆坦克竟猖狂地迂回到我阵地侧翼打炮，企图用炮

火直接摧毁我阵地的防御工事。浓雾刚散，4架敌机就飞临我阵地上空轮番俯冲投弹扫射，白雪覆盖的山头、山谷，顷刻间变成一片焦土，弹坑累累。有的野战工事坍塌了，被炸起的冻土覆盖了战壕……轰炸过后，敌军便在炮火、坦克和飞机的掩护下，向我七连阵地发起猛攻。我们的战士有的牺牲了，有的负了伤，阵地上硝烟弥漫，一片火海，然而英勇的战士没有一个后退。在敌炮疯狂轰击时，战士们躲进防炮洞里；当敌人开始冲锋时，战士们又从掩体、防炮洞里冲出来，伏身战壕前沿，瞅准敌人进入射程，便集中步枪、冲锋枪、机枪、手榴弹向敌群倾泻，一时弹片呼啸，子弹飞鸣，猛烈的火力打得敌人应声倒下，有的晕头转向，四处逃窜。敌人的第一次进攻被粉碎了，但很快又发动第二次进攻。我们的战士顽强阻击，沉着应战，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把敌人压回去，我们的阵地巍然屹立。

在打退敌人三次冲锋后，指导员张树洲被一颗流弹击中，浑身鲜血淋漓，包扎伤口后，他还坚持指挥战斗。一位云南籍的老班长头部负了伤，血流满面，卫生员给他包扎，绷带上渗满了血，排长和战士们劝他下火线，他硬挺着一直顽强战斗到昏厥过去。机枪射手田文富以灵活机动的战术，左右开弓，他从炸塌的掩体里跳出来，利用地形、地物，不断变换射击位置和敌人周旋，哪里上来敌人他就冲向哪里，奋不顾身地勇歼敌人。弹药手牺牲了，他便以神速的动作边压弹边射击。这一天他射出了800多发子弹，毙伤50多个敌人。他的棉大衣、棉帽被大大小小的枪眼打烂了，步枪打的，机枪打的，弹片划的， 50多个破洞，可他毫不畏缩，越打越坚强。（注：四次战役后，田文富的棉衣帽经志愿军政治部转送军事博物馆收藏）

目睹指战员殊死战斗的英雄行为，我陡然增加了勇气和力量。这正是："和英雄在一起，懦夫也会变得勇敢。"在敌人再次进攻时，我不再呆在防炮洞里，而是跟战士们一起守在前沿阵地

上，用手中的战斗武器——照相机，为坚守阵地的指战员记录下他们与敌人浴血奋战时那威武雄壮的英姿。

敌人在一轮密集的炮击之后，在坦克的掩护下又开始进攻了，我跟着战士们从防炮洞里冲了出来，伏身在战壕旁注目等待着。敌人在一步步往上爬行，当他们进入我军射程范围之时，连长夏居去一声令下："出击!打!"战士们一跃而起，端着枪像猛虎下山，呼喊着向敌人扑去。机枪手猛烈开火，掩护战友冲锋杀敌。我抓住战士跃出战壕的一刹那，迅速按下快门，"咔嚓，咔嚓"，把一张张动人的画面摄入镜头。照片洗出来后，画面真实再现了鏖战的场景，表现了志愿



在帽落山113.8高地上，机枪射手田文富机智灵活打退敌人数次冲锋。



军战士气贯长虹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我为这张照片取名为《帽落山鏖战》。照片发表后，被许多报刊画册采用，好评如潮。但是我深深知道，《帽落山鏖战》仅仅是抗美援朝战场中的一个瞬间，作为一个战地摄影记者，我亲历的汉江阻击战，才是永生难忘的。

姜峰（1930.8~ ）湖北省武昌人。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广东画报社记者组长、采编组长。

英雄阵地马良山

张炳新 文/摄

马良山，本是朝鲜开城东北地区几个海拔300多米的普通高地，因中国人民志愿军六十四军在这里同敌人进行了持续、艰苦、惨烈、反复争夺的攻防战而闻名。

1951年7月10日，开城停战谈判开始。为配合停战谈判，志愿军六十四军大纵深、多阵地设防，牢牢控制着黄鸡山、高旺山、马良山和烽火山一线阵地。敌继夏季攻势之后，于9月下旬又开始了秋季攻势。10月5日，敌以4个营的兵力分三路向我五七一团防守的马良山阵地进攻。三连激战一整天，阵地失守大半，连长、指导员身负重伤。副连长阎志刚在万分危急时刻指挥连队在黄昏时反冲击，硬是把阵地夺了回来。敌进攻不成，第二天凌晨，开始炮击我阵地，3小时内马良山一个高地就落弹两万余发，山头被削去1米多，树丛被打着燃烧，一片火海。我军伤亡很大，坚守216.8高地的五七一团七连剩有战斗人员20余人，而敌人炮击后紧接着组织三个营的兵力向我军猛冲。面对几十倍于我的敌人，文书张豪挺身而出，组织起通信员、司号员一齐上阵，硬是打退敌人五次冲击。激烈的攻防战歼敌2000多人，粉碎了敌人攻占九化里的企图。激战6昼夜之后，我军被迫放弃马良山阵地。

时任六十四军军长的曾思玉，是个江西小个子，也是条硬汉子，亲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率千军万马南征北战，他决心要把马良山夺回来。10月9日，一九一师师长谢正荣向曾思玉报告：英联邦第二十八旅苏格兰皇家边防团接替了美骑一师的马良山防务。曾思玉一听：机会来了。他要趁敌立足未稳，攻击马良山。

11月4日，我五七二团、五七三团向马良山阵地发起总攻。

激战一昼夜，完全占领了马良山阵地。3小时之后，敌即在坦克、飞机、火炮支援下向我反扑，次次均被我军击退。你攻我防，我防你攻，大小战斗持续不断。直到停战协定生效，马良山阵地牢牢控制在志愿军手里。

英雄阵地马良山，一时吸引了成批的作家、记者。但亲身上到马良山阵地采访的并不多。因为我军攻占马良山阵地后，敌人即使不反击，也是每天用多种大口径火炮向我阵地前沿、纵深及交通线轰击，平均每天落弹3000多发。敌空军对我轮番轰炸、扫射，阻我补给运输。坚守马良山阵地的连队，即使没有战斗，白天也不敢轻意在地面活动，绝大部分时间蹲在坑道里。就是说，要想上到马良山采访那是非常危险的。国内去的作家记者要求去，军政治部也不会批准。

我当时是六十四军摄影干事，在解放战争中曾经跟随主攻连队拍摄实战场景。作为战斗部队的一员，流血牺牲在情理之中。因此，我冒着敌人的炮火，几次上到马良山阵地摄影。

下图是五七一团三连副连长、一等功荣立者阎志刚（中）在马良山坑道里。



一等功荣立者阎志刚（中）和战士们在一起。

这幅照片是我同郝建国合拍的。郝建国是十九兵团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摄影记者，他来到我六十四军采访。我熟悉六十四军的防务，熟悉敌情、我情。两人优势互补，协同采访，拍摄了一批新闻照片，这是其中的一幅。在这之前我已去过马良山，所以我俩无第三者陪同，俩人在一天的黄昏出发，乘夜暗上到马良山。当夜完成拍摄任务后即下山，在一个小山村农舍草屋求住。房东中年夫妇见来了两个志愿军，拿出米酒款待："醋儿毛高"（请喝酒）。我不习惯朝鲜米酒刺鼻的酸味，喝不下。郝建国同我相反，喝了一碗又一碗，一面喝，一面用新学的几句朝鲜话同老乡交谈。天蒙蒙亮，敌开始无目标地四处炮击，炮弹在小山村落下。我俩同房东老少三口，五个人挤在一个小防炮洞里。战地采访，遇到敌人炮击、轰炸、扫射是经常的事，习惯地听着震耳欲聋的炮弹轰炸声。而房东那十一二岁的小女孩吓得一副蜡黄的面孔，炮弹的爆炸声引起她恐惧的哭喊，倒是撼人心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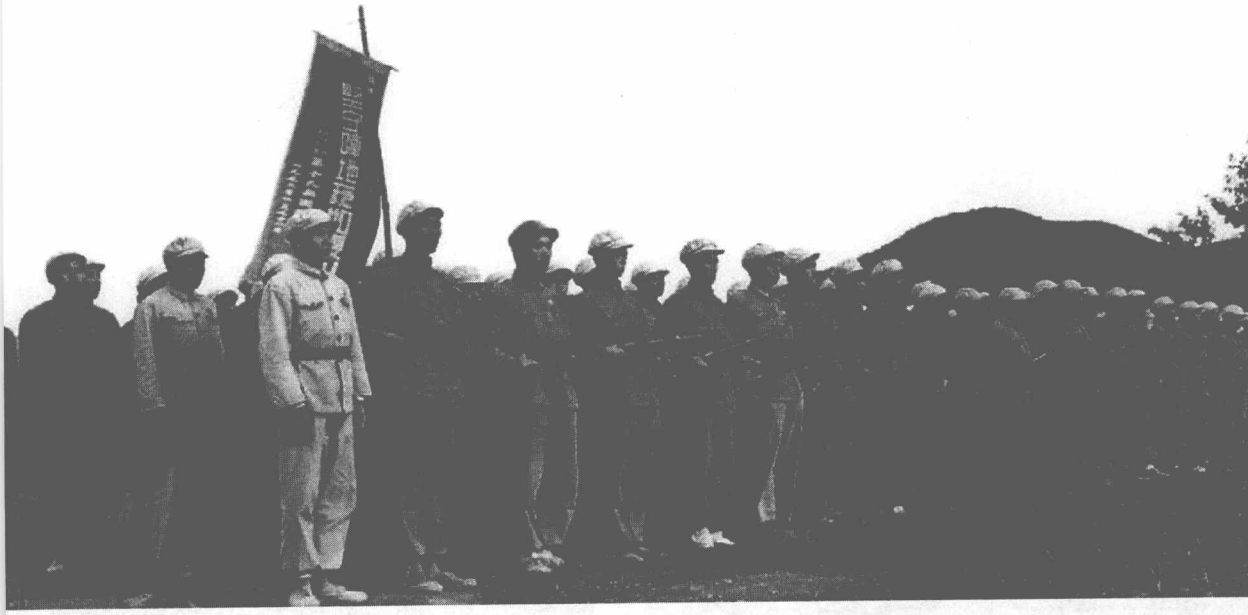
一等功臣、二级英雄张豪。

张豪，五七一团七连文书，一等功臣、二级英雄。张豪这幅半身像，我记不清是谁拍的了，除我之外，是王树德、余启邦？还是刘铭盘？反正是这四名摄影干事中的一个。

在马良山攻防战中荣立一等功的"马良山英雄连——五七一团七连"。

我拍摄这幅照片的时候，已经是七连换防下山以后的事情了，拍摄过程比较顺利。

六十四军军长曾思玉在历次战役战斗中向来有靠前指挥的习惯。而马良山攻防战是他在朝鲜前线的得意之作。马良山攻防战之后不久，他就晋升为志愿军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尽管敌人不停地炮击、轰炸，但他在离任之前，还是非常想到马良山阵地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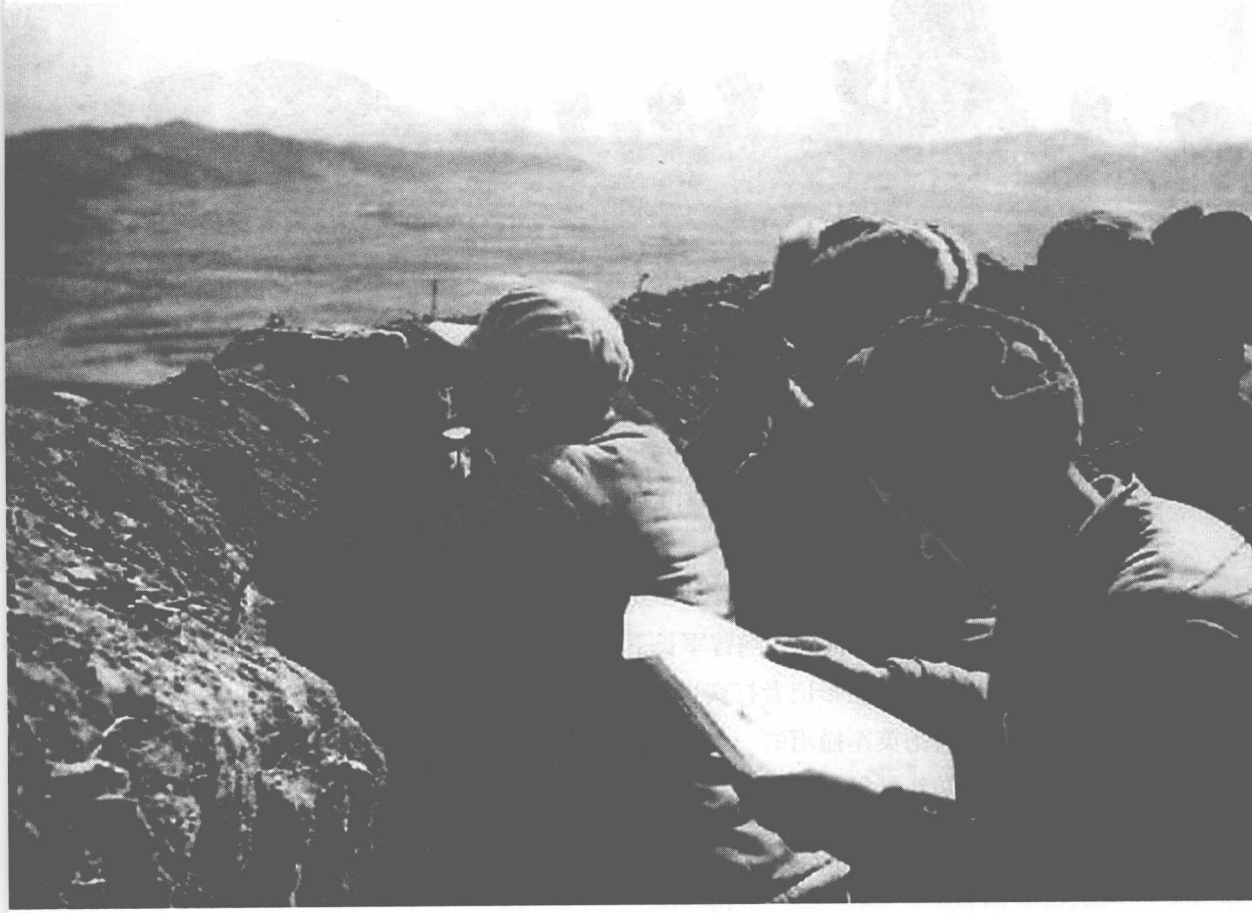
在马良山攻防战中荣立一等功的“马良山英雄连——五七一团七连”。

看。看看英雄的战士，看看马良山的地形地貌，也看看当面之敌的真面目。

一天上午，宣传处长沈定华（此人后来曾任解放军出版社社长）通知我到司令部报到，随曾军长下部队。

曾思玉很少跟摄影记者打交道，除了有一次他同参谋长马卫华一起派我去拍英军撤出的一个高地的作战工事（他们是从军事上考虑，不是新闻摄影）以外，再没有什么个别性来往。跟曾思玉军长下部队，我在朝鲜前线也就这一次。

一不坐车，二不骑马，除警卫人员之外，曾思玉带着参谋郭英（284页照片上看地图者，测绘能手，战后转业到石家庄河北省测绘局工作），走上山间崎岖小路。我一看，这不是奔向马良山吗？白天上山危险！但在军长面前，“危险”二字是不能说出口的。好在老天有眼，我们侥幸，那天只是远处有炮声，敌人没有对着我们炮击。曾思玉顺利登上马良山，我也顺势拍下这一难



六十四军军长曾思玉（左1）在马良山上。曾思玉在历次战役战斗中向来有靠前指挥的习惯。而马良山攻防战是他在朝鲜前线的得意之作。

得的镜头。曾思玉望远镜所指的照片左上方山岭，就是英联邦苏格兰皇家边防团的阵地。

我当时在朝鲜将这幅照片底片寄给解放军画报，画报没有刊用。好在画报社把底片保存在资料室。战后，朝方建军事博物馆，向中方征集文物。画报社将这幅照片推荐给朝方。转眼40年过去了，1992年，我有幸应邀作为前中国人民志愿军随军记者代表团的一员访问朝鲜。在平壤朝鲜军事博物馆里，我看到这幅照片高高挂起，顿时热血沸腾。它唤起我在朝鲜前线、在马良山上、在敌人狂轰烂炸情况下举着相机进行战场摄影的回忆。想当初，上下马良山如履平川，来来去去如走门窜户，将生死置之度外；而如今，脑中再现朝鲜前线的日日夜夜，想起长眠在朝鲜土地上的战友，不禁热泪纵横，感慨万千。

张炳新(1929.11~)河北省安平县人。1945年参军，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解放军报社主任记者。

后 记

2007年，我曾随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组织的“重走新四军北上抗日路”活动，跨越了福建、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五省，无论是在安徽岩寺、云岭新四军旧址，还是在皖南事变、黄桥战役、车桥战役、高邮战役遗址，总是能听见有人指着纪念馆里的照片，叙述父辈当年的往事。照片是无声的语言，但是当人们在叙述历史的时候，照片真实的说服力往往是文字无法比拟的。

本书收录了200余张战争亲历者珍藏的老照片，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中，这些老照片背后的故事，记录的不仅仅是瞬间的历史，而是战争年代独特的语言和情感，是对中国革命战争进程与内幕、人民军队征战细节的揭秘与展示。从《毛主席视察南泥湾》、《王秉璋在平型关大战中》、《胡奇才打冶源》、《陈毅、粟裕视察炮阵地》，到《红旗直插太原城 》、《自行车上的指挥部》、《日本鬼子举起手来》……每张照片都以独特的视角令读者似曾相识，又远比传闻中想象的更鲜活真实生动。它向和平年代的人们表明：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发生过惨烈的改天换地的伟大战争。

漫步在烈士陵园的青竹翠柏中，已经很难想象当年在这片土地上发生过的激烈枪战和经历的血雨腥风，多少历史往事已经烟消云散，但是在人们心里依旧余响不绝的，是那些亲历者经过磨难留下来的真实记录，那是历史深处最深刻的、永不褪色的记忆。

这部以亲历者、知情者口述、撰写的《军中老照片》，记录的是我军艰苦卓绝的发展历程，是当事人的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经历。

图片均由作者提供，未署名的照片，请摄影者阅后提供相应证明与编者联系，以便及时付酬。电子邮件信箱：zhln118@126.com。

文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知情者不吝赐教。（第二辑《军中老照片》正在整理过程中，欢迎来稿）

但愿这本书给读者留下的不仅仅是老照片的故事。

郑鲁南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军中老照片：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作者=闻鲁南主编
页数=286
SS号=12477575
DX号=000006847066
出版日期=2010.01
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封面
书名
版权
毛主席视察南泥湾炮兵团＆宋承志／文　　江青 / 摄
陈赓打榆社＆徐肖冰　文 / 摄
等待白求恩做手术＆罗光达　文 / 摄
陈庄战斗＆王雁／文　　沙飞 / 摄
王秉璋在平型关大战中＆王润西 / 文
陈毅、粟裕视察炮阵地＆康晓燕／文　　杨玲 / 摄
陈毅司令员在坦克上＆陈人康／文　　陈士榘 / 摄
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伪总统府＆邹健东　文 / 摄
第二军进军新疆的艰苦历程＆王北来 / 文
宣传车为北平和平解放打前站＆秦学惠 / 文
朱德总司令在机枪训练班上＆苏晓林／文　　苏静 / 摄
毛泽东与秋收起义部分同志合影＆刘松柏 / 文
井冈山的同志们＆熊光楷 / 文
陕甘边独立第一师唯一的一张合影＆王兆相 / 文
长征中的一张合影＆贾若瑜 / 文
首战平型关战斗中的“无名”参谋姜洪照＆姜毅生 / 文
陈伯钧参加苏区党代表大会——在延安的生活片段＆陈进元／文　　海伦 / 摄
马宁与日本友人香河正男＆黄晓意／文　　史沫特莱 / 摄
陈庄奋力折“牛刀”＆南溪 / 文
邓子恢率新四军民运队胜利归来＆邓小燕／文　　叶挺 / 摄
李天佑与“独腿”将军钟赤兵的三张照片＆李亚宁 / 文
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倡导的爆破战术＆罗小明　　黎小弟 / 文
自行车上的指挥部＆王扶之 / 文
周希汉，护送炮兵团回延安＆韦晓咏／文　　徐肖冰 / 摄
坚持在大青山＆张秀英／文　　王锦 / 摄
张震参谋长提议合影照相＆胡文良／文　　任泊生 / 摄
“皖南事变”中的王培臣＆罗颖 / 文
谭希林在大桥战斗中＆谭晓嘉 / 文
端炮楼＆刘丁玲　　刘兰丰／文　　刘峰 / 摄
胡奇才打冶源＆胡东平／文　　胡奇才 / 摄
芝麻部歼敌＆赵兴元／文　　胡奇才 / 摄
我军将帅首次集体转移＆滕飞 / 文
让敌人的飞机有来无回＆康鲁平 / 文
日本鬼子举起手来＆龙实／文　　龙实　　康矛召 / 摄
参谋长为英雄竞选唱大戏＆罗小兵／文　　罗义淮 / 摄
刘伯承司令员练打靶＆裴植　文 / 摄
龙飞虎：跟随毛泽东离延安＆龙剑辉　　龙海岩 / 文

敌人在那里！&邹健东　文 / 摄
山东即墨攻城记&姜京京／文　　姜子宽 / 摄
李堡战斗前，周团长做动员&周锋　文 / 摄
攻克昌黎城的勇士们&伍时宝／文　　吴群 / 摄
攻夺徐水，突击队冲上前&柳杞／文　　蔡尚雄 / 摄
齐家埠之战——胜利者的欢笑&李恕　文 / 摄
保北战役中荣立特等功&宋双来／文　　郝建国 / 摄
独四旅在运城战斗中&杨晓哲／文　　王琦 / 摄
人人有本血泪账&李宣化／文　　杨玲 / 摄
行千里　　决一战——孟县歼灭战侧记&黎枫／文　　黎枫　　尤青 / 摄
邓小平政委观看华东野战军战绩图片展&康晓燕／文　　杨玲　　康矛召 / 摄
上蔡阻击战突围记&李云诚 / 文
送军粮&张韫磊　文 / 摄
骑兵追歼敌坦克&孟秀玲／文　　杨玲 / 摄
杨罗耿兵团和“地面战场之神”&孔祥／文　　耿飚 / 摄
红旗直插太原城&韩红　　王卉／文　　韩荣志 / 摄
解放太原战役中的炮一师&张英 / 文
连战皆捷&张生文 / 文
进军大西北&李书良　文 / 摄
敌人在对岸&皮卫平／文　　王纪荣 / 摄
第十兵团领导人进福州&陈鲁生／文　　肖海 / 摄
千里行军进福建&张廷斌／文　　肖海 / 摄
五十军进军鄂川&胡宝玉　文 / 摄
刘贤权将军在滇南战役中&安少杰　　凌空／文　　余林 / 摄
谭善和，巧用吉普车运粮&王晓建 / 文
练好本领打北平&郝建国　文 / 摄
１９４９，炮击东单临时机场&栾克超／文　　齐观山 / 摄
朱总司令万岁&郑鲁南／文　　孟昭瑞 / 摄
和平起义：包尔汉迎接解放军战车团入新疆&伊力夏提·包尔汉 / 文
金门战斗前，八十五师营以上干部合影&朱云谦 / 文
一个朝鲜军人和他的１３张照片&朱伟民 / 文
三十九军军党委成员合影&潘荻　文 / 摄
一五六师“朝鲜团”入朝作战&邓鲁延 / 文
皮定均与神枪手张桃芳&王纪荣　文 / 摄
歼灭英军二十九旅皇家坦克营&胡宝玉　文 / 摄
战斗英雄赵积华&徐洁　文 / 摄
战前鼓动上阵地&张文苑 / 文
金城战役，炮击提前５分钟&杨东征 / 文
打扫战场，把敌人的武器搬回家&康海 / 文
美军不得不举起手来&胡春侠／文　　张崇岫 / 摄

长津湖之战——东海胜利会师＆郑鲁南／文　　张崇岫　　季一平 / 摄
美军的汽车插着白旗开到板门店＆谷岩　　王卉／文　　蔡尚雄 / 摄
战俘回归祖国＆袁汝逊　文 / 摄
火线释放美军战俘＆黄继阳　　程绍昆 / 文
亲历汉江阻击战＆姜峰　文 / 摄
英雄阵地马良山＆张炳新　文 / 摄
后记＆郑鲁南